

魏连科 著

古代藝術家傳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艺术家传

魏连科 主编

目 录

崔瑗传

- 《后汉书》卷八二…………… 魏连科译（1）

蔡邕传

- 《后汉书》卷九〇…………… 魏连科译（6）

韦诞传

- 《三国志》卷二一…………… 魏连科译（42）

邯郸淳传

- 《晋书》卷六〇…………… 魏连科译（46）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传

- 《晋书》卷八〇…………… 魏连科译（49）

桓伊传

- 《晋书》卷八一…………… 魏连科译（80）

顾恺之传

- 《晋书》卷九二…………… 魏连科译（86）

戴颙传

- 《宋书》卷九三…………… 魏连科译（92）

王僧虔传

- 《南齐书》卷三三…………… 魏连科译（97）

萧子云传

——《梁书》卷三五 魏连科译 (117)

郑道昭传

——《魏书》卷五六 任文坚译 (124)

江式传

——《魏书》卷九一 魏连科译 (132)

赵文深传

——《周书》卷四七 魏连科译 (144)

万宝常传

——《隋书》卷七八 魏连科译 (147)

韩滉传

——《旧唐书》卷一二九 魏连科译 (153)

柳公权传

——《旧唐书》卷一六五 魏连科译 (169)

阎立德、阎立本传

——《新唐书》卷一〇〇 魏连科译 (176)

虞世南传

——《新唐书》卷一〇二 魏连科译 (180)

颜真卿传

——《新唐书》卷一五三 魏连科译 (190)

欧阳询传

——《新唐书》卷一九八 魏连科译 (207)

李邕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魏连科译 (211)

张旭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魏连科译 (222)

郑虔传

- 《新唐书》卷二〇二 魏连科译 (224)
- 杨凝式传
-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 魏连科译 (228)
- 蔡襄传
- 《宋史》卷三二〇 魏连科译 (232)
- 李建中传
- 《宋史》卷四四一 魏连科译 (242)
- 米芾传
- 《宋史》卷四四四 姚汉荣译 (246)
- 赵秉文传
- 《金史》卷一一〇 魏连科译 (249)
- 党怀英传
- 《金史》卷一二五 魏连科译 (258)
- 王庭筠传
- 《金史》卷一二六 魏连科译 (261)
- 麻九畴传
- 《金史》卷一二六 魏连科译 (266)
- 巉巉列传
- 《元史》卷一四三 魏连科译 (269)
- 赵孟頫传
- 《元史》卷一七二 魏连科译 (277)
- 邓文原传
- 《元史》卷一七二 魏连科译 (290)
- 揭傒斯传
- 《元史》卷一八一 魏连科译 (295)
- 阿尼哥、刘元传
- 《元史》卷二〇三 任文坚译 (303)

祝允明、唐寅传

——《明史》卷二八六 魏连科译 (308)

沈度传

——《明史》卷二八六 魏连科译 (312)

王绂、夏景传

——《明史》卷二八六 魏连科译 (315)

文征明传

——《明史》卷二八七 魏连科译 (319)

董其昌传

——《明史》卷二八八 魏连科译 (327)

徐渭传

——《明史》卷二八八 魏连科译 (332)

沈周传

——《明史》卷二九八 魏连科译 (336)

刘墉传

——《清史稿》卷三〇二 魏连科译 (340)

戴熙、汤貽汾传

——《清史稿》卷三九九 魏连科译 (343)

翁方纲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魏连科译 (348)

包世臣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魏连科译 (351)

何绍基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魏连科译 (354)

张裕钊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魏连科译 (358)

傅山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魏连科译 (361)
- 王澍列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三 魏连科译 (365)
- 王时敏列传
- 《清史稿》卷五〇四 魏连科译 (388)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以她悠久的历史、光辉的成就而著称于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书法、绘画、篆刻、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等艺术门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艺术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艺术影响发展起来的，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她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唯其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放出独特的光辉。唯其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艺术各个门类的发展，源远流长，各种艺术家人才辈出，灿若群星，各逞风流。他们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以自己的天赋和才华为中国艺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或者处于困顿之中，以艺术的追求进取反对财富和官位的追求；或者为权势者们排挤，甘冒风险为艺术而不顾迫害；或者身居显要，但不迷恋声色犬马，仍为艺术的发展而发挥自己的倡导力量；或者一生孜孜以求，为艺术而献身。为了使读者对我国艺术的发展及对艺术家的生平和艺术实践有所了解，我们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选收了主要艺术家的传记，译成白话，供读者学习参考。

选目遵循如下的标准。

一、每个时代选取最优秀的艺术家，以体现那一时代的艺术发展水平及那一时代的艺术风貌。

二、从艺术发展的继承性着眼，对于那些承前启后的艺术家着重收录，特别注意收录那些在艺术上有突破创新的艺术家。

三、注意时代和地域的平衡。如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重南而轻北；辽金元时期，特别是辽金时期，往往被人忽略。这次选目酌收北朝和辽金时期艺术家若干人，以体现中国艺术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概况。

四、注意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如绘画史上的流派纷争、书法史上南派、北派等。

五、注意中外艺术史上的交流。既选收对外国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又选收外来的艺术家，如元代的尼泊尔国雕塑家阿尼哥，清代的西洋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等。

在封建时代，“艺术”与“技术”几乎是同义语，封建士大夫视技艺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而专门从事技艺的艺人，社会地位卑下。除书法、绘画为士大夫视为雅事者外，从事其他艺术形式的，被视为贱业，由封建士大夫主修的史书，当然不肯为他们立传。即使是在艺术上有很高成就的艺术家，若没有个一官半职，也很难入史传。如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两《唐书》居然没有他的传记，舞蹈家公孙大娘也没有传记，或在他人的传记中有一言片语，也不能单独成文。又如元代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等人，《元史》中没有他们的踪迹。明代著名曲艺家柳敬亭，《明史》中也没有片言只字。其他被埋没的艺术家，不知有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这个选目中收录的书法家、画家人数居多。

尽管封建史书有种种缺陷和不足，我们从入选艺术家的传

记中，可以鸟瞰我国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概况，从各个艺术家的时代、经历、个人天赋以及他们在艺术上的苦苦追求和杰出贡献，分析他们成功之所在。同时从王羲之等人的传记中，我们可以领略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个光辉时代的风貌。《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述了蔡邕对篆、隶、行、草等书体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使人们体味到书法艺术的无穷妙趣。《南齐书·王僧虔传》中，对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长短优劣的评述，可以使人们领略古人的论书标准，也可提高我们的鉴赏能力。从《周书·赵文深传》，可以看出南北书法家的艺术交流情况。从《隋书·万宝常传》中，可以窥见隋代的音乐发展水平。从两《唐书》颜真卿等人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书法艺术史上鼎盛时代的缩影。从《明史》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书画艺术史上又一个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的局面。从入选的清代艺术家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工艺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盛况。

总之，读一读这些艺术家的传记，对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对我们论世知人，进而知人论艺、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都是有帮助的。

本书的选目，力求突出重点，照顾全面；译文力求准确、畅达。但由于学力不足、见闻不广，选目不当或译文疏误，或当不免，敬祈专家和读者指正。

魏连科

1992年8月

崔瑗传

——《后汉书》卷八二

【说明】崔瑗（公元77—142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人。崔氏是两汉南北朝时期的望族，博陵崔氏，历代人才辈出。崔瑗出生在名门世家，他的父亲崔骃是东汉著名学者，博学多才，与班固齐名。崔瑗自幼立志学问，能传父祖家学，通晓天文、律历、数术等学问。官至济北相。

崔瑗也是东汉著名书法家，他善写章草，与杜度齐名，世称“崔杜”。大书法家张芝曾学他的笔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可惜的是今天看不到他的书迹了。著《草书势》及其他著作五十余种。

崔瑗字子玉，在他幼年时父亲去世，他专心好学，能继承他父亲崔骃的学业。他十八岁时来到京师洛阳，向侍中贾逵请教经书大义，贾逵待他很好，于是崔瑗留居京师交游问学，因而他通晓天文、律历、数术、《京房易传》、占卜之学，受到学者们的推崇。他和扶风人马融、南阳人张衡友谊很深。当初，崔瑗的哥哥崔章被本州人杀害，崔瑗为兄报仇，亲手杀死仇人，因而逃亡在外。遇上朝廷大赦，崔瑗回到家乡。家

里很穷，崔瑗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生活了数十年，本乡人都受到他们这种兄友弟爱精神的感化。

崔瑗在四十多岁时，才任为郡衙的办事吏员。后来因事被关进东郡发干县的监狱，监狱长对《礼经》很有研究，崔瑗受审讯之外，常常向监狱长请教《礼经》有关问题。他专心好学，就是身处颠沛流离之中也一心从事学问。后来官司结案回到家乡，被度辽将军邓遵征召在他身边任职。没过多久，邓遵被朝廷处死，崔瑗也被免职，又回到家乡。

后来又被车骑将军阎显征召，在阎府中任职。当时阎太后垂帘听政，阎显入朝参政。在此之先，安帝废黜太子刘保，贬为济阴王，另立北乡侯刘懿为太子。崔瑗认为北乡侯立为太子，不合法统，他预见到阎显将要垮台，想劝说他废黜北乡侯，另立太子，但阎显整天醉生梦死，见不到他。于是崔瑗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陈述等人，因他们得到先帝的宠幸，把先帝哄得迷迷糊糊，于是废黜了合法的太子，另立旁支子弟。少帝即位时，就在宗庙中犯了病，西汉时征调周勃迎立太子的时机，今天又重新出现。我想和长史您一起求见将军，劝他上奏太后，逮捕江京等人，废黜少帝，迎立济阴王。这样做，一定能上合天意下合民心。象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勋，不动声色就可以建立，那么将军的官位爵禄可以子子孙孙地传下去。如果违背了天意，君主的宝坐久空，你即使没犯罪也逃不了首恶的罪责。这就是受祸得祸的关键时候，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陈禅听了犹豫不决，不敢听从。恰好北乡侯刘懿这时病死，孙程立济阴王刘保为帝，这就是汉顺帝。阎显兄弟都被处死，崔瑗也被罢免。崔瑗的学

生苏祗对崔瑗的谋划了解得一清二楚，想上书皇帝说明这一情况，崔瑗听到后，马上加以制止。当时陈禅任司隶校尉，把崔瑗找来，对他说：“你姑且听任苏祗上书说明，我为你作证。”崔瑗说：“这话象小孩子们说的悄悄话，希望司隶校尉大人不要再说了。”于是辞职回家，再也不应州郡的征召出来做官。

过了很久，大将军梁商建立大将军幕僚机构，首先征召崔瑗。崔瑗认为，如果再次充当外戚贵官的幕僚，如不被重用，仍免不了被罢斥，于是他以有病为词，推辞了。这一年，他被荐举，选拔为秀才，被任为汲县县令。他在知县任内，多次向朝廷上书，提出应实行的政事，他为百姓开垦出几百顷稻田。他在任七年，受到百姓们歌颂。

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同推荐崔瑗是德高望重的大儒，从政期间政绩突出，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才沉沦下僚，因此升任他为济北国相。当时李固任太山郡太守，他很欣赏崔瑗的学识，不断给崔瑗写信致意。过了一年多，光禄大夫杜乔充任巡察使者，到各地巡视，他向朝廷检举，崔瑗犯有贪污罪，于是崔瑗被送司法机关审理。崔瑗上书自辩，辩明无罪被释。被释放后因病逝世，时年六十六岁。在他临死之前，嘱咐他的儿子说：“人接受天地的恩赐得以生存，人死之后，灵魂归天而去，骨肉葬入大地。哪里黄土不埋人？不要把我的尸体运回故乡。他人赠送东西和羊猪之类的祭品，一律不要接受。”他儿子尊照遗嘱。于是把他埋葬在洛阳。

崔瑗是写文章的高手，尤其擅长写书札、记文、箴文、铭文，著有赋、碑文、铭文、箴文、颂文、《士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等，共

五十七篇。他所著的《南阳文学官志》受到后人的称赞，那些擅长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他。崔瑗喜欢读书人，好招待宾客，为客人摆设丰盛的宴席，具备各种美味菜肴，但不过问家里的生计。他平时只是粗茶淡饭而已。因此，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当时人很称赞他的清廉。（魏连科 译）

【原文】

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为州人，年四十余，始为郡吏。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瑗间考讯时，辄问以《礼》说。其专心好学，虽颠沛必于是。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时阎太后称制，显入参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陈述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征，于斯复见。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禅犹豫未敢从。会北乡侯薨，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门生苏祗具知瑗谋，欲上书言状，瑗闻而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第听祗上书，禅

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久之，大将军梁商初开莫府，复首辟瑗。自以再为贵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辞。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

汉安初，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瑗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迁济北相。时李固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书礼至殷勤。岁余，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臧罪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年六十六。临终，顾命子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归乡里。其赙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子奉遗令，遂留葬洛阳。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

蔡邕传

——《后汉书》卷九〇

【说明】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东汉东留郡圉县（今河南开封市）人。自幼孝敬父母。博学多才，长于词章，又好天文、历数；善弹琴，是著名的音乐家；书法也称名于世。青年时，沉湎于学问，不愿出来做官。汉灵帝时，任为司徒桥玄府吏，后任河平县令，又升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又升任议郎，于熹平四年和杨赐、马日磾、张驯等人，正定《六经》中的文字讹误，蔡邕亲笔书写上石，立碑于国立大学门外，成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同时，他对东汉时的行政得失，社会情弊也多有建议。他因向灵帝上书，劾及当时的权臣，因堂谗之祸，被投入监狱，流放边地，后遇赦得免，又因怨家陷害，逃亡到吴越地区。

汉灵帝死后，董卓专权，董卓敬重他的才学，召他为官，三日之间，三升其职，后拜官中郎将，因此后世称他为“蔡中郎”，在董卓专权期间，对于董卓的胡作非为，他曾多方劝戒。董卓对他很敬重，给他的待遇也很优厚。董卓被杀后，蔡邕因出于个人恩怨，曾表示惋惜，被司徒王允投入狱中。他

乞求免他一死，以续成汉史，未被允许，后死于狱中。

他的著作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辑其诗文为《蔡中郎集》。

蔡邕字伯喈，是陈留郡圉县人。他的六世祖名叫蔡勋，喜好黄老之学，前汉平帝时，任郿县令。王莽初年，任他为厌戎郡太守。蔡勋面对封官的印信，仰天长叹，说道：“我是汉朝的臣子，死也要为汉朝而死。古代曾子不接受季孙氏的赏赐，怎么可以侍奉异姓呢！”于是携带家眷，逃进深山，和鲍宣、卓茂等人一起，誓不作新朝的臣子。蔡邕的父亲叫蔡棱，也有清白的操行，死后谥号为贞定公。

蔡邕生性孝顺，他的母亲曾卧病三年，蔡邕除非在夏冬二季换换衣服，平常不脱衣服，也没躺下睡过觉，这样一直坚持七十多天。母亲死后，住在母亲的坟墓旁边，一切行动都按礼法去做。在他的住处，出现温驯的兔子跑前跑后，屋旁又长出两棵枝干相连的树木，远近人都认为这是新鲜事，争着去看。蔡邕和他的叔叔、堂弟住在一起，三辈没有分家，乡亲们都很敬重他的品行。他少年时就博学多才，拜太傅胡广为师。又善于写文章、研究数术和天文，还弹得一手好琴。

后汉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人专权肆行，他们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于是奏明皇帝，命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进京。蔡邕不得已，走到偃师县，托词生病，回到家乡。他在家闲居，沉缅于古代文化，不和世人交往。他有感于东方朔的《客难》以及杨雄、班固、崔骃等人自问自答的文章形式，于是对以上诸人的言论，加以审视，他们说得对的就采

纳，他们说的不对的就加以纠正，著作《释诲》一文，以此来自励，文章说：

有一位有治世之心的青年人向一位白发老人请教说：“我听说圣人最宝贵的是名位，所以用推行仁义来保持名位，用财富来招集人材。但是有了名位就尊贵，有了财物便富有，推行仁义，至于圣王之道，这是读书人的职责。所以伊挚背负烹器求见商汤；孔子也说过，如果能富贵行道，就是给人当随从，他也愿干；宁戚用歌声来求齐桓公任用。百里奚卑身喂牛求见秦穆公。以上这些人和事，说明圣贤哲人有共同的志趣，这是古人明明白白的志向啊。您老先生，生活在清明的时代，又具有纯和的姿质，深研古代典籍，胸怀《六经》，安于贫贱地位，与世无争，才华沉沦，志在天外，胸中囊括天地人事，精研自然之理，已经很久了。但没能出类拔萃，展布才华，登上朝廷高位，以圣王之道整顿天下，清除人世间的丑恶，扫去宇宙间的尘埃，使治世的光芒犹如白日，使世间的和气直逼白云。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岁数也大了，仍是默默无闻。我真感到迷惑不解，所以我说了以上这些话，当今皇帝宽容圣明，辅佑的臣子都贤良明智，英才大器，不被逸弃，德高的人被任为宰相而授爵分封，才大的人享受富贵蒙受赏赐。你何不灵活处世，以达到目的，和世人共同俯仰，站住脚根，坐收治世的荣利，建立不朽的功勋，在这时建立光宗耀祖的功业，留下永不磨灭的美名？这些难道您没想过吗？为什么守住您那一套而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白发老人傲然笑了笑，说道：“你这个年轻人，你真是常说的只看到那不明不白的功利，而忘记明明摆着的祸害；一心只指望成功，而忽视跌跤失败的那种人啊。”年轻人肃然起敬，拢起衣襟站起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发老人说：“你坐下，我将向你解释清楚。过去在远古时代，君臣之分刚刚奠定，曾出现过伏羲氏的安宁时代，唐尧、虞舜的理想时期。三代的兴盛，也属盛世之光，春秋五霸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但他们仍勉力维持。从此以后，维系社会的法网松弛，人的道德崩溃，先王的治道被破坏，天下混乱，君臣关系、上下关系，都土崩瓦解。于是有权术者骋驰诈幻，能言善辩者到处游说，武将施展韬略，战士讲习武艺。各种人物的活动，象风掣雷电，风云变幻，欺诈诡谲，以适应社会时尚。有的人因筹划一条妙计而得到万金的赏赐，有的人游说一个早晨便得到美玉宝物。主张连衡的，同时佩六国的官印，主张合纵的，也是腰里多印生辉。骤然富贵，财富无数，各逞机巧，忘记了危险。花朵脱离花蒂就会枯萎，枝条离开树干就会干枯，女人打扮妖艳必定淫乱，士人背叛圣贤之道必然获罪。人们诅咒他们的暴发骤富，神明也痛恨他们的邪恶行径，容华富贵刚刚到手，祸害的种子已经萌芽。刚刚乘上华丽的车子，祸害就临头了。要加高加大住室，反而使原来的住室昏暗不明。因此，社会黑暗，圣人和哲人都隐匿藏身，如石门的守门人，如长沮、桀溺隐于耕作，如颜歆怀才而不出来当官，如蘧伯玉不出世而保全性命。齐人送给季桓子女伎，孔子就

离开齐国；卫灵公和阍人同乘一车，孔子就离开卫国去曹国，象丢掉不值钱的东西一样。我哪里是傲视君主而背弃祖国呢？因为我的理想不能实现罢了。

再者，我也听说过，冬至时节正应黄钟之律；东北风吹起，天将变暖，鱼儿会跳到冰上；五月夏季，阴气则渐渐萌发；芦苇变黄，露水开始凝结为霜。冷热循环，阴阳代起，发展到极点就要发生变化，治和乱也是互相推移。现在又朝继承陶唐氏的余绪，扫清天下的残祸，圣德比天高、比地厚。圣王之道推行，上下融洽，皇帝的鸿才大略显现于世，平民百姓，都广受恩惠。挑选天下的英才，治理成清平治世，群臣都恪守自己的职责，圣君可以垂手而治。君臣关系和谐，共守太平之世，人才济济，从从容容，君子在朝，人才充盈。好比锺山的美玉，泗水之滨的美石，即使在锺山上加上几块美玉也不显得多，采出泗水中几块磬石，也并不显得少。在古代，大禹时洪水得到治理，河流稳定，周武王用武功平定了天下战乱；玃狁被赶走，尹吉甫才得休息；城濮之战，楚军失败，晋人得以凯旋。所以，国家有战事，穿着蓑衣带着斗笠上战场，披甲操戈，仍显得忙不过来；国家平安无事，穿上宽衣博带，走起路来佩玉叮咣响，显得悠闲从容。

再说那些世代勋臣、大官的子弟，他们是皇帝的下人，上天保佑，君主给他优厚的俸禄，从容而行，自然得到爵位，他们捋须整髯，居官尊贵。他们进身之时，如果用顺从圆转，还不足以形容他们升官的方便，用逡巡

放逸，也不足以形容他们升官的容易。人人有超群的能力，个个有丰富的智慧。小孩不向有经验的老成人请教，任事不懂的学生也不找先生问难。心境恬淡高远，已经走到极点而不知停止。仍铺张煊赫，炫耀荣华富贵。有头脑的人，能知足而止，所以能保持安宁。狂妄而胡做非为，只会把人的心志搞乱。贪财的人为财而死，炫耀浮夸的人必死于权势。看到这些现象，心烦意乱。不明白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驾着劣马走远路，羡慕千里驹的快速而拼命驱赶，在外戚门前卑躬屈膝，乞求权贵提携。荣华富贵还没攀到，就跌跤摔下来，轻者被牵连坐罪，重者招灭门之祸。前面的车子已经翻了，后面的车子仍沿这条路奔驰，不借鉴前车蹈祸的教训，从而知畏惧而止。我为这些人的下场而悲悼，祸害竟是如此厉害！天如此之高远，地如此之深厚，不敢不谨慎从事。招来忧怨并不在明智与否，祸患发生都是不深思熟虑所致。定要战战兢兢，必须慎之又慎。

用我则推行我的治道，这是孔圣人的明训；不用我则隐晦韬光，也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天下河水泛滥，并非一块土能够堵塞；百万大军，也非一介勇夫所能抵抗。现在你责备我这个普通人不去清除天下的污秽，那么可把发生水旱灾害归罪于唐尧、商汤吗？我惧怕我这缕微微青烟会招来没顶之灾，哪里还敢大放光芒呢？再说，地震之前兆是天枢星散开，井中没有日影表明发生了日蚀。君主宽容如同晦日，则月亮出现在西方；侯王急下，如同朔日，则月亮出现在东方。因此，有识之士能够见微

知著，看到开头就能知其发展的脉络，脚踏秋霜就知严冬将至，踏着露水就知是暑热天气将到。时势允许则出世行道，时势不允许则退身而止，掌握个中消息，取之于天地的规律。以此来判断前途的利害，来决定自己去留，乐天知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大批车辆在险路上奔驰，我怎么能和他们并驾而行？考虑到危难而自我安乐，所以身处贱位而不自以为耻。我将在圣贤典籍这条光明大道上骋驰，在仁义的林海中游息，踏着周公、孔子的足迹，与儒、墨学说为友。施展才能，可以光照天下；收敛韬略，则谁也不知我胸怀何物。如果遇上千载难逢的时运，上应天命，皇帝招贤之天门大开，我会登上天街，在盛大的仪仗簇拥下掌握权柄，向皇帝献上高明的策略，在华夏大地上实现太平盛世的理想。如果我的策略合乎皇帝的要求而被采纳，这当然是我的希望；如果我不能因而建功立业，那是我的罪过。如果在这时，贤者仍隐居深山，小人没有被清除，贤者仍然与草木为伍，只能说明他愚蠢。不了解我的人，将责备我曲线求荣。君子欲建功立业求得其名，舍弃这条道路，还往哪里去？所以我静静地等候时运的到来，不懈不怠。百年以后，葬入坟墓也就算了。若有幸而获得世人称誉，那也是上天诱导之功。如果默默无闻而死，也不是我的罪过。古代的伯翳能与禽鸟交谈，葛卢能听懂牛鸣，董父因好龙而得姓泰龙氏，奚仲能造精美的车子，偃氏的巧于工艺，造父的善于驾马，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封，狼臯因勇斩囚徒而获得为晋襄公驾车之职，弓父的殚精竭思制造出精

弓，欽非入江斩蛟之勇，吾丘寿王因精于围棋而官待诏，东方朔因长于诙谐幽默而成为汉武的近侍，上官桀因善于系紧车盖而得官，桑弘羊因精于计算而位居丞相。我没有以上古人的幸运，所以我怀才而优游岁月。”

于是那个年轻人仰头避开老人的视线，退下台阶，惭愧而去。白发老人扬眉含笑，弹琴歌唱，唱道：“静修我的心志，使之达到最高的境界，涤荡心灵中的污秽，保存天地之正气。心情舒畅而神气宁静，志向淡泊而心神高远，各种欲念不生。超越世事而摆脱尘俗，在浩渺境界中独来独往。”

建宁三年，在司徒桥玄府中任职，桥玄对他很敬重。后来外补为河平县令。又被召进京任官郎中，在东观校勘图书。后又升为议郎。蔡邕认为，经典图籍距圣人的年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讹，浅俗的学者据以穿凿附会，贻误后来的学者。在熹平四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磔、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向皇帝上奏，乞求订正《六经》中的文字。汉灵帝批准，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把经文书写在石碑上，让石工雕刻，立在太学门外。晚生后学，都据此来改正经书中的错讹。碑刚刚树起，前来观看和照抄的人很多，常常每天有千余辆车子，把大街小巷都塞满了。

当初，朝廷的官员认为，州郡的官员互相结成帮派，郡人也结伙营私，于是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联姻之家以及两州的官员，不得互相做对方的监察官员。到这时又制定了联姻之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在该地任官的“三互法”，禁

令更加周密，选用官员就很困难。幽、冀二州，官员缺额久久不补。蔡邕上奏说：“我了解到，幽、冀二州是汉朝的根据地，盔甲和战马大都是该地出产，近年因战乱和灾荒，这一地区耗尽了财力。现在百姓们家家空虚，万里萧条，官位长久空缺，下面的办事吏员也盼望有所统属，但太尉、司徒、司马三府选任官员，几个月也定不下来。我曾为此事感到奇怪，而议事的官员说是因为回避三互法。十一州的禁令，具体来说只是二州罢了。再者，二州的士人，或限于年岁资历，迟疑观望，失去实施政事的机会。我认为三互法的禁令，只是浅层次的措施，如申明严厉的皇威，明确法令，在任的官员哪能不畏惧，敢于犯三互法的本旨，岂肯自我阻隔前途？当年韩安国出身于罪徒之中，朱买臣出身于低贱，都因为才能适宜，都做了本乡的太守。再者，张敞原是个逃亡之徒，超拔为大州刺史。这哪里管什么三互之法，受细微末节的制约呢？太尉、司徒、司马三公明知幽冀二州的重要，赶快确定官员，应该超出三互法的禁令，选取有能力的人，改变二州的破败局面；若置我直言敢谏之议于不顾，为避开微不足道的规定，任官久而不决，而失去人才。我希望陛下您上学光武皇帝，废除近来这些禁令，各州刺史才器可以调换的，不要拘泥于资历和三互法的规定，以求用得其人。”奏疏呈上去，皇帝不加理睬。

当初灵帝好学，自己著作《皇羲篇》五十章，因而召集来不少善于作文赋的读书人。本来是以长于经学招集文人的，后来把长于作书信的以及工书法篆文的都加招引，于是有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等人，又招来品行不端、趋

炎附势之徒多人，都在鸿都门下侍奉皇帝，这些人喜欢向皇帝陈说些民间的世俗琐事。皇帝听了却很高兴，越级提拔这些人为官。另外，一些市井小人，因为做了宣陵的守坟户，几十个人，都任为郎中、太子舍人。因而当时的天象反常，经常打雷刮大风，树木被折断或连根拔起，又有地震、冰雹、蝗虫等灾害。鲜卑人入侵边境，民间加重了劳役和赋税。六年七月，皇帝下诏书行咎自责，令群臣各自陈述应该施行的行政要务。蔡邕上奏说：

我读了圣旨，虽然象周成王时遇上风灾，向诸大臣讯问政事；周宣王时遭受旱灾，而勤政畏惧，比起陛下的虔诚态度，都不在话下。我听说上天下降灾害，都是因人事而发。频频出现惊雷，大概是因为受刑被处死的人太多所致。风是上天的号令，是用来警告人的。虔诚地按上天的意志行事，就会带来好处；礼敬祖宗，则鬼神安稳。国家的大事，首先要注重祭祀的典礼，天子应该亲自恭敬从事。我自从任宰相府的官员，以至任祭祀官，各种郊祭，皇帝很少亲行，礼敬四时节气这样重要的祭祀活动，经常是派官代行，虽然曾向上天谢罪，究竟是废礼不敬。所以上天不高兴，才降下这种种灾异。《鸿范传》说：“政事违背天意，使上天好生之德隐而不显，就会出现大风刮倒房屋、折断树木的灾害。”《坤》卦象征地理，《易经》上说，安静则大吉大利。阴气太盛，应该用安静来行正，“法为下叛”。大权不掌握在上边，则相应的灾害是冰雹的灾伤；行政苛刻暴戾，相应的灾害是虎狼吃人；官员因贪利而伤害百姓，相应的灾害是蝗

虫损害庄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与月亮相近，兵家认为不是好兆头。鲜卑人犯境，是长久以来的边患，现在出兵，还看不到取胜的可能。这样就上背天象，下背民心。确应广听诸臣的议论，采纳切实可行的意见。我怀着满腔忧愤，敬陈应实行的七件事如下：

第一件事：按照朝廷的祭祀时间表规定，皇帝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及夏末的节气，亲自祭祀，迎接五帝，以此来乞求风调雨顺，上天赐福，带来丰收。宗庙祭祀，为了向祖宗申孝敬之诚，赡养老人，开设学校，是为了以礼化教育人，这都是作皇帝应重视的大事，为祖宗以来所恪守。使下面的官员，往往因疏远封国的丧事、家里有子女降生、或者小吏的病死，以此为忌，而废弃大事。我看到祭天之礼，还没遭废弃，至于其他的祭祀，往往有不同意见。难道说祭天之礼卑微不足道、其他祭祀因重要而多异议吗？孝元皇帝曾说过：“典礼最尊敬的，莫过于祭祀，以此来竭心致诚亲身而行，表达严肃的敬仰之情。”再者，章帝元和年间所行的事例，再次申明遵从先王的旧典。前后圣旨，推心置腹，态度诚恳。但是近来的情况，往往更换太史之官。把祭祀的大事几乎忘掉，听信各种禁忌书上所载，因很小的事情，亏缺祭祀大典。《礼经》上说，妻妾生小孩，丈夫在斋戒期间不入产房之门，没有讲到因此而废弃祭礼的文字。所说的家里死了人，因而三个月不举行祭礼，那是指一般百姓人家只有几间房子，一家人共同居住的情况，哪里可比皇宫之大、妻妾之众呢？从今以后，斋戒期间应照旧

有礼典行事，以此来回答上天风雷灾变的示警。

第二件事：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兴盛，能经常听到治理国家的名言高论，朝廷之内，对行政情况了如指掌，在朝廷之外，对民情体察入微。因此，已故的桓帝虽然具有圣哲的资质，而仍然广泛听取行政的得失。又因发生灾变，提拔那些沉沦的人物，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等科的选拔，因此正直谏诤的言论，不断在朝廷上出现。陛下您主持政事以来，连年发生灾变，但没有听到为此而特别举行广取贤良的圣旨。确应认真思考，按旧章办事，让胸怀忠义的臣子，施展他们的抱负，来改变《易传》上所说“行政乘背、有德者隐身”的局面。

第三件事：求得贤能之臣的途径，不只一条，有的因道德高尚名世，有的因直言敢谏扬名。近来，在朝的臣子，并没有因忠心耿耿被赏赐，却常招致恶言毁谤而被罪，于是群臣下僚结舌缄口，没有人敢出来主持正义。郎中张文，以前曾单枪匹马披肝沥胆条陈忠言，蒙圣上采纳，责令三司衙门实行。这样，群臣解除了思想负担，众百姓也都很高兴。我认为应该提升张文任要职，以鼓励忠正耿直，并在天下广为宣传，这样就会广开议论政事之路。

第四件事：司隶校尉和各州的刺史，这些官员的责任是监督官员、辨奸纠枉、分别黑白。我看到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宠芝、凉州刺史刘虔，每人都胸怀秉公奉法、疾恨奸恶的忠心，杨熹的举劾，功效很好。其他人大都废公枉法，根本不称职。有的刺史本身，就有罪

恶，和下级同病相怜，法网松弛，互不揭发，三公台阁各官也保持沉默。建宁五年下的圣旨，准备派遣使者巡行天下，又下令三公根据民间歌谣所反映的民间利病，上奏天子。当时奉公守法的官员洋洋得意，奸邪枉法的官员惊怕失色。但不知这种措施为何原因废而不行。过去刘向向皇帝上奏曾说：“用将信将疑的态度去执行某种计划，就会为枉法者大开方便之门；优柔寡断，必然招致谗邪的议论。”现在刚刚听到将要推行善政，马上又变卦，这样做，促使天下人对朝廷政事作出种种猜度。应该重新任命使者，纠察非法的官员，选任忠心清白的官员，赏罚分明。太尉、司徒、司马三公衙门，每年年末，评品各官的高下，使下级官吏明白，奉公守法者得福，营私枉法者得祸。这样，各种灾变可以从根本上杜绝。

第五件事：我听说古代选取官员，必让各诸侯每年向朝廷贡献人才。武帝之时，令各州郡选取孝廉，又设有贤良、文学之科，于是名臣辈出，文臣武将，人才济济。汉朝之所以能得到人才，就是这几条途径罢了。长于书法、绘画、诗词文赋，那只不过是小小才小艺，治理国家政事，他们无能力担任。陛下你继位为天子，刚刚开始，应该先涉猎儒家的经典学术，政事余暇，可以浏览文词篇章，松弛一下精神，以此来代替下棋等娱乐，但文词篇章不能作为教化百姓，选取人才的根据。然而读书人为争夺利禄，作文章势头沸沸扬扬。其中高明一些的，还引证一些经典中劝世的文字；等而下之的作者，则连连搬用民间俗语村言，简直象演滑稽戏；有的剽窃成

文，假冒他人的名字。我经常在盛化门接受圣旨，评定作者的等级名次，那些不及格的人，也和其他人一样都被提拔委任。既已经加恩任官，也难以再收回，这些人若只守职领取俸禄，国家对他们也算仁至义尽，不应该再派他们去做治理百姓的州郡地方官。当年汉宣帝把儒家学者聚集在石渠阁，汉章帝聚集学士于白虎观，通解经文，解释疑义，这事情很重要，这也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之道，应该尊循。象那样擅长小才小艺，虽然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孔夫子认为，若以此来治理国家大事，那就扞格难通了，所以有识之士应该把心志用到大的方面。

第六件事：品级为六百石的地方吏员，他的责任是治理百姓，对他们的考察，应以是否给百姓带来福利实惠为成绩，以任职时间长短为资历。表彰或责罚的条款，应该黑白分明。但是现在对地方官在任治绩根据不清楚，等任期满召还，大多提升为议郎、郎中等官。如果其中有才具优秀的，不应安排他们为闲职。如在任期间犯有罪过，应该加以刑罚。这样怎么会发生隐瞒罪行害怕考察、反而谋求升迁、互相效法、好坏不分这样的情况呢？已故皇帝的旧法，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当机立断，辨其真伪。

第七件事：在前面我说到把为宣陵守坟人都提拔为太子舍人一事。我听说汉文帝规定服丧期为三十六天，虽然是继位的君主，是父子骨肉之亲，公师大臣，受皇帝莫大之恩，都压抑自己的感情，按规定办事，不敢超期

服丧。现在那些虚伪小人，本不是皇帝的亲骨肉，皇帝生前也没有喜欢过他们，他们本身也没有一官半职，那么殷切思念的感情，从何而产生？他们聚集在陵墓旁，声称行孝，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本心，按照礼仪，没有任何根据，甚至有奸邪坏人，混迹其中。桓思皇后的灵柩出殡之时，东郡有一个拐骗别人老婆的人混在孝子的队伍中，本县派人来追捕，才承认罪恶。象这样虚伪污乱的情况，难以枚举。又有先来到陵墓边的人被委任为官，后来的被弃置不顾；有的长年在陵墓守陵，偶而回一趟家，就被遗漏；有的请人代替，也受到恩宠而荣升。因此发生争吵、怨恨，怨声载道。太子的辅佐官员，应该选取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哪能只选取坟墓房的不三不四的不吉利的人？这种不吉利的情况，再没有比这严重的人。应该把这些人遣送回农村，并揭露他们的伪骗行为。

奏本送上去，灵帝才亲自主持北郊祭礼，又到太学主持祭孔仪式。又发布命令，那些守陵孝子被任为舍人的，一律改为丞尉。光和元年，又设立鸿都门学校，在校内图画孔子和七十二弟子像。在校读书的生员，命令各州郡及三公府举荐任用，有的出任外的州刺史、郡太守，有的在朝廷被任为尚书、侍中等官，甚至有被封侯赐爵位的，而有识之士都耻与这些人为伍。

当时各种怪异现象不断出现，人人惊恐。这年七月，灵帝召蔡邕和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磔、仪郎张华、太史令单飏等人到金商门，又带进崇德殿，派中常侍曹节、王甫向他们询问灾变情形以及为消除灾变应实行的措施。蔡邕

详细回答，灵帝又亲自召问说：“近来灾变迭起，不知有什么过错得罪了上天，朝廷为此而焦心，满怀恐惧。询问各个王公大臣，希望听到忠正言论，但他们都闭口不言，不肯说出心里话。因为你蔡邕经学渊博，所以特别单独秘密向你询问，你应该指出行政的得失，提出行政的要领，不要模棱两可，自生疑惑。回答的奏章，密封呈上。”蔡邕回奏说：“我看陛下您圣德清明，深深为发生灾变而自责，您褒奖我的学业，特地向我询问，这使我这微不足道的臣子怎么敢承当。现在确实是披肝沥胆的时候，怎么能顾虑直言敢谏会带来的祸害、而使陛下您听不到惊戒的言论呢！我认为各种灾变的发生，都是亡国的征兆。上天对于大汉王朝，仍然是特别关照，因此才屡屡降下灾变，以此来进行谴责，是想让君王省悟，转危为安。现在灾变发生，不在其他地方，却发生在京城附近，或京城各衙门，它是上天的警告，再明确也不过了。长虹下落、雄鸡异化，这都是妇女干政所招致。在此之前，皇帝的乳母赵娆，成为天下的高贵人物，生前的财富可和国库相比，死后的坟墓，比皇帝的陵墓还气派，两个儿子受封爵，她的兄弟也任为州郡长官；接着又有永乐门史霍玉，凭借皇威，又为非做歹。现在路人又传言纷纷，说又出了一个程大人，看他的来势，将要成为国家的祸害。应该提高警惕，加以防备，明令禁止，以赵娆、霍玉为鉴戒。现在陛下您情真意切，想辨明邪正。但听说太尉张颢，是霍玉引荐的；光禄勋姓璋，是有名的贪官；再如长水校尉赵玄、屯骑校尉盖升，都侥幸受宠而荣华富足。应该想到，小人在位给国家带来的灾害；退一步想，这些人引退让贤也是他们的福份。我了解到，廷尉

郭禧，敦厚老练；光禄大夫桥玄，练达正直；原太尉刘宠，忠诚正派，这些人都应是皇帝的智囊人物，经常向他们询问政事。宰相大臣，好比皇帝的四肢，委任他们，责其成效，他们的优劣自然分明，不应从听小吏的意见，陷大臣于罪过。再者，尚方令所作的工巧器物、鸿都门所作的诗词文赋，可暂且停止，以表示忧虑。《诗经》上说：“恐怕上天发怒，不敢游戏淫佚。”上天的敬戒，确不可当作儿戏啊。宰相府的孝廉，那是士人中高材者才能充任。近来因荐举不慎，责备三公，但现在却只凭小小艺能超拔选取，这样就大开后门，违背了圣上选人的条法，众心不服。却没有人敢出来说话。我希望陛下您下决心杜绝这种弊端，全部心力用于政事，以此来报答上天的期望。圣上既然自我严格要求，左右亲近的臣子也应随之转变作风。人人自我约制，以此来回答上天的警告，那么天时自然由灾变转为圆满正常，鬼神都受福不浅。我出于正直与忠诚，因受激励，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所以才敢于讲出别人因忌讳不敢讲的话，亲笔来回答。君臣之间若不能保密，君上若不知戒惧而泄露了机密，会给臣下带来杀身之祸。我希望把我的奏本对压下不要下发，且莫使尽忠的官吏，因此而招致怨仇。”奏本呈上，灵帝看了以后，异常感叹，因起身去换衣服，中常侍曹节偷看了奏本，把全部内容宣扬出去，于是机密泄露。那些被蔡邕弹劾的人，都横眉怒目地要加以报复。

当初，蔡邕和司徒刘郃平常就合不来，他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听大臣阳球有仇。而阳球又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于是派人向朝廷写匿名信说蔡邕、蔡质叔侄屡因私事请刘

郃帮忙，刘郃不答应，蔡邕怀恨在心，发誓要中伤刘郃。皇帝批下，让尚书处理，召来蔡邕，追问事实。蔡邕上书自辨说：“我被责问，问大鸿胪刘郃前此为济阴太守的时候，我属下吏员张宛病休了一百天（按规定，吏员病休百日应免官）；刘郃任司隶时，我又托他提拔河内郡吏员李奇为州的文书官；又请他营救原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我的请求，他都不答应，因此我怨恨他等情形。我听了以后满怀惶恐恐惧，忧心如焚，不知罪过在哪里。我自己寻思这案件的来由，实因张宛、李奇之事而起，与羊陟、胡毋班无关。但是小吏的休假，也不是结怨的原因。我家与羊陟家虽是亲家，怎么敢救援私党？如果我们父子想陷害刘郃，自应向台阁大臣揭发，详细陈述所谓怨恨刘郃的缘由。没有尺寸的事实，而散发匿名信，应该用我的申辨和刘郃对质。我能够以学问渊博，受到褒奖，在祕阁任职，在皇帝身边作文字工作，因而我的姓名长相学问才能，被圣上注意。今年七月，把我召到金商门，问起灾变的原因，又下诏旨，让我直言。我出于忠正直率，只知竭尽忠心，生死置之度外，没顾忌到因此而招致祸害，于是讽刺了王公大臣，以及圣上身边的宠臣，我本想回答圣上的询问，以消除灾变，为陛下您献长治久安之计。陛下您没考虑到对忠臣的直率言论，应加以保密，因泄露而诽谤猛烈而来，陛下你也因此而产生疑惑。这样，尽忠的官吏，还有容身之处吗？每次圣旨须颁下，群臣各密封奏事，本想改革政事，以免上天谴责，逢凶化吉，但进谏的臣子没有因此而得福，反而马上遭受诬陷祸害。现在人人闭口不言，以我为前车之鉴，这样谁还敢为陛下您尽忠尽孝呢？我叔父蔡质，连

连被提拔，位居高官。我受陛下皇恩，屡被垂问。因此，有人想陷害我们父子，使我们家族破败，他们并不是为了揭发奸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我今年四十六岁，孤身一人，如能列名忠臣，死了也很荣耀。恐怕陛下您从此再也听不到忠正的谏言了。因我的忠直，招来祸害，但我前面的回答，蔡质不知道，他已经白发衰老，横遭牵连，因我被祸，也一并被坑害，实在冤枉，实在令人痛心。我一进监狱，必然被严刑逼问，追问匿名信所列的罪名。我的辨白情况，陛下您怎么能听得到？我的死期快要到了，冒昧向您陈述，我情愿一人抵罪而死，请求不要把蔡质连坐，那么我死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再生之日。希望陛下您努力加餐，为天下百姓自加珍重。”于是把蔡邕、蔡质投入洛阳监狱，判他以官报私仇、陷害大臣的大不敬罪名，处以死刑。判决上奏，中常侍吕强怜愍蔡邕无罪而被叛死刑，请求皇帝宽宥，灵帝也想到蔡邕章奏中辨白的情形，下旨免去死罪，降罪一等，和家属一起，剃去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流放到朔方郡，遇上大赦也不能赦免。阳球派刺客在路上刺杀蔡邕，因刺客被蔡邕的义气所感动，几个刺客都没有刺杀蔡邕。阳球贿赂当地主管官员杀害他，但被贿赂的官员反而把这种情况告诉蔡邕，所以多次得以免死。被安置在五原郡安阳县。

蔡邕以前在东观任职，和卢植、韩说等人著补《后汉书》，因遭官司被流放，未能成书，因此他向皇帝上书，陈述他著作的十志的内容，分别篇目，写在奏章的后面。灵帝欣赏他的才能，遇上第二年大赦，于是宽免蔡邕，归还本郡。蔡邕从流放至归还，共历九个月。将要归还上路，五原太守王

智为他饯行。喝得酒酣耳热，王智离席起舞，向蔡邕劝酒，蔡邕却不加理睬。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平常骄贵惯了，在宾客面前使他下不了台，于是大骂蔡邕：“你这个罪徒，竟敢轻视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痛恨蔡邕，向朝廷密告蔡邕在流放地满腹牢骚，诽谤朝廷。皇帝的宠臣听了也非常讨厌蔡邕。蔡邕估计终究难以免祸，于是逃亡江海之中。远逃吴郡、会稽一带。来来往往，依靠太山羊氏家，在吴郡呆了十二年。

吴郡人有烧桐木煮饭的人家，蔡邕听到桐木燃烧发出的声响，断定是上好的木材，于是向人家求来，制作成琴，果然音色很美，因尾部有燃烧的痕迹，所以当时人命名为“焦尾琴”。当初，蔡邕在陈留郡时，他的邻居有一次请他喝酒吃饭，蔡邕到邻人家门的时候，酒席已进入高潮。东道主家有个宾客在屏风里弹琴，蔡邕来到门口暗暗偷听，他惊诧地说：“哼！用音乐来招引我，而暗藏杀机，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回去了。邻居的管事人对主人说：“蔡生先刚才来过，到门口又回去了。”蔡邕向来受乡亲们敬重，主人赶紧把他追回，问是怎么回事，蔡邕说出原因，在场的宾客都莫名其妙地发出笑声。弹琴的人说：“在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螳螂正盯着鸣叫的蝉，蝉将要飞去，螳螂的身体正一前一后的跃跃欲试。我心里很着急，唯恐螳螂失去良机，莫非因此产生杀机表现在琴声里么？”蔡邕听了，嘿嘿一笑，说道：“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所在了。”

中平六年，灵帝逝世，董卓任司空，听说蔡邕名望很高，召辟他出来做官，蔡邕声称有病不赴任。董卓大为恼火，骂道：“我的权威，能够灭人家族，蔡邕这样傲慢，我让你祸不

旋踵。”又严令州郡官员推举蔡邕到他的司空府，蔡邕不得已来到，任命他为代理祭酒，很受敬重。因考试名列前茅，补官侍御史，又转升为持书御史，又升任尚书。三天之内，经历三个官署。后又升任巴郡太守，又召进京任为侍中。

初平元年，任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门客家人想让董卓尊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董卓为此向蔡邕问计，蔡邕说：“姜太公辅佐周天子，受命灭商，所以才特别给他这样的名号。现在您的权威和盛德，诚然很高，但是和姜太公相比。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这么做。应等到关东地方平定了，皇帝从长安迁回旧都洛阳，然后再说。”董卓听从了他的意见。二年六月，长安一带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是什么原因，蔡邕回答说：“发生地震，是阴气太盛，侵渍了阳气，是臣子行为出格造成的。去年春天举行祭天礼，明公您引领皇帝坐车，您的坐车上，饰有金花青布车棚，车箱上画有金爪的花纹，（这是皇太子、皇子所乘车的装饰），远近的人都认为你这种做法不合适。”于是董卓改乘黑棚车。

董卓很敬重蔡邕的才学，给他的待遇很优厚，每次朝官饮宴，往往请蔡邕弹琴助兴，蔡邕也利用各种机会劝戒董卓。但是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有感于他的劝戒很少被听从，便对他的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情刚愎而陷于罪过，最终难成大事。我想向东逃到兖州去，如果路远难去，暂且逃到山东等待时机，你看怎么样？”蔡谷说：“您的相貌和平常人长得不一样，每次出外，围观的人很多。这样自我藏身，不是很难做到吗？”蔡邕才没有东去。

到董卓被杀后，蔡邕在司徒王允家作客，蔡邕无意之中谈起此事，深为叹惜，面部表情也表现出来。王允勃然大怒，斥骂说：“董卓是国家的叛贼，几乎推翻了汉朝。你做为国家的臣子，应该同仇敌忾，但你却念念不忘他对你的私人恩情，忘记了大节！现在杀死这有罪之人，你却反而为此而悲痛，难道不是和他一起谋反的吗？”立即交付廷尉去治罪。蔡邕上书谢罪，请求只刺面砍脚，以便继续修成汉史。在朝官员们很多人营救他，但都未奏效。太尉马日磔快马去见王允，对他说：“蔡伯喈是旷世奇才，对汉朝的史事很熟悉，应该让他续成后汉史，成为一代典籍。况且他一向以忠孝著名。判罪也无确切事实，杀了他不担心失去人心吗？”王允说：“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出诽谤朝廷的史书，流传至后代。现在国运中衰，江山不稳，绝不可让这样阿谀奏承的臣子在幼年皇帝身边记录史事。这样既对幼主的道德培养不利，而且我们这些人也会受他的史书讽刺。”马日磔退出后对人说：“王大人可能活不长久了。完美的人，是国家的纪纲所示；著作，是国家的经籍典则。毁灭纪纲、废掉籍则，这样的人还能活长久吗！”于是蔡邕死在狱中。王允也后悔了，想要挽救，已来不及了。蔡邕死时六十一岁。上层人士和学者们没有不为此而流泪的。北海人郑玄听到这一消息，感叹说：“关于汉代的史事，再找谁去请教呢！”兖州、陈留等地都图画他的影像称颂他。

他撰集的汉代史料，还没有编录的续后汉史书。只作了《灵帝纪》及十志，又补了四十二篇列传，这些文稿因叛乱，大都散失没有保存下来。他所作的诗、赋、碑文、诔文、铭

文、赞文、连珠文、箴文、吊文、论议文字，以及《独断》、《勤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和祝文、章表、书记等，共一百零四篇，流传于世。

【原文】

（魏连科 译）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郾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黜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炫，仲尼设执鞭之言，宁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韞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

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扫六合之秽匿，清宇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涂要至，俯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睹暧昧之利，而忘昭皙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谖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宁，唐虞之至时。三代之隆，亦有缉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王涂坏，太极阢，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亦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珪。连衡者六印磊落，合从者骈组流离。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以忘其危。夫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丰其屋，乃基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歆抱璞，遽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

“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

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隐灭之高，拆纆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丕，泝泝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群品，济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职司，圣主垂拱乎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纁，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珪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狺狺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余裕。

“夫世臣、门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祜，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馀官委贵。其进取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贍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矇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灿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殉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暗谦盈之效，迷损益之数，骋驽骀于修路，慕骐驎而增驱，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居而 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

“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

盈溢，非一块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惧烟炎之毁尖，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井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朏，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霸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清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闾闾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从，己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祇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妒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蒙龙，奚仲供德于衡辀，偃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臆取右于禽囚，弓父毕精于筋角，欽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上官效力于执盖，弘羊据相于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

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蹕

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充设三互，自生留阂邪？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擢授剧州。岂复顾循三互，继以末制乎？三分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而不顾争臣之义，苟避轻微之科，选用稽滞，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

并待制鸿都门下，熏陈方俗间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乃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乃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乃吏卒小汙，屡生忌故。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

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众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

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涂，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群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众庶解悦。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谏，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黑白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熏、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熏等所纠，其效尤多。馀皆枉桡，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纲网弛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寢息。昔刘向奏曰：“夫

执狐疑之计者，开群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優；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乃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七事：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

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磔、议郎张华、太史令单扬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邕对曰：“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褒臣末学，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所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

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司，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虬坠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货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姓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璜、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臣以愚赣，感激忘身，敢触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

数以私事请托于郤，郤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自陈曰：“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郤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郤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乃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郤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窃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如臣父子欲相伤陷，当明言台阁，具陈恨状所缘。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郤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操管御前，姓名状貌，微简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赍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赣，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馀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愚冗，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设，并入坑陷，诚冤诚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可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丐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

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怵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

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翦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辂，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皂盖车。

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和，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仙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

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勤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韦诞传

——《三国志》卷二一

【说明】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其父韦端，曾任太仆卿。韦诞历官至武都太守、侍中。他长于书法，与邯郸淳、卫觊齐名，魏代许多宝物上的铭文，都出自韦诞之笔。他曾师事邯郸淳，善作古文大篆。他又善于制做毛笔，曾著《笔经》一书。

韦诞，字仲将，他是太仆韦端的儿子。他很有文采，文章写得很漂亮。建安年间，他担任州郡掌管人口、钱粮、狱讼的统计吏员，后来超升为郎中，又升为侍中中书监，最后以光禄大夫退休，七十五岁时死在家中。

当初，邯郸淳、韦诞、卫觊都以书法著名。卫觊的孙子卫恒著《四体书势》，他在论及古文时说道：“从秦朝以小篆为通用字体，把前代的典籍都烧毁，古代的文字就绝迹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的旧屋，发现了用古文写成的《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人已经不知道这是古文学，称之为蝌蚪书，在汉代将这批古文书秘密收藏起来，很少有人看到。曹魏初年传习古文的人，都是从邯郸淳那里学

来的。我的祖先敬侯抄写了一部邯鄲淳所传的《尚书》，拿来给邯鄲淳看，他也分辩不出是抄本，在晋朝正始年间所立的三体石经碑，已经失去邯鄲淳的古文书写规矩。因当时称之为蝌蚪书，于是按照这个名称，书体摹仿蝌蚪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的坟墓，发现竹简书，有十余万字。用此来对比敬侯书体，大致还相像。”他所说的敬侯，即是卫觋。卫恒在论及篆书时，说道：“秦朝时李斯号称工于篆书，各大山上有封禅石刻以及铜人身上的铭文，都是李斯书写的。汉章帝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写得篆书比李斯的篆书稍加变异，也被称为能手。邯鄲淳学曹喜，还能够保留曹喜书法的妙趣。韦诞学习邯鄲淳，但学得不到家。魏明帝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郡太守，因他善长书法，留在京师补官侍中，魏国宝物上的铭文，都是韦诞书写的。汉代末年又有蔡邕，吸收李斯、曹喜的笔法，形成古今相杂的书体，但在结体严密、风格闲雅方面远不如邯鄲淳。”他论述隶书的文字，已经在《武帝记》中述及。卫恒又说：“师宜官适合写大字，邯鄲淳适合写小字。梁鹄认为邯鄲淳继承了王次仲的笔法，然而梁鹄的用笔法充分发挥了王次仲的笔意。”卫恒论及草书时，说道：“汉代出现了草书，不知创始者是谁。到汉章帝时，齐国相杜度以善长草书著名。后来有崔瑗、崔 ，也工于草书。杜度的书体结构稳妥，但字形稍瘦。二崔深深领会了草书的笔意，但结体显得松散。弘农人张伯英，草书技艺十分精巧。凡是他家白衣白布，他拿来写满字以后再去漂染，他在池塘边练字，池水因洗笔变成黑色。他下笔一丝不苟，规规矩矩，他常说：‘时间紧迫，来不及写草书。’他的只字片纸，人都不

肯丢掉，现在人们对他的墨迹更视为珍宝，韦诞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草书成就仅次于张伯英。同时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诞之辈，都是张伯英的门徒，也著名于世，但都远不如张文舒。”

【原文】

（魏连科 译）

诞字仲将，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词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于家。

初，邯鄲淳，卫觐及诞并善书，有名。觐孙恒撰《四体书势》，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玉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敬侯谓觐也。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鄲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云。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其序隶书，已略见《武纪》。又曰：“师宜官为大字，邯鄲淳为小字。梁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其序草书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实，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

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尤宝之，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邯鄲淳传

——《三国志》卷二一

【说明】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颍川（治今河南省阳翟县）人。他博学多才，颇受曹氏父子器重，官至博士给事中。他对文字学有较深的研究，又长于书写鸟虫书大篆，他与卫觋、韦诞并以善书知名当时。他曾师事曹喜，深究篆隶之法。魏初传习古文，以邯鄲淳为大家，卫觋、韦诞都曾向他学习古文。传世魏正始三体石经（残石），是邯鄲淳书写的。

邯鄲淳，又名邯鄲竺，字子叔。他博学有才能，又长于文字之学，对于鸟虫书、篆书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很有研究。汉献帝初平年间，他从关中客居荆州。后来荆州归服曹魏，魏太祖曹操平时就久闻邯鄲淳的大名，请他来相见，对他十分敬重。当时五官中郎将曹丕广开人才之路，聘请出类拔萃的读书人，曹丕也闻邯鄲淳的大名，于是给邯鄲淳下聘书，打算安排他为文学官。正好当时临菑侯曹植也要求聘任邯鄲淳，曹操就把他送到曹植那里。曹植见到邯鄲淳，非常高兴，请他落坐，但并不和他交谈。当时正是伏天时节，天气很热，曹植传唤侍从备下洗澡水，曹植自己洗完澡，又涂

粉化妆，于是光着头，裸露上身，跳起少数民族的五椎锻舞，又投弹舞剑朗诵戏文小说几千字，然后对邯郸淳说：“邯郸生，你看我表演得怎么样？”于是穿起衣服，戴上头巾，重新整理了一下装束，和邯郸淳讨论天地形成的原因，万物区别之所在，然后又评品从伏羲、皇帝以来圣贤、名臣、杰出人物的优劣高下，接着又吟诵古今文章辞赋的名篇佳什，又讨论为官施政的孰先孰后，又探讨行武用兵起伏变化形势，等等。于是传令厨师上菜，在宴席上他大口大口地吃肉，大口大口地饮酒，席上的客人都默默无语，没人比得上他的豪迈不羁。到天黑的时候，邯郸淳回到住处，在他的朋友面前盛赞曹植的才能，称他为“天人”。当时曹操还没有选定王位的继承人，他有意立曹植，邯郸淳经常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的才能。因此，五官中郎将曹丕心里很不高兴。到魏文帝黄初初年，任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作了一篇千余字的《投壶赋》呈送给魏文帝曹丕，曹丕认为文章写得很好，赏给他丝帛一千匹。

（魏连科 译）

【原文】

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

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传

——《晋书》卷八〇

【说明】王羲之（公元 321—376 年，一说 303—361 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他出身贵族家庭，是东晋司徒王导的侄子。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因此史称其为“王右军”。因他与王述关系不好，辞官归隐，定居于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后人尊为“书圣”。他少年时从其父学习，后又从师卫夫人，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精研诸体，推陈出新，一改汉魏以来带隶意的古朴书风，形成妍美流便的新体。如果说钟繇的书法是从隶书、章草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代表书家的话，那么王羲之则是摆脱隶意开楷书之先河并使之臻于完美高度的书法大师。因而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书法大家大都从五体而出。他的书迹。流传下来的较多，但大都是刻本、临本或双钩本。其行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像赞》、《兰亭序》等，草书以《快雪帖》、《姨母帖》、《表形帖》、《初月帖》等最著名。

王徽之（公元？—388 年），字子猷，王羲之子，王献之兄。曾任大司马桓温、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后官至黄门侍

郎，弃官归隐。其为人有才而放浪、怪诞，好声色，尤爱竹子，声称不可一日无竹。笃于手足之情，他和献之俱病重，他发愿代弟而死。王徽之亦善书，明刻《宝晋斋法帖》即收有他的书迹。

王献之（公元344—386年），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初为州主簿，历任秘书郎、秘书丞、吴兴太守，最后官中书令。因此，人称之为“王大令”。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与其父王羲之齐名，人称“二王”。王献之兼精诸体，以行草书擅长。他在继承张芝、王羲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古拙书风，形成自己的流畅英发、笔势奔放、颇有媚趣的书风，其后经唐人张旭、怀素的发展，形成狂草一体。存世墨迹有《鸭头丸帖》，其他有《洛神赋十三行》、《十二月帖》以及《中秋帖》、《送梨帖》、《保母帖》等。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南迁，就是王旷首先提议。王羲之年幼时语言迟钝，别人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十三岁时，曾经去拜访周顗，周顗审视了一会儿，对他很感惊异。当时宴客很重视烤牛心这道菜，宴会开始时，其他客人还没尝这道菜，周顗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他成年以后，富于才辩，以耿直著称，尤其擅长楷书，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人们评论他的运笔气势，以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来形容。他深受堂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重，在王敦手下任主簿。王敦曾对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

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家的三位优秀青年。当时太尉郗鉴派他的门客去王导家选择女婿，王导让这位门客去东厢房挨个相看他的子侄。这位门客回去以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小伙子们都很好，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选女婿的，一个一个的都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敞着怀吃饭，好象不知道有这回事。”郗鉴听了以后，说道：“这个人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初任官为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他为参军，历升至长史。庾亮临死前，向朝廷上奏，称赞王羲之品行清高且有鉴识。后来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在少年时就有很好的名声，朝廷上的公卿贵官都很爱重他的才具，多次征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干。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推拖不接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劝他接受任命，给他写信说道：“很多人都以你的进退来考察国家政事的兴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你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怎么能置一代兴亡于不顾，只顾满足自己的心意呢？希望你细心体察众人的心意。你若不应时任职，国家哪有善政可言呢？你如果豁然想通了，就能够体验到众人的心意所向了。”王羲之写信回答说：“我一向无心在朝廷上任职，王丞相在位时就坚持让我在朝廷任职，我誓不答应，那时我写的书信手迹尚在，可见我的这种志向由来已久，并不是你参政之后我才不愿任职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我就立志学尚子平那样隐居不仕，也曾多次向亲朋知己说过，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承您不弃。如果想任用我的话，即使是关陇、巴蜀

地区，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不具备应对朝廷事务的才能，但能忠于职守，宣扬国威和德政教化，所起的作用，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让远近的百姓们都知道朝廷对他们并不见外，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比起护军将军一职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汉代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磾去安抚关东地区，若不嫌我身份低微，对我的能力无所怀疑的话，最好在初冬时节赴任，我恭敬地等待任命。”

王羲之被任为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去宣城郡任职，朝廷不答应，于是任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二人不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朝臣和外官的和衷共济，因而给殷浩写信，进行劝戒，殷浩不听他的劝告。在殷浩要北伐的时候，王羲之认为必败无疑，便写信劝止，言词十分恳切。殷浩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得大败。殷浩想再次北征，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

得知安西将军谢尚失败的消息，国家和我本人都为之痛惜，时刻不能忘怀。小小的江左地区，竟治理成这样，使天下人为之寒心，已非一朝一夕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真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希望筹划开拓未来的方略，让天下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此成就中兴的大业。治理政事，道义是成功的关键，行政宽容和谐是根本，一味以武功取胜，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遵循以道义取胜的原则，以此来巩固大业，我想您会清楚其中的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掌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一味损耗百姓，各逞其志，结果

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正的言论和好的策略摈弃不用。致使天下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怎么能使人不痛心疾首、悲愤万端呢！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脱使天下陷于混乱的罪责呢？追究过去的罪责，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改弦更张，虚心求取贤人，和有识之士共同商讨大计，不能再出现忠正言论屈服于当权者个人意志那样的局面了。现在军队在外失败，国内物资耗尽，保住淮河一线的想法已经无力做到，不如退保长江一线，都督将领各回旧镇，长江以北各地，只是维持现有的局面罢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应引咎自责，应自行贬降，向百姓谢罪，一改过去的作法，和朝廷的贤能臣僚制订平稳的政治措施。废除那些繁苛规定，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差不多能满足百姓的希望，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

刺史大人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当国家的重任，在推行德政方面，没有做到事事妥当，您身为统帅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恐怕朝廷上的贤能之士没有人肯分担这个责任的。现在应赶快推行德政，以弥补过去的失误，广招贤能之士，和他们分担责任，即使这样做，尚且不能断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您认为以前做得还不够，因而再去追求不合时宜的东西，天地虽然这样广大，还有您立足之地吗！我明白我说的话您一定不听，反而会招致您的怨恨，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感触很深，因而不能不尽情陈言。如果您一定要率兵出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贸然行动，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您再和其他人共同

斟酌。

又接到州衙的命令，让会稽增运军粮一千石，征调军粮和劳役同时进行，又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这一切，灰心丧气，不知所措。经年以来，剥夺黎民百姓，其恶果是罪徒满路，这和秦始皇时的虐政相差无几，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吴广那样的灾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王羲之又向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应北伐的道理，并论及当时政事，说道：

古人因其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而感到羞耻，做臣子的人，哪有不希望他所侍奉君主受到尊崇，可以和前代圣君贤主比美，何况现在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才智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又怎能不根据轻重情况的不同而妥善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反躬自问，令人忧愁的事多于令人高兴的事。经典上说得好：“若不是圣人治理天下，外面虽然显得安宁无事，必有重重的内忧。”现在的情况是，外边既不安宁，内忧却更加深重。古代能成就大业的人，有人或许不依靠大家的智谋，而能尽全国的力量建立一时功业的，也往往不乏其人。那是因为个人的智谋确实足以超过众人，用国家暂时的困苦能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人，能和古人相比吗？

要使朝廷的决策必胜，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具备了万全之策才能行动。成功之后，就应利用

当地的民众和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现在成功还没有把握，但是饱经战乱之后的幸存者也会被歼灭殆尽，万不剩一。再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难题，何况现在要转运供给，向西运往许昌、洛阳，向北运过黄河。即使是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十家九空的忧患，便会接踵而至。现在从事转运的人没有归还日期，各种征调又日重一日，仅以小小的吴越地区，维系天下十分之九的军需，不灭亡还有什么结局呢！而又不量力而行，不失败不停止，国内的人因此而痛心悲叹，但没有人敢说真话。

已经过去的事，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加以补救，希望殿下您能考虑再三，改弦更张，下令殷浩、荀羨回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等地的驻军都回师把守淮河一线，建立起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牢固形成攻势，再出兵征伐，也为时不晚，这确实是在当前形势下最高明的策略。如果不这么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掌握安危变化的关键，易如反掌，考察国家的虚实，形势就明摆在眼前，希望殿下您英明决断，决定于一时之间。

我的地位低下，而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怎不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古人或身为平民百姓，或是军阵中的士卒，他们尚且为国家出谋划策，决策者并不因此讥笑他们，况且我身居大臣之末位，怎能沉默不语呢！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就去实行，决不能犹豫不定延误时机，这时不作出决断，后悔可就晚了。

殿下您德高望重，国内人望所归，以皇室贵胄辅佐朝廷，您最有条件地去直说直做，使国家出现当年那样兴盛局面，但是您的作为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这使我这个受您器重的人为之终夜兴叹，我真为您感到可惜。国家陷于深度的灾难之中，我时常担心，伍子胥的忧虑不仅是古代的悲剧，麋鹿出没的地方不只是山林水泽这样的地方。希望殿下您暂时摈弃那些清虚玄远不切实际的追求，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可以说在败亡的危局中奋力图存，转祸为福，这是国家的大幸，四海的百姓也有所依赖了。

当时东部地区发生灾荒，王羲之就开仓赈济灾民。但是朝廷征发的赋税徭役仍很繁重，吴郡、会稽一带尤其严重，王羲之多次上疏力争，往往被朝廷采纳。他又给尚书付射谢安写信说：

近来我陈述的意见，常常被您采纳，因此令下之后，百姓们可以稍事休养生息，各务其本业。如不是这样，这一郡百姓都跳东海喂鱼了。

现在大事还没有安排的，漕运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意见是，希望朝廷下达规定的期限，交有关部门办理，不要再催逼下层，只是到年底考核成绩的好坏就行了。主管官员的成绩最差的，派囚车把他送交朝廷治罪。如果有三个县完不成任务，郡守一定要免职，有的可以降级使用，让他到边远艰苦地区任职。

再者，自从我来到这里，助手常常有四五个人，加上上司衙门以及都水御史行衙的文件之多，象雨点般下

发，其中颠倒错误，互相抵触，不知有多少。我只能闭着眼睛按常规办理，推给下面，只是拣重要的事交主簿办理，一般的则交下面机构办理。主管人到任，还不到十天，官吏和百姓来回奔走，费用金钱数以万计。您正担任重要职务，您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我所说的情况。在平时，江左地区，扬州只用一位称职的刺史就足以把政事统理的井井有条，现在有一群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反而没有治理好，只因为法令不一，多方牵制。我想，用简而易行的办法，便足以守住已有的成就。

仓库监督官耗费、盗窃官米，往往数以万计，我认为杀掉一人，便能断绝这种弊端，但是当权的人不同意。近来检查各县，都是这样。余姚县被耗盗官米十万斛，向百姓收取重税，却用来肥了贪官污吏，致使国用缺乏，真可叹啊！

自从有战事以来，各种征调徭役以及担任转运军粮的人，死亡叛乱散逃回不了原地的人很多，百姓们被损耗到这种程度，国家仍按常规，抽人补充代替，因此，各地都被弄得凋弊困苦，谁也不知该怎么办。被长官遣派出去的人，上路以后，多数叛逃，于是监送的官吏也和叛逃的人一起逃跑了。按照常规，就让叛逃者的家属和邻里负责追捕。追捕不到人，家属和邻里接着也叛逃而去。百姓流离逃亡，户口日见其少，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各种工匠和医生，或死或逃，家家空无一人，没有人代替他们的差役，但是上司还不断催促，这种情况已延续了十年或十五年，尽管官吏不断遭到弹劾而获罪，但

于事无补，这样下去，老百姓如何能承受！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各种减死的罪犯以及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补充逃亡人户的亏缺，减死罪犯可长期服兵役，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充当各色工匠医生，把他们的家属也迁来，以充实城市。城市得到充实，这是行政的根本，又可以杜绝逃亡事件的发生。如不把他们的家属迁来，逃亡之患仍将和以前一样重演。现在免除他们服刑而充当杂役，又把他们的家属迁来，小民愚昧无知，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惩罚比杀头还严重，因而可以杜绝奸恶。惩罚虽然看起来很轻，但惩办的性质却很严重，这难道不是适合现时需要的措施吗！

王羲之平常喜欢服丹食药，涵养性情，不喜欢住在京城，他刚渡过浙江，便产生终身住在这里的想法。会稽有秀丽的山水，很多名人都生活在这里，谢安在做官以前也住在此地。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均以文章名满天下，都在江东一带构筑别墅，和王羲之志趣相投。他曾和这些志趣相投的人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集宴饮，王羲之亲自撰文表达他的志趣，文章说：

永和九年，这年的干支为癸丑，在暮春三月上旬，众人会集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采兰游戏，以驱除不祥的晦气。高人贤士们都到了，老老少少聚集在一起。这里有高山峻岭，茂密的森林，长长的竹子，又有清澈见底的小溪。小流湍急，萦绕如带，利用溪水漂流酒杯，取以饮酒，人们依次坐在岸边。虽然没有乐队助兴的盛大场面，但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也足以尽情抒发幽雅

的情怀。

这一天，晴空万里，空气清新，暖风轻拂，令人心胸舒畅，仰头纵眼望去，宇宙是如此广大，低头细察，万物是如此繁盛，这样放眼纵观，敞开胸怀，使耳目得到极大的享受，确实是赏心乐事啊！

人们在互相交往中，很快就度过一生。有的人互相敞开胸怀，在一室之内促膝畅谈；有的人寄情于万物，放浪不羁，忘记了自身的存在。虽然他们对人生的追求千差万别，性格或恬静或躁急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的时候，即使是暂时的称心，他也会痛快满足，从而忘记了老年即将到来。一旦对所追求的东西感到厌倦，心情随之发生变化，无限的感慨也随之而来了。以前曾为之高兴的事情，顷刻之间，已成为过眼烟云，因而不能不引起无限感慨。况且人的生命的长短，听命于自然，最终是要完结的。古人说：“人的生和死，也是大事情啊！”这怎么能不引起无限悲痛呢！

当我考察古人产生感慨的原因时，发现竟然是如出一辙，我面对书卷，不能不感慨悲叹，弄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当然明白，那种认为生死如一、寿夭相同的说法是虚假荒诞之词，后世的人考察今天的人和事，也就像今天的人考察古代的人和事一样，想来真让人悲伤！因此我逐一记下参加集会人的姓名，并录下他们所作的诗文。后世和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人事各异，但引起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却是一致的。后世的读者，读了我这篇文章也将会产生感慨的。

有人拿潘岳的《金谷诗序》和王羲之这篇文章相比，把王羲之和石崇相比，王羲之听了很高兴。

王羲之生性喜欢鹅，会稽有个老寡妇饲养了一只鹅，叫声很好听，王羲之要买下这只鹅，但没有买成，于是他带着亲友前去观看。老寡妇听说王羲之要来。把那只鹅宰了煮熟来招待他，王羲之为此整日叹惜。又有个山阴县道士饲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前往观看，非常高兴，执意要买下。道士说：“你替我抄写一部《道德经》，我把这一群鹅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命笔，抄写毕，把鹅用笼子装起来带回，满心高兴。王羲之就是这样真诚坦率。有一次他到他门客家里，看到桌面光滑干净，就在上面写满了字，一半是楷书，一半是草书。后来门客的父亲没注意把字刮掉，那位门客为此懊丧了好几天。王羲之又曾在戴山看到一个老妇，手拿六角竹扇叫卖，王羲之在她的竹扇题了字，每把扇子上五个字。老妇人起初是满脸怒气，他对老妇人说：“您只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每把扇子可要价一百钱。”老妇人按着他的话去卖，人们竞相购买。又一天，老妇人又拿来扇子求王羲之书写，王羲之笑而不答。他的书法被世人珍重，都和这事一样。他经常自称：“我的书法同钟繇相比，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比起张芝的书法，应该说仅在其次。”他曾给人写信说：“张芝在池塘边练字，洗笔把池水都染成黑色，别人如果能这样入迷，未必赶不上他。”王羲之的书艺，起初不如庾翼、郗愔，到他晚年，书艺才达到精妙的境界。他曾用章草体给庾亮写回信，庾翼看到，深为佩服，因而给王羲之写信说：“我过去曾收藏张芝的章草十幅，过江南渡时颠沛流离，于是遗失了，常为这样精妙的书

法绝迹而感叹。忽见您给家兄写的回信，书法美妙入神，好像张芝的书迹又呈现在面前。”

当时骠骑将军王述年少名高，与王羲之齐名，但王羲之很看不起他，因此二人不大合得来。王述先前曾在会稽任职，因母亲逝世，回会稽郡境内守孝，王羲之接替王述的职务，只去吊唁了一次，就没有再去。王述每次听到吹角声，认为是王羲之来问候自己，于是洒扫庭院来等待，这样一连几年，王羲之竟然没有来看他，王述对此非常怨恨。后来王述被任为扬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在会稽郡内走了一圈，却不却见王羲之，临走时，才去告别了一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对他的宾朋们说：“王述只是个做尚书的材料，到老可能得个仆射的职位。他得到会稽内史的职位，就飘飘然了。”当王述被任为大官，王羲之作为王述的下属，感到羞耻，便派人去京师，请求朝廷把会稽郡分出来设立越州，派去的人言词失妥，深受当时贤明人士的讥笑。事后王羲之内心惭愧，满腹感慨，对他的儿子们说：“我不比王述差，而职位相差悬殊，或是由于你们不如王垣之（王述子）的缘故！”后来王述查考会稽郡的政事，当问及刑狱的情况时，主管官员疲于回答问题，被弄的狼狈不堪。王羲之对此深感羞耻，于是称病离开会稽郡，来到他父母的坟前发誓说：“在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日是初一）九日辛亥，儿子王羲之敬告二老在天之灵。羲之生来不幸，很早父亲去世，未得到父亲的教诲。母亲和哥哥的扶养，使我慢慢长大成人，因人材缺乏，才得到国家的职位。我在任职上在忠孝方面没有建立名节，退职之举又违背了荐贤而代的道义，每当我诵读老子、周任的告诫，常担心一旦失身

死去，辱及祖宗，哪里仅仅是自身的事呢！因此我昼夜叹息，像坠入万丈深谷。知足而止，现在就作出决定。恭敬地在这月的吉日良辰摆设筵席，向祖宗叩头行礼，满怀诚心，在二老灵前发誓：从今以后，如果我胆敢变心，贪图禄位，投机进身，那我是无视父母的不肖之子。作为儿子而不肖，是天地所不容、礼教所不齿的。誓言出自诚心，就像白日在天一般！”

王羲之去职以后，和吴郡、会稽一带的人士，尽情游览山水、捕鸟钓鱼，娱乐身心。他又和道士许迈一起练丹服药，为采集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部各郡，遍访名山大川，泛舟东海。他感叹道：“我最后会纵情游乐而死。”谢安曾对他说：“我中年以后，因喜怒哀乐伤害了身体，和亲友离别，就会好几天心情不好。”王羲之说：“人到了晚年，自然是这样，刚要想听听音乐来陶冶情操，又常常担心儿子们发觉，对欢乐情绪有所影响。”朝廷鉴于他发了绝誓，就不再征召他作官。

当时刘惔任丹杨尹，许询曾在刘惔处借宿，床帐被褥都新鲜艳丽，饮食也十分丰盛，美味俱全。许询说：“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比在东山强多了。”刘惔说：“你如知道吉凶祸福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我哪能保证永远过这样的生活。”王羲之当时在坐，说道：“如果巢父、许由遇上稷、契，不会说这种话。”说得许询和刘惔二人都脸有愧色。

王羲之去官之初，优游无所事事，他给吏部侍郎谢万写信说：

古代逃世隐居的人，有的披乱头发装疯卖傻，有的满身污垢，也够艰难的了。现在我安坐优逸，实现了当

初的愿望，实为大幸，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的吗！违背天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前些时东游归来，种植桑树果树，现在长得茂盛，鲜花盛开，我带领儿子们，怀抱小孙孙，在桑果林中游玩，摘得好吃的果子，切开分吃，享受眼前的欢乐。虽然我的道德修养不深，仍想以敦厚退让教育子孙。如果子孙有轻薄举动，就罚他用马鞭子去清点马匹，效法古代万石君的风范，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

近来将要和谢安石东游山海，同时到田野考察收成情况，以此来打发闲暇时光。除衣食之外的剩余，想和知心朋友时时进行欢宴，虽不能吟诗作赋，但举杯痛饮。讲讲田野里的所见所闻，以此来作为谈笑之助，这种得意的生活，言语是表达不出来的！我常常按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等人的处世原则去作，很想学习他们的高风，我的志愿就全在这里了。

后来谢万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又给他写信进行劝诫，说道：“以你豪迈不羁的次质，屈居群官之中，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是所谓通达明智的人，也只能随事行止，这样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希望您经常和下层官吏在生活上保持一致，那就完美无缺了。吃饭只有一道菜，睡席不用双层，这有什么，但古人却传为美谈。成功与否的原因，在于积小以成大，您要好好记住。”谢万对他的建议未能采用，后来果然失败。

王羲之五十九岁时去世，朝廷赠衔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的生前本意，坚辞不受。

他有七个儿子，著名的有五人。王玄之早年夭折。次五

王凝之，也擅长草书、楷书，历官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王凝之尤其虔诚。孙恩进攻会稽的时候，王凝之的助手们劝他做好御敌的准备，王凝之不听，却是入静室进行祈祷，他走出静室对诸将说：“我已经祈请过天师，天师答应派鬼兵助战，贼军自会被消灭。”因他没有防御措施，被孙恩所杀害。

王徽之字子猷。他生性卓犖不群，放浪不羁，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经常散披头发，衣不系带，也不管府中事务。他又担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主管什么部门？”王徽之回答：“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马曹管理多少马匹？”他回答：“我管理的是否马曹都不清楚，怎么能够知道马匹的数目！”桓冲再问：“近来马匹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我连活马的数目都不知道，哪会知道死马的数目！”他曾随桓冲出门，正赶上下暴雨，王徽之下马钻进桓冲的车中，对桓冲说：“您怎么能一人独占一辆车！”桓冲曾对王徽之说：“你在我的衙门任职已经很久了，不久我会提拔你的。”王徽之并不答谢，眼睛向上仰视，用手牌版着面颊，说道：“早晨的西山带来一股清爽的空气。”

当时吴郡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一片好竹林，王徽之想去观看，便乘轿离家来到竹林边，面对竹林，吟诵了好长时间。主人打扫庭院请他入坐，王徽之不加理睬。他将要出去的时候，主人关上大门，王徽之对主人此举非常欣赏，宾主入坐，尽欢而去。他曾借住一处空宅，他住进后就令人栽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借住种竹子干什么，王徽之只是吟诵，手指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来陪伴呢！”他曾住在山阴县，有

一天夜里大雪初晴，月光明朗，放眼四望，一片银白，他独斟独饮，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徽之当夜乘船去拜访，船行了一夜才到，来到戴逵门前便往回走。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自然往回走，何必要见到戴逵呢！”他禀性放浪怪诞，好声色，有一天夜里和他的弟弟献之一起读《高士传赞》，王献之非常赞赏“井丹高洁”这句话，王徽之说：“我看比不上‘长卿慢世’这句话更妙。”他就是这样傲俗放达。当时人都钦佩他的才能而鄙薄他的品行。

后来王徽之任黄门侍郎，弃官离开京师东还，与王献之同染重病。当时有个江湖术士说：“人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有活人乐意代他而死，那么死者可以复活。”王徽之对术士说：“我的才能和地位都不如弟弟，请求用我的余生来代替弟弟。”术士说：“代死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寿命还有余年，能够补足将死的人。现在你和你的弟弟寿命都到了尽头，用什么来代替呢！”不久，王献之去世，王徽之凭吊死者却不哭泣，径直坐在灵床上，拿过王献之的琴就弹起来，弹得时间长了，琴声变了调，他感叹说：“可叹啊子敬（王献之字），人琴俱亡！”说罢就昏死过去。他原先背部生疮，这时疮烂溃裂，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叫王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任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任太尉时，朝臣们聚齐，他问王桢之：“我比你死去的叔叔怎么样？”在坐的人听了这话都感到憋气。王桢之说：“先叔是一时的楷模，您是千载的英俊人物。”满座朝臣才高兴地舒了一口气。

王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王献之字子敬。少年时代即负有盛名，豪迈不羁，即使是在家闲居，容貌举止，毫不懈怠，文采风流为一时之最。他刚几岁的时候，曾在旁观看门客们赌博，局面将分出胜负，王献之说：“南边的将要失利。”门客说：“这个小主人管中窥豹，有时也能看出一点门道。”王献之发怒说：“我的才能只是远不及荀粲，近不及刘惔罢了。”说罢拂衣而去。他曾和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二位哥哥在谢安面前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王献之则只寒暄了几句罢了。他们走后，在座的客人评论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年岁小的那个好。”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说：“贤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他说话很少，因此我知道他好。”王献之和哥哥徽之二人在一间房子里，房内起火，徽之马上逃走，连鞋也顾不得穿。献之则镇定自若，从容叫人把他扶出去。有一次他正在寝室睡觉，有几个小偷窜进他的房间，把房中的东西都偷光了。王献之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小偷，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可把它留下。”这伙小偷闻声惊慌逃去。

王献之草书、楷书写得很好，又擅长绘画。他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他的父亲王羲之悄悄从他背后夺他的毛笔，未能夺下，因而王羲之感叹地说：“这孩子日后也会大为出名。”他曾在墙壁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认为难能可贵，来围观的有好几百人。桓温曾请他书写扇面，他不慎失手把笔落在扇面上，他趁势画了一头黑色母牛，非常精妙。

他初任州主簿、秘书郎，又转为秘书丞，选配新安公主。他曾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座名园，他们过去并不认识，便乘轿直进园中。当时顾辟疆正在和朋友聚会，王献之游遍了

花园，旁若无人。顾辟疆十分恼火，责备他：“对主人傲慢，是无礼的行为。自持高贵，骄慢士人，不合道义。犯有这两种过失，就是不足挂齿的粗野人。”把他赶出门外。王献之傲然如初，毫不介意。

谢安对王献之非常爱重，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谢安进号为卫将军，仍任他为长史。太元年间，朝廷新建立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题写匾额，成为流传万代的墨宝，但是谢安难以启齿，便试探性地对王献之说：“曹魏时，陵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被工匠误钉上去，取不下来，于是请韦诞悬挂凳子书写。等写好以后，韦诞的胡须头发都变白了，累得只剩一口气。回来以后，对他的弟子说，以后绝不要这样写字。”王献之揣摸到这话的意思，严肃地说：“韦诞是魏国的大臣，哪里会有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从这事也可以看出魏国短命的原因了。”谢安于是也不再逼迫他。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和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说：“本来就不相同。”谢安说：“外边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王献之回答说：“别人哪里知道！”不久，王献之升任建威将军、吴兴郡太守，又征调他为中书令。

谢安逝世以后，对他的丧礼规格和追赠有不同意见，只有王献之、徐邈一起申明谢安对朝廷的忠诚和所建立的功勋。王献之向朝廷上疏说：“已故的太傅谢安，少年时代就在玄学领域名声大振，清淡声誉洋溢四海。年轻时隐居，节操可与箕子、商山四皓比美。适应国家的需要出仕任职，为国家出谋划策稳妥周到。及其率兵出征，强敌即被消灭。在他建立了功勋以后，却谦恭退让。再者，他服侍先帝，君臣关系融

洽，超过了布衣之交。陛下您即位时，年纪很轻，他殚心竭愿辅佐陛下。回顾他从隐居到出仕的一生，时时事事以国事为重，他确是大晋优秀辅臣，全心全意为国的高义，超过了以往的大臣。希望陛下关心这位举世景仰的大臣，对他的追赠礼仪加以明察。”晋武帝于是下令用特殊礼仪追赠谢安。

不久，王献之身染重病，他的家人问五斗米道师上表请求消除病灾，按照五斗米道的规矩，病人必须向道师陈述自己的过失并发誓改正，于是家人问他有什么过失。王献之回答：“没有想起有其他过失，只想起和郗家离婚这件事。”王献之前妻，是郗昙的女儿。不久就死在官位上。安僖皇后被册立，因王献之是皇后的父亲，追赠他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赠谥号为“宪”。他没有儿子，过继他哥哥的儿子静之为后，静之官至义兴太守。当时人们认为，王羲之的草书、楷书，江左和中原没人赶得上他，王献之的书法骨力赶不上他父亲，但妩媚可喜。桓玄特别喜爱他父子二人的书法，各装订一册，放在身边时时欣赏。（魏连科 译）

【原文】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

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诰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客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与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唯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诰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诰书以戒之，诰不从。及诰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诰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诰书曰：

知安西败丧，么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

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合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供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归镇，自长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国均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措。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诰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

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从，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金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殄尽，万不馀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小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羨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间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详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

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藪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徐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

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怠，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

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至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草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

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已，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要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谕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诚，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顙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谕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复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蛟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移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

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杨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迈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地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彷彿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期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尊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我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发，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板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此无君邪！”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雅必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结”，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傲达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馀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

馀，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馀亦卒。子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皆悦。

操之字子重，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年数岁，尝观门生搏捕，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后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斲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

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伦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馀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书？”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仪，唯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远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宜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拔高让。且服事先帝。春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心曩臣矣。伏惟陛下留下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无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义兴太守。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

桓伊传

——《晋书》卷八一

【说明】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晋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桓氏家族在晋代是仕宦世家，人才辈出，桓温、桓冲、桓玄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桓伊自幼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略，入仕后，多次被任为定疆大吏，历任淮南太守、豫州刺史、江州刺史、护军将军等。他和谢玄在淝水大败苻坚之军，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名将。桓伊除具军事才能外，又是当时著名的笛子演奏家，他的演奏水平，在当时为江左一绝。他还收藏一支东汉著名音乐家蔡邕的“柯亭笛”，称为一时之绝。著名琴曲《梅花三弄》据说就是据桓伊的笛曲改编而成的。

桓伊字叔夏。他的父亲桓景，具有治世的才能，官至侍中、丹杨尹、中领军、护军将军、长社侯。

桓伊有军事才略，生性机敏，作风平易，深为王濛、刘惔所赏识，多次为诸军府参谋；军事历升至大司马参军。当时苻坚兵力强盛，边境上多处令人担心，朝廷要选拔能捍卫边境的将领，于是任桓伊为淮南太守。因在边地措施得力，升

任他为豫州的十二郡扬州的江西五郡都指军事、建威将军、历阳太守，仍旧兼任淮南太守。他和谢玄一起击败苻坚的将领王鉴、张蚝等人，因功封为宣城县子，又进升为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在苻坚率兵南下的时候，桓伊和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同在淝水打败苻坚，因功被封为永修县侯，进名号为右军将军，赏钱百万、衣料千疋。

桓伊生性谦逊平易，立了大功，始终作风不改。他擅长音乐，成为当时的高手，被称为江左第一。他有一支东汉蔡邕的柯亭笛子，经常吹奏。王徽之有一次奉召进京，所乘的船只停泊在青溪旁。桓伊向来不认识王徽之，他正好从岸上经过，船上的人称呼桓伊说：“这位是桓野王。”王徽之便让人对桓伊说：“听说你善于吹笛子，请为我吹奏一曲。”当时桓伊已是官高位显，平时就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于是下车，坐在矮几上，为他演奏了三支曲子，吹奏完毕，便上车走开，主人和客人并没有交谈一句。

当时谢安的女婿王国宝仗势胡作非为，谢安很讨厌他，经常对他进行约束。晋武帝晚年嗜酒，好女色，会稽王道子更加昏庸，只亲近那些阿谀奉承、行为邪恶之徒，于是王国宝便能靠拍马奉承、挑拨君主和宰相谢安的关系。那些为利的奸险之辈，认为谢安势力已经极盛转变，便造谣生事，于是晋武帝和谢安之间发生矛盾。晋武帝请桓伊赴宴，谢安陪坐。晋武帝让桓伊吹笛助兴，桓伊满腔表现出顺从的神情，为他吹奏了一曲，放下笛子说：“我弹筝的水平虽然不如笛的水平高，但也能做到与歌声和其他乐器音调和谐，我为陛下边弹边唱，请一个人来吹笛子。”晋武帝对他的随和很满意，于是

让全皇家乐队的乐妓来吹笛。桓伊对说：“皇家乐队的人和我不一定配合得好，我有一个奴仆，善于和我配合。”晋武帝越发欣赏他的直率，准许把的奴仆叫来。奴仆吹起笛子，桓伊便弹筝歌唱《怨诗》，歌词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文武，《金 》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音调铿锵，情绪慷慨激昂，声调高低悦耳。谢安被感动得泪湿前襟，他从坐位上站起来，走到桓伊的笛边，用手捋着桓伊的胡子说：“刺史大人在这一点上真是不同凡响！”晋武帝则满腔羞愧。

桓伊在豫州十年，他安抚百姓，救济贫困，很得民心。桓冲去世后，他升任都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仍号右军将军，假节钺。桓伊到江州镇城，鉴于边境上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应以宽免百姓的赋税、抚恤贫因为当务之急，于是他上奏朝廷，因江州边年争斗，地方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上边年收成不好，现在只剩下民户五万六千多户，应该将小县合并，免除所欠的赋税，把州治迁回豫章，皇帝下令州治移至寻阳，其他名项都照准。桓伊因地制宜地进行安抚，使百姓有所依赖。他在任多年，朝廷征他为护军将军，原右军将军府中千人兵吏随他调动，配备护军府。他死在护军将军任上。追赠他为右将军。加散骑常待衔，谥号为“烈”。

当初，桓伊存有骑兵步兵盔甲众百套，他临死之前预先写下奏疏，让家人在他死后上交给朝廷。他在奏疏上说：“我受到皇帝的原爱，在西部边境任职。淮南的胜利，敌人逃命，人马的盔甲，四处丢弃。当时我下令收集这些盔甲，但都残破不完整。连年加以修理，现又修理完整。现在虽然天下统

一了，但敌人的残暴势力还没有消灭，我虽然已经年迈老朽，仍想为朝廷效力尽命，以上报皇帝的恩德。现在我的志愿没法实现了，这是我死后的遗愿。现在送上马具一百套、百兵盔甲五百套，这些都存放在寻阳，请派官员去接受。”皇帝下诏说：“桓伊的尽忠心理没能最终实现，更加让我伤心，收下他送上的盔甲。”

桓伊的儿子桓肃之继承了他的爵位。桓肃之死后，他的儿子桓陵继承爵位。宋朝接收政权，封爵被废除。桓伊的弟弟名叫不才，也有军事才略，他曾讨伐孙恩，官至冠军将军。

（魏连科 译）

【原文】

伊字叔夏。父景，有当世才干，仕至侍中、丹杨尹、中领军、护军将军、长社侯。

伊有武干，标悟简率，为王濛、刘惔所知，频参诸府军事，累迁大司马参军。时苻坚强盛，边鄙多虞，朝议选能距捍疆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绥御有方，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建威将军、历阳太守，淮南如故。与谢玄共破贼别将王鉴、张蚝等，以功封宣城县子，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及苻坚南寇，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俱破坚于淝水，以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笆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

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庸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波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迁，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箏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箏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站衿，乃越席而就之，将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馀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伊随宜拯抚，百姓赖焉。在任累年，征拜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配护军府，卒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

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豫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令六合虽一，馀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效力命，仰报

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伊忠诚不遂，益以伤怀，仍受其所上之铠。”

子肃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禅，国除。伊弟不才，亦有将略，讨孙恩，至冠军将军。

顾恺之传

——《晋书》卷九二

【说明】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他博学有才气，但一生未做过大官，只是在桓温、殷仲堪等权贵府中任幕僚之类的小官。他为人诙谐，且时有怪僻的行径，有点装疯卖傻。这是魏晋文人怀才不遇、满腹愤恨无处发泄的一种变态表现。

顾恺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画家，尤以画人物见长。他画人物，并不注重人物外形的相似，而特别注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处，在于眼睛。所以他画人物肖像，往往几个月不肯点眼睛。经过苦苦观察思考之后，才点出眼睛，分外传神，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充分表现出来。他的这种主张和艺术实践，体现了我国人物画的优秀传统。可惜的是，他的作品没有保存到今天，读者无由一睹他的画作风貌。

顾恺之字长康，是晋陵郡无锡县人。他的父亲顾悦之，曾任尚书左丞。顾恺之很博学，也很有才气，他曾作成一篇《箴赋》，对别人说：“我这篇赋比起嵇康的那把琴，不懂的人必然认为它晚出而被遗弃，识见高明的人一定会因为它的高

妙奇特而加以珍贵。”

大司马桓温引荐他为大司马参军，很受桓温的宠信。桓温死后，顾恺之到桓温墓前拜祭，作了一首诗，诗中说：“山崩沧海干，鱼鸟何所依！”有人问他说：“你是这样地依重桓公，痛哭的情景可以用诗表达出来吗？”顾恺之回答说：“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顾恺之诙谐好开玩笑，人们都喜欢和他亲近。后来任殷仲堪的参军，也很受器重。殷仲堪在荆州做官时，顾恺之曾请假回家，殷仲堪特别借给他一条船用布帆。行船至破冢的地方，遭遇大风，船被风浪击坏。顾恺之写信对殷仲堪说：“那个地名叫破冢，真是破冢而出啊！同行的人都平安，布帆也没坏。”回到荆州，人们问起会稽地方山川景物的状貌，顾恺之说：“千座山峰，各显灵秀，万道溪流，争相奔泻。草木郁郁葱葱，象云蒸霞飞。”有一次桓玄和顾恺之一起在殷仲堪家作客，三人比试，看谁说出的话能道出事之极致、最为彻底。顾恺之说：“火烧平原，寸草不留。”桓云说：“白布裹棺材，竖起招魂幡。”殷仲堪说：“投鱼于深渊，放鸟于蓝天。”又比试谁的话最道出危险的景状。桓玄说：“长矛顶上淘米，利剑尖上煮饭。”殷仲堪说：“百岁衰老翁，攀援枯树枝。”有一个参军在旁边插嘴：“盲人骑瞎马，走近深水池。”殷仲堪一只眼因生病而失明，听了这话，吃惊地说：“这话太逼人了！”因此不再说了。顾恺之每次吃甘蔗，总是从尖上慢慢嚼至根部，别人觉得这种吃法很奇怪。他却说：“这样可以渐入佳境。”

他尤其擅长绘画，勾线设色，奥妙无比，谢安深为佩服，认为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这样高的成就。顾恺之每

画完人像，经常好几年不点眼神。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四肢的美和丑，本来无关紧要，人像的传神，只在这里。”他曾爱上一个邻家的少女，顾恺之挑逗她，少女不从，于是他把那少女的像画在墙上，用针扎在心脏部位，那少女就得了心痛病。顾恺之向对方诉说了爱慕之情，少女答应了，他偷偷拔掉针，少女的病也随之而愈，顾恺之很欣赏嵇康的四言诗，因此为诗配图，他常说：“画出手弹五弦琴的场面很容易，要画出目送归雁的意境很难。”因此，要画成一幅人像，都妙绝一时。他曾为裴楷画像，在面颊部位加上三根毛，观看者觉得人像特别有精神。又曾为谢鲲画像，把他安排在山石之中，他说：“这位先生应该置身于丘壑之中。”他想为殷仲堪画像，殷仲堪因为自己眼有毛病，坚辞不允。顾恺之对他说：“刺史大人您的特点恰恰在眼上，如果把眼球点得黑黑的，再用飞白笔轻抹，象薄云蔽月，不是很美吗！”殷仲堪这才答应。他曾装满一柜子画，柜门上贴了封条，寄给桓玄，这些画都是他珍爱的精品。桓玄把柜子背面打开，偷偷把画取出来，而前面柜门上的封条依旧，把柜子送还，捉弄顾恺之，说柜子并没有打开。顾恺之见封条依旧，但画却没有了，他只说：“好画通灵气，变化飞去了，正象人成仙上天一样。”他毫没露出惊怪的表情。

顾恺之的矜持自夸，言过其实，那些轻薄少年便对他胡乱吹捧，以此来嘲弄他。又好吟诗，自以为颇得古人的风韵。有人请他效法洛阳书生用鼻音来咏诗，他回答说：“不屑于学那老奴婢的声音！”义熙初年，任散骑常侍之职，衙门与谢瞻相邻，夜里在月色下长时间吟诗，谢瞻在远处高声赞扬，顾

恺之越发起劲，忘记了疲倦。谢瞻要睡觉，让人代替自己，顾恺之也没觉察到换了人，于是直吟到天亮才停止。他特别相信邪道小术，认为用心访求，一定能学到手。桓玄曾拿一片树叶捉弄他，说道：“这是蝉借以藏身的树叶，用它来遮盖自己，别人就看不见你。”顾恺之高兴，便拿树叶遮盖自己，醒玄就当面小便，恺之便确信他看不见自己，因而对那片树叶十分珍视。

当初，顾恺之在桓温府中任职，桓温常说：“顾恺之身上，呆痴和狡黠各占一半，二者合起来，正好平衡。”因此，世俗传说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六十二岁时，死于任所，他的著作文集和《启朦记》流传于世上。

（魏连科 译）

【原文】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后为殷仲堪参军，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还至荆州，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桓

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语。恺之先曰：“火烧平原无遗燎。”玄曰：“白布缠根树旒。”仲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仲堪眇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缺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刺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象，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给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

恺之矜伐过实，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异。又为吟咏，自谓得先贤风制。或请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为老婢声！”义熙初，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瞻每遥赞之，恺之弥自力忘倦。瞻将眠，令人代己，恺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桓玄尝以一柳叶给

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也，甚以珍之。

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朦记》行于世。

戴颙传

——《宋书》卷九三

【说明】戴颙（公元 378—441 年）字仲若，谯郡铨（今安徽宿县）人，迁居浙江剡县。其父戴逵，是东晋著名雕塑家、画家、戴颙能继承父业，也擅长雕塑、绘画。当时他人曾铸丈六铜像，因比例失调，面部显得消瘦，在戴颙的指导下，削减了肩臂部，才自然匀称。他尤其擅长弹琴，能作曲，在当时名声很著。戴颙一生不仕，朝廷多次征召，他都坚卧不出。

戴颙，字仲若，是谯郡铨县人。他的父亲戴逵，哥哥戴勃，都隐居不仕，都有很高的名望。

戴颙十六岁时，父亲去逝，他悲痛得几乎垮了，因而身体长年病弱。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做过官，他继承了父亲的技艺。他的父亲擅长弹琴书法，戴颙也兼而能之，但凡各种乐曲，他都能挥手弹奏。会稽郡剡县朋多次山水名胜，因而他家世代代居住在剡县。戴颙和他哥哥戴勃的弹琴技艺都是他父亲亲自传授，他父亲去世之后，传授给他们的琴曲，他们怕引起悲痛，不忍心再弹奏，于是各自谱写乐曲，戴勃谱

写了五部，戴颙谱写了十五部，又谱写了一部大型乐曲，都流传在世上。中书令王绥曾带领他的门客来到戴家，戴勃等人正吃豆粥，王绥说道：“听说你很会弹琴，你弹奏一下，给我听一听。”戴勃等人不理睬，于是王绥气恨而去。

相庐县也有很多名山大川，他们兄弟一起去游玩，就留住在那里。戴勃得了病，又缺医少药，戴颙对他哥哥说：“我跟随哥哥闲居，并不想就这样默默无闻。哥哥现在病得这样厉害，又没办法医治，我想出去当官来解救眼前的危急。”于是托人请求任海虞县令，事情快要成功时，戴勃就死去了，这事情也就告罢。相庐县地处偏远，不利于养病，于是出山居住在吴县。吴县的读书人合力为他筑造房屋，叠山引水，植树开沟，不久林木长得郁郁葱葱，景致象自然形成一样。于是他研究《庄子》一书的思想，写出了《逍遥论》，又注释了《礼记》的《中庸》篇。三吴地区的将军，郡守以及吴郡的名流邀请他去野游，他认为合适就去，绝不虚情假意，矜持自高，大家都很赞赏他这一点。

宋高祖任他为太尉行参军、琅邪王的司马属官，他都不就任。宋朝建国之初，下令说：“原太尉参军戴颙、隐士韦玄，志在隐居，坚守不改，应该加以表彰，以奖励他们的引退之风。都可任为散骑侍郎，在通直郎之列。”戴颙没有赴任。宋太祖元嘉二年，皇帝下圣旨说：“新任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二人志在隐居，自甘蓬屋茅舍的生活，恬静的品操，久而不改。戴颙可任为国子博士，宗炳可任为通直散骑侍郎。”立太子之初，又征召戴颙为太子中庶子，元嘉十五年又征召他为散骑常侍，戴颙都不就任。衡阳王刘义季镇守

京口，长史张邵和戴颙是亲家，把他接来，住在黄鹄山。山北有大片竹林，种杏在精致的房屋，林边的山涧，风景优美，戴颙就生活在这条山涧里，刘义季很快就和他交上朋友，戴颙仍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装束，不改往常的仪度。戴颙为刘义季弹琴，都是经过改编的新曲子，他弹奏的清平侧三调整《游弦》、《广陵》、《止息》等曲目，都和世人的奏法不同。宋太祖常常想去看他，曾对黄门侍郎张敷说：“我去东方视察时，当在戴公住的山上欢宴。”因戴颙爱好音乐，当在戴公住的山上欢宴。”因戴颙爱好音乐，长年配给他一个正声乐队。戴颙把正声与《何尝》、《白鹄》二调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声调，称为清旷调。

从汉代才开始有佛像，但造型不精，戴逵特别擅长塑佛像，戴颙也参与其事，宋世子在瓦官寺铸造了一座一丈六尺高的铜佛像，铸成以后，佛像的面部显得很瘦，铸造工人没有办法，于是把戴颙接来察看，戴颙说：“并不是面部瘦，而是肩臂太肥的缘故。”待把肩臂锉减以后，面部瘦的毛病随即消失了。对他的技艺，没有不佩服的。

元嘉十八年，戴颙去世，终年六十四岁。他没有儿子。景阳山堆成以后，戴颙已经去世了，宋太祖感慨地说：“遗憾的是不能让戴颙看上一眼了。”
(魏连科 译)

【原文】

戴颙字仲若，谯郡铨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

颙年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

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常携宾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师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医药不给，颙谓勃曰：“颙随史得闲，非有心于默语。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录以自济耳。”乃告时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往，不为矫价，众论以此多之。

高祖命为太尉行参军，琅邪王司马，并不就。宋国初建，令曰：“前太尉参军戴颙、辟士韦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并可散骑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诏曰：“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华，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颙可国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东宫初建，又征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征散骑常侍，并不就。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颺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颺看之。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十八年，卒，时年六十四。无子，景阳山成，颺已亡关，上叹曰：“恨不得使戴颺观之。”

王僧虔传

——《南齐书》卷三三

【说明】王僧虔（公元426—485），临沂（今山东属县）人。他生活在南朝宋、齐之间，在宋朝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令；在齐朝仍为侍中、湘州刺史。他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因受家族的熏陶，他喜爱文史，懂得音律，他有关雅乐与俗乐的论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雅乐与俗乐的消长，道出了音乐发展史上规律性的东西。他尤其以善书著名，他的字能继承古法，书风丰厚古朴，为当时所推崇，对唐、宋的书法也有影响。存世书迹有《王琰帖》等。著有《论书》等文。

王僧虔，是琅邪临沂人。他的祖父王珣，在晋朝官至司徒。伯父王弘，在晋朝官至太保，在宋朝元嘉年间为宰相。王弘的门客问及他的家讳，王弘回答说：“我的家讳与苏子高（峻）相同。”王僧虔的父亲王昙首，官至右光禄大夫。王昙首兄弟把他们的子孙召集在一起，王弘的儿子王僧达在地上蹦跳游戏，当时王僧虔才几岁，一个人端坐用蜡油捏凤凰。王弘说：“这孩子将来会成忠厚的长者。”

王僧虔二十岁左右时，为人宽厚，擅长楷书。宋文帝看到他写的扇面，赞叹说：“不仅书法超过了王献之，方正的器量也超过了他。”他被任为秘书郎、太子舍人。王僧虔性格谦逊，少言寡语，很少和人交往，与袁淑、谢庄是好朋友。后来转任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又迁为司徒左西属。

他的哥哥王僧绰，被刘劭所杀害，亲朋都劝王僧虔逃命。他泪流满面地说：“我的哥哥用忠贞来敬奉国家，用慈爱抚育我现在的事情，如果（我）不被牵连就算了。倘若一同命归黄泉，就象飞天成仙一样。”孝武帝初年，外任他为武陵郡太守。他的侄子王俭，在随他赴任的中途生病，王僧虔为此不吃不睡照顾侄儿，同行的门客劝慰他，他说：“过去马援对待儿子和侄子一点也没有分别，邓攸看待侄儿胜过亲生儿。我就是这样想的，和古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是我亡兄的后代，不应忽视。如果这孩子救不活的话，我就掉转舟头回朝辞职，再也不会做官的兴致了。”后来回京任中书郎，转任黄门郎、太子中庶子。

宋孝武帝刘骏企图专享书法名家的声誉，因此王僧虔不敢显露出自己的书法水平。在大明年间，他常用秃笔写字，因此才能存身。外任他为豫章王刘子尚的抚军长史，又升为散骑常侍，又任他为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南东海郡太守，行使南徐州刺史的职权，这两位亲王都是孝武帝的爱子。

不久任他为豫章内史。又入朝为侍中，升御史中丞，兼骁骑将军。贵族人士向来都不任监察官，王氏家族的分支在平民区居住的，才任这官位较低的职务，王僧虔担任这种职务，他说：“这是在平民区居住的那些人的官位，我也可以试

着干干。”后来又任他为侍中，兼屯骑校尉。泰始年间，外任为辅国将军、吴兴郡太守，官品与二千石相当。王献之善长书法，曾任吴兴郡太守，王僧虔也擅长书法，也任为吴兴郡太守，被人们传为美谈。

他后来又改任会稽郡太守，官品与二千石相当，仍为辅国将军。中书舍人阮佃夫老家在会稽，请假东归。王僧虔的门客劝他通过阮佃夫结好朝廷，对阮佃夫要以礼接待。王僧虔说：“我立身处世有自己的准则，哪能曲意奉承这种人。他如果讨厌我，我就甩袖而去。”阮佃夫把这话告诉给宋明帝，并指使御史中丞孙复弹劾他，说道：“王僧虔任吴兴太守时，胡作非为，检点他从到任到迁官，共任用功曹、五官、主簿，以至二礼吏署三传，以及收弟子，计四百四十八人。他又批准百姓何系先等一百一十家为士族。应派州郡官员去检查。”王僧虔因此被免官。

不久，以平民的身份兼任侍中，外任为监吴郡太守，又升为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使湘州刺史职权，又为辅国将军、湘州刺史。他在各种职位上，都以行政宽和利民著称。巴峡的流民很多人住在湘州境内，王僧虔上奏朝廷，分割出益阳、罗、湘西三县沿江流民另立湘阴县，他的建议得到批准。

元徽年间，升任他为吏部尚书。高平人檀珪原为沅南县令，后被罢职，王僧虔任他为征北板行参军。檀珪向王僧虔诉说求官不得的委屈，他给王僧虔写信说：“国家的创建，文韬武略最为重要，文能治理天下，武能拔乱定国。我家族的人虽没有以文治而身居显要，但曾身为显赫的武将。我的堂

姑有三位和皇家结亲，我的祖父、兄长两代人，为国捐躯，但是他们的子侄落得饿死草野的下场。去冬今春，连遭二次斥责，因我在朝中无人说话，于是屡遭贬降。在四、五个月的时间内，我给你写了十二封信，你接见我只有六、七次，不但没有得到你的照顾，反而更受冷遇。三教九流的人你都能公平对待，不应该单独苦了我一人，害得我饥肠辘辘，为时已久。因饥饿的老虎能咬人，人马上投给他肉食；饿坏了的麒麟不会咬人，谁肯给他一口食呢？去年冬天我请求任豫章丞，这个职务被马超夺走了；今年春天任命我为南昌县令，又被史偃夺走了。这两个人他们父祖的功劳和他们本人的才能，哪一点比我强？如果是由于贫富不同的原因，我当然不如他们。我虽然位微势孤，但我的家庭是百年的士族，前辈的联姻之家和父祖的地位，也不在别人之下。尚书您的堂姊是江夏王妃，我的堂姑是南醺王妃；尚书您的妻子是江夏王之女，我的祖姑是长沙景王的嫔妃；尚书您的伯父曾做江州刺史，我的祖父也曾是江州刺史；尚书您的堂兄初仕为后军参军，我的父亲初仕也为中军参军。我和尚书您相比，人才和地位相差悬殊，但是在前辈联姻和官位方面，却相差不多。现在虽然你位居显官，我地位卑下，相差甚远，但同属官宦世家，尚书您为什么这样苦苦相逼？泰始初年之时，八方反叛，我檀家一门两代人，为了保卫君主，粉身碎骨，对国家有这样大的功勋，却得不到提拔，我只不过按常规任官，却又遭到排挤贬降。”王僧虔回信说：“征北板行参军这一职务，近年来处境很不错，殷主簿就从这一职务步入高官之列，何仪曹接代殷主簿，也没听到他诉苦。足下你一向官位较低，一旦想

越级提拔，确有困难。泰始初年你辛辛苦苦干了十年，却怎么没有看到你受过苦苦逼迫呢？只不过我对你的看法和你不同罢了。”檀珪又回信说：“过去荀公达是汉朝的功臣，晋武帝还给他的玄孙以爵位。夏侯惇是曹魏的功臣，刘宋初年，也受到重视，他的孙子得到赏赐，近族子孙得到封爵。羊叔子因在晋朝泰始年间提议伐吴，到咸宁末年，也加以褒奖，他的侄儿也得到封爵。卞望之因咸和初年为国献身，到兴宁末年，才受到尊崇，他的子孙都委任为官。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年死于旧主之难，咸康年间才提拔他的子孙。以上这些事例，似乎不因年代久远他们的子孙被遗弃，不因时代不同而被排挤。我檀珪遭遇的种种厄运，世间少有，五代人没有安葬，百口之家流离失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本来只希望得到微薄的薪俸，无心获取更高的荣耀。自古以来就有只享受俸禄而无职事的沐食侯，近世又有所谓王官。府佐并非沐食侯的职务，参军也不是王官的职称。我自知自己不是葫芦，以空悬为耻。殷、何二位，或者是出于上官的情面，或者是朝廷的旨意，哪能和我这个平常的人同日而语。假使我就任此职，尚书您是否能转升为我郎官？如果我能得到每天五升米的俸禄，就是给您牵马坠蹬我也不感到羞耻。”王僧虔才任他为安城郡丞。檀珪，是宋朝安南将军檀韶的孙子。

王僧虔不久又加散骑常侍衔，又转为左仆射。升明元年，升尚书仆射，不久又转为中书令、左仆射，二年又为尚书令。王僧虔爱好文史，对乐律也有研究。他鉴于朝廷上现行的礼乐制度大都违背了传统规定，民间又竞相制作新调杂曲，当时太祖萧道成为辅政大臣，王僧虔上书说：“悬锤之类的乐器，

应用于高雅场合；奏凯的舞蹈，以八队为准。现在乐官跳的羽舞，乐曲和服饰都违背礼数。再者，一套编钟，为歌伎伴奏，以歌唱为主，这也不是雅乐。大明年间，用宫中的编钟演奏《鞞》、《拂》乐曲，节拍虽然相合，恐怕也有违于雅乐，将来有懂音乐的人发现这种情况，恐怕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礼乐提出批评。如果说现在的乐器和舞蹈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很难改变，那么可以另造编钟。不按原来的形制。宫中的四面悬钟，仍严格按照雅乐的规定演奏，这样既保护了雅乐的体统，又考虑到实际情况，这样或许是可行的。再者，现在的《清商》乐曲，实际是从曹魏时流传下来的，它是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流风余韵，这种乐曲仍随处可以听到，京洛人士视此为高雅，江左地区更是以此为高贵。确实作到了庙堂雅乐，绝迹于私家宴会、象桑间、濮上，郑卫之声等庸俗的歌声，遭到上层人士的摒弃，雅俗各得其宜，也没有比这种局面再好的了。但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欣赏习惯随之变化，这些《清商》乐曲，日渐衰落，十几年的时间，乐曲失传了将近一半。从此，家家竞相创制新曲，人们崇尚通俗音乐，一味追求急促的旋律，不顾及音乐的本身的规律，这种风气无节制地发展流传开去，不知要发展到何种地步。这种社会风气，排斥雅乐正音，崇尚淫乱的歌曲。士人有等级，无故不能撤去音乐，礼仪有分别，有的乐曲不可老少都去欣赏。因此，那些喧嚣叫号的歌曲，日盛一日地在民间发展；雅乐正音，只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应该下令有关方面，务必要下工夫，整理失传的雅乐、逐渐推广，乐曲有遗忘的地方，全部补配齐全。如果能整理出完整的乐曲，要给予高薪，演奏

水平高的，任以高官。这样用物质利益去激励，那么人人会去下苦功。这样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或指日可待。”它的意见被采纳实行。

建元元年，王僧虔转为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二年，进他为左卫将军，王僧虔坚持推让，不受封拜。改任他为左光禄大夫，侍中、丹阳尹仍旧。郡县里对待囚犯一向有这样的做法：借囚犯生病之机，用汤药毒死囚犯。王僧虔为此上书说：“汤药本来是治病用的，而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或者是为了泄私恨。如果罪行严重，必须重判，自有刑法规定；如果是为了从快惩治罪犯，应该先行上报。哪能把生死大权让郡县随意掌握？我认为，给罪犯治病，必须首先向郡里报，要求有关吏员和医生当面进行诊断，如果罪犯家属远离县衙，必须等家人来看望，然后再治疗。这样罪犯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家人也不会有怨言。”他的意见被皇帝采纳了。

王僧虔很留意收集雅乐曲谱，升明年间所进呈的曲谱，不仅稍有修改，而且还有不少遗漏。这时皇帝想向外国派遣使者，收集乐曲，王僧虔给他侄子王俭写信说：“古语说得好‘中原礼仪失传，求之于四周少数部族。’估计乐曲也是这种情况。苻坚失败以后，东晋才备齐了雅乐乐曲，因此不能对苻坚一概否定。北边国家或许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乐曲，当然不能用来弥补中原的缺失，但了解了存失的情况，也算一次清理。但是《鼓吹曲》原有二十一支曲子，现在能演奏的只有十一支，我想这次北使，会带随身的隶役，应从乐官中选一个大致能辨别乐曲同异的人，充当使团的一员。虽然难以和延陵季子问乐一事相比，但就他所知能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与原来的局面相比，自当有所不同。如果你认为我这话有道理，是否能把我的意思上报给皇帝？请你考虑一下。”但这件事并没有能施行。

齐太祖萧道成擅长书法，他即位当皇帝以后，对书法艺术的爱好，热情不减。他曾和王僧虔比赛书法，他写完后问王僧虔：“谁是第一？”王僧虔回答说：“我的书法是第一，陛下您的书法也是第一。”皇帝笑着说：“您真可说是善于为自己打算啊！”同时向王僧虔展示十一卷古人墨迹，并让他举出历代书法家的名字。王僧虔得到民间收藏的古人墨迹，皇帝给他看的墨迹中不载的，有吴国大皇帝孙权、景帝孙休、归命侯孙皓的墨迹，桓玄的墨迹，以及丞相王导、领军王洽、中书令王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等人的墨迹，共十二卷，进呈给皇帝。又进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这一年冬天，升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仍为侍中。王僧虔为政清静简约，没有贪欲，也不经营私产，因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齐世祖萧赜即位，王僧虔因患中风想陈奏退休，这时升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少年时曾参加本族同辈人的聚合，有位宾客给他看相，说道：“僧虔的年龄和官位将来最高，当官至公卿，其他人赶不上他。”这时被任命，王僧虔对侄子王俭说：“你在朝肩负重任，不久将位至公卿，如我再被任此官，那么我们一家就有二位公卿，真让人胆颤心惊。”于是他坚辞委任，皇帝体谅他的苦心，答应了他。改任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有宾客问他为什么推让，王僧虔说：“君子所担心的是没有品德，不担心得不到荣誉。我吃得饱穿得暖，官位荣

耀，已经过分，惭愧的是才能菲薄，无力报效国家，哪能再接受更高的爵位，招致讥责呢！”他的侄子王俭在朝任宰相，在家盖了一栋长梁房屋，比规定的规格稍稍超标，王僧虔看了很不高兴，竟然为此不登王俭的家门，王俭马上拆毁了。

永明三年，王僧虔去世。王僧虔善观天象，有一天夜里在外闲坐，他看到与豫章郡相应的星座有变异，断定豫章郡将发生什么事件，当时他的儿子王慈任豫章内史，担心他公事上出纰漏。过了不大一会儿，王僧虔就去世了，王慈丢弃职务奔丧。王僧虔当时六十岁。朝廷追赠他为司空，侍中衔仍旧，赠谥号为“简穆”。

王僧虔论述书法艺术时说：“宋文帝的书法，自称可以和王献之相比，当时人们的评论是：‘他的天赋胜过羊欣，他书法功底不如羊欣’。平南将军王广，是王羲之的叔父，在南渡以前书法水平最高。我去世的曾祖王洽的书法，王羲之评论说：‘我弟弟的书法不下于我。’能变化古代书体的，现在只有王羲之、王洽；不然的话，我们至今仍然会以钟繇、张芝的书法为标准书体。我去世的堂祖中书令王坦之的书法，王献之说：‘我弟弟的书法象匹骡子，跑得飞快，常想超过骏马。’征西将军庾翼的书法，年轻时和王羲之齐名，王羲之是他的后辈，庾翼不服气，他在荆州任职时给京城的朋友写信说：‘后生小辈像穷人家的鸡一样，都去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等我去到京城，将和他平分秋色。’张翼的书法，王羲之曾亲自书写表章。晋穆帝让张翼写题后批语，王羲之本人当时也分不清楚，过了很久才醒悟，说道：‘这小子的字几乎和我的字相混，以假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卫 、卫夫人，

都在前代著名，没法判断他们的优劣，只看到他们的笔力惊人罢了。张澄当时也有心侧身其间，郗愔的章草稍次于王羲之，郗嘉宾的草书稍次于王羲之、王献之，但结构紧凑妩媚，超过了他父亲。桓玄自认为他的书法和王羲之同属一流，人们认为他只能和孔琳之相比。谢安也名列书法家行列，也很自负，曾为王献之书写嵇康的诗作。羊欣的书法名重一时，曾亲受王献之的传授，行书尤其见长，楷书和他的名声不相应。孔琳之的书法，自然放纵，很有笔力，但不如羊欣的字规范。丘道护和羊欣都曾受王献之指点，所以他应在羊欣之下。范晔和萧思话同拜羊欣为师，后来范晔少变师传，既失去原来的规矩，只不过少具羊欣的是笔意罢了。萧思话的书法，简直是羊欣的影子，笔风墨趣，不在羊欣之下，遗憾的是笔力较弱。谢综的书法，他的舅父认为紧凑有生气，得到赏识，但遗憾的是缺少妩媚之趣。谢灵运的书法不入流，若各方面的条件合适，也能写出好字。贺道力的书法稍次于丘道护。庾昕学习王羲之，也能达到乱真的程度。”王僧虔又著有《书赋》，流传于世。

他的第九个儿子王寂，字子玄，生性好动，又长于写文章，他读《范滂传》时，已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王融败亡以后，门客大都去投奔他。建武初年，他想进献《中兴颂》，他的哥哥王志对他说：“你现在正青春年少，何愁不发迹？如果不能镇静行事，将来恐怕受人讥笑。”王寂才作罢。初仕为秘书郎，终年二十一岁。

王僧虔在宋朝时曾有书信教训自己的儿子，说道：

我知道你恨我不赞成你的学问，你表示要发奋图强。或

者立志为学问献身，或者另选别的好职业，即使有所遗憾，也可以告慰平生。但我只听你这么说，并没有看到你的实际行动。按照先师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圣训去做，希望不虚度此生。我之所以不相信你说的话，并不是无根据的。往年你有意学史，把《三国志》放在床头，不过百十来天，又转而去从事玄学，玄学当然比史学少差，但你也没能得其大概，正如东方朔所说：“谈何容易。”你看那些玄学家，其他想法全抛开，为玄学披肝沥胆，专攻一书，又读几十家的注解，这样从小学到老，手不释卷。尚且不敢轻易开口谈玄。可你呢，打开《老子》一书的卷轴还不足五尺长，还不知道王弼的注释说了些什么，何晏又说了些什么，马融、郑玄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凡例》说明了些什么，便摇动拂尘，自称为玄学人士，这是很危险的！假设袁令要和你谈论《易经》，谢中书与你谈《庄子》、张吴兴向你提问《老子》中的问题，你能回答说没有读过吗？谈玄就像射策一样，前人点出了某一问题，后人应详加解释，如果解释不了，就算输了。再说诸子百家的论注，有荆州《八襄》，又有《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等，这都是谈玄家的资料，像来了客人则有所准备一样。这些书你都没有读过。哪有厨房里没有任何东西而要大宴宾客的道理？就像张衡造浑天仪巧夺天工，郭象注《庄子》口若悬河，不经过艰苦努力，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你连题目也没有看懂，大致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易经》的六十四卦，你也不知道各卦的卦名；《庄子》各篇，哪些是内篇，哪些属于外篇，你也不了解；《八帙》所载，共有几家，你也不清楚；《才性四本》，哪一家优长，你也不知。却整天在那里欺人，人

家不会受你的蒙蔽的。因我没有什么学问，没去教训你。但是虞舜并没有严父教育，唐尧却有不成器的儿子，关键在个人。你们兄弟们在私下会这样议论：“父亲也没有刻苦学问，一样在人间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趁着极盛的时期尽情游乐，何必为此而自减其福呢？”你只看到一面，并不全是这样。如果我的学问像马融、郑玄那样，情况就会比现在好得多；如果我没有现在的学问，情况就会大不如现在。取得现在的生活，是有原因的，就是本身努力的结果。你现在正是壮年，自应加倍学习，也许能赶上我。世上的例子俯首即是，我想你很了解这一点，不再多说。

我生在世上，虽然缺乏道德修养，总是在人世间生活了几十年，因此算上一个名人了，人家或许把你们看作我一样。我死之后，你们若不严格要求自己，谁再来管你们的事；我们家族中也有少年时代即有美名、二十来岁时就能出人头地的人。到那时，王家的后代，优秀者则成龙成凤，恶劣的则成狼头虎豹，你们失去庇护之后，难道被人讥为狼头虎豹吗？况且我也不能给你们带来恩荫，这就更加应该各自努力啊。有的人做到三公的大官，但却默默无闻，有的人虽身为平常百姓，但王公大臣却向他屈身敬礼。有的虽是父子，但贵贱相差甚远，即使同胞兄弟，名声也很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之所以得到好的结果，是本身读通了几百卷书的缘故。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用我的前车之鉴告诫后来的车辆啊。你的年龄快要三十岁了，正是做官的好时候，又有家属有拖累，耗费精神，哪有时间坐下来专门读书像小时候那样呢？只能在职学习，来度过一生了。你再三想一想，不要回避我提出

的问题。希望督促你哥哥王志等人，或许他们能摆脱这种命运。我在死之前，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有所成就，不知对你们有启发收益没有？这关系到你们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死鬼只知道留恋茂盛的松树柏林，哪知身后子弟的好坏！因为你着想，引起了我的感慨，因此才粗略地谈出我的想法。

（魏连科 译）

【原文】

王僧虔，琅邪临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宾客疑所讳，弘曰：“身家讳与苏子高同。”父昙首，右光禄大夫。昙首兄弟集会诸子孙，弘子僧达下地跳戏，僧虔年数岁，独正坐采蜡珠为凤凰。弘曰：“此儿终当为长者。”

僧虔弱冠，弘厚，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除秘书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转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任司徒左西属。

兄僧绰，为太初所害，亲宾咸劝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若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兄子俭于中途得病，僧虔为废寝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马援处儿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还为中书郎，转黄门郎，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客。出为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迁散骑常侍，复为新安

王子鸾北部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爱子也。

寻迁豫章内史。入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浅，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复为侍中，领屯骑校尉。泰始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

徙为会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将军如故。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复奏：“僧虔前莅吴兴，多有谬命，检到郡至迁，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礼吏署三传及度与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委州检削。”坐免官。

寻以白衣兼侍中，出监吴郡太守，迁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湘州事，仍转辅国将军、湘州刺史。所在以宽惠著称。巴峡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阳、罗、湘西三县缘江民立湘阴县，从之。

元徽中，迁吏部尚书。高平檀珪罢沅南令，僧虔以为征北板行参军。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五常之始，文武为先，文则经纬天地，武则拨乱定国。仆一门虽谢文通，乃忝武达。群从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躯奉国，而致于子侄饿死草壤。去冬今春，频荷二敕，既无中人，屡见蹉夺。经涉五朔，逾历四晦，书牒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润，

反更曝鳃。九流绳平，自不宜独苦一物、蝉腹龟肠，为日已久，饥虎能吓，人遽与肉；饿麟不噬，谁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为马超所争；今年蒙敕南昌县，为史偃所夺。二子勋荫人才，有何见胜？若以贫富相夺，则分受不如。身虽孤微，百世国土，姻媾位宦，亦不后物。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妇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嫔长沙景王，尚书伯为江州，檀珪祖亦为江州；尚书从兄出身为后军参军，檀珪父释褐亦中军参军。仆于尚书，人地本悬，至于姻宦，不肯殊绝。今通塞虽异，犹忝气类，尚书何事乃尔见苦？泰始之初，人表同逆，一门二世，粉骨卫主，殊勋异绩，已不能甄，常阶旧途，复见侵抑。”僧虔报书曰：“征北板比岁处遇小优，殷主簿从此府入崇礼，何仪曹即代殷，亦不见诉为苦。足下积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难。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见其赏，而顿就求称，亦何可遂？吾与足下素无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书曰：“昔荀公达汉之功臣，晋武帝方爵其玄孙。夏侯惇魏氏勋佐，全德初融，亦始就甄显，方赏其孙，封树近族。羊叔子以晋泰始中建策伐吴，至咸宁末，方加褒宠，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殒身国难，至兴宁末，方崇礼秩，官其子孙。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难，咸康中方擢其子孙。似不以世代远而被弃，年世疏而见遗。檀惇百罹六极，造化罕比，五丧停露，百口转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质非匏瓜，实羞空悬。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岂与悠悠之人同口而语？使仆就此职，尚书能以郎

见转不？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僧虔乃用为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将军韶孙也。

僧虔寻加散骑常侍，转右仆射。升明元年，迁尚书仆射，寻转中书令、左仆射、二年，为尚书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今总章羽佾，音服舛异。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务，非雅器也。太明中，即以宫悬合《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重违成宪，更立歌钟，不参旧例。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谅以金石干羽，事绝私室，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报，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宜命有司。务勤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踵。”事见纳。

建元元年，转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二年，进号左卫将军，固让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如故。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汤本以救疾，而实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或去恶宜疾，则应先启。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治下囚病，必先

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无怨。”上纳其言。

僧虔留意雅乐，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是时上始欲通使，僧虔与兄子俭书曰：“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缺，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事竟不行。

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宣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其年冬，迁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简无所欲，不营财产，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风疾俗陈解，会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时群从宗族并会，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仁当至公，余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乃固辞不拜，上优而许之。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客问僧虔固让之意，僧虔曰：“君子所忧无德，不

忧无宠。吾衣食周身，荣位已过，所惭庸薄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谤邪！”兄子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之。

永明三年，薨。僧虔颇解星文，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虑其有公事。少时，僧虔薨，慈弃郡奔赴。僧虔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谥简穆。

其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广，右军叔，过江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亡从祖中出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骡，駉駉恒欲度菑骐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草书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趣好，殆当不减，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庾昕学右军，亦俗

乱真矣。”又著《书赋》传于世。

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动，好文章，读《范滂传》，未常不叹挹。王融败后，宾客多归之。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初为秘书郎，卒，年二十一。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知汝恨吾不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请从先师听言观行，冀此不复虚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警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何日不学，在天地间可嘻戏，何忽自课？’

幸有盛时逐岁暮，何必有所减？’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世中比例举眼是，汝足知此，不复具言。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超清级者，于是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分，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官，兼有室累，牵役情性，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为可作世中学，取过一生耳。试复三思，勿讳吾言。犹捶挞志辈，冀脱万一，未死之间，望有成就者，不知当有益否？各在尔身已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受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矣。

萧子云传

——《梁书》卷三五

【说明】萧子云（公元 487—549 年），字景乔，南兰陵（郡治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人。他是南齐宗室，在梁朝官至侍中、国子祭酒。擅长草隶书，初学王献之，后学王羲之、钟繇，笔力遒劲。他的书法颇受梁武帝萧衍的赏识，在当时负重名。著有《晋书》、《东宫新记》已佚。他的儿子萧特，也擅长草隶。

萧子云。字景乔，他是萧子恪的九弟。在他十二岁时，是南齐建武四年，被封为新浦县侯，他自己撰写的谢表，就很有文采。梁天监初年，侯爵降为子爵。成人以后，更加勤于学问，他因晋朝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史书，二十岁左右时便留心撰写，到他二十六岁时，此书写成，表奏呈给朝廷，皇帝下令收藏于史馆。

萧子云生性沉静，没有当官的兴致。到他三十岁时，才初次任官秘书郎。后升为太子舍人，著《东宫新记》，呈给朝廷，皇帝赏赐他一束丝帛。历次提升为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文学、司徒主簿，丹阳尹丞等。当时湘东王任京兆尹，二

人彼此互相欣赏，象平民百姓那样交往。又升任北中郎卢陵王的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大通元年，任黄门郎，不久又升为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二年，调进吏部。三年，升为吏部长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转任太府卿。三年，外任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他在郡内史任上，行政平和，政事治理得井然有序，官吏和百姓都很满意。调入京城任散骑常侍，不久再任侍中。大同二年，升任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任南徐州大中正。不久，再任侍中，仍兼任国子祭酒，大中正。

梁代初年，行祭天祭祖礼时还没有革去供祭祀的牲畜，当时祭祀时歌唱的歌词，是沈约撰写的，到这时仍然沿用，萧子云建议，应当加以修改。于是他上书说：“我想礼敬圣人，就应按原来的制度行礼，祭天祭祖，所贵在于尊严，这样才算领会了周礼的精神，才算对周公、孔子制礼作乐的主旨弄清楚了，祭祀时革去牲畜，德意可与神祖相通，改用黍稷蘋藻来作为祭品，这样可以表现祭祀者的诚恳严肃态度，这实在是治国的美好制度，它能与日月同辉，传至百世，原因就在于此。我近来兼任祭祀官，看到乐手所唱的歌曲，仍沿用未革除牲畜以前的乐曲。在举行祭天礼时，乐师仍唱‘式备牲牷’，举行祭土神礼时，乐师奏《诚雅》乐曲，仍唱‘牲玉孔备’；在祭祖时，仍唱‘我牲以洁’；在岁初食祭时，仍唱‘朱尾碧鳞’。用这种歌词，配上钟鼓乐器，实在是不符合现行的制度。我的职务是教授儒家经典，因而提出我的疑问，不知是否应该修改歌词？”皇帝批示说：“这是由于主持祭祀的官员墨守陈规，应该赶快修改。”于是派萧子云改写。皇帝指

示说：“祭天地祖宗的歌词，应采用经典上的高雅词语，不可杂用诸子百家和史书里的庸浅语言；但沈约撰写的歌词，也多有谬误。”萧子云回答说：“盛大的祭祀活动，所奏的乐曲用雅乐来命名，理应采用《五经》中圣人的训示之词，但从汉朝以来撰写的乐词，不完全用经典语言，沈约所写的歌词，更是浅显揉杂。我以前改定的沈约所撰的十种乐曲歌词，当时只考虑到已经革除牲畜这一点，应该修改歌词，其他方面仍然沿用，并没有嫌弃他的浅显不成体统。现在得到陛下的指示，才豁然省悟。我本来稀里糊涂，现在忽然明白了。现在严格按照陛下的指示，全面修改沈约的词曲。修改时只以《五经》为根据，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也是经典著作，我想也予采用。我又想，唐、虞各书篇，以及商《颂》周《雅》，都是经典中的名篇，但各自记述各自时代的史事。大梁朝建立，平定战乱，修举文事，制礼作乐，意义重大，可以和夏、商、周相比；但沈约所撰写的歌词，只是称颂梁朝的德政之美，而一言也没有涉及制礼作乐的盛举。和周《雅》商《颂》的成例相比，显然是不合体例的。我以为，圣人所定的乐论钟律规制，文义很深奥，只有命世大才出世，才能使之与日月同辉，成为永不磨灭的盛典，礼乐的教化力量，是达到清平盛世的原因。现酌采一二，随着叙事内容，表现它的重要意义，来说明制礼作乐的盛举。我苦苦思索了好多天，现在才完成任务，恭敬地呈给皇帝。”皇帝下令萧子云改定的乐曲都加采用。

萧子云擅长草书隶书，他的作品成为世人学习书法的标准，他自称善于摹仿钟繇、王羲之，稍有变化。他在回答皇

帝的询问时说：“我过去没有自己的定见，随着世人的时尚，摹仿王献之的书体，练了好几年。到二十六岁时，撰著《晋史》，在写《二王列传》时，想论述一下草书隶书的笔法，但言不尽意，不能成篇，只是粗略地论述了飞白一种笔法罢了。十多年以后，看到皇帝陛下的《论书》一卷，其中论述笔势，字体论述得十分透僻；又认为王羲之赶不上钟繇，象王献之赶不上王羲之一样。从此我深入研究，才悟出了隶书规律，于是变摹仿王献之改为全学钟繇。近年以来，自己觉得书艺有所进步。”他的书法作品很受梁高祖的赏识，高祖论述萧子云的书法时说：“笔力遒劲，能做到心手相应，精巧超过了杜度，可和钟繇并驾齐驱，不分先后。”他的书法是这样受高祖的欣赏。

大同七年，萧子云外任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中大同元年，回京任宗正卿。太清元年，再任侍中、国子祭酒，兼南徐州大中正。太清二年，侯景叛兵进逼京师，萧子云逃往民间藏身。太清三年三月，宫城沦陷，萧子云东逃晋陵，在显灵寺僧舍饥饿而死，终年六十三岁。他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东宫新记》二十卷。

他的第二个儿子萧特，字世达。很早就著名，他擅长草书隶书。梁高祖曾对萧子云说：“王献之的书法，赶不上他父亲王羲之。近来看到萧特的书法作品，成就和你相近。”萧特历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军记室。又外任为海盐县令，因事被免官，二十五岁时去世，比萧子云先死。

（魏连科 译）

【原文】

子云字景乔，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齐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天监初，降爵为子。既长勤学，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

子云性沉静，不乐仕进。年三十，方起家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撰《东宫新记》奏之，敕赐束帛。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文学、司徒主簿、丹阳尹丞。时湘东王为京尹，深相赏好，发布衣之交。迁北中郎庐陵王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大通元年，除黄门郎，俄迁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二年，入为吏部。三年，迁长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转太府卿。三年，出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称，民吏悦之。还除散骑常侍，俄复为侍中。大同二年，迁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梁初，郊庙未革牲牲，乐词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祖，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手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听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胝燎，尚言‘式备牲牲’；北郊《诚雅》，亦奏‘牲玉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词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词，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享，乐以雅名，理应正采

《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唯知牲既革，宜改歌词，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朦。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约制。唯用《五经》为木，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词，唯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于体为违。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征，命世一出，方悬日月，不刊之典，礼乐之教，致治所成。谨一二采缀，各随事显义，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谨以上呈。”敕并施用。

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拨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七年，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中大同元年，还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复为侍中、国子祭酒，领事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冠逼，子云逃民间。三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馁卒于显灵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晋书》一百一十

卷，《东宫新记》二十卷。

第二子特字世达。早知名，亦善草隶。高祖尝谓子云曰：“子敬之书，不及逸少。近见特迹，遂逼于卿。”历官著作法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军记室。出为海监令，出事免。年二十五，先子云卒。

郑道昭传

——《魏书》卷五六

【说明】郑道昭（公元？—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人。官至光州刺史、青州刺史。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他从巩固北魏政权出发，认为要加强儒家的传统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他提出不少建议。他是北魏的书法家。清代中叶，在山东掖县云峰山等处摩崖上发现许多题名题诗以及《郑文公上下碑》，结字宽博，笔力雄健，兼有隶意。包世臣考定，认为是出自郑道昭手笔。

郑懿的弟弟郑道昭，字僖伯。少年时就很好学，博览群书。初仕为中书学生，后升为秘书郎，又任主文中散，升为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

郑道昭曾随从魏高祖元弘征伐沔、汉，高祖在悬瓠方丈竹堂宴请随从群臣，郑道昭和他的哥哥郑懿都在坐。乐队奏起乐曲，唱得酒酣耳热，高祖唱道：“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元勰接着唱道：“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唱道：“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

一正历。”邢昺唱道：“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郑道昭唱道：“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唱：“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唱道：“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对郑道昭说：“近来虽被迁都事务所牵，但和众才子也没有中断咏诗，于是命邢昺把所咏的诗歌加以整理编成集子。在这几年，你家连遭丧事，但你仍眷恋吟诗作赋，我很为之感动。”不久，升为中书郎正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元详任司徒，委任郑道昭和琅邪王元秉为谏议参军。

又升任国子祭酒，他上书说：“我以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必须有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首先是学校。现在国子学的房舍已大致具备，只是学业还未修举。洛阳城南旧太学里的汉魏《石经》，因太学荒废，《石经》也遭到残毁，杂草丛生，牧童在这里放牛，小孩在这里嬉耍，真令人叹息，凡是关心文教的人，都为之伤心，况且我掌管文教，能沉默不言吗？希望皇帝留心，给予关注。如果我的意见是合适的，请求皇帝陛下责令尚书省、门下省，制定营建规模，那么国学可以马上建起来，被毁坏的《石经》也可以得到修复。《石经》碑树立在京城，这一盛举可以永垂不朽。这是帝王的千秋功业。”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广平王元怀为司州牧，任郑道昭和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郑道昭上书说：“我听说尧舜盛世，以文教德政为基础；商周兴盛，也以道德六艺为首务。这么说来，礼乐是立国的基础，不可一时一刻废弃。因此，周朝普施文教，天下人归心；鲁国继承周礼，强大的齐国也宾服。到了战国时代，局面混乱，刀

光剑影，经典被焚毁，儒生遭坑杀，轻视宣扬仁义之道的经典，重视军事斗争的战术，致使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遭到荼炭，几十年之间，之所以民不聊生，原因就在这里。到汉高祖刘邦，他在争战之中尚且优待儒者孙通等人。后汉光武帝，在拨乱反正中建立中兴大业，于是派郑众、范升等人在东观校定经籍。到魏晋时代，又何尝不注意文教？在戎马倥偬中尚且热衷于学问。至于我大魏国兴起，虽然当时敌人还未被消灭，军队还在野外争战，仍然招致名儒硕彦，广开学校，因而能阐扬德政于四国，宣布盛德于天下，文教所至，莫不归心，象风吹野草，莫不顺服。现在在国家安定的基础之上，为开拓万代的伟业，迁都于洛阳，步入新的纪元，天下人受到皇帝德政的威名，四海都拍手相贺。但是顽固不化的闽吴，以长江为险，拒绝归顺，已故皇帝大为恼怒，以致战事不断。但是在戎马争战的间隙，仍留心经典，命已故御史中尉李彪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等人，选择名儒，崇尚文教。元澄等人，按照皇帝的旨意，设四门博士四十人，另外国子博士、太学博士以及国子助教，都已选拔出来。回想先帝的旨意，意在迅速建立学校，只因军事频繁，没来得及成立。从那时到今天，差不多经过了十年，教官已七零八落，学业荒废。致使那些名儒大师，老经而不读；无知的后生小子，舍本而逐末。钻营取巧的风气，因此而产生。陛下您深明文教的作用，目光远大。吴越会稽地区尚未归顺。一心修举文教进行招徕；远方归服较晚，宣扬文教进行感化。陛下您留心经籍，精研坟典。将使教化程度超越陶唐，圣德胜过虞夏。因此多次传下圣旨，督促营建学校，房屋已修筑起来，但学生还没有选上

来。我的经学浅陋，书法也不高明，但以前制定律令时，曾参加议论。也曾依据前代的成规，搜寻旧时事例，拟定出学校条令，拟好后进呈给皇帝。从那时到现在，未见批示。但学校已废置多年，经学也没有发展。请求把学校条令和皇帝的批示，尽早颁行，以便选择学官有所依据，学生也可以有准则通循。”皇帝下圣旨说：“你的崇儒促学的用意，是非常可嘉的。新的条令不久就可以颁布，付诸施行也不会很久了。你真是尽职尽责，没有旷废职事。”

郑道昭又上书说：“考虑到迁都中原，将近十年，但读书人学业荒废，礼乐尚缺，致使堂堂大魏，外国没人来观光礼乐，这样就不能宣扬国威，也不能用礼乐收笼人心。我从去年以来，多次请求下颁学校条令，并选收学生，但前后多次上书，没有得到回答，恐怕是因为我学识庸浅滥竽充数，没有深刻的见解足以引起皇帝的注意。现在学馆已经修成，学员的房舍也大致具备，现有的国子博士，也足以胜任教学。虽然新的条令还没有颁下，请求暂按旧有规定收选学员，逐渐开始学业，这样教学也有章可循，学业也不致于中断，使后辈生徒看到学习向上的机会，在校的学生也体会到学业上的收益。至于孔庙已经修成，祭奠先师孔子的典礼以及一切礼仪，等到新令颁布以后再举行。”他的意见皇帝没有理睬。

郑道昭升为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又外任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任青州刺史，仍为平东将军。又入朝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衔。熙平元年逝世，追赠为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赠谥号为“文恭”。

郑道昭爱好写诗作赋，共著有数十篇。他在光州、青州

任上，行政宽厚，不滥用刑罚，受到官民的爱戴。

他的儿子郑严祖，很有风度，粗通文史典籍。历官通直郎，通直常侍。但他为人轻狂浮躁，行为不端，不安心读书，投靠势家大族，贪图功名利禄，家庭人伦关系混乱，臭名满天下。出帝在位时，御史中尉綦儁检举郑严祖与嫁给宗氏的堂姐通奸，人们提起他都感到羞耻。但郑严祖却毫无愧色。孝静帝初年，升任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又外任为北豫州刺史，仍为骠骑将军。罢任州刺史，入朝仍为鸿胪卿。他死之后，追赠他为都督豫兖颍三州诸军事、□□将军、司空公、豫州刺史。

郑严祖的弟弟郑敬祖，也生性粗疏。初任官为著作佐郎。因郑俨败亡，他也被乡民所害。郑敬祖的弟弟郑述祖，武定年间官至尚书。郑述祖的弟弟郑遵祖，官至秘书郎。去世后，追赠为辅国将军、光州刺史。郑遵祖的弟弟郑顺，死于太常丞任上。

自从灵太后当政时，淫乱的风气开始流行，到元叉专权时，则公开通奸。从此以后，名族大家之内，人伦关系混乱，官方也不加处治，他们在淫乱关系下的婚姻士官行为，社会上也不加以抨击，有见识的人都为此而叹息。（任文译）

【原文】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

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详为司徒，以道昭与琅邪王秉为谏议参军。

迁国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 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盼，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王雍可翹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不从。

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致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递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及汉祖，于行陈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

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尝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且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佇蹕，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旋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投有依，生徒可准。”诏曰：“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

道昭又表曰：“窃惟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义。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

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俊令出。”不报。

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照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

子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历通直郎、通直常侍。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倾侧势家，干没荣利，闺门秽乱，声满天下。出帝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宗氏从姊奸通，从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仍本将军。罢州还，除鸿胪卿。卒，赠都督豫兖颍之州诸军事、□□将军、司空公、豫州刺史。

严祖弟敬祖，性亦粗疏。起家著作佐郎。郑俨之败也，为乡人所害。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书。述祖弟遵祖，秘书郎。卒。赠辅国将军、光州刺史。遵祖弟顺，卒于太常丞。

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者咸以叹息矣。

江式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江式（公元？—257年），字法安，祖籍陈留郡济阳（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其祖父由凉州迁居代京（今山西省大同市）。江式仕北魏，官至骁骑将军、著作佐郎。江氏一门，以文字书法为家学，江式以书法著名北魏，擅长篆书，洛阳宫殿匾联，大都由他题署。江式曾撰集字书《古今文字》四十卷，书未成而去世。

江式，字法安，是陈留郡济阳县人。他的六世祖江琼，字孟琚，在晋朝官至冯翊太守，擅长鸟虫书和篆书，又精于文字训诂之学。永嘉年间大乱，江琼弃官西去，投靠张轨，因此子孙居住在凉州，世代继承他的家学。江式的祖父江疆，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定，举家迁往代京。他曾向朝廷上书，提出三十多项行政措施，都很得体，他又向朝廷献上经史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千多卷，因此提升他为中书博士。逝世之后，追赠他为敦煌太守。江式的父亲江绍兴，高允举荐他为秘书郎，主修国史达二十多年，以谨慎忠厚著称。死于赵郡太守任上。

江式少年时代就能继承家学。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常梦见有两个人来教他读书，醒来以后，还能记住教授的内容。他最初任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不久又任为殄寇将军、符节令。因他曾书写文昭太后的尊号谥册，特提升他为奉朝请，仍兼符节令。江式尤其擅长篆书，洛阳宫殿各门的匾额，都是江式书写的。

延昌三年三月，江式上书说：

我听说庖羲氏兴起以后，列出八卦的笔划，轩辕氏兴起后，用龟纹进行占卜。古史仓颉观察到乾坤二象的笔划，又观察了鸟兽的足迹，另外创出文字，以代替结绳，用文字来记事。文字用于政事，则百官职责分明；用来记述志册，则万物各有专名。到了三代时，字体发生变异，但是依类相从，与仓颉造字原则也相差不多。因此，《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教师用六书来教学生：一为指事，二为象形，三为谐声，四为会意，五为转注，六为假借。这大概就是仓颉的造字方法。到周宣王的时代，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和古文有同有异，当时人称之为“籀书”。到后来孔子删定《六经》，左丘明著《春秋》，都采用古文，人们都能看懂。

后来战国时七国的文字都不一致，文字差别很大，到秦朝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向皇帝奏请，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著《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用史籀的大篆，或者少加省改，这就是小篆。于是秦朝下令焚烧经书，废除旧的典籍，因官方文书和刑狱案件繁多，书写时文字

趋向简易，开始形成隶书。古文从此就被废弃了。所谓隶书，是秦始皇下令杜人程邈在小篆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因程邈是有罪之徒隶，于是就称之为隶书。因此秦代的文字有八种书体：一为大篆，二为小篆，三为刻符书，四为虫书，五为摹印，六为署书，七为殳书，八为隶书。

汉朝兴起，掌握刑律的官员学习法律，又教他们学习籀书，并熟悉八种书体，学习成绩最好的，任为尚书史。官民上书，文字省改不合正体的，要遭受弹劾。又有草书，不知创始者是谁，考察它的形体，却没有一定的规律，也是出于一时的变通。汉宣帝时，征召精通《仓颉篇》的人，只有张敞一人前来受读。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爱礼、讲学大夫秦近等人，也能通《仓颉篇》。汉平帝时，朝廷征召爱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研究文字，任爱礼为小学元士。黄门郎扬雄利用爱礼等人的研究成果，著作了《训纂篇》。到王莽篡政，自以为上承天命，应有所作为，于是派大司空甄丰校定文字的部属，对古文颇有修改。当时有六种书体：一为古文，就是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书体；二为奇字，在古文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书体；三为篆书，即是小篆；四为佐书，即秦代的隶书；五为缪篆，用来刻印的书体；六为鸟书，用来书写旗帜的书体。孔子壁中书，是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时发现的《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再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字体和孔子壁中书相仿，就是前代的古文。

后汉时，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他的书体比李斯的篆书小有差别，但却十分精巧，后来的学者都采用曹喜的篆法。皇帝又令侍中贾逵清理旧有文字，不管是哪种书体，哪种写法，为了宣扬王道是一致的，如果有利于国家政事，都加以收集。贾逵即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字学老师。后来许慎有感于当时人的好奇，慨叹迂儒的穿凿附会，叹惜文字毁于争名夺誉，痛恨字体坏在人们的互相攻击，任情变乱字形，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因此他撰著《说文解字》十五篇，从“一”部开始，以“亥”部结尾，文字各归部类，普遍包括了六艺群书的训诂，评品诸子百家的解释，凡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异珍、国家制度、世间的人事等，都有证载。可说是做到了依类相从，以群相分，杂而不乱，文质彬彬，是最完美的论著了。左中郎陈留人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篆法，形成古今杂揉的篆体，皇帝下令在国立大学立碑，用这种字体刊刻《五经》，标题和正文，大都出自蔡邕之手。后来开设鸿都学，各种书画作品以及奇异技能作品云集于此，当时四面八方呈献的篆书作品，水平没有超过蔡邕的。

曹魏初年，清河人张揖博士撰著《埤雅》、《广雅》、《古今字诂》，《埤雅》和《广雅》这两部书，拾遗补缺，增加了部类，对研究文字学是有帮助的。但他的《古今字诂》这部书，比起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古今字形字义的解释方面，有得有失。陈留郡人邯郸淳也和张揖同时，博雅多才艺，特别擅长文字学以及许慎的《说文解

字》，对各种字体和书法精研细究，比张揖更为有名，教诸位皇子学习书法。又在汉碑之西树立《三字石经》碑，蔚为大观，使三种书体重新耀现光彩。与《说文解字》相比较，篆隶大体相同，古字稍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凯两家，都号称擅长篆书。当时楼台馆阁的匾额、宝贵器物上的铭文，都是韦诞所书写，他们的子孙也能继承祖业，被世人传为美谈。

晋朝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进呈《字林》六卷，细究它的指趣，体例依照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用排偶文字，并附注古籀奇字，文字的部类准确，不违背篆书的字义。吕忱的弟弟吕静另放已故的左校令李登所著《声类》一书的体例，撰著《韵集》五卷，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所收的文字和他哥哥的书差不多，音读或取中原读音或荆楚读音，时有不同。

北魏建国在百代圣王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字也发生了变异，篆体错误百出，隶书也失去原有面貌。学识浅薄的人，又将错误的字形巧为解释。口若悬河的辩士，又任意胡说，哗众取宠，难以改正。因此经传上说，以多数人的错误，来指责正确的东西。这话确实是道出了这种流弊的实质。甚至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需鬣”、“神虫为蚕”，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不合乎孔壁古书、史籀、大篆、许慎的《说文解字》、《三体石经》。凡是关心古文字的人，莫不为此而感慨。啊啊！六艺依赖文字流传，圣贤治世也以文字为根本，古人用文字记载史事，流传到今天，现

在的人借助文字了解古代史事，因此说“本立而道生”。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说：“述而不作。”《书经》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这都是说要遵守旧有的文字规范，不敢去穿凿附会。

我的六世祖江琼，世世代代住在陈留郡，在晋朝初年，和他的堂兄江应元都跟随卫凯学习，对于古代的篆书，以及《仓颉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都深有研究，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六世祖官至太子洗马，又外任为冯翊郡守。因洛阳之乱，逃奔到河西地区，经几代人继承传授，所以这门学业没有中断。世祖太延年间，大魏势力强盛，牧犍归服，我已故的祖父江文威前来投奔，并献上世代传习的书籍，以及古篆八种书体的技法，当时受到褒奖，他身列儒林，在朝为文官，我家被称为文字世家。到我这一辈，才质不高，学识浅薄，家学中落，有愧于祖宗。但我身遇盛世，受到皇帝的赏识，得到莫大的恩惠，我身为文官，曾参预撰修国史，官门的匾额，也命我来题写，与古代贤哲际遇相同。为朝廷既尽了我的绵薄之力，但欲罢不能，我想凭六世家学的修养，按照祖辈的遗训，摹仿古人的成例，实现儒者的愿望，我要求编一部字书，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本，兼采孔壁《尚书》、《五经》的音注、《史籀篇》、《尔雅》、《三仓》、《凡将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的文字，有合于六书造字原则的，都按部类进行编排，文字不重出，编为一部书。其中古籀字、奇异

字、隶书的俗体字等字体，都缀于篆体之下，各有区别。字义的训诂、字音的假借，都随字进行解释；字音的正读和方言读音，也逐字注出。读音不明的，则暂付缺如。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将来可以省得人们去翻检诸子百家，又可以统一文字，成为一代字典。编撰中所需要的书籍，请下令配给，并派曾学习文字学的五个学士，帮助我翻检书籍；再派抄手五人，专门从事抄写。侍中、黄门郎、国子祭酒等官员一月一审查，解决疑难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发生错误。这部书的书名，希望皇帝来命名。皇帝批示说：“可按他的请求进行，并在太常寺办公，希望兼教八书字体。他需要的一切，按他的请求配给。书名待书编成后再说。”

于是江式着手撰集一部字书，名为《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上列篆书，下列隶书。江式又升为宣威将军、符玺郎，不久又加轻车将军衔。正光年间，任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负责校正史书中的文字。正光四年去世，追赠他为右将军、巴州刺史。但他的字书没有最后编成。

江式的侄子征虏将军江顺和，也擅长篆书。原在太和年间，兖州人沈法会擅长隶书，世宗为东宫太子时，召沈法会侍奉太子。以后以隶书在民间知名的人很多，但都达不到崔浩的水平。

【原文】

（魏连科 译）

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训诂。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内

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馀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馀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卒，赠敦煌太守。父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馀年，以谨厚称。卒于赵郡太守。

式少专家学。教年之中，常攀两人时相教授，乃寤，每有记识。初拜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寻除殄寇将军、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特除奉朝请，仍符节令。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

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

臣闻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龟策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放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颉之遗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楷书”。至孔子定《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击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

隶书。故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之受。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应运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学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文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字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

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雅》、《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陈留邯鄲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颍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

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给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𪔐，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楷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

曰：“必也正名手。”又曰：“述而不作。”《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凯，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暗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添无显。但逢时来，恩出愿外，每承泽云津，厕沾漏润，驱驰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罢不能，是以敢籍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令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金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脱蒙逐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五人，专令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评议疑隐，庶无纰缪。所撰名目，伏听明旨。

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冀兼教八书史也。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

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又除宣威将军、符玺郎，寻加轻车将军。正光中，除骠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书。四年卒，赠左将军、巴州刺史。其书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将军顺和，亦工篆书。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世宗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

赵文深传

——《周书》卷四七

【说明】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市）人。官至赵兴郡守。擅长楷书、隶书，尤善于题写碑文榜联，当时称为第一。王褒归北，赵文深也曾学习王褒的书体，但无所成，仍以自家面目见称于世。他的书法，也被南朝人士所称赞。传世书迹有《西岳华山神庙碑》（存陕西华阴县岳庙），隶书。

按：“赵文深”当作“赵文渊”，《周书》避唐讳改。

赵文深，字德本，是南阳郡宛县人。他的父亲赵遐，因擅长医道被朝廷任用，官至北魏的尚药典御。

赵文深少年时学楷书和隶书，他十一岁时，向北魏皇帝敬献他的书法作品。北周建国，赵文深归顺，任他为大丞相府法曹参军。赵文深的书法具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意，笔力斐然可观。当时的碑文匾额，只有赵文深和冀俊写得最好。大统十年，追论归顺的功劳，被封为白石县男的爵位，封地二百户。周太祖鉴于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多有讹误，下令让赵文深、黎季明、沈遐等人依《说文解字》和《字林》为准，审

定六种字体的字形，审定了一万多字，通行于世。

在北周平定了江陵以后，王褒从南朝入关归顺北周，高官贵族都去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艺，被远远扔在一边，为此赵文深惭愧而怨恨，常在言谈间表现出来。后来他知道这种风气很难扭转，也去学习王褒的书体，但没有成功，反而受到人们的讥讽，认为他是邯郸学步。但是书写碑文和匾额，其他人都赶不上赵文深，王褒也称赞他在自己之上。宫殿楼阁的额联，都是他书写的。勋爵晋升为白石县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衔。世宗令他去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文，汉南地区读书人也认为写得好。梁主萧察看了以后，大加赞扬，给他的赏赐很丰厚。天和元年，露寝等行宫建成，赵文深因题写匾联有功，给增加二百封户，升为赵兴郡守。赵文深虽然在外地任官，每当遇上需要题写匾联，就把他召回来。后来生病去世。

【原文】

（魏连科 译）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进，仕魏为尚药典御。

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文深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及冀俊而已。大统十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邑二百户。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馀言，行于世。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愧，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返，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

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察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榜之功，增邑二百户，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万宝常传

——《隋书》卷七八

【说明】万宝常，生卒无考，也不知是什么地方人。你的父亲随梁将归顺北齐，因谋图再回南朝，父亲被杀，万宝常也被配为乐户。他的活动，主要在北齐、北周至隋朝开皇年间。万宝常的音乐天赋很高，被配为乐户后，这种天赋得到较充分的发展。隋朝是我国音乐发展的突出时期，万宝常无论在乐理、谱曲、乐兴演奏等方面，在同时代人中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地位低贱乐户出身，一生不得志，他的音乐理论和实践，受到权势者的压抑，不得为世所用，他本人也在病饿中离开人世。他著有《乐谱》六十四卷，在他临死前因疾愤而烧毁。万宝常的一生，充分体现出在封建社会里出身卑下的艺人的悲惨遭遇。

和万宝常同时的音乐家王令言，也精通音律，他能从演奏的曲调中辨别出人物的情趣以及吉凶祸福，因其传记附在万宝常传后，现一并译出。

万宝常，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叫万大道，随梁将王琳归顺了北齐。后来企图逃回江南梁朝，事情泄漏，被

杀。因此，万宝常被发配为乐户，因而他精通音律，各种乐器都能精熟演奏。他自己曾制造了一组玉磬，献给北齐皇帝。曾和人在一起吃饭，饭间讨论起音调。当时现场没有乐器，万宝常就拿面前的餐具和其他杂物，用筷子敲击，定其音调的高低，五音配齐，敲击起来，和乐器一样音调和谐，当时人大为赞赏。但他历事北周和隋朝，都没有被提拔。

开皇初年，沛国公郑译等人主持确定乐曲的声调，起初定为声音洪亮的黄钟调。万宝常虽然是专门从事音乐的乐官，郑译等人也常常把他叫来，参加讨论，但他的主张大多不被采用，后来郑译等人将所定声调，上奏皇帝，隋文帝把万宝常召来，问他这种声调是否可行，万宝常说：“这是亡国之音，陛下您不应听这种声调！”隋文帝很不高兴。万宝常极力说明这种声调表现了哀怨、淫邪、放肆的情绪，不是庄重的雅音，请求用水尺为准，调正乐器声调。隋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万宝常奉皇帝的命令，制造各种乐器，乐器的声调都比郑译等人所定的调值降了两个调。他撰写《乐谱》一书，共六十四卷，全面论述八种音高可以递相为基调的规律，以及音调调整的变化。总括起来，共有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能变化出一千八百声调。当时人认为，《周礼》一书记载了八种音高可以递相为基调的说法，但是从汉、魏以来，历代音乐家都弄不懂，见到万宝常对此记载的创解，都嗤之以鼻。到这时，皇帝让他试奏，简直是应手成曲，在场的人，莫不惊异赞叹。于是经他淘汰、创制、改进的乐器，不可计算；但这些乐器的音色淡雅，当时人不喜欢，音乐官署太常寺里的音乐家多数人持排挤、诋毁的态度。

太子洗马苏夔以擅长音律自命不凡，尤其嫉妒万宝常。苏夔的父亲苏威有权势，因此凡是谈论乐律的人，都附近和苏夔，而排斥万宝常，万宝常多次到达官贵人的面前发泄不满的情绪，苏威便责问万宝常，问他的音律理论是从哪里学来的。有一名僧人对万宝常说：“皇帝平素喜欢祥瑞征兆，但凡有人说出现某种异物是祥瑞征兆时，皇帝都很高兴。先生您应该说您的乐律理论是从外族僧人那里学来的，并说这是佛门菩萨亲身所传，皇帝一定会喜欢的。这样，你的所作所为，就可以通行无阻了。”万宝常认为有道理，就按照僧人的话回答苏威。苏威听了，勃然大怒，说道：“外族僧人所传授的，是四周蛮夷的音乐，不应该在中原地区流行。”这事就被搁置下来。万宝常曾经去听太常寺演奏的乐曲，听完之后，流泪哭泣。人们问他为什么哭，万宝常说：“乐声表现出过分猛烈的情绪，但基调是悲哀的，预示着天下不久将互相残杀，同归于尽。”当时隋朝正处于全盛时期，听他这样说，人们都不以为然。到大业末年，他的话终于应验了。

万宝常家里很穷，且没有儿子，他的妻子乘他卧病在床，把家里的东西偷窃一空而逃走。万宝常时常挨饿，也没有人送汤送饭，竟然活活饿死。在临死之前，他把他的著作烧掉，说道：“要这有什么用！”看到的人从火中抢救出几卷，现在流传于世，当时人很为他悲哀。

开皇年间，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等人，都从事研究典籍，撰写音乐著作，这些人都会被当时所任用。但若论音乐天赋，这些人都远远赶不上万宝常。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人，都能谱曲，也能一时走红，他们

又熟悉淫荡音乐，但万宝常的创作，都属于庄重严肃的雅乐。这些人虽然口头上不赞成万宝常，但内心都佩服他，认为他的音乐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当时又有个音乐家王令言，也精通音律。大业末年，隋炀帝要去江都游玩，王令言的儿子曾当隋炀帝的随从，有一天他儿子去窗外弹胡琵琶，弹的是翻调《安公子曲》。王令言当时在屋里躺着，听到乐曲，大惊失色，猛地坐起来，说道：“变了，变了！”急忙喊他的儿子，问道：“这曲子什么时候兴起来的？”他儿子回答说：“近来才出现。”王令言于是流泪长叹，对他儿子说：“你千万不要跟皇帝去，皇帝这一去，必然回不来。”他儿子问是什么原因，王令言说：“这支曲子中，宫声出现以后再也没有回映，宫声象征君主，我由此而得知。”结果隋炀帝竟然在江都被杀。（魏连科 译）

【原文】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

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已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

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授。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赡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

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

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

韩滉传

——《旧唐书》卷一二九

【说明】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陕西西安市）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韩休，唐玄宗朝任宰相。韩滉在唐德宗朝历任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给事中、尚书右丞、户部侍郎，至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被封为晋国公。韩滉为官清廉，自奉甚俭，对下属约束亦严。精于吏治，但失之苛刻。他治理地方，能在短期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也能治军，在平定李希烈之乱中，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韩滉还是唐代著名书画家，书法得草书大师张旭的笔法，绘画方面，长于写农村景物，画牛、羊、驴最为出色，与韩干齐名。传世画作有《五牛图》、《文苑图》等。其子韩皋，字仲闻，历官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京兆尹，至尚书左仆射。韩皋也自奉俭约，精于吏治，饶有父风。但他求治太急，不免有浮夸之弊。韩皋性知音律，据说他听演奏晋代嵇康的琴曲《广陵散》，能悟出乐曲中所反映的政治局势、司马氏代魏以及司马氏的式微等内容。这当然有以既成史事去附会的成份，也说明他对音律的修养是相当高的。

韩滉字太冲，他是太子少师韩休的儿子。他在少年时性格耿直，好读书学习，因他父亲的恩荫，初入官场就任他为左威卫骑曹参军，又外任为同官县主簿。至德初年，青齐节度使邓景山征召他为判官，又授任他为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因北海郡道路隔绝，于是避战乱来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上奏，任他为判官，实授他为通州长史、彭王府谏议参军。邓景山转为淮南节度使，又上奏征他为幕僚，还未成行，朝廷任他为殿中侍御史，催他赶赴京师长安。在此之前，韩滉的哥哥韩法任知制诰，在起草任命王玙文件的时候，不肯虚加吹捧，王玙因此痛恨韩法。当王玙当政时，官员们推荐韩滉兄弟，必定只任命闲散职务，王玙被罢免宰相，官员们都替韩滉兄弟叫屈，韩滉历升至祠部、考功、吏部三个部的员外郎。

韩滉为官，公正廉洁，耿直倔强，对官务很熟悉。他任南曹判官共五年，对各种文件都详加研究，没有丝毫的遗漏。大历年间，改任吏部郎中、给事中。当时发生了强盗杀害富平县令的案件，县里的官吏捕获了强盗党羽，但他们属于北军管辖，监军鱼朝恩因他们武艺好，上奏朝廷，请免去他们的罪过，韩滉写了秘密奏折，加以驳斥，强盗党羽才伏法。升任他为尚书右丞。大历五年，掌管兵部官员的升迁任免。大历六年，改任户部侍郎、掌管财政。从至德、乾元以后，各地用兵，赋税征收没有节制，国库的出入，仍因循旧法。韩滉掌管财政以后，认真清理检查，对于贪污官吏毫不容情，他的下属以及各地收交财税的官员犯罪的，必痛加惩治。再者在大历五年以后，边境上外族极少侵扰，加上连年丰收，因

此韩滉能够积蓄些粮食布疋，国库稍为充实。但是他搜刮过于苛刻，又重新审查各种帐目文书，多方找借口加强搜刮，引起百姓的怨恨。

大历十二年秋天，连阴雨损害了庄稼，京兆尹黎干向朝廷汇报京城周围农田受灾的情况，韩滉坚持认为黎干的汇报夸大了灾情。于是派御史复查，御史汇报京城周围各县共有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农田受灾。当时任渭南县令的刘藻不顾事实曲意迎附韩滉，他汇报渭南县境内没有受灾，并上报知府和户部。分巡御史赵计重新进行检查，汇报和刘藻的说法一致。代宗看了奏章，认为水旱灾害在附近各地应该相同，不应渭南县独独不受灾，命令御史朱敖再去检查，查出渭南受灾面积三千多顷。代宗对朱敖说：“县令的职责是抚育百姓，即使没有受灾也应汇报受了灾害，可是他却遭灾而不汇报，这哪有一点点体恤百姓的心意呢？你这次去检查，可以说是称职的。”于是把刘藻、赵计交司法部门审讯，刘藻、赵计都认罪服罪，刘藻贬降为万州南浦县员外尉，赵计贬为丰州员外司户。韩滉玩弄权术培植私人势力，都像这事情一样。不久，改任韩滉为太常卿，但是未能平息人们对他的议论，于是又外任为晋州刺史。过了几个月，又升任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不久又升任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

韩滉移任以后，安抚境内百姓，均摊赋税租役，没过一年时间，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到德宗建中年间，泾州守兵发动叛乱，德宗从长安出逃，黄河下游、汴水流域的政治局势骚动不安，韩滉训练士卒，制造兵器盔甲，

建立了一支精兵劲旅。叛将李希烈攻陷汴州，韩滉挑选精锐部队，令偏将李长荣、王栖曜率领，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形成犄角之势，进攻李希烈，解除叛兵对宁陵的围困，收复宋州、汴州一带地方。韩滉的功劳最大。

但自从关中地区战乱加剧，韩滉即在他管辖的地区封锁关口桥梁，从京口至玉山，修筑石头城等五座城池，禁止牛马运出境外，又建造楼船战舰三十多艘，派水兵五千人由海门耀武扬威至申浦而回；又拆毁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多处，用拆下的物料修筑堡垒，从建业到京岷，一路上城堡相连，又用佛殿的材料修造馆第数十处。当时韩滉鉴于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担心发生西晋时永嘉之乱、朝廷渡江偏安的情况，预先做好准备，用来迎接皇帝的到来，也借此来表明自己戒备自守的决心。在城里挖掘十丈深的水井近百眼，水井的底部和江面成水平，派偏将丘洊总管此事。丘洊对待挖井兵士残酷暴虐，每天派千人左右，他要求早上派去，晚上必须完成。近城数十里内的古代名人的坟墓，大多都被挖毁。第二年正月，把在外担任守卫任务的李长荣守军召回，派他的亲信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筑营垒，教习士兵弓箭。用佛寺的铜钟铸造弩机兵器。陈少游当时任扬州刺史，在江边检阅三千全副武装的兵士，韩滉也派三千兵士登上金山，和陈少游遥相呼应，楼船在江中游弋，韩、陈互相赠送金银绸缎等物。从德宗出逃到返回京城，其间军事费用浩繁，道路又时时被阻，关中地区连年饥荒，加上蝗虫为灾，江南、两浙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关中运送，每一府每月都要按时运出，朝廷依赖这些物资来维持。

兴元元年，就地升任检校吏部尚书。过了几个月，又升任检校右仆射。贞元元年七月，升任检校左仆射、同平章政事，仍兼任节度使。贞元二年春天，封爵为晋国公。这年十一月，进京朝见皇帝。当时尚书右丞元琇主管财政，因关中地区发生旱灾收成不好，请求朝廷运江淮地区的税米供应京师。皇帝鉴于韩滉任浙江东西节度使，一向有威信，任他为江淮转运使，想让他专职督理运粮事务。元琇因韩滉性格刚愎自用，很难和他共事，于是元琇上书建议，韩滉只管把江南米运到扬子江，只有十八里路，扬子江以北，都由元琇来主管。韩滉对元琇此举，恨得咬牙切齿。元琇鉴于京师长安流通的铜钱少价值高，货物价钱低，为此他很伤脑筋，于是从江东监院收笼现钱四十余万贯，让韩滉转运入关。韩滉不答应，便谎言上奏说：“运一千钱至京师，运费要用万钱，这样做对国家有害，请停止这公干。”皇帝询问元琇，元琇上奏说：“一千钱的重量，大致和一斗米相同。从江南水路运输至京师，一千钱所花的运费，只不过三百钱罢了，怎么能花费一万钱呢？”皇帝认为元琇说得有道理，于是皇帝派太监带着圣旨去，命令韩滉运钱。韩滉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不可行。这年十二月，韩滉升任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韩滉不忘旧怨，多次诬告元琇，最终把元琇贬降为雷州司户。因对元琇处分得太重，满朝官员都认为元琇没罪，很多人在私下议论。尚书左丞董晋对宰相刘滋、齐映说：“元琇忽然遭贬降，不知犯了什么罪，这样胡乱处分人，谁不担心害怕？这样会使得有权的大臣随心所欲，宰相大人何不上奏，让司法部门详细审理？去年关中地区用兵，当时又发生蝗灾旱灾，元琇

主持国家财政，整日整夜操劳，使军队能得到供给，而且不增加税收，军队和国家的费用都得到满足，这样的人真可算是为国操劳的臣子了。现在却遭到流放，这样做恐怕会失去民心，民心一旦动摇，就会出现闻风而动的人。我真为宰相大人痛惜啊！”刘滋、齐映只是敷衍说自己有过失罢了。给事袁高又抗旨上疏，替元琇申冤，韩滉诬蔑他们是同党，袁高的奏疏被搁置不理。

当时两河地区战事停止，中原出现安宁的局面，韩滉上奏说：“吐蕃侵占河湟地区，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历以前，中原多灾多难，因此吐蕃肆意侵犯。我听说近年以来，它的军事力量削弱了，西边受强国大食的挤迫，北面有回纥的大兵压境，东面有南诏的坚强抵御，它的军队分守各地的不计，在河、陇地区的兵力只不过有五、六万人。国家只须派三四个强将，率领十万兵长驱直入，在凉、鄯、洮、滑等地修筑坚固的城防工事，各派守兵二万人，足以守卫各军事要地。我请求将我处的赋税收入作为军用物资，可以满足三年的费用。然后组织军队屯田，积蓄粮米，边耕边战，这样，河、陇地区二十余州，可以垂手而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韩滉进京任职，路过汴州，和汴宋节度使刘玄佐深深结交，韩滉说让刘推荐他任守边将帅，刘玄佐收了韩滉的礼物，答应了。刘玄佐任边将后，进京朝见皇帝，皇帝不断向他询问边地的情况。起初刘玄佐对边事尚且受命尽职，当韩滉因病回家休养以后，刘玄佐也心灰意懒，于是辞去边任，并强调说明边境上的异族势力尚未衰弱，不可轻易进兵。韩滉在贞元三年二月，因病去世，边境上的事情也就搁了下来，他活了六十五

岁。皇帝长时间为之悲悼，为了悼念他，三天不上朝，追赠他为太傅，按规定赠送他家布帛米粟等物。

韩滉是宰相的儿子，小时候就有好名声，他结交的朋友，都是一时的佼佼者，不是公正耿直的人，他不深交。他生性节俭，一意为公，他的衣服被褥，十年才一换，住房也很简陋，只是能避风雨而已。他的弟弟韩洄曾在老家的旧宅增修了穿廊，韩滉从江南回来，马上下令拆除，他说：“祖宗居住的房屋，我们保持原貌，常怕它倒塌，如有损坏的地方，修整一下就行了，哪里敢改造，有损节俭的美德。”他做了大官，更加清廉节俭，痛恨奢侈浪费，为国家财政，他严密计算，堵塞漏洞，只要他认识到了，马上去做，但对于自己的家产，从不放在心上。从他进入官场，以至位居卿相，前后共计四十年，共乘用过五匹马，每匹都是老死以后再换新马。他擅长书法，也长于绘画，但他认为绘画不是当务之急，因而不愿显露这方面的才能，也不把他的技法传授给他人。他爱读《易象》和《春秋》，曾著《春秋通例》、《天文事序议》各一卷。但他自恃在朝臣中为前辈，又早年做了大官，对后辈官员就有些轻视。他晚年调进京城，在和各衙门中的副职助手官员接触中，显得架子很大，众官员愤愤不平。他在浙东任职时，行政精明，但后期则有急躁严厉的毛病，在他的管辖范围里婺州属县有人冒犯了他的禁令，把犯人的左邻右舍都治罪处死，杀了百十来人。他又派官在境内进行复察，凡是嫌疑犯，必定处死，非常残忍，一次审判，往往处死数十人，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令行禁止，但冤案接连发生。人们议论说，他治理一方，确实政绩突出。他从小

立志为官清廉，但晚年行政过于残忍；在他还没有发达的时候，掩饰他的本性以图向上爬，一旦得志，则本性暴露无遗。他的儿子韩群、韩臬。韩群官至考功员外郎。

韩臬字仲闻，早年就很有名声，气质庄重敦厚，有大臣的风度。他由云阳县尉选拔为贤良人才，任官右拾遗，转左补阙，历升起居郎、考功员外郎。不久，父亲去世，在家守孝，德宗派太监去他家进行慰问，并传旨让他论述他父亲韩滉事功，韩臬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任务，立即写出几千字的文稿，受到德宗的嘉赏。守孝期满，执政大臣拟任他为考功郎中，德宗亲笔批示兼任知制诰，后升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兵部侍郎，都胜任称职。后改任京兆尹，他奏请任郑絪为仓曹官，专门掌管钱粮的出入。郑絪以苛刻搜刮下民为能事，引起人们的不满。他又劝诱韩臬搜罗杂项收入，压价收购百姓的粟麦三十万石献给朝廷，以博得皇帝的恩宠。韩臬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奏请任郑絪为兴平县令。到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无雨，谷子和小麦都干旱而死，京城附近的百姓多次向韩臬陈诉，要求免去赋税，韩臬因国库空虚，忧愁恐惧，不敢如实向上汇报。这时唐安公主的女儿嫁给右庶子李 ，宫中的太监经常去李 家，百姓们拦道苦诉，太监就把这种情况向皇帝汇报。德宗下旨说：“京城附近是首善之区，是各地的榜样，京城附近的地方长官，他接受的是治理百姓的重托，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指望他们分担我的忧虑，如果任人不当，就会把政事搞乱。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臬，近年官任清近，也颇有勤慎尽职的声誉，所以委任他为京兆尹。期望他效力尽忠。近来京城附近，米、麦

不收，我关心百姓的疾苦，正在考虑免除赋税，韩臬本应尽心尽力，以体现我体恤百姓的本意。韩臬对上的汇报不实，措施不当，致使百姓不能安生，纷纷上诉。下令让他复查，他的汇报都是虚假情况，掩盖得越严，欺君之罪越重。应该加以惩处，使各地方官有所警戒。韩臬应贬为抚州司马，编外安置，待遇与编内官员相同，用驿马遣派。”不久，郑铎也外贬为汀州司马。韩臬不久又提升为杭州刺史，继而升任尚书右丞。

韩臬自恃是老臣前辈，待人接物，简傲无礼。唐顺宗年间，王叔文派势力强大，韩臬十分嫉恨，对人说：“我不能侍候这些新贵。”韩臬的堂弟韩晔，与王叔文关系密切，把韩臬的话告诉王叔文，于是韩臬又被外贬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又内调为东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升任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任忠武军节度等使。因陈、许二州发生了水灾，皇帝赏赐给韩臬绫绢布葛等十万疋，以补贴军费和宴请赏功的费用。他为官行政，以节俭著称。又调他进京，任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兼管太常卿事务。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逝世，让韩臬担任大明宫使。十五年闰正月，担任宪宗陵墓礼仪使。三月，穆宗念韩臬任保傅官时的旧情，给韩臬加衔为检校右仆射。十二月，因吏部考选人才失实，韩臬和主管考选的刑部侍郎李建被罚一个月的俸禄。长庆元年正月，实授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为左仆射，在他去尚书省衙门奏事时，皇帝派内使太监赏赐酒食，后来宰相及百官送迎皇帝，赏赐都以此为准。这一年，复任东都留守，赴任路上，行至戏源驿，得急病去世，终年七十

九岁。追赠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赠谥号为“贞”。

韩皋有理解音律的天赋，他曾听人弹琴，当弹到嵇康的《止息》（广陵散）乐曲时，他感叹地说：“嵇康这首琴曲谱得真好啊！它反映的是魏、晋之际的史事吧！它的声调以商音为主，商代表秋天的声音。所谓秋，大自然将摇落树叶、草木将枯死，到了一年的尾声吧！又晋朝的国运属金，商音即是金声，从这里可以推知魏国已到晚年，而晋国将要代替它。演奏者慢挑商弦，它发出的音调与宫音相同，这是臣夺君位的象征，从这里可以推知司马氏将要篡权。司马懿受魏明帝的嘱托，辅保他的后继子孙，而司马懿反生篡权的野心，从诛杀曹爽以后，凶相毕露，王陵为扬州都督，谋划立荆王曹彪为帝；母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任扬州都督，都有恢复曹魏的谋划，都被司马懿父子所杀。嵇康鉴于扬州即是旧广陵之地，以上四人都是曹魏的文武大臣，都在广陵散败，所谓‘散’，指的是曹魏散亡从广陵开始。所谓‘止息’，晋朝虽勃然兴起，最终也息败于广陵。乐曲中表现出的哀愤、狂促、悲痛、被胁迫的情绪，都是由此而发。永嘉之乱，不就是应验吗？嵇康谱写这首乐曲，是为了留给后代懂音乐的人来鉴赏品味，也是为了避免在当时招致祸害，所以才采用这样神秘莫测的表现手法。”（魏连科 译）

【原文】

韩滉字太冲，太子少师休之子也。少贞介好学，以荫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出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齐节度邓景山辟为判官，授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以道路阻绝，因避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长史、彭王府谘

议参军。邓景山移镇淮南，又表为宾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师。先是，滉兄法知制诰，草王玙拜官之词，不加虚美，玙颇衔之。及其秉政，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玙免相，群议称其屈，累迁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

滉公洁强直，明于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详究簿书，无遗纤隐。大历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时盗杀富平令韦当，县吏捕获贼党，而名隶北军，监军鱼朝恩以有武材，请诏原其罪，滉密疏驳奏，贼遂伏辜。迁尚书左丞。五年，知兵部选。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后，所在军兴，赋税无度，帑藏给纳，多务因循。滉既掌司计，清勤检辖，不容奸妄，下吏及四方行纲过犯者，必痛绳之。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连岁丰稔，故滉能储积谷帛，帑藏稍实。然苛克颇甚，复治案牘，勾剥深文，人多咨怨。

大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干奏畿县损田，滉执云干奏不实。乃命御史巡复，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时渭南令刘藻曲附滉，言所部无损，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赵计复检行，奏与藻合。代宗览奏，以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餘顷。上谓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谓称职。”下有司讯鞫，藻、计皆伏罪，藻贬万州南浦员外尉，计贬丰州员外司户。滉弄权树党，皆此类也。俄改太常卿，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数月，拜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

浼既移镇，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浼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浼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犄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浼功居多。

然自关中多难，浼即于所部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马牛出境；造楼船战舰三十馀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馀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岷，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时浼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与江平，俾偏将丘浚督其役。浚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办，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明年正月，追李长荣等戍军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憎营垒，教习长兵。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陈少游时镇扬州，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浼亦以兵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楼船于江中，以金银缯彩互相聘贄。而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饿，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

兴元元年，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数月，又加检校右仆射。贞元元年七月，拜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使并如故。二年春，特封晋国公。其年十一月，来朝京师。时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上以浼浙江东西节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琇以浼性刚愎，难与集事，乃条奏浼督运江南米至扬子，凡一十八里，

扬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浞深怒于琇。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馀万贯，令转送入关。浞不许，乃诬奏云：“运千钱至京师，费钱至万，于国有害。请罢之。”上以问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约与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运，费三百耳，岂至万乎？”上然之，遣中使齐手诏令运钱。浞坚执以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浞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遂逞宿怒，累诬奏琇，贬雷州司户。其责既重，举朝以为非罪，多窃议者。尚书左丞董晋谓宰臣刘滋、齐映曰：“元左丞忽有贬责，未知罪名，用刑一滥，谁不危惧？假有权臣骋志，相公何不奏请三司详断之。去年关辅用兵，时方蝗旱，琇总国计，夙夜忧勤，以贍给师旅，不憎一赋，军国皆济，斯可谓之劳臣也。今见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则有闻鸡起舞者矣。窃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过而已。给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浞诬以朋党，寝而不行。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义，浞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众窃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馀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纳其言。浞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稟命，及浞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浞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

遂寝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废朝三日，赠太傅，赠布帛米粟有差。

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结交，皆时之俊彦，非公直者不与之亲密。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弟洄常于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使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辈奉之，常恐失坠，所有摧圯，葺之而已，岂敢改作，以伤俭德。”自居重位，愈清俭嫉恶，弥缝阙漏，知无不为，家人资产，未尝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继乘马五匹，皆及敝帷。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议》各一卷。然以前辈早达，稍薄后进。晚岁至京师，丞郎卿佐，接之颇倨，众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伤于严急，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诛及邻伍，死者数十百人。又俾推复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诛杀残忍，一判即剿数十人，且无虚日。虽令行禁止，而冤滥相寻。议者以滉统制一方，颇著勤绩，自幼立名贞廉，晚途政甚苛惨，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木质遂彰。子群、臬。群官至考功员外郎。

臬字仲闻，夙负令名，而器质重厚，有大臣之度。由云阳尉擢贤良科，拜右拾遗，转左补阙，累迁起居郎、考功员外郎。俄丁父艰，德宗遣中人就第慰问，仍宣令论撰滉之事业，臬号泣承命，立草数千言，德宗嘉之。及免丧，执政者拟考功郎中，御笔加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皆称职。改京兆尹，奏郑絳为仓曹，专掌

钱谷。锋苛刻剥下为事，人皆咨怨。又劝臬搜索府中杂钱，折余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臬纳其计，寻奏锋为兴平县令。及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累经臬陈诉，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 ，内官中使于 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下诏曰：“京邑为四方之则，长吏受亲人之寄，实系邦本，以分朕忧，苟非其才，是紊于理。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臬，比践清贯，颇闻谨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间，粟麦不稔，朕念兹黎庶，方仪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臬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间井不安，嚣然上诉。及令复视，皆涉虚词，壅蔽颇深，罔惑斯甚。宜加惩诫，以勸守官。可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锋亦寻出为汀州司马。臬无几移杭州刺史，复拜尚书右丞。

臬恃前辈，颇以简倨自处。顺宗时，王叔文党盛，臬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臬从弟晔，幸于叔文，以告之，因出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入为东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使。以陈、许二州水潦之后，赐臬綾绢布葛十万端疋，以助军资宴赏。所理以简俭称。入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臬充大明宫使。十五年闰正月，充宪宗山陵礼仪使。三月，穆宗以师保之旧，加检校右仆射。

十二月，以铨司考科目人失实，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罚一月俸料。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

左仆射，赴尚书省上事，命中使宣赐酒馔，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东都留守，行及戏源驿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谥曰贞。

臯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杂，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母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躁蹙，惨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祸，所以托之神鬼也。”

柳公权传

——《旧唐书》卷一六五

【说明】柳公权字诚悬（778-865），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年间中进士。柳氏一门，系世宦人家，他的叔父柳子华曾任池州刺史，他的哥哥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堂弟柳公度，仕至光禄少卿。他的侄儿柳仲郢仕至天平刺史。柳公权亦仕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

柳公权是我国唐代著名书法家，以书法得到皇帝的宠幸。唐代的皇帝以李世民为代表，最喜爱书法艺术，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书法艺术在唐代形成我国书法艺术的高峰，虞世南、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杰出书法家灿若群星。柳公权的书法，兼收各家之长，形成自己刚劲清丽的书风，世称“颜筋柳骨”，对后世习书者有很大影响。旧时矇童学书，不少是从柳书入手。传世的书法作品有《送梨帖跋》、《玄秘塔》、《金刚经》、《神策军碑》等帖。

柳公权字诚悬。从小就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元和初年中进士，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任他为掌书记之官。唐穆宗即位，柳公权进京回奏政事，穆宗

召见,对他说:“我在佛寺中看到你的笔迹,很久就想见见你。”当天就升任他为右拾遗,补翰林学士之职,后又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唐穆宗荒淫,行政乖僻,他曾向柳公权问怎样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回答说:“用笔的方法,全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法自然尽善尽美。”皇帝面带愧色,知道他这是借用笔法来进行劝诫。柳公权历事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都在宫中担任侍书之职。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职,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我的弟弟苦心钻研文章书法,先朝只任他为侍书,这种职务,和占卜小吏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以此为耻,请给他调换一个闲散职位。”于是升任右司郎中,又转为司封郎中、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宗思念他,又召他为侍书,升任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为中书舍人,充任翰林书诏学士。每次在浴堂回答文宗的提问,常常是蜡烛烧完了,而谈兴正浓,不肯花工夫去取蜡烛,宫中婢女使用蜡油谫纸来照明。他曾随从文宗去未央宫花园中游玩,文宗停下车子对柳公权说:“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常常不能及时发下,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柳公权上前祝贺,文宗说:“只是祝贺一下,还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清楚,你应作首诗向我祝贺。”宫人催他亲口念给皇帝听,柳公权应声念道:“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听了很高兴,赞赏了好大一会儿。

有一次文宗在便殿召见六位学士,文宗说起汉文帝的节俭,便举起自己的衣袖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学士们都纷纷颂扬文宗的节俭品德,只有柳公权闭口不说话,文

宗留下他，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柳公权回答说：“君主的大节，应该注意起用贤良的人才，黜退那些不正派的佞臣，听取忠言劝戒，分明赏罚。至于穿洗过的衣服，那只不过是小节，无足轻重。”当时周墀也在场，听了他的言论，吓得浑身发抖，但柳公权却理直气壮。文宗对他说：“我深知你这个舍人之官不应降为谏议，但因你有谏臣风度，那就任你为谏议大夫吧。”第二天下旨，任他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学士衔仍旧。

开成三年，调转为工部侍郎，只不过是备员而已。文宗曾召他问事，对他说：“近来外边有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自从郭旼被任为邠宁节度使，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文宗说：“郭旼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太皇太后的叔父，在职也没有过错。从金吾大将升任小小的邠宁节度使，还议论什么呢？”柳公权说：“凭郭旼的功绩和品德，任命为节度使是合适的。人们议论的原因，据说是郭旼把两个女儿献入宫中，因此才升官，这是真的吗？”文宗说：“他的两个女儿进宫，是来看望太后的，并不是他进献女儿。”柳公权说：“常言说，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整冠，如没有嫌疑，为什么这事嚷得家喻户晓？”他因而举出王珪劝太宗送卢江王妃出宫的事例来说明利害，文宗当即派内使张日华把二女送还郭旼家。柳公权忠正直言匡求失误，大都和这事一样。

柳公权屡次升迁，在文宗朝升为学士承旨。唐武宗即位，罢去内府学士官职，任命他为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举荐他为集贤殿学士、判院事。李德裕本来对柳公权不错，当柳公权被崔珙举荐时，很不高兴，降他为太子詹事，改为太子宾客。再历升为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封邑

二千户。又任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升工部尚书。咸通初年，改任太子少傅，又改任太子少师，在三品、二品的官位上达三十年之久。咸通六年去世，赠衔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岁。

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广泛浏览近世各家笔迹，形成自己遒劲、妩媚的书风，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书的碑文，人们会认为是不孝行为。外国使者来进贡，都专门封上货币，上面注明这是购买柳公权书作的专款。长安西明寺的《金刚经碑》为柳公权所书，兼收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等人的笔法，更是他得意之作。文宗在夏天和学士们联句作诗，文宗的首联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作：“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当时丁、袁等五学士都相继联句，文宗只吟诵柳公权两句诗，论道：“词句清丽，诗意表达充分，不可多得。”于是命柳公权题写在宫殿的墙壁上，每字方圆五寸，文宗看了以后，赞叹说：“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啊！”

宣宗大中初年，升为少师，柳公权进宫答谢，宣宗召他上殿，让他当面书写三幅字，军容使西门季玄替他捧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替他伸纸。一幅写的是正楷十个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幅是行书十一个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幅是草书八个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赏赐给他锦缎、瓶盘等银器，并命令他亲自书写答谢表，不拘楷书、行书，宣宗对他的谢表，特别珍惜。

柳公权专心于书法艺术，没有精力管理家务，他替勋臣

贵戚家书写碑文，每年得到大量的金钱馈赠，这些钱大都被主管财物的奴仆海鸥、龙安等人偷去。他存放着一筐酒具杯盘等银器，他发现筐上的封条原封未动，但器皿却不翼而飞。他审问海鸥，海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丢的。”柳公权微微一笑，说道：“大概银杯长出翅膀飞去了。”就不再说什么。他珍视的只有笔砚和书画，都亲自锁起来。他曾品评砚石的高下，他认为青州的石末砚为第一，轻磨即可发墨；绛州黑石砚次之。他特精于《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讲说一词一义，常写满好几篇纸。他通晓音律，却不喜听演奏，他常说：“这是由于听音乐容易使人产生骄慢情绪的缘故。”

（魏连科 译）

【原文】

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宗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公

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赏久之。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慄，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彩，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诰，学士如故。

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旼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旼。公权忠言匡益，皆此类也。

累迁学士承旨。武宗即位，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权厚，及为珙奏荐，颇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师，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

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

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筥，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肩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阎立德 阎立本传

——《新唐书》卷一〇〇

【说明】阎立德（？—656）雍州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他出生于工艺世家，其父阎毗以工艺著名。他是唐代有名的工艺美术及建筑艺术家。他入仕为尚衣奉御，创制帝王公侯的朝服、伞扇等物，均典雅有则，后任将作大匠、工部尚书，代理司空等职，他规划营建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以及翠微宫、玉华宫等，都是唐代有名的建筑，在我国建筑艺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阎方本（？—673），阎立德的弟弟。他是唐代著名的宫廷画家。尤其擅长画人物肖像。他的画注重形似，用笔细腻，毫发不爽。他曾为太宗李世民画像，又曾作《寿府十人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受到当时人的赞赏。历任将作大臣、工部尚书，后来升任右宰相。但阎立本长于绘画，缺乏宰相才具，当时任左丞的姜恪只有战功，也乏治世之才，当时人借用《千字文》中的文句进行嘲讽：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世，是京兆府万年县人。他的父亲

阎毗，在隋朝任殿内少监，本来是因擅长工艺而被提拔的，因此阎立德和弟弟立本都很灵巧，富于创造力。武德初年，阎让被任为秦王府士曹参军，跟随秦王李世民平定东都洛阳。升任尚衣奉御，他创制六种帝王公候所穿的衣帽礼服、轿子、伞扇等物，都典雅而符合礼仪的规定。贞观初年，历任将作少匠，封爵大安县男。因护理唐高祖李渊的坟墓有功，升任将作大匠。文德皇后逝世，他代理司空之职，营建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时，因管理松懈被免职。后起用为博州刺史。太宗李世民去洛阳巡视，命令他选择凉爽干燥的地方建造避暑宫殿，他选择了汝州西山，宫殿建在汝水之上，面向广成泽，称为襄城宫，动用一百多万劳力。宫殿建成后，燥热不可住，太宗废弃了，把它卖给百姓，因此而被免官。

没过多久，又任他为将作大匠，在洪州制造航海大船五百艘，于是跟随太宗征伐辽东，代理殿中监之职，他规划修筑土山，因此攻破了安市城。大军班师回朝，行至辽泽，前面横拦二百里的沼泽地，不能通过，阎立德率人修路搭桥，大军没有被滞留。太宗很高兴，给他很多赏赐。他又负责营建翠微、玉华二宫，升任工部尚书。太宗逝世，又代理司空之职，并主管陵墓事务。因有劳绩，进爵大安县公。永徽五年，高宗去万年宫，他留守京师，率领四万罪犯修治京城。他死后，追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衔，陪葬于昭陵，赠谥号为“康”。

阎立本，高宗显庆年间以将作大匠的身份代替立德为工部尚书。高宗总章元年，由司平太常伯升任右相，封爵博陵县男。当初，太宗李世民和近臣在春苑池划船，看到奇异的

飞鸟在水面上上下下翻飞，非常高兴，令在坐诸臣赋诗，召阎立本来摹写这种景象，于是阁外的侍从传唤画师阎立本，这时阎立本已升任主爵郎中，于是他在春苑池左方，俯身作画，口吮毛笔，调和颜料，他看到陪太宗而坐的诸人，不觉羞愧流汗。回家以后，教训他的儿子们说：“我年轻时读书，辞采文章不比在坐的那些人差，现在只有我以绘画知名，地位与仆役相同，你们千万不要学习绘画！”但他生性为画，虽然为此而受委屈，也扔不掉画笔。他升为辅政大臣，只不过具有普通人应付事务的能力，缺乏宰相的才具。当时姜恪因作战有功升任左相，所以当时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左相沙漠逞威风，右相绘画有高名。”以此来嘲弄二人缺乏宰相之才。咸亨元年，官名改为旧称，于是右相改为中书令。逝世以后，赠谥号“文贞”。

（魏连科 译）

【原文】

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万年人。父毗，为隋殿内少监，本以工艺进，故立德与弟立本皆机巧有思。武德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从平东都。迁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舆、伞扇咸有典法。贞观初，历将作少匠、大安县男。护治献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摄司空，营昭陵，坐弛职免。起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阳，诏立德按爽塏建离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懊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

未几，复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摄殿中监，规筑土山，破安市城。师还，至辽泽，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筑道为桥梁，无留行。帝悦，赐予良厚。又

营翠微、宝华二宫，擢工部尚书。帝崩，复摄司空，典陵事，以劳进爵大安县公。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留守京师，领徒四万治京城。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康。

立本，显庆中以将作大匠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县男。初，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悦之，诏坐者赋诗，而召立本侔状。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是时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怅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齐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勿习！”然性所好，虽被訾屈，亦不能罢也。既辅政，但以应务俗材，无宰相器。时姜恪以功擢左相，故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复旧名，改中书令。卒，谥曰文贞。

虞世南传

——《新唐书》卷一〇二

【说明】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仕隋，任秘书郎。入唐，历任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官。入唐之后，虞世南一直在唐太宗李世民左右，因唐太宗喜爱书法艺术，他很受太宗的赏识。他直言敢谏，对唐太宗多所规，太宗也喜爱他的忠直敢言。唐太宗称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

虞世南是唐初著名书法家。他最初向智永学书法，深得其妙，因而他的书法作品受到人们的珍爱。他以行草书著名，其书与欧阳询齐名，世称“欧虞”。虞世南在唐代书坛上影响很大，鉴赏力也高。书家褚遂良曾询问虞世南，他的书法与智永、欧阳询相比如何，虞世南对智永、欧阳询、褚遂良的书艺作了恰当的评价。可见虞世南在唐代书坛的地位。他和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称为初唐四大家。传世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现藏陕西博物馆）。另外编集《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

虞世南，是越州余姚人。因他过继给他的叔父——南朝陈中书侍郎虞寄为后，所以字为伯施。他生性沉静，清心寡欲，和他的哥哥世基一起在吴郡顾野王门下学习十多年，终日专心学问，从不懈怠，甚至十多天不洗脸不梳头。他的文章委婉多彩，他很崇拜仆射徐陵的文章，徐陵也说虞世南的文风颇象自己，因此虞世南得以文章著名。陈朝天嘉年间，他的父亲虞荔逝世，虞世南由于过分悲伤，损害了身体，几乎坚持不住。陈文帝敬重虞荔的品德高尚，又了解到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博学，派人到他家里看护，召任虞世南为建安王的法曹参军。当时虞寄被陈宝应劫持，虞世南虽然为父亲服丧已满期，仍然粗衣粗饭；虞寄回来以后，才换去粗布衣服，开始吃肉食。至德初年，升为西阳王友。陈朝灭亡，和哥哥世基在隋朝任职。世基的文章清劲，超过了世南，但不如世南学问渊博，二人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声望，人们将他兄弟二人比作晋朝的陆机、陆云兄弟。在隋炀帝杨广作晋王的时候，和秦王杨俊递相任用他。大业年间，虞世南官至秘书郎。隋炀帝虽然喜欢他有才能，但对他刚正的性格很头痛，所以并不怎么重用他，七品官当了十年也得不到升迁。虞世基机敏而善于巧言花语，隋炀帝很喜欢他，于是一天天尊贵起来，妻妾的穿戴和王公贵族一样，虞世南家里却很贫困，但他一点也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又将杀虞世基，虞世南抱住隋炀帝，请求代他而死，宇文化及不允许，隋炀帝被杀，虞世南悲痛过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随宇文化及来到聊城，被窦建德俘获，任他为黄门侍郎。秦王李世民消灭了窦建德，任他为王府参军，转为记室，又升任太子

中舍人。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封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已年老体衰，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不允许，并升任他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坚持不就任，改为秘书监，封爵为永兴县子。

虞世南长相儒雅温顺，从外表来看，似乎连身上的衣服也抱不动，但意志坚强，议论政事，坚持正确意见。太宗李世民曾说：“我和虞世南讨论古今史事，他说了一句不合适的话，就因此而无限悔恨，他的态度竟是这样诚恳！”

贞观八年，虞世南进封永兴县公。当时陇右一带发生山崩地震，大蛇不断出现，山东和江、淮一带大水成灾，太宗为此忧虑，问虞世南该怎么办，虞世南回答说：“春秋时代，梁山发生山崩，晋侯把伯宗召来，问他该怎么办。伯宗说：‘山河是国家的象征，所以发生山崩河枯这样的灾异，君主应该放弃一切排场，换盛紧为素服，乘素帷车，撤去鼓乐，离开宫殿，另居别室，以礼祭祀山川’。梁山，是晋国的象征，晋侯按着伯宗的话去做，因此没有造成灾害。汉文帝元年，齐地、楚地的二十九座山峰同日发生山崩，大水从地下涌出，汉文帝下令，各郡国不要来贡献，给天下人以恩惠，因此四方稳定，也没有造成灾害。后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皇帝的宝座旁边；晋惠帝时，在齐地出现三百步长的大蛇，经过街市，进入宗庙。蛇本来应在野外草丛中，却进入街市，因此人们认为是怪异之事。现在蛇出现在山岭沼泽，这正是它生活的地方。再者，山东大雨，江、淮之间的大水，恐怕是有受冤屈的人被关在监狱所致，应该辨明在押犯是否冤枉，这样做，或许能够顺应天意。”太宗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于是派遣使者

救济灾民，昭雪冤狱，赦免了很多入。

后来彗星侵入虚宿、危宿，并横扫氐宿，这种现象持续了一百多天，太宗为此历访群臣。虞世南说：“古代齐景公时，彗星出现，齐景公问晏婴，晏婴回答说：‘君主您下令挖池塘，总嫌不深；下令盖亭台，总嫌不高；推行刑罚，总嫌不重。因此上天现出彗星，以示警戒。’齐景公听了很害怕，推行德政，过了十六天，彗星消失了。我希望陛下您不要认为自己有大功而产生自负情绪，不要因长时间天下太平而产生骄傲情绪，始终如一，彗星虽然出现，也不必担心。”太宗说：“确实象你指出的那样，我虽然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从十八岁上率兵起义，二十四岁时平定天下，不到三十岁就登上皇帝的宝座，自认为自从三皇五帝以来，平定祸乱的君主都比不上我。因此自负而傲慢，轻视天下的人物。上天出现这样的变异，大概是为此而发吧？秦始皇平灭了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最终都因骄傲而失败，我哪能不警惕呢？”

唐高祖李渊逝世，太宗下令，高祖的陵墓规格，以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准，丧礼隆重，于是徭役苛暴，百姓被奴役得疲惫不堪。虞世南上书进行劝戒：

古代的帝王之所以提倡薄葬，并不是不想用崇高的丧礼、显赫的陵墓来荣耀他们的亲人，但是高大的坟墓，厚厚的坟山，随葬宝物用具，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圣人深思远虑，安于薄葬，实在是为长远打算的。过去汉成帝建造延陵、昌陵，刘向上书说：“文帝登上霸陵，心情凄怆，悲从中来，对群臣说道：‘好啊！用北山的石头砌成外槨，内外棺之间填上丝麻，浇上油漆，这样坚固，

怎么能打开呢！’张释之说：‘如果坟墓中有引起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虽然压在南山下，犹有缝可钻；如果其中没有东西，即使没有石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死人的事，时时会发生，没完没了，但国家政权却有兴有灭。汉文帝听了，猛然省悟，于是薄葬高祖。

再者，按照汉代的规定，君主在位，抽出天下三分之一的贡赋，准备葬入陵墓。汉武帝在位的时间长，到下葬的时候，陵墓中被填满，已放不进任何东西了。霍光不识大体，主持葬礼，挥霍过度，后来赤眉军打入长安，打开汉武帝的茂陵，各种物品，取之不尽。聚集不用的财物，被盗贼利用，实在没有意思

魏文帝建造自己的陵墓时，立下遗嘱：“帝尧的陵墓，依山而成，地表不起坟堆，不建造灵殿和坟园，棺只容下尸体就行了，衣服被褥能掩住尸体就行了。我的坟墓选在不毛之地，这样做，是想让子孙后代不知我葬在哪里。也不要随葬金银铜铁等器物，一律用陶器。战乱以来，汉代各皇帝的陵墓，没有不被盗的，甚至为了取金，把金缕玉衣也烧化了，遗骨也随之烧光，不是让人很痛心吗？如果违背我的遗嘱，妄有改变，等于在地下戳我的尸体，使我死了又死，这种不忠不孝行为，如果我的灵魂知道了，决不保佑你们。这一条定为长远遵守的制度，把我的遗嘱收藏在祖庙里。”魏文帝定的这一制度真是通达事理的啊。

陛下您的德政，尧、舜也赶不上，但却在这一点上，等而下之，和秦、汉的君主一样，过分奢侈，我为此感

到很痛心。现在坟墓建造得如此高大，其中虽然不随葬珍奇宝物，后世人能相信这一点吗？我认为，霸陵依山就势，不起坟头，自然高大显赫。现在既然选择了平地，应该按照周朝的制度，建三仞高的坟头，随葬器物，一律不用金银铜铁，埋葬完毕，在陵墓左侧立一块石碑，上面刻写陵墓的大小高低规格，一份收藏在祖庙里，成为子孙万代遵循的制度，不是很好吗！

他这封奏疏送上去，太宗未加理睬。他又上奏说：“汉代的规定，皇帝即位，便开始营造陵墓，时间短的用十几年，长的用五十多年。现在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规定完成几十年工程量，百姓也太劳累了。汉代的大郡，人户可达到五十万户，现在人数达不到汉代的数量，而工作量相同，这是我提出疑问的原因。”当时群臣议论，也认为应遵守高祖的遗嘱，于是陵墓的规模稍稍缩小了一些。

太宗曾作宫体诗，让虞世南奉和。虞世南说：“陛下的诗作，确实很好，但这种体裁并不是严肃的诗体。上面喜好什么东西，下面必然更加喜好，我担心陛下的诗作一经传开，会风靡天下。因此，我不敢奉和。”太宗说道：“我这只不过考验你一下罢了！”赏给他丝帛五十匹。太宗经常出外打猎，虞世南又加劝戒，他的话都被太宗采纳。太宗曾令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当时手头没有书本可据，虞世南就凭记忆书写，结果不差一字。太宗经常说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品德，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章，五是书法。虞世南最初向佛僧智永学习书法，对智永的书法艺术之妙，深有所得，因此他的书法作品，受到世人的珍爱。

贞观十二年退休，加衔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官衔仍旧，另外俸禄、赏赐、卫队等待遇，和在职的京官一样。八十一岁时逝世，太宗下令，将他陪葬昭陵之旁，赠衔礼部尚书，加谥号为“文懿”。太宗亲笔下圣旨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和我的关系，像一个人一样，他对朝廷政事的疏漏，能拾遗补阙，没一天不记在心里，他真称得起当代的名臣，是人们行为的模范。可惜现在他已经过世，宫中的学者，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后来，太宗写了一首诗，历述古代国家的兴亡原因，诗写好以后，感叹说：“钟子期死后，因为没有知音，伯牙不再弹琴。我这首诗要给谁看呢？”派起居郎褚遂良在虞世南的灵前把诗稿焚烧了。过了好几年，太宗有一次作梦，梦见虞世南对他进行劝戒，和生前一样。第二天，太宗下令给虞世南家优厚的抚恤。（魏连科 译）

【原文】

虞世南，越州余姚人。出继叔陈中书侍郎寄之后，故字伯施。性沉静寡欲，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十余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缦，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陈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毁不胜丧。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学，遣使至其所护视，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时寄陷于陈宝应，世南虽服除，仍衣布饭蔬；寄还，乃释布啖肉。至德初，除西阳王友。陈灭，与世基入隋。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俱名重当时，故议者方晋二陆。炀帝为晋王，与秦王俊交辟之。大业中，累至秘书郎。炀帝虽爱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为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贵盛，妻妾被服拟王者，而世南躬贫约，一不

改。宇文弑帝，间杀世基，而世南抱持号诉请代，不能得，自是哀毁骨立。从至聊城，为窦建德所获，署黄门侍郎。秦王灭建德，引为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王践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已衰老，屡乞骸骨，不听，迁太子右庶子，固辞，改秘书监，封永兴县子。

世南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中抗烈，论议持正。太宗尝曰：“朕与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乃如此！”

贞观八年，进封县公。会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大水，帝忧之，以问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问焉。伯宗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纁，彻乐，出次，祝币以礼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诏郡国无来贡，施惠天下，远近洽穆，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坐。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庙。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适其所居。又山东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狱枉系，宜省录累囚，庶几或当天意。”帝然之，于是遣使赈饥民，申挺狱讼，多所原赦。

后星孛虚、危，历氏，馀百日，帝访群臣。世南曰：“昔齐景公时，彗见，公问晏婴，婴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灭。臣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慎终于初，彗虽见，犹未足忧。”帝曰：“诚然，吾良无景公之过，但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

大位，自谓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吾若，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上天见变，其为是乎？秦始皇除六国，隋炀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骄败，吾何得不戒邪？”

高祖崩，诏山陵一准汉长陵故事，厚送终礼，于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谏曰：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显以荣其亲，然高坟厚陇，宝具珍物，适所以累之也。圣人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为长久计。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刘向上书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为椁，用纒絮斲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汉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之一以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方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为盗之用，甚无谓也。

魏文帝为寿陵，作终制曰：“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寝殿、园邑，棺槨足以藏骨，衣食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者，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此制，可谓达于事矣。

陛下之德，尧、舜所不逮，而俯与秦、汉君同为奢

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为丘陇如此，其中虽不藏珍宝，后世岂及信乎？臣愚以为霸陵因山不起坟，自然高显。今所卜地势即平，宜依周制为三仞之坟，明器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事讫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庙，为子孙万世法，岂不美乎！

书奏，未报。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馀岁，远者五十年。今以数月之程，课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不亦劳矣。汉家大郡，户至五十万，今人众不逮往时，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时议者颇言宜奉遗诏，于是稍稍裁抑。

帝尝作宫体诗，使虞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赐帛五十匹。帝数出畋猎，世南以为言，皆蒙嘉纳。尝命写《列女传》于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无一字谬。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世南始学书于浮屠智永，究其法，为世秘爱。

十二年，致仕，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如故，禄赐仿阁视京官职事者。卒，年八十一，诏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帝手招魏王泰曰：“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将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灵坐焚之。后数岁，梦进说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

颜真卿传

——《新唐书》卷一五三

【说明】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他出生在书香贵官世家，他的五世祖颜之推是北齐的著名学者，颜师古是唐代的经学大师。他于开元年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因受宰相杨国忠排挤，外任为平原太守，因此后世称之为“颜平原”。安禄山反叛，他联络从史颜杲卿进行抵抗，被河北十七郡推为盟主。后入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因此也称之为“颜鲁公”。德宗朝，李希烈发动叛乱，朝廷派他去劝说，被李希烈勒死。

颜真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他初学褚遂良，后师张旭，甚得张氏用笔。他的楷书端庄凝重，气势雄伟，行书遒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人称之为“颜体”。他的书法，存世碑刻极多，著名的有《多宝塔碑》、《扶风庙碑》、《东方先生画掬碑》、《郭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宋景碑》等。存世墨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竹山》、《连句》等。

颜真卿字清臣，他是秘书监颜师古的五代堂孙，少年丧

父，母亲对他亲加教诲。成人以后，学问渊博，文章写得很漂亮，对母亲很孝顺。

开元年间，考中进士，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他又得中选。被任为醴泉县尉，再升任监察御史，出使河西、陇右地区。当时五原县有件冤案，长期得不到昭雪，时值天气大旱，颜真卿把这起冤案理清楚，就下了一场大雨，当地的人称之为“御史雨”。又派他去河东巡察，他弹劾朔方县令，郑延祚终身不许任用，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为之一惊。又升他为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吉温因私仇陷害中丞宋浑被贬住贺州，颜真卿说道：“怎么能因一时的愤怒，来危害名相宋璟的后人呢？”宰相杨国忠因此厌恶颜真卿，唆使中丞蒋冽弹劾他，降为东都采访判官，又转为武部员外郎。杨国忠始终想把他排挤出京城，于是外补他为平原郡太守。

安禄山谋反的举动初露端倪，颜真卿料他必然反叛，他扬言因连日阴雨，下令增筑城防，疏浚壕沟，选择兵壮，充实仓库。他整日和宾客们划船饮酒，以避免安禄山对他的举动有所怀疑。安禄山看他整日划船饮酒，认为他确实是书生之辈，不必担心。安禄山举兵反叛，河朔各地都沦陷了，只有平原郡城因防御完善未陷落，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急速向皇帝奏报消息。唐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奏报，叹了口气，说道：“河北地区二十四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对李平的到来，玄宗大为高兴，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了解颜真卿是怎么一个人，他的所做所为真是难能可贵！”

当时平原郡有静塞守兵三千人，又增募兵卒，得到一万多人，派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任刁万岁、和琳、徐浩、马

相如、高抗朗等人为将领，分别统领各部。颜真卿又在城西门大摆酒宴，犒赏士卒，他当场陈述利害，慷慨激昂，满面流泪，兵众们都感激奋发。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玮、邺郡太守王焘等人，都率部来投奔颜真卿，朝廷命令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兵五千渡过黄河增援颜真卿。贼攻破东都洛阳后，派段子光把李愬、卢奕、蒋清的首级传示河北各地，颜真卿担心兵将们看了以后产生惧敌心理，便欺骗诸将说：“我一向认识李登等人，这首级都不是他们的。”于是杀掉段子光，把三颗首级收藏起来。后来，用草扎成人体状，配上收藏的首级，进行殡敛祭奠，设立灵牌，颜真卿哭祭三人。

这时，他的堂兄颜杲卿任常山太守，斩杀贼将李钦凑等人，清剿了土门的叛军，河北地区十七郡的人马同一天投奔颜真卿，推他为主帅，拥兵二十万，在燕、赵之间坚持。朝廷任命他为户部侍郎，帮助李光弼讨伐叛军。颜真卿任李晖为自己的副手，任李铣、贾载、沈震为判官。不久，朝廷又任命他为河北招讨采访使。

清河太守派郡人李 来请求援兵，李 说：“听说大人您首先举起效忠朝廷的大旗，河朔地区依靠大人您为坚不可摧的长城。清河郡是平原郡的西邻，这里有江淮间运来的粗米、布匹，供应北军的军需，号称为‘天下北库’，计算它的储备，三倍于平原郡，兵卒也比平原郡多出二倍。大人您如果拥有此郡，以它为中心，那么您指挥其他城池，就象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颜真卿往清河郡派兵六千，对李 说：“我已经派出军队，你还有什么意见？”李 说：“朝廷派程千里领兵十

万，从太行山东下，将要出兵鄠口，阻止敌军，使之不能前进。大人您如果先攻伐魏郡，杀掉叛军守将袁知泰，派精兵攻占鄠口，让朝廷派来的军队去讨伐邺、幽陵等地，平原、清河二郡合兵十万去攻占洛阳，分别派精兵控制战略要冲。大人您则坚壁清野，不与袁知泰交战，不出十天，叛军必然溃败，互相残杀而死。”颜真卿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传令清河等郡，派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会同清河、博平二郡士卒五千人屯驻堂邑县。袁知泰派将白嗣深、乙舒蒙等领兵二万前来抵抗，叛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袁知泰逃往汲郡。

史思明围攻饶阳，派游击兵断绝平原援兵进军路线，颜真卿担心敌不过叛军，便写信招贺兰进明来增援，并把河北招讨使的职位让给他。贺兰进明在信都吃了败仗。这时正逢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郡归属，颜真卿想把他稳住，便派贾载从海道送去军费十多万两，刘正臣把他的儿子刘颇送来，作为人质。刘颇才十岁，诸将请求留下刘颇，颜真卿不允许。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颜真卿多次派人送去用蜡丸裹着的疏奏，陈述战事。朝廷任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任河北招讨使。当时军费困难，李 建议收购景城所产的食盐，并向各郡转卖，这样一来，军费就不缺乏了。第五琦在贺兰进明军中任参军，也推行颜真卿的措施，军费也得到充实。

安禄山乘河北地区空虚，派史思明、尹子奇猛攻河北，各郡又陷入敌手，只有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固守。但是人人自危，士气不能重新振作。颜真卿和诸将商议：“叛军的攻势，锐不可当。如果死在这里，有辱使命，并不是上策，不如直

接回到皇帝那里，朝廷如果追究兵败的责任而将我处死，我毫无怨言。”至德元年十月，颜真卿放弃平原郡，渡过黄河，辗转来到凤翔，朝见皇帝，肃宗封他为宪部尚书，又升为御史大夫。

当时朝廷流亡在外，战乱之中各种制度顾不上执行，但是颜真卿对御史大夫一职，尽职尽责，惩治违法行为和平时一样。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都被他弹劾降职。广平王领兵二十万去平定长安，在他向皇帝告辞的那天，在行宫前不敢骑马，待走出栅栏之后才敢上马。王府的都虚候管崇嗣，在广平王上马之前先骑马背，遭到颜真卿的弹劾。肃宗退回他的奏章，安慰他说：“我的皇子前次外出，我都谆谆告戒，因此他不敢有过失之举。崇嗣年岁大，又是瘸腿，你就饶他一回吧。”群臣都肃然起敬，不敢怠慢。两京平复后，肃宗派左司郎中李选去宗庙告慰祖宗，告慰文后署名“嗣皇帝”，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兴说：“太上皇帝玄宗尚在四川，这样署名合适吗？”崔兴马上回奏肃宗，加以修改，皇帝认为颜真卿通达事理。颜真卿又建言：“《春秋》记载，鲁国的新宫遭受火灾，鲁成公为此哭祭了三天。现在祖庙被叛贼毁坏，请求在郊野修筑檀台，皇帝东向哭祭，然后再派使者去告慰祖宗。”他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宰相讨厌他的言论，把他外补为冯翔太守。后又转任蒲州刺史，封他为丹阳县子。因遭御史唐旻的诬陷，被贬为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升任浙西节度使。刘展将要反叛朝廷，颜真卿预先进行战备，都统李岷以为这样做会惹起事端，对颜真卿的所作所为进行非难，因而朝廷把颜真卿召回，任为刑部

侍郎。刘展果然反叛，领兵渡过淮河，李峘逃往江西。

李辅国把上皇唐玄宗软禁在西宫，颜真卿率领百官去西宫向玄宗问安，李辅国对此非常厌恶，把颜真卿贬降为蓬州刺史。唐代宗即位，起用他为利州刺史，颜真卿不接受，于是升任他为吏部侍郎。又任他为荆南节度使，还未赴任，改任为尚书右丞。

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颜真卿请求皇帝先拜祭祖陵祖庙，然后再入皇宫，宰相元载认为这建议十分迂腐，颜真卿忿怒地说：“我的建议用不用，由您来决定，提建议的人有什么罪过？但是朝廷的政事还能经得起您再去破坏吗！”元载怀恨在心。不久，派颜真卿以检校刑部尚书的职衔出任朔方行营宣慰使，没有成行，留他在京主管尚书省事务，改封他为鲁郡公。当时元载大肆任用私人亲党，但他担心群臣向皇帝揭发，便欺蒙皇帝说：“群臣上书言事，往往夹杂毁谤朝政的言论。我请求作出这样的规定：但凡朝臣议论政事的奏章，必须先送自本部门的长官，长官再送交宰相，宰相再审查决定是否上奏给皇帝。”颜真卿为此上奏说：

各部门的长官，都是显贵官员，他们有资格直接向皇帝奏事。郎官、御史，都是陛下您的心腹耳目臣子，因此，他们巡视天下，不论大事小事、成败得失，派他们加以调查，回朝以后，向天子回报。这是古人广开视听之路的措施。现在陛下您要堵塞住自己的耳目，改使耳不聪、目不明，那么天下人还仰望什么呢？《诗经》上说：“往来飞行的黑苍蝇，落在篱笆上；谗言的危害无边，能使国破家亡。”谗言和苍蝇一样，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因此，诗人对进谗言的人十分

痛恨，故而写下这样的诗句：“抓住进谗言的人，扔去喂豺虎；豺虎嫌他脏，扔到蛮荒处。”古代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都是进谗言的人。陛下您厌恶这种人，是应该的。但是不对眼前人们的言论加以分析，如果他的言论纯属虚伪诬诞，那他就是进谗言的人，应该除掉他；如果他的言论实实在在，他就是正人君子，应该奖励他。如果陛下您不采取这种态度，致使人们认为陛下您不能分辨言论的好坏而且又懒于听取正确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替陛下惋惜。

过去太宗皇帝勤于政事，他在《司门式》中说：“没有进门证件却有急事要奏上，让主管官员和仪仗引领进见，不许阻挡。”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耳目受到蒙蔽。为此，备有二匹马，称为“仗马”，奏事的人如需要乘骑，听从自便。这是太宗治国平天下措施的一端。天宝年间以后，李林甫受到玄宗的宠信，群臣奏事如果不先经宰相允许，李林甫即找借口对奏事者加以中伤陷害，但是他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规定，群臣奏事必须经他同意。当时太监袁思艺每天到中书省读圣旨，他把玄宗的一言一行，都告诉李林甫，李林甫这才能够做到迎合玄宗的意向，先行预测之言，玄宗大为惊喜，以为李林甫料事如神，因此李林甫更受宠信而夺权，路人为之侧目。这样，皇帝的旨意不能下传，下情不能上达，这种权臣蒙蔽君主的局面，是由于不遵循太宗皇帝的成法形成的。这样每况愈下直到今天，天下的各种矛盾都集中在陛下您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在安禄山反叛初期，百姓还设有彻底破产，还有希望赢得天下太平，但是李辅国当权，宰相夺政，

相互姑息迁就。设置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三司衙门，受理刑狱，大肆诛杀反叛，致使叛军的残兵败将向北逃往党项，那些啸聚山林的不法之徒，更是惊慌不定，史思明成天恐惧，举兵反叛，致使东都洛阳沦陷，先帝肃宗由于忧虑操劳，损害了寿命。每当我想起这些，如万箭穿心。

现在国家的创伤还没有得到恢复，各地战事又日益加剧，陛下您说怎能不广听忠臣的言论，使自己耳聪目明？怎么能拒绝忠言直语呢！陛下您在陕州时，凡奏事的官员，不论贵贱，群臣认为太宗的贞观之治可计日而待。再说，正人君子，难进而易退，即使朝廷明文规定言者无罪，还担心他们不敢进言，何况心怀厌倦，又让宰相决定他们能否进言，御史台又拟出条条框框，使人不能面见天子，从此以后，群臣就不会再奏事了。陛下您的所见所闻，只是来自几个人耳目闻见，天下的官员因而闭口不言，陛下您还认为无事可奏，哪知是因惧怕而不敢进言呢！这样就为李林甫、杨国忠之类的人夺权创造了条件。我认为今天这样的局面，自古未有，即使是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陛下您如果不及早省悟，慢慢就成为孤家寡人了，那时后悔可就晚了。

于是宫内太监把颜真卿的言论在朝廷内外广为散布。后来颜真卿主持祭祀太庙，他反应供祭祀的祭器不整洁，宰相元载认为这是诽谤朝廷，把他贬为陕州别驾。后来改任吉州司马，又升任抚、湖二州刺史。

元载有罪被处死，杨绾推荐颜真卿，朝廷提拔他任刑部尚书，又进升吏部尚书。代宗去世，任颜真卿为礼仪使，他上书陈奏，以前各位皇帝的谥号太繁长，请求按照当初的意

见确定代宗的谥号，袁傒排斥他的建议，不给他上报。当时在安史之乱以后，各种典制被废弃，颜真卿虽然博通今古，屡次建议改正，因被权臣阻挠，都中途搁浅了。

杨炎当政时，因颜真卿耿介忠直，不为所容，改任他为太子少师，仍然兼任礼仪使。至卢杞当政，更不喜欢颜真卿，改任他为太子太师，罢去礼仪使之职，并多次派人去向颜真卿询问愿意到哪个方镇任职，想把他排挤出京师。颜真卿去见卢杞，责备他说：“当年你父亲卢奕中丞的首级被传送到平原郡时，满面都是血迹，我不敢用衣服去擦拭，亲自用舌头去舐，你就这样狠心容不得我吗！”卢杞听了，表面上对颜真卿矍然下拜，但内心恨之入骨。

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于是向皇帝上奏，要把颜真卿派往外地，他说道：“颜真卿为各地官员所信任，如果派他去说服，可以不出兵而平定。”代宗批准了他的奏章，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李勉认为，这样朝廷失去一位元老大臣，也会给朝廷带来羞辱，秘密上表，诸求留下颜真卿。颜真卿来到河南，河南尹郑叔则鉴于李希烈谋反的迹象已很明显，劝他不要前去，颜真卿说：“君命能违背吗？”他见到李希烈，宣读圣旨，李希烈的养子一千多人都拔刀前来，李希烈手下的将领也破口大骂，恨不得把他吃下去，颜真卿不动声色。李希烈以身护住颜真卿，斥退众人，颜真卿才得以进入宾馆。李希烈逼迫颜真卿，让他上疏为自己辩白，颜真卿不答应，于是李希烈采取欺骗的手段，让颜真卿的侄子颜岷以及颜真卿手下的官吏向朝廷请求，为李希烈昭雪，德宗皇帝不予理睬。其实颜真卿每次给子侄们写信，只是教训他们好好守护宗庙，

体恤孤儿，并无其他言语。李希烈派李元平去劝说颜真卿，颜真卿斥责说：“你受国家的委任，却不以死报效朝廷，可惜我手中无刀，有刀就把你宰了，你还来劝说我吗？”李希烈和他的同党聚会，把颜真卿召来，让艺人演唱，辱骂朝廷，颜真卿怒不可遏，斥责说：“你李希烈是朝廷的臣子，怎么能这么做！”说罢甩甩袖子去了。李希烈则满面羞愧。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派来的使者都在坐，他们对李希烈说：“早就听说太师颜真卿的高名盛德，大人您想要称帝，而太师来到，要找宰相的人才，有人能比太师颜真卿的？”颜真卿呵斥说：“你们听说过颜常山（杲卿）吗？他是我的哥哥，安禄山反叛时，他首先兴兵平叛，后来虽然被俘，口中骂贼不绝。我已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坚守我的节操，死而后已，我难道怕你们的胁迫吗！”叛贼们都大惊失色。

李希烈于是拘捕了颜真卿，派士兵看守，在院中挖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大坑，传言将要活埋他，颜真卿看到李希烈，说道：“去死是我的命运决定的，你不必再说什么了！”张伯仪失败被杀，李希烈派人把张伯仪的符节和首级送给颜真卿看，颜真卿失声痛哭，仆倒在地。适逢李希烈的同伙周曾、康秀林等人谋划袭杀李希烈，推颜真卿为元帅，事情泄露，周曾被杀，于是把颜真卿押送至蔡州。颜真卿估计这次必死无疑，便写下遗书、墓志、祭文，指着居室的西墙下说：“这就是我死的地方。”李希烈谥号皇帝，派人去向颜真卿请教登基仪式，颜真卿回答说：“我已经老了，曾主管国家的礼仪，我只记得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

兴元年间以后，官军的力量又强大起来，叛贼担心形势

发生变化，派将领辛景臻、安华到颜真卿那里，满院堆满柴草，对颜真卿说：“你如果不变节投降，就把你烧死！”颜真卿站起来向烈火扑去，辛景臻等人马上拉住他。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与朱泚同谋，被朝廷处死，李希烈大为恼怒，派太监等人来杀害颜真卿，他们对颜真卿说：“圣旨到！”颜真卿行礼听旨。太监说：“应赐你死。”颜真卿说：“老臣我出使没有完成使命，罪该赐死，但使臣你哪一天从长安出发的呢？”那太监说：“我是从大梁派来的。”颜真卿大骂：“原来是叛贼派来的，怎么能称圣旨！”于是颜真卿被勒死，时年七十六岁。嗣曹王李泉听到这一消息，泪流满面，三军将士都为之痛哭，于是李泉向朝廷上表，陈述颜真卿的高风亮节。淮、蔡地区平定以后，颜真卿的儿子颜颢、颜硕护送他父亲的灵柩回到长安，德宗五日不上朝，表示悲哀，追赠他为司徒，谥号为“文忠”，供丧葬用的布帛米粟等物加倍赐给。

颜真卿作为朝臣，端庄严肃，刚毅而有礼，凡不符合公论正道的事，心里连想也不想。天下人出于对他的尊敬，不直呼他的姓名，而称他为“鲁公”。象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这些人才，都是颜真卿发现提拔起来的，后来都建立了功勋。他擅长楷书、草书，笔力遒劲婉转，世人把他的墨迹视为珍宝，加以传布。根据贞元六年朝廷颁发的大赦令，颜颢被授予五品正员官。开成初年，朝廷又任他的曾孙颜弘式为同州参军。

（魏连科 译）

【原文】

颜真卿字清臣，秘书监师古五世从孙。少孤，母殷躬加训导。既长，博学，工辞章，事亲孝。

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复使河东，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诏终身不齿，闻者耸然。迁殿中待御史。时御史吉温以私怨构中丞宋浑，谪贺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宰相杨国忠恶之，讽中丞蒋冽奏为东都采访判官。再转武部员外郎。国忠终欲去之，乃出为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壮，储仓禀。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以纾禄山之疑。果以为书生，不虞也。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玄宗始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

时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分总部伍。大飨土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玮、邺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有诏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锐五千济河为助。贼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愷、卢奕、蒋清首徇河北，真卿畏众惧，给诸将曰：“吾素识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藏三首。它日，结刍续体，敛而祭，为位哭之。

是时，从父兄杲卿为常山太守，斩贼将李钦凑等，清土门。十七郡同日自归，推真卿为盟主，兵二十万，绝燕、赵。诏即拜户部侍郎，佑李光弼讨贼。真卿以李晖自副，而用李铣、贾载、沈震为判官。俄加河北招讨采访使。

清河太守使郡人李 来乞师，曰：“闻公首奋裾唱大顺，河朔恃公为金城。清河，西邻也，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天下北库’，计其积，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众。公因而抚有，以为腹心，它城运之如臂之指耳。”真卿为出兵六千，谓曰：“吾兵已出，子将何以教我？”曰：“朝家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而东，将出嶮口，限贼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斩贼首袁知泰，以劲兵拔嶮口，出官师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十万众徇洛阳，分犀锐制其冲。公坚壁勿与战，不数十日，贼必溃，相图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与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将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万拒战，贼败，斩首万级，知泰走汲郡。

史思明围饶阳，遣游弈兵绝平原救军，真卿惧不敌，以书招贺兰进明，以河北招讨使让之。进明败于信都。会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归，真卿欲坚其意，遣贾载越海遗军资十馀万，以子颇为质。颇甫十岁，军中固请留之，不从。

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 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

禄山乘虚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复陷，独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复振。真卿谋于众曰：“贼锐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国，非计也，不如径赴行在，朝廷若诛败军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载十月，弃郡度河，间关至凤翔谒帝，诏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

方朝廷草昧不暇给，而真卿绳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广平王总兵二十万平长安，辞日，当阙不敢乘，趋出陞栳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骑，真卿劾之。帝还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谆谆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卿姑容之。”百官肃然。两京复，帝遣左司郎中李选告宗庙，祝署“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为达识。又建言：“《春秋》，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为贼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不从。宰相厌其言，出为冯翊太守。转蒲州刺史，封丹阳县子。为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拜浙西节度使。刘展将反，真卿豫饬战备，都统李岷以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为刑部侍郎。展卒举兵度淮，而岷奔江西。

李辅国迁上皇西宫，真卿率百官问起居，辅国恶之，贬蓬州长史。代宗立，起为利州刺史，不拜，再迁吏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改尚书右丞。

帝自陕还，真卿请先谒陵庙而即宫，宰相元载以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岂堪公再破坏邪！”载衔之。俄以检校刑部尚书为朔方行营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鲁郡公。时载多引私党，畏群臣论奏，乃给帝曰：“群臣奏事，多挟谗毁。请每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以白宰相，宰相详可否以闻。”真卿上疏曰：

诸司长官者，达官也，皆得专达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无细大得失，皆俾访察，

还以闻。此古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望焉？《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也。诗人疾之，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无极，汉之江充，皆谗人也。陛下恶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虚诬，则谗人也，宜诛殛之；其言不诬，则正人也，宜奖励之。舍此不为，使众人谓陛下不能省察而倦听览，以是为辞，臣窃惜之。

昔太宗勤劳庶政，其《司门式》曰：“无门籍者有急奏，令监司与仗家引对，不得关碍。”防拥蔽也。置立仗马二，须乘者听。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宝后，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辄奏事者，托以他故中伤之，犹不敢明约百司，使先关白。时阉人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天子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请，帝惊喜若神，故权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此权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从来渐矣。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犹可致，而李辅国当权，宰相用事，递为姑息。开三司，诛反侧，使余贼溃将北走党项，哀啸不逞，更相惊恐，思明危惧，相挺而反，东都陷没，先帝由是忧勤损寿。臣每思之，痛贯心骨。

今天下疮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岂得不博闻说言，以广视听，而塞绝忠谏乎？陛下在陕时，奏事者不限贵贱，群臣以为太宗之治可 而待。且君子难进易退，朝廷开不讳之路，犹恐不言，况怀厌怠，令宰相宣进止，御史台作条目，不得直进，从此人不奏事矣。陛下闻见，止于数人耳目，天下

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岂知惧而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臣谓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林甫、国忠犹不敢公为之。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悔无及矣。

于是中人等腾布中外。后摄太庙，言祭器不飭，载以为诽谤，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二州刺史。

载诛，杨綰荐之，擢刑部尚书，进吏部。帝崩，以为礼仪使，因奏列圣谥繁，请从初议为定，袁傖固排之，罢不报。时丧乱后，典法湮放，真卿虽博识今古，屡建议厘正，为权臣沮抑，多中格云。

杨炎当国，以直不容，换太子少师，然犹领使。及卢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师，并使罢之，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将出之。真卿往见杞，辞曰：“先中丞传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亲舌舐之，公忍不见容乎？”杞矍然下拜，而衔恨切骨。

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谕之，可不劳师而定。”诏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郑叔则以希烈反状明，劝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见希烈，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拔刃争进，诸侯皆慢骂，将食之，真卿色不变。希烈以身扞，麾其众退，乃就馆，逼使上书雪己，真卿不从。乃诈遣真卿兄子岷与从吏数辈继请，德宗不报。真卿每与诸子书，但戒严奉家庙，恤诸孤，讫无它语。希烈遣李元平说之，真卿叱曰：“尔受国委任，不能致命，顾吾无兵戮汝，尚说我邪？”希烈大会其党，召真卿，使倡优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惭。时朱滔、王武俊、田

悦、李纳使者皆在坐，谓希烈曰：“闻太师名德久矣，公欲建大号而太师至，求宰相孰先太师者？”真卿叱曰：“若等闻颜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后虽被执，诟贼不绝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岂受若等胁邪！”诸贼失色。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于廷，传将坑之，真卿见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为？”张伯仪败，希烈令赍旌节首级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会其党周曾、康秀林等谋袭希烈，奉真卿为帅，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寝室西壁下曰：“此吾殓所也。”希烈僭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耳！”

兴元后，王师复振，贼虑变，遣将辛景臻、安华至其所，积薪于廷曰：“不能屈节，当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诛，希烈因发怒，使阉奴等害真卿，曰：“有诏。”真卿再拜。奴曰：“宜赐卿死。”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骂曰：“乃逆贼耳，何诏云！”遂缢杀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闻之，泣下，三军皆恸，因表其大节。淮、蔡平，子颢、硕护丧还，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赙布帛米粟加等。

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后皆有功。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贞元六年赦书，授颢五品正员官。开成初，又以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欧阳询传

——《新唐书》卷一九八

【说明】欧阳询（557——641），字信木，潭州临湘（今湖南省属县）人。早年在隋朝任官，曾仕至太常博士。入唐，历任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

欧阳询是我国唐代著名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但用笔险劲，结字严整，笔画刚劲，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世称为“率更体”。他的书法，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很喜爱。高丽国专门派使者来中原购求他的书法作品。欧阳询学书法，刻苦专心，他曾在索靖所书碑前，精心揣摩，三日三夜，终于成为书法名家。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的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卜商帖》、《张翰帖》等。

欧阳通，字通所，欧阳询第四子。唐高宗时任中书舍人，武则天时以司礼卿、判纳言事为相。因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被武氏诸人陷害，处死。

欧阳通幼承母教，刻意学习乃父的书体，最终有成，与乃父齐名，世称“大小欧阳体”。

欧阳询字信木，是潭州临湘人。父亲欧阳纥，为南朝陈广州刺史，因谋反被杀。按法律规定，欧阳询也应治罪，因逃藏而得免。江总因他是老朋友儿子，便私自收养了他。欧阳询相貌丑陋，但聪明悟性过人。江总教他读书，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因此他博通经史诸书。在隋朝做官，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和他不断交往，李渊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多次升迁，至提拔为给事中。

欧阳询最初临摹王羲之的书体，后来用笔险涩刚劲，超过了王羲之，因而自成其体。他随意书写的书信，流传在世上，被人们效法。高丽国曾专门派遣使者，购求他的书法作品，皇帝李渊慨叹说：“高丽人看到他的书法作品，一定会以为他相貌魁伟、仪表堂堂呢！”他曾经在路看到晋人索靖所书的石碑，详细观看，走出几步，又返回细看，站着看得疲劳了，坐下来再看，最后索性睡在石碑旁边，三天三夜才离去。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竟达到这种地步。

唐太宗贞观初年，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爵渤海男。死时年八十五岁。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唐高宗仪凤年间历升至中书舍人。母死，应在家守孝，皇帝下令照旧任官供职，不许在家守孝。欧阳通每次上朝都光着脚走路，直至朝门。夜里值班，睡觉只铺一张草席。不为公事，概不说话，回家以后就放声大哭。因遇上灾荒年，母亲的灵柩未能下葬，在丧室中守了四年，从未脱去孝服。在冬天，家人偷偷地在他睡的草席下铺上毛毡和绵絮，欧阳通发现，立即撤去。后来他历升为殿中监，封爵渤海子。武则天天授初年，转为司礼卿、判纳言事。任辅

政大臣一个多月，正逢凤阁舍人张嘉福奏请武承嗣为太子，欧阳通和岑长倩坚持反对，因此得罪了武氏诸人。岑长倩被投入监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了死刑，酷吏来俊臣诬告欧阳通与岑长倩同谋，欧阳通虽被毒刑拷打，始终不肯承认，于是来俊臣替他拟供词，把他处死。中宗神龙初年，追复原来的官爵。

欧阳通早年死了父亲，他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怕他不能继承父业，曾给他钱让他去购买父亲的手迹，于是欧阳通刻意摹仿，以求得功名，过了几年，他的书法水平仅仅次于父亲欧阳询，因此父子齐名，号称“大小欧阳体”。褚遂良也以书法著名，褚遂良曾问虞世南：“我的书法比智永怎么样？”虞世南回答说：“我听说智永的字，一字值五万钱，你的字怎么能达到这一点？”褚遂良又问：“比欧阳询怎么样？”虞世南回答：“我听说欧阳询写字，不论纸笔好坏，都能写出他的水平，你怎么能达到这一点？”褚遂良说：“那么我的书法到底怎样？”虞世南说：“你若写顺了手，笔也合适，写出字来，也是可贵的作品。”褚遂良非常高兴。欧阳通晚年更加矜持持重，用狸毛作笔尖，外面再加一层兔毛，笔管都是用象牙犀牛角做的，若不是这样的笔，从不肯动手书写。

（魏连科 译）

【原文】

欧阳询字信木，潭州临湘人。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匿而免。江总以故人子，私养之。貌寝悦，敏悟绝人。总教以书记，每读辄数行同尽，遂博贯经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数与游，既即位，累擢给事中。

询初仿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牋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类此。

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居母丧，诏夺哀。每入朝，徒跣及门。夜直，藉藁以寝。非公事不语，还家辄号恸。年饥，未克葬，居庐四年，不释服。冬月，家人以毡絮潜置席下，通觉，即彻去。迁累殿中监，封渤海子。天授初，转司礼卿，判纳言事。辅政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以武承嗣为太子，通与岑长倩等固执，忤诸武意。及长倩下狱，坐大逆死，来俊臣并引通同谋，通虽被惨毒无异词，俊臣代占，诛之。神龙初，追复官爵。

通早孤，母徐教以父书，惧其堕，尝遗钱使市父遗迹，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复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

李邕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说明】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省扬州市）人。其父李善，是著名的《文选》学家。李邕聪明博学，少年即有文名。武则天时，任左拾遗，后历任左台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陈州刺史，后为汲郡、北海郡太守，被李林甫所杀。因其最后任北海太守，故人称其为“李北海”。因李邕生性刚直激烈，加之细节不检点，屡遭贬斥、诬陷，以致最后被害。

李邕在当时文名甚著，尤其擅长撰写碑传墓铭。书法亦很著名，最初学王羲之，后来不为王书所拘，自成一体，别具风格，人称“书中仙手”。因他长于碑铭文字，又长于书法，由他撰文或书丹的碑刻很多，传世的碑刻拓本多种，著名的如《麓山寺碑》、《东林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叶慧明碑》、《婆罗树碑》等。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县人。父亲李善，品行高雅，博通古今，误却不善于写文章，因此人称他为“书橱”。唐高宗显庆年间。历升为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他作《文选

注》，注释详尽、准确，进呈给皇帝，得到优厚的赏赐。又升李善为潞王府记室参军，又任泾城县令，因他和贺兰敏之是好朋友，贺兰敏之犯罪，他被流放到姚州，遇上大赦，回到中原。他在汴州、郑州之间讲学，从学的人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教授他专精的学问，称为“《文选》学”。

李邕从小就有文名。他父亲李善注释《文选》，注重词句和史实，而忽略了文词的主旨。书注成以后，他问李邕质量如何，李邕不敢说，李善追问，李邕表示想改变一下注释的体例，李善说：“你替我补充补充吧。”李邕就注释的史实，道出文章的宗旨，李善也认为李邕的阐释不可或缺，于是两书并传于世。李邕二十岁时，去进见大官特进李峤，说明来意，称：“有些书我还没读到，希望看看内阁的藏书。”李峤说：“内阁藏书上万卷，哪能短时间读完？”李邕坚持要看，于是就暂时让他在内阁藏书处值班。没过多久，就辞职而去，李峤很吃惊，便拿藏书中的深奥、冷僻书籍考问他，李邕随问即答，不加思索，李峤赞叹说：“你将来要成为专家！”

李峤任内史，和监察御史张廷珪推荐李邕文章写得好，为人又正直，是谏官的材料，于是李邕被任为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璟检举张昌宗等人谋反事实，武则天不理睬，李邕立在殿阶下大声说道：“宋璟所奏，事关国家命运，陛下您应该听从。”武则天神色稍微缓和，当时就批准了宋璟的奏章。李邕退出宫殿，有人责备他说：“你的官位低，如果违背了皇帝的意旨，会大祸临头的。”李邕说：“不这样做，就不能闻名。”

唐中宗即位，郑普思凭借方术爱宠幸，被提拔为秘书监。李邕劝戒说：“陛下您亲政的时间尚短，因有天子的威严，听

不到社会上的议论。现在外边沸沸扬扬，都说郑普思凭借他的各种诱惑，陈说种种怪异，陛下您不明白，被他驱使。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没有邪恶的念头。’陛下您如果真的认为郑普思的方术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话，那么爽鸠氏将会永远统治天下，陛下您的皇帝宝座，现在就不可能得到；如果他的方术能招致神仙，秦朝和汉朝会因此而永远拥有天下，陛下您今天也做不了皇帝；如果他的方术能使人成佛，那么梁武帝会因此而永远拥有天下，今天陛下您的皇帝也做不成；如果他的方术能役鬼施展邪术，那么墨子、干宝会将这种办法献给他们的君主，从而永远拥有天下，今天陛下您也做不了皇帝。自古尧、舜之所以被尊为圣人，我观察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是时事人伦，使人家族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没听说用鬼神来治理天下，希望陛下您认真考虑。”中宗不接受他的意见。

张柬之、敬晖、崔玄晖、袁恕己、桓彦范等五位郡王遭贬降，李邕因与张柬之是好朋友，亦被贬出，任南和县令，再贬为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之乱被平定，召任李邕为左台殿中侍御，他尽职弹劾不法官员，人们都对他惧怕三分。谯王李重福谋反，李邕和洛州司马崔日用知搜捕谯王余党，升任为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与崔日用交恶，李邕却和崔日用来往；玄宗在东宫为太子时，李邕和崔隐甫、倪若水都受到玄宗的礼遇，岑羲等人十分嫉妒，于是贬降李邕为舍城县丞。玄宗即皇帝位，召任李邕为户部郎中。当时张廷珪为黄门侍郎，姜皎又受皇帝的宠幸，二人共同推荐李邕任御史中丞。宰相姚崇讨厌李邕轻薄躁进，把他降为括州司马，后又升为陈州

刺史。

玄宗去泰山祭祀返回，李邕在汴州进见皇帝，玄宗令他献呈歌颂泰山封禅的词赋，看了以后，玄宗很高兴。但是李邕傲慢放肆，自以为将要做宰相。李邕向来看不起丞相张说，二人关系很坏。又遇上仇人告发李邕在官贪赃枉法，李邕被逮捕入狱，判为死罪。许昌人孔璋给天子上书说：

开明的君主，提拔有才能的人，对他的过错，却不去计较，只用其才，而不管他的行为如何，壮烈之士坚持节操，勇敢之士不怕死，因此，晋国任用荀林父，不计较他的过失，汉朝任用陈平，并不计较他的品行，秦国的禽息为荐贤不惜弃生，齐国的北郭骚为劝留晏婴自刎，不惜一死。如果荀林父因有过错被杀，陈平因偷嫂被处死，百里奚因得不到推荐而被弃，晏婴被驱逐，那么晋国得不到赤狄的地盘，汉朝就不会取得天下，秦国也不会强大，齐国也不可能称霸。我听说，陈州刺史李邕，是个刚毅忠烈、不苟且避祸的人。以前为除掉张昌宗、张易之，为摧毁韦氏之乱，虽然受委屈被贬降，但坏人的阴谋被瓦解，李邕对国家是有功的。再说，李邕在官位上，能做到的都做了，他拯救孤寡，抚恤穷人，解救贫乏，普施恩惠，而且不聚集私产。现在听说他因贪赃而被投入监狱，不日就要被处死。我崇仰这样的信条：人生在世上如不能做出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不如舍弃生命，为贤人申明冤屈。我情愿用我的六尺之身服刑而死，代替李邕。我和李邕一向没有交往，我知道有个李邕，李邕却不知道有孔璋这个人，我比不上李邕，这是明摆着

的。知道他是贤人加以举荐，这是仁的表现；能替人承担祸患，这是义的表现。能以一死得到仁义的好名声，我还想得到什么？我希望陛下您宽免李邕的死罪，让他改过自新，去建立荀林父、陈平那样的功业，我死也瞑目了；让他象禽息、北郭骚那样为国家舍生忘死，我的愿望也就达到了。如果陛下刚刚即位就杀戮大臣，我请求伏剑自刎，不敢麻烦行刑官。皇天在上，会听从我的忠直之言的。过去吴、楚等七国之乱，汉朝得到剧孟这员战将，就不必担心，以一员战将能抵挡七国的兵众，我以为，君主应该宽容大度，不计较小节的失误，这样就会得到人才，远有剧孟，近有李邕。况且陛下已封禅泰山，向上天报告了成功，天下面目为之一新，如把已赦免了的罪人重新判罪，那谁会没有罪过呢？希望贤明的陛下认真考虑。我听说过“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古训，被判死罪的李邕并不了解我，我之所以甘心替他而死，不只是出于可惜李邕的才能，也想成全陛下您爱护人才的慈悲之心。

这封书信上奏给皇帝，结果李邕免去死罪，贬降为遵化县尉，孔璋被流放到岭南。李邕的妻子温氏，又向朝廷请求，让李邕去守卫边境，以此来赎罪，她说：

李邕年少时读书习文，养成嫉恶如仇的性格，因此不被众人所容，邪恶的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读书人因嫉妒对他怒目而视。他多次被贬降到边远地区，朝廷中再没有他的踪迹，这样度过了十多年。他时时刻刻为离开朝廷而伤叹，使人听了以后，也替他伤心。陛下去泰

山封禅，圣驾返回的路上，李邕向皇帝贡献牛酒，受到皇帝的恩赐。我听说过，正人君子被任用，奸恶小人就担忧，李邕的灾难，就发端于此。再者李邕连年在外地任官，没有一个人出来毁谤他，但是一旦陛下对他产生好感，马上就被加上种种罪名。常言说：“不管是贤才或者不肖之徒，只要进入朝廷，就被人嫉妒。”这一点请陛下您明辨是非。李邕刚被审讯，就投入监狱，五天五夜，汤水未进，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只有听从狱吏的摆布。罪名由狱吏口述，逼迫李邕亲笔书写。贷给百姓蚕种，被说成是枉法；收购丝罗贡献给朝廷，被诬告为贪赃。当时的投诉衙门，被严密封锁，尽管你呼天唤地，谁肯替他上诉？他满怀悲愤，离开京师，投身边地，且永远没有归还的日期。我希望让李邕充当一名军卒，在边境为国家效力，血染边壤，身埋黄沙，以成全李邕平生报国之心。

这封书信送上去，没有被理睬。

后来李邕跟随内臣杨思勖征伐岭南的盗贼，立了功，升任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又起用为括州刺史。因他喜欢兴利除害，又被诬告，将要判罪，因皇帝记住了他的名字，下令不要弹劾。后来李邕历任淄、滑二州刺史，进京述职。起初，李邕很早就出了名，重义气，爱惜人才，因长年被贬在外地，与京师的官员没有接触。他进京以后，人们传说他的长相特别怪异，在道路上围观他，年轻的后生，闻风纷纷去拜访，街巷都挤满了人。朝廷的内臣也来问候，并索取他的文章，将要呈送皇帝。因遭受谗言、嫉妒，不能留在京师，外

任为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年间，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被逮捕入狱，因李邕曾赠送给他一匹马，于是吉温逼迫柳勣供出李邕，说李邕曾向他陈说朝廷的吉凶祸福，并暗中贿赂他财物。宰相李林甫一向忌恨李邕，便趁机给他加以罪名。传旨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去北海郡就地处死李邕。时年七十岁。唐代宗时，追赠秘书监衔。

李邕的文章，擅长作碑铭颂文，人们拿黄金丝帛为礼请他撰文，前后所收的润笔钱，以万万计。李邕虽然官运不通，却以文章闻名天下，当时人称他为“李北海”。卢藏用曾说：“李邕的为人，好像宝剑干将、莫邪，人们很难和他争锋，但担心宝剑会断刃。”李邕的下场，正和卢藏用说的那样。杜甫知道李邕是被诽谤而死，为此作了《八哀诗》，读者也为李邕伤心。李邕生性豪放，不拘细节，他所到之处，接受贿赂酬谢，任意打猎游玩，最终因此而败亡。

【原文】

（魏连科 译）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麓”。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

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

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乃召拜左拾遗。御璟史中丞宋璟劾张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邕立阶下大言曰：“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

中宗立，郑普思以方伎幸，擢秘书监。邕陈曰：“陛下躬政日浅，有九重之严，未闻道路横议。今藉藉皆言普思冯诡惑，说妖祥，陛下不知，猥见驱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诚以普思术可致长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纳。

五王诛，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平，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弹劾任职，人颇惮之。譙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恶日用，而邕与之交，玄宗在东宫，邕及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羲等忌之，贬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为户部郎中。张廷珪为黄门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起为陈州刺史。

帝封太山还，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然矜肆，自

谓且宰相。邕素轻张说，与相恶。会仇人告邕赃贷枉法，下狱当死。许昌男子孔璋上书天子曰：

明主举能而舍过，取才而弃行，烈士抗节，勇者不避死，故晋用林父不以过，汉任陈平不以行，禽息殒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爱死。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士，汉无天子之尊，秦不强，齐不霸矣。伏见陈州刺史邕，刚毅忠烈，难苟免。往者折二张之角，挫韦氏之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沮解，即邕有功于国。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赈惠，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死在旦夕。臣闻生无益于国者，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愿以六尺之躯膏铍钺，以代邕死。臣与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贤而举，仁也；任人之患，义也。获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宽邕之死，使率德改行。兴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愿毕矣。若以阳和方始，重行大戮，则臣请伏剑，不敢烦有司，皇天后土，实闻臣言。昔吴、楚反，汉得剧孟则不忧，夫以一贤而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弃遐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贤，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疏奏，邕得减死，贬遵化尉，流璋岭南。邕妻温，复为邕请戍边自赎，曰：

邕少习文章，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

儒侧目。频谪远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载。岁时叹恋，闻者伤怀。属国家有事泰山，法驾旋路，邕献牛酒，例蒙恩私。妾闻正人用则佞人忧，邕之祸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无一毁，天意暂顾，罪过旋生。谚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气息奄奄，惟吏是听。事生吏口，迫邕手书。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于时匍匐使朝堂，守捉严固，号天诉地，谁肯为闻？泣血去国，投骨荒裔，永无还期。妾愿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涂朔边，骨粪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

邕后从中人杨思勖讨岭南贼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早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谄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代宗时，赠秘书监。

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巨万计。邕虽拙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卢藏用尝谓：“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后卒如言。杜

甫知邕负谤死，作《八哀诗》，读者伤之。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张旭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说明】张旭，字伯高，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因他曾任左率府长史，因此世称他为“张长史”。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以草书最为驰名，被人称为“草圣”。他往往醉后作书，被人称为“张颠”。他的草书气势迭荡，连绵缠绕，富于神韵。僧怀素继承了他的笔法，发展为狂草，怀素自称他“以狂继颠”（见其《自叙帖》），人称“颠张醉素”。唐文宗称李白的诗歌、裴旻的舞剑和张旭的草书为“三绝”。传世碑刻拓本有《尚书省郎官石记》，墨迹有《草书古诗四贴》等。

张旭，是苏州吴县人。嗜酒如命，经常喝得大醉，醉后大声呼叫，发疯一样来回狂跑，在这种情况下，才下笔作字。或者手攥自己的头发蘸墨挥洒，酒醒以后，自己审视，认为是神力所书，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字来了，因此人们称他为“张颠”。

当初，张旭任常熟县尉时，有一个老头儿手拿状纸，求张旭写判词，过了两天，老头儿又来求写，张旭对老人的罗嗦感到厌烦而责备他。老头儿说：“我看大人您的笔法奇妙无

比，我只不过想收藏您的书法作品罢了。”张旭问他家里还有什么收藏品，老头儿把他父亲的书法作品全拿出来，张旭仔细观看，真是天下的绝妙笔墨，从此尽得其用笔之法。张旭曾说，他看到公主和挑担人争路，又听到乐队的吹打声，从中悟出用笔的意境，欣赏艺人公孙大娘跳《剑器》舞，从中悟出用笔的神韵。后人评论前辈书法成就，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等人都有不同意见，说到张旭，众口一词，没人能指出他的不足之处。能继承他的书法艺术的人，只有崔邈和颜真卿。

（魏连科 译）

【原文】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檐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唯崔邈、颜真卿云。

郑虔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说明】郑虔，生卒年不详，字弱齐，唐郑州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天宝初年任协律郎，因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流放在外十年。唐玄宗赏识他的才华，开元二十五年任广文馆博士。安禄山反叛，郑虔被劫往洛阳，任他为水部郎中。安禄山被平定，郑虔被囚禁，后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死于任所。

郑虔是唐代著名画家，亦善诗文书法，他曾将诗书画献给唐玄宗，玄宗称赞他诗书画三绝。他的画长于山水，兼及人物虫鱼。另外他又长于地理之学，对各地的山川、物产、守卫情况十分熟悉，曾著《天宝军防录》。他和李白、杜甫是朋友，杜甫赠诗有“才名四十年，从客寒无毡”之句，对他的才华和清廉加以赞扬。

郑虔，是郑州荥阳县人。天宝初年，任官协律郎，他搜集当代史事，著书八十多篇。有人偷偷地看过他的书稿，便上书告发郑虔私修国史，郑虔急忙把书稿焚烧，因此被贬降了十年。他回到京城以后，唐玄宗很欣赏他的才能，想把他

安排在自己身边，不管任何具体事务，于是设置了广文馆，任郑虔为广文馆博士。郑虔得到任命，不知道广文馆这个机构在哪里，便去找宰相诉苦，宰相说：“皇帝陛下下令扩充国立大学，增设广文馆，来安排有贤德的人，让后代人说起广文博士是从你开始的，这不是很好吗？”这样郑虔才走马上任。过了很久，大雨毁坏了广文馆的房屋，有关部门也不加修复，借住在国子馆内，从此广文馆被废弃。

当初，郑虔从旧书中选出有流传价值的文章四十多篇，国子监司业苏源明为这部书起名叫《会粹》。郑虔善长画山水，好书法，常苦于没有纸张，当时慈恩寺里存放着好几屋子柿树叶，于是他每天去拿些柿叶回来练习书法，时间久了，几屋子柿叶几乎都被他写遍。他曾经书写自己的诗作和绘画献给皇帝唐玄宗，玄宗在他的书画上用大字题写：“郑虔三绝。”并升他为著作郎。

安禄山反叛，派张通儒劫持百官往东都洛阳，任郑虔为水部郎中，他声称自己患有风湿病，不胜任水部郎中之职，请求掌管市场条令，他乘职务之便，把奏章秘密送到唐玄宗所在的灵武。叛贼被平定以后，郑虔和张通、王维一起被囚禁在宣阳里。这三个人，都长于绘画，中书令崔圆让他们彩绘自家墙壁，郑虔等人怕被处死，极力请求崔圆解救，终于免去死罪，郑虔被贬降为台州司户参军，王维只是降级处分。过了几年以后，郑虔死去。

郑虔的学问，长于地理，各地山川的险易，地方特产，守兵的多少，他都了解得很详细。他曾写了一本《天宝军防录》，文字简练，叙事详尽，读书人都佩服他善于写书，称他

为“郑广文”。他虽然做官，但家中一贫如洗，他却毫不放在心里。杜甫曾赠他诗句说：“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有一个叫郑相如的人，从沧州来，以郑虔为老师，但郑虔却并不以弟子的礼节对待他，有一次郑虔问他有什么学问，郑相如回答说：“我听说孔子说过‘继承周朝的政权，千百年以后的事情我可以推知’，我也能推知千百年以后的事情”。郑虔听了，大为吃惊，郑相如接着说：“开元满三十年必将改换年号，再满十五年将天下大乱，奸臣贼子称王称帝，您老先生必将身受其侮辱，充任伪政权的官员，希望您坚持节操，可以避免祸害。”郑虔又问：“你自己的命运怎么样呢？”郑相如回答说：“我将当三年官，死于衢州。”当年郑相如考中进士，任信安县尉。过了三年，郑虔向吏部官员打听郑相如的情况，郑相如果然死去，因郑虔记住了郑相如的话，终于没有跟叛贼跑。

（魏连科 译）

【原文】

郑虔，郑州荥阳人。天宝初，为协律郎，集掇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庀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初，虔追述故书可记者得四十余篇，国子司业苏源明名其书曰《会粹》。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

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

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维止下迁。后数年卒。

虔学长于地理，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戎众寡无不详。尝为《天宝军防录》，言典事该。诸儒服其善著书，时号郑广文。在官贫约甚，澹如也。杜甫尝赠以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云。

有郑相如者，自沧州来，师事虔，虔未之礼，间问何所业，相如曰：“闻孔子称‘继周者百世可知’，仆亦能知之。”虔骇然，即曰：“开元尽三十年当改元，尽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僭伪官，愿守节，可以免。”虔又问：“自谓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进士第，调信安尉。既三年，虔询吏部，则相如死，故虔念其言，终不附贼。

杨凝式传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

【说明】杨凝式（公元 873—954），字景度，号虚白、希维居士，或称癸巳人、关西老农，华阴（今陕西属县）人。唐相杨涉之子。杨凝式于唐昭宗时中进士，后历仕五代梁、唐、晋、汉、周五朝。在唐、后梁易代之际，杨凝式恐招祸，佯装疯癫，因此人称之为“杨疯子”。他虽然历仕五代，但并未受到重用，且不时以“心疾”免官。因他有才气声望，又善于以疯病保护自己，虽然处于政局动荡、政权不断易手的政局中，却能免祸寿终。

杨凝式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远学二王，近师欧阳询、颜真卿，形成自己遒劲纵逸的书风，在当时就影响很大，洛阳的僧寺道观，杨凝式题壁殆遍，他的片语只字，人们都加以珍藏。当时人把他与颜真卿并列，称为“颜、杨”。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宋元名家。明人董其昌以为，“宋四大家（苏、黄、米、蔡）并从杨少师津逮以造鲁公之室”。其中黄庭坚曾作诗称颂杨的书法：“谷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他传世的书法作品有《韭花贴》、《夏热贴》、《神仙

起居法》等。

杨凝式，华阴县人。他的父亲杨涉，在唐朝末年梁代初年，曾两次为台阁大臣，罢相后任为仆射，死于任上。杨凝式身体瘦小，却非常精神，非仕被任为度支巡官，又升为秘书郎，任职史馆。后梁开平年间，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三川太守，齐王张宗奭一见到他就满口嘉赏，请他的原职充任留守巡官。后梁丞相赵光裔一向重视杨凝式的才华，推荐他任集贤殿直学士，后改为考功员外郎。

后唐同光初年，任他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因他神经有毛病，改任为给事中、史馆修撰，掌管史馆事务。后唐明宗即位，任他为中书舍人，又因犯神经病不能上朝而罢官。长兴年间，历任右常侍、工部侍郎，仍以旧病被免官，改任秘书监。清泰初年，升任兵部侍郎。后唐末帝率军驻扎在怀覃，杨凝式跟随在皇帝身边，不时因神经病复发在军营中大吵大闹，末帝因他有才有名，原谅了他，把他送回洛阳。

后晋天福初年，改任他为太子宾客，不久以礼部尚书的官衔退休，在伊水、洛水之间闲住，任意发疯发癫，得罪了不少人，从郡太守以下，人们因他有高才又是老资格，没人去责备他。后晋开运年间，宰相桑维翰知道他没有薪俸收入，吃饭也成了问题，上奏朝廷，任他为太子太保，在洛阳设立分支机构。后汉乾祐年间，历任少傅、少师。后周太祖郭威专擅军政，杨凝式在军营外等候郭威接见，诉说年岁已老不能再管日常事务，郭威为此上奏皇帝，免去他的日常杂务。后周广顺年间，上书请求去任，不久以右仆射的官衔准予退休。

显德初年，改任左仆射，又改任太子太保，二任都是闲居在家，不管政事。显德元年冬天，杨凝式死于洛阳，时年八十五岁。朝廷赠给他太子太傅的荣衔。

杨凝式擅长作诗，又长于书法，洛川寺观的蓝墙红壁之上，遍是他的题字。当时人因他放纵怪诞，称之为“疯子”。

【原文】

（魏连科 译）

杨凝式，华阴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罢相守左仆射卒。凝式体虽藁眇，而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唐昭宗朝，登进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迁秘书郎，直史馆。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三川守，齐王张宗奭见而嘉之，请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赵光裔素重其才，奏为集贤殿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

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寻以心疾罢去，改绘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复以心疾不朝而罢。长兴中，历右常侍、工部侍郎，以旧恙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怀覃，凝式在扈从之列，颇以心恙喧哗于军砦，末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洛。

晋天福初，改太子宾客，寻以礼部尚书致仕，闲居伊、洛之间，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责也。晋开运中，宰相桑维翰知其绝俸，艰于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汉乾祐中，历少傅、少师。太祖总政，凝式候于军门，且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诉，太祖特为奏免之。广顺中，表求致政，寻以右仆射得请。显德初，改左仆射，又改太子太保，并悬车。元年冬，卒于洛阳，年八十五。诏赠

太子太傅。

凝式长于歌侍，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

蔡襄传

——《宋史》卷三二〇

【说明】蔡襄（1012—1067），字君谟，仙游县（今福建省属县）人。中进士居，历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直史馆等职，又外任为福州、泉州、杭州等地知州、端明殿学士。蔡襄为人厚重正直，上书言事，敢于申张正义，斥责奸邪，与朋友交往，讲究信义，笃于友情。为官尽职尽责，精于吏事，处理政务，明快果决。因不为奸邪所容，屡被排挤外任。

蔡襄是北宋的书法名家，宋四大家之一。他的书法被称为当时第一。他远学王羲之，近师虞世南、颜真卿，以小楷、草书见长，正书端重沉着，行书流畅婉转。传世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书迹有《谢赐御书侍》、《与杜长官帖》、《董精帖》、《精茶帖》等多种。

蔡襄字君谟，是兴化军仙游县人。中进士后，被任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上书议论朝政而被贬官，余靖上书营救，尹洙请求和范仲淹一起贬降，欧阳修写信给司谏高若讷，指责他作为谏官不能为范仲淹辨白，因此余靖、尹

诛、欧阳修都被贬降。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进行讽刺，京师人互相传扬，书商印刷发卖，发了大财。正逢契丹的使臣来京师，将此诗买回，张贴在幽州公共场合。

庆历三年，宋仁宗更换了宰相，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王素为监察官，蔡襄又写诗祝贺，余靖、尹洙、欧阳修三人推荐蔡襄，皇帝即命蔡襄为知谏院官。蔡襄为言路大开而高兴，但担心正派的大臣立足不稳，于是向皇帝上书说：“朝廷为了加强谏官的力量，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同一天被任命，朝野上下纷纷祝贺。但任命谏官不难，虚心听取谏官的言论则比较困难；如果说虚心听取谏官的言论也并非难于做到的话，那么把谏官的言论付之于实践就难于做到了。这三个人，忠心耿耿，刚正不屈，一定能够做到知无不言。我担心那些奸邪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一定会编制出种种抵制的说法，我以为他们的抵制说法，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诬蔑三人‘好名’。忠臣引导君主推行先王之道，议论政事，唯恐不尽善尽美，如果为避好名的嫌疑而闭口不言，那么泥像木偶也可以做谏官了。二是说他们为了进身升官。前代谏官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由于激于忠讲义愤，遇上昏乱世道，就是进言而死，尚且不回避，哪里谈得上进身升官呢？近世对谏官提拔太快，如长时间任谏官，不予提拔，他们就是死在这个职位上，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三是说他们张扬了君主的过失。谏臣的职责，就是查举不合适的言行，君主能听从，从而改正，这是以给君主带来从谏如流的声誉，怎么能说是张扬君主的过失呢？至于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不是这样，某种事情说出来就会得罪人，则闭口不说，选择不得罪任何人的

事情，不时发一点议论，如果他的议论没有得到实施，事后他会说，我早就议论过这件事，这才叫为了博取好名声。在职而当说不说，默默无闻，处理政事无可无不可，不尽职责而毫无愧色，熬资历升级，直至大官显位，这才叫为了进身升官。君方有过失，不在未形成以前去纠正，使君主的错误流传开去，传至后代，事情没法再掩盖，这才叫张扬君主的过失。希望陛下您仔细考虑，不要只有喜欢纳谏的名声，而没有从谏的实际行动。”

当时出现旱灾、蝗灾、日食、地震等灾害，蔡襄认为：“灾害的发生，都是政事的失误造成的。几年以来，天象屡屡发出警告。推究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失误。君主处理政事不单独决断，大权不独揽，这样发出的号令没有威信，朝廷的恩惠下层百姓沾不上，这是陛下您的过失。掌握天下的大权，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没有好主意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不尽忠竭力以不辜负职位，这是大臣们的过失。朝廷的弊政得不到纠正，百姓们的疾苦得不到解除，陛下优柔寡断得不到规劝，大臣们因循无所做为得不到斥逐，这是我们谏官的罪过。陛下您已经说过自己有过失，这话天地听到了，希望付之实际行动。”他的奏章写出来之后，听到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蔡襄进升为直史馆之职，兼任记述皇帝的起居言行的职责，他更加尽职尽责，议论政事，没有任何顾忌。开宝寺的佛塔发生火灾，佛塔下埋有佛骨，皇帝下令把佛骨迎进宫中，很多宫女太监，信奉佛法，烧灼臂膀，剃去头发。正在议论修复佛塔，蔡襄劝戒说：“非份的好处，不能侥幸获得。现在

百姓困苦不堪，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傲慢无理，陛下您应该关心人民的疾苦，怎么能专信佛法？有人说佛骨会放光芒，说得神乎其神，它居住的佛塔尚且无力保护，它还能有什么神秘力量？上天降下灾害，进行警告，如果大兴土木，那是用人力来抗拒天意啊。”

吕夷简任平章军国重事，掌握最高权力，宰相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到他城里商议朝政，蔡襄请求罢免吕夷简。西夏元昊归顺朝廷，起初他自称“兀卒”，后来音译为“吾祖”。蔡襄说：“‘吾祖’即是‘我翁’，这是对大宋的侮辱，太傲慢无理了。如果朝廷给他下圣旨，也称他为‘吾祖’，这象什么话？”

夏竦被罢免枢密使之职，韩琦、范仲淹被任为枢密使，蔡襄上书说：“陛下您罢免了夏竦，任用韩琦和范仲淹，官员们都向朝廷祝贺，百姓们在路上唱歌跳舞，甚至饮酒高呼，以表示高兴。斥退一个奸邪的人，进用一个贤良的人才，对国家来说，真的是这样举足轻重吗？因为斥退一个奸邪的人，和他一类的人都将被罢斥，进用一个贤良人才，正派的官员都将得到提拔任用。奸邪都被斥退，贤才都得到任用，天下还能不安定吗？虽然是这样，我仍然深表忧虑。现在天下的形势，象一个病人，陛下您已经得到了医术高明的医生，如对他信任不疑，不只能治好病，而且能使天下百姓健康长寿。医生的医术虽然高明，如不能发挥他的作用，病情会日日加重，即使有医和、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

保州的守兵发生哗变，叛兵抓了十几个怯懦不敢闹事的兵卒，谎称是带头闹事的人，把他们杀死，请求朝廷招抚。蔡

襄上书说：“天下有兵卒百万，如果没有杀头严惩的法令，必然成为骄悍叛乱的先例。现在保州守兵杀害官吏，闭城自守，如果不加讨伐，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招抚，难道不被天下笑话吗？我请求领兵入城，把他们消灭。”

因为母亲年老，蔡襄请求任福州知州，朝廷改任他为福建路转运使。他到任以后，开掘出古代的五個水塘，灌溉民田，又上奏朝廷，减免五代时推行的人口税的一半。又负责撰修皇帝的起居注。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引起皇帝大怒，蔡襄上前说：“唐介诚然狂妄愚昧，但是他出于忠心，请求赦免他。”唐介被贬降为春州别驾，蔡襄又上书说，唐介贬到春州，必死无疑，于是改贬至英州。温成皇后逝世，进行追封，蔡襄请求，皇帝不必临表致祭，罢去陵墓守护官员。

蔡襄进升为知制诰，三名御史官因弹劾梁适而被解职，蔡襄不肯起草诏令。后来提拔官员，蔡襄认为不合适的人选，就原件退回，不起草任命诏书。皇帝待他更加亲厚，赏给他母亲头戴，以表示对他的亲宠，皇帝又亲笔写“君谟”二字，派使臣送给他。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蔡襄对官吏的职事非常精通，谈笑之间，就能判决疑案，揭发奸行隐恶，手下的吏员一点也欺骗不了他。

以枢密直学士的身分，再度任福州行政长官。福州人士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因行道义而著名，蔡襄以隆重的礼仪把他们请来，请他们教郡学生员读经。福州的风俗，丧事讲究排场，亲人去世，秘不发丧下葬，却请佛僧为亲人超度，以致为此而破产，蔡襄下令禁止此种陋习。转任为泉州行政长官。距州治二十里外的万安渡，被海水阻隔，行人往

来，渡海才能到达，渡海又十分危险。蔡襄用石头造桥，桥长三百六十丈，在桥墩根部繁殖牡蛎，以加固桥墩，至今人们往来，仍依靠这道桥梁。又在七百里长的道路两旁种植松树，保护路基，遮蔽阳光，福建人立碑纪念蔡襄的功德。

朝廷召蔡襄进京，任为翰林学士、三司使，他精心计算国家财赋的盈亏收支，量力为出。剔除蠹耗国家财物的积弊，他制定的财务，制度等条例，都可供后人效法。

宋英宗生病，皇太后处理朝政，蔡襄对辅政大臣说：“逝世的皇帝已经确立皇太子，宫内的太监宫女等对他百般迷惑，那些知名的亲近大臣也这么干，差一点坏了国家大事，我已准备好奏章了。”很快外边就传说蔡襄将有所议论，英宗听到以后，对蔡襄产生怀疑。正逢蔡襄多次请假，于是就选人代替蔡襄。蔡襄请求任杭州知府，于是朝廷封他为端明殿学士，赴任杭州。治平三年，蔡襄为母守孝。第二年逝世，时年五十六岁。追赠他为吏部侍郎。

蔡襄工于书法，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宋仁宗尤其喜欢他的书法，皇帝撰写《元舅陇西王碑》文，令蔡襄书丹刻石。又让他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说：“这是待诏职责范围之事。”不服从命令。蔡襄对朋友讲求信义，朋友去世，自己不吃酒肉，设置灵位，痛哭拜祭。他曾赴会灵东园的宴席，坐上客射箭玩耍，误伤了人，有人硬说是蔡襄误伤了人。后来皇帝问他这件事，蔡襄叩头请罪，始终不进行辨白。

蔡京和他是同乡但入仕较晚，蔡京想攀附名门，自称是蔡襄本族弟弟。政和初年，蔡襄的孙子蔡佃参加殿试，宣布名单时，蔡佃名列第一，蔡京在殿上为考试官，因蔡佃是他

本族的孙辈，为避嫌疑，把蔡佃降为第二名，因此蔡佃一生怨恨蔡京。乾道年间，赠蔡襄谥号为“忠惠”。

（魏连科 译）

【原文】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庆历三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过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难言则暗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此之谓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躋资累级，以挹显仕，此之谓好进。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时有旱蝗、日食、地震之变，襄以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不颦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无嘉谋异画以矫时弊，不尽忠谒节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过之言，达于天地神祇矣，愿思其实以应之。”疏出，闻者皆悚然。

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职论事，无所回挠。开宝浮图灾，下有旧瘞佛舍利，诏取以入宫，宫人多灼臂落发者。方仪复营之，襄谏曰：“非理之福，不可缴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工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

吕夷简平章国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襄奏请罢之。元昊纳牧，始自称“兀卒”，既又译为“吾祖”。襄言：“‘吾祖’犹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赐之诏，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

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切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求，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

保州卒作乱，推懦兵十余辈为首恶，杀之以求招抚。襄曰：“天下兵百万，苟无诛杀决行之令，必开骄慢暴乱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闭城门，不能讨，从而招之，岂不为四方笑？乞将兵入城，尽诛之。”诏从其议。

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唐介击宰相，触盛怒，襄趋进曰：“介诚狂愚，然出于进忠，必望金贷。”既贬春州，又上疏以为此必死之谪，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册，请勿立忌，而罢监护园陵官。

进知制诰，三御史论梁适解职，襄不草制。后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益厚，赐其母冠帔以示宠，又亲书“君谟”两字，遣使持诏予之。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

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以行义著，襄备礼招延，诲诸生以经学。俗重凶仪，亲亡或秘不举，至破产饭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

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划除蠹敝，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

英宗不豫，皇太后听政，为辅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荧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几贩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论议，帝闻而疑之。会襄数谒告，因命择人代襄。襄乞为杭州，拜端明殿学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

忧。明年卒，年五十六。赠吏部侍郎。

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尝饮会灵东园，坐客误射矢伤人，遽指襄。他日帝问之，再拜愧谢，终不自辨。

蔡京与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阀，自谓为族弟。政和初，襄孙佃廷试唱名，居举首，京侍殿上，以族孙引嫌，降为第二，佃终身恨之。乾道中，赐襄谥曰忠惠。

李建中传

——《宋史》卷四四一

【说明】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号岩夫民伯。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后迁居四川。中进士后，历任大理评事，著作佐郎、殿中丞、州通判、知州、太常博士等官。因他曾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任职，人们称他为“李西台”。李建中生值五代宋初，饱受战乱之苦。他自幼好学，刻苦自励，少年丧父，以游学奉养母亲。为人性格闲雅，淡于荣利。

李建中是宋初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得欧阳询笔意，书风遒劲凝重，有唐人神韵，人称他的书法“能风轨魏晋，扫却尘俗”，书法名家黄庭坚对李建中也很推重。存世书迹有《同年帖》、《土母帖》等。

李建中字得中，他的祖先是京兆人。他的曾祖父李逢，在唐代任左卫兵曹参军。祖父李稠，五代时任梁朝商州刺史，因躲避战乱，搬家至四川。王建在四川称帝，李稠是开国功臣，任为左卫将军。李建中从小就好学，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四川平定后，他居住在洛阳，奉养母亲，凭讲学的收入维持生活。他携带自己的文章去京师汴梁，被王佑赏识，替他广造

声誉，在石熙载家中教家馆，石熙载给他的待遇很丰厚。

太平兴国八年中进士高等，起初投官任大理评事，又任岳州录事参军。转运使李惟清推荐他才能出众，又升为著作佐郎，又任监潭，州茶场官，改任殿中丞，历任道、郢二州通判。柴成务任漕运使，一再上书推荐他，因而转任太常博士。当时有些官员，因向朝廷建议如何能多收财物而得以升官，李建中向朝廷上书，则陈述政事的得失，献上强国的策略，宋太宗对他的建议很赏识，召他在便殿问话，赏给他绯鱼袋。当时正逢考察在京的官员，李建中过去曾为公务被罚款，这件事泄露出来，因此降他为殿中丞之官，监在京榷易院。苏易简被皇帝重用，经常召他问话，曾说起四川的文人学士，谈到李建中，宋太宗平时也了解李建中其人，于是任命他为昭文馆直学士。李建中的父亲名叫昭文，为避父讳，他诚恳辞去昭文馆职务，改为集贤院学士。任职几个月，外任为两浙转运副使，再升任主客员外郎，历任河南府通判，曹、解、颖、蔡四州知州。景德年间，因他在外任官时间长久，晋升为金部员外郎。

李建中性格恬静，神情儒雅清秀，不热心功名利禄，他前后三次请求去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任职，他非常喜爱洛阳的风土人情，他在洛阳建造起园林池塘，起名叫“静居”。他喜爱作诗，每次出外游山玩水，都题诗留念，自称为岩夫民伯。朝廷给他加衔为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李建中擅长道家的修身养性之术，当时朝廷派官校定《道藏》，李建中就参预其事。又任太府寺判。大中祥符五年冬天，朝廷任命他为使臣，去泗州致祭，他携带皇帝所作的《汴水发愿文》，在泗

州设立道场，祭祀汴水之神。奉使回京，便生了病，第二年去世，时年六十九岁。

李建中擅长书法，行书造诣最深，他创出多种多样的行书体势，草书、隶书、篆书、籀书，八分书也称妙一时，很多人临摹他的字体，以他的书法作品为习书的范本。他曾亲笔抄写郭忠恕的《汗简集》，呈送给皇帝，都是蝌蚪古文，受到皇帝的嘉奖。他好古勤学，收藏了大量的古器物 and 名画。著作文集三十卷。

他的儿子李周道、李周士都考中进士。李周士历任侍御史、江东陕西转运使、三司盐铁判官，得到皇帝金鱼袋、紫衣的赏赐，最后任工部郎中。李周民，官至太子中舍。

【原文】

（魏连科 译）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卫兵曹参军。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会王建僭据，稠预佐命功臣，左卫将军。建中幼好学，十四丁外艰。会蜀平，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携文游京师，为王祐所延誉，馆于石熙载之第，熙载厚待之。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岳州录事参军。转运使李惟清荐其能，再迁著作佐郎，监潭州茶场，改殿中丞，历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务领漕运，再表称荐，转太常博士。时言事者多以擅利进。建中表陈时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赏，因引对便殿，赐以绯鱼。会考课京朝官。建中旧坐公累罚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监在京榷易院。苏易简方被恩顾，多得对，尝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宜昭文馆。建中父名昭文，恳辞，改集贤院。数

月，出为两浙转运副使，再迁主客员外郎，历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颖、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攻进金部员外郎。

建中性简静，风神雅秀，恬于荣利，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自称岩夫民伯。加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养之术。会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预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制《汴水发愿文》，就致设醮。使还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

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于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蝌蚪文字，有诏嘉奖。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有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并进士及第。周士历侍御史、江苏陕西转运、三司盐铁判官，赐金紫，终工部郎中。周道，太子中舍。

米芾传

——《宋史》卷四四四

【说明】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据说他的祖先是西域人，后世代居住在太原，义迁居襄阳，最后定居在江苏镇江，因此称他是吴郡人。米芾的一生，官运不通，只作到州县级的小官。

米芾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法，师承王献之，书风清逸俊放，不拘一格，自成一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北宋四大家。他的画，以山水人物见长，特别善于画山，被称为“米家山”。同时，他还精于鉴赏，曾为内府鉴别字画文物。传世书作多种，如《苕溪诗》、《虹县诗》、《蜀素》、《向太后挽词》等，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诗录》、《山林集》等。

他的儿子米友仁，字元晖，能继承父业，善书画，精于鉴赏，曾长期在内府鉴别书画。

米芾字元章，吴郡人。因他母亲曾在王府中侍候过宣仁皇后的关系，米芾补官为浚县尉。后历任雍丘县、涟水军的行政长官，太常博士，无为军行政长官。奉召进京，任为

书画学博士，曾进宫被皇帝召问。他献上他儿子米友仁所画《楚山清晓图》，升任礼部员外郎，外任为淮阳军行政长官。死时四十九岁。

米芾的文风，以奇险制胜，不因循前人的文章路数。他的书法，独妙一时，书风沉着飞动，颇得王献之用笔的奥妙。他的山水人物，也自成一家。他尤其擅长临摹，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他还精于书画文物的鉴别，看到古代的器物书画，千方百计追求，得到后才罢手。王安石曾经摘他的诗句书写在扇面上，苏轼也出于喜受他的书画而加以赞扬。他的服装摹仿唐朝人式样，举止风流潇洒，说话声音清亮，他无论走到那里，都会招来人围观。但他有爱干净的嗜好，甚至不和别人共用脸盆毛巾。他的所作所为，神秘怪异，经常被人们传为笑话。无为州衙门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形状极为难看，米芾看到，却喜出望外，说道：“这块石头真值得我参拜！”于是穿得衣帽整齐，向石头行礼，并称石头为兄。他的为人，不能随波逐流，所以官运不通，学沦下僚。曾奉皇帝的圣旨摹仿《黄庭经》的笔法书写周兴嗣的《千字文》。又曾获准进入宣和殿内观摹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人们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恩宠。

他的儿子米友仁，字元晖，刻苦学问，嗜好古文物，也擅长书法绘画，世人称他为“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学士。

【原文】

（姚汉荣译）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浚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

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譎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臣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尝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

子友仁字元晕，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赵秉文传

——《金史》卷一一〇

【说明】赵秉文（1158—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省磁县）人。金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他曾上书认为应罢免宰相胥持国，得罪，牵连王庭筠等人下狱，为士大夫所耻。赵秉文是金朝末期文坛盟主，诗文名满天下。他的诗气势奇伟纵放，而不拘格律，文长于析理，而不守程式。著述很丰，多不传，存世有《滏水集》三十卷。

他也是金朝著名书画家，“字画工夫最深，诗次之，又其次散文也。”（见《归潜志》）他的书法初学王庭筠，后学李太白、苏东坡，及其晚年，书艺大进，与王庭筠齐名。可惜书画没有留传下来。

赵秉文字周臣，是磁州滏阳县人。从小就很聪明，开始读书，就好象以前早就读过一样。他考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任安塞县主簿，因政绩优秀，升任邯郸县令，又改为唐山县令。父亲逝世在家守孝，因他人推荐，起用他为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入京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认为宰相胥持国应该罢免，宗室完颜宗贞可任此要职。金章宗向他询问，他的回答与上书的内容颇不一致，于是章宗命大兴府知府人完颜膏等人来审讯。赵秉文起初不肯招认，追问他的奴仆，才一一说出他所交往的人，这时赵秉文才承认：“当初想上书，曾和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人私下商议过。”于是王庭筠等人都被逮捕入狱，分别轻重被判刑和处罚。有关部门论劾赵秉文上书内容虚妄，按照法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皇帝不想用言论而加罪于人，于是特予宽免。当时人针对赵秉文的行为编了几句顺口溜：“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进言，不惜一死，秉文进言，出卖友人。”士大夫认为赵秉文的行为是可耻的。因此，他长时间在家闲居，废而不用。后来起用为同知岢岚等州事，又转任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季十月，一连几天出现阴晦天气，白日昏暗，宰相张万公入宫应对，章宗注视着张万公说：“你说白日昏暗，就好象人君用人邪正不分一样，这话很有道理。如赵秉文这个人，以前因上书遭到贬降，听说他很有文采，又擅长书法，而且敢于说话。对此，我并不想弃之不用，因为北部边境上战事刚起，姑且考验一下他罢了。”泰和二年，征召他为户部主事，又升任翰林修撰。这年十月，又外任为宁边州刺史。泰和三年，改为平定州刺史。前任州刺史用刑苛毒，每当他听说大赦令将到，先把抓获的盗贼打死，然后再拜受大赦文书，因而盗贼越来越多。赵秉文行政一切从宽从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盗贼都销声匿迹了。灾害之年，他拿出自己的禄米号召富民赈救灾民，救活了很多

人。

大安初年，北方蒙古兵南下，朝廷召见赵秉文和待制赵资道商议备边的策略。赵秉文说：“现在我军聚集在宣德，宣德城很小，军队在城外扎营，到了伏天，雨水会把兵械淋坏，人也容易生病，等到秋天敌人来攻，那将是非常不利的。应派临湟的军队直捣敌人空虚的老窝，那么敌人对山西的包围就可以解除，兵法上说‘出其不意，攻其必救。’就是这个道理。”他的建议，卫王不采纳。这年秋天，果然报来宣德失败的消息。不久，赵秉文被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转为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年，赵秉文建言，有三项时政可以付诸实行：第一是迁都，第二是疏导黄河，第三是分封诸王。这三件事，朝廷大都实行了。第二年，他上书朝廷，表示愿意为国治理好一个残破州，以此来体现朝廷关心百姓疾苦的用心，他说：“陛下您不要认为文弱书生不懂军事，颜真卿、张巡、许远等人舍身为国，这些人也是书生啊！”他又说：“如果我不惜一死而对国家有益，总比白白消耗国家的俸禄成为无用的人要好。”宣宗说：“你的志向固然可敬，但是翰林院还难找到合适的人，你是博学大儒，应留在我身边。”没有准许他的请求。

贞祐四年，任赵秉文为翰林侍讲学士，他上书说：“纸币宝券之所以流通困难，是因为朝廷刚刚议论要改货币，市面上已经哄传宝券将要废弃不用，因而一再贬值，渐至被废弃。我认为应成立回收兑换机构，让皇帝身边懂得市场物价的官员主管，拨给该机构银币、粟麦、缣帛之类的物品，权衡价值的高低加以兑换。”皇帝命有关部门计议施行。

兴定元年，赵秉文转任侍读学士，又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主持科举取士，因录取进士卢亚偏重用韵获罪，官降二级，赵秉文因而请求退休。金朝从泰和、大安以后，科举文章的弊病越来越严重。因主持科举的官员只知按死格式衡量，故而所取中的文章，内容简陋，观点陈腐，只是符合格式罢了，如果文章稍稍有新奇的观点或稍有些棱角，总会被扔到一边，于是文风大为衰败。贞祐初年，赵秉文主持省试，发现李献能所作的赋，虽然格律稍有疏失，但文词颇为典丽，选拔李献能为第一。于是举子们大肆喧哗，向上级告状，以为赵秉文严重地破坏了试文的规矩，并作诗进行诽谤，闹了好长时间才平息下来。不久，李献能又考中宏词科，进入翰林院。但赵秉文却因此而得罪。

贞祐五年，赵秉文再次任礼部尚书，在他进宫谢恩时，宣宗对他说：“你岁数已经大了，因主持考试，故而再次起用你。”赵秉文因受到皇帝的厚爱，无从报效，他希望朝廷广开言路，采纳忠言，以增益圣上的心智，因而他每次朝见皇帝时都专向皇帝陈述：人主应当节俭、勤政，用兵用刑要慎重，以此来祈求上天，永保全国的江山。皇上愉快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哀宗皇帝即位，赵秉文再次请求退休，皇帝不答应。改任他为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赵秉文鉴于哀宗即位不久，应该经常接触经史以加强自我修养，于是他进呈《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

正大九年正月，由于元兵进逼，汴京戒严，哀宗命赵秉文起草大赦文告，以宣示圣上悔悟、哀痛的心意。赵秉文据

事说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元兵退走以后，大臣们想向皇帝表示祝贺，让赵秉文起草贺表，赵秉文说：“《春秋》上记载：‘新宫发生大灾，鲁成公哭祭了三天。’现在祖宗的陵墓成为这个样子，按照礼仪的规定，应该表示慰问，不应祝贺。”于是作罢。当时赵秉文年事已高，天天为国家大事而忧虑，连吃饭时也不能忘怀。每当他听到某一件事可以便利百姓，某一士人可以提拔任用，大事则上疏皇帝，小事则向当权的大臣面述，他的态度诚恳，表情严肃，自己也不能控制。三月，他起草的《开兴改元诏》，街头巷尾都能背诵，洛阳百姓按拜诏书后，满城一片痛哭的声音，他的文章如此感人肺腑。他于当年五月壬辰逝世，时年七十四岁，历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年间，他和杨云翼撰述《龟鉴万年录》，进呈给皇帝。又因他向皇帝讲解经史，和杨云翼一起收集自古以来有关治世之道的文字，编成《君臣政要》一书进呈。赵秉文从幼年直到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著有《易丛记》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他所著的文章集为《濠水集》三十卷。

赵秉文的文章，长于理论分析，把要说的话尽后，便戛然而止，不受文章格式之类的束缚。他的七言长诗，气势纵放，不拘一格；律诗雄伟典丽；短诗非常精妙，多为近体诗；至于五言古诗，诗意深沉蕴籍，声调抑扬顿挫。他的字画，草书尤其刚韧奔放。朝廷的使臣从河、湟地区回来的，很

多人反映：西夏人问及赵秉文和王庭筠的生活情况，他是这样受四方人士的敬重。

赵秉文为人，非常诚恳，平易近人，和朋友交往，从不摆架子，向来不以名人自居。他历事五朝，官至公卿，但饮食服饰和贫寒的读书人没有什么两样。杨云翼曾和赵秉文相继成为文坛盟主，时人称为“杨、赵”。但他在晚年时颇以佛语自我玷污，人们也为赵秉文感到遗憾。（魏连科 译）

【原文】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投，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

闻赦将至，先赍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廩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

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

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己。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湓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

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道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党怀英传

——《金史》卷一二五

【说明】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冯翊（今陕西冯翊县）人，后定居山东泰安。大定十年成进士，历官莒州军事判官、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他曾和郝俟撰修《辽史》。据刘祁《归潜志》载：“党承旨怀英、辛尚收弃疾，俱山东人，少同舍。”以后幸南党北，俱有建树。党怀英长于诗文，工篆书籀书，当时称为第一，是金代颇有声誉的书法家，可惜书迹不见流传。

党怀英字世杰，是已故宋朝太尉党进的十一代孙，冯翊人。他的父亲党纯睦，官至泰安军录事参军，死于官任上，妻子儿女回不了故乡，于是就在泰安落户。他应试不幸而落榜，于是他摆脱世俗，尽情游山玩水。家无隔夜粮，他也安然处之。大定十年，考中进士，被任为莒州军事判官，历升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

党怀英很会写文章，又擅长篆书和籀书，在当时被称为

第一，学者都很尊崇他。大定二十九年，他和凤翔府治中郝侯担任《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赵汾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是民间收藏的辽代碑铭墓志以及各家的文集，或记述辽代史事的文字，全部送交官府。

当时，金章宗刚即位，他崇尚文辞，广求有文学才能的人才，充任文学侍从，章宗对宰相说：“翰林缺人，怎么办呢？”张汝霖回奏说：“郝侯很会写文章，政绩也很好。”章宗说：“近来起草诏书文字的，只有党怀英最好。”移刺履奏说：“进士们中试以后，只是学习政务，便不再读书，近来才留心学问了。”章宗说：“现在的进士太粗疏了，连《唐书》中所载的史事也大都不知道，我特别不喜欢。”他又对宰相说：“郝侯的诗写得很好，过去的刘迎也能写诗，李晏赶不上他们。”

明昌元年，党怀英又升为国子监祭酒。明昌二年，升为侍讲学士。第二年，朝廷计议开挖边防濠沟，党怀英等十六人请求取消这项工程，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他又升为翰林学士。明昌七年，行南郊祭天礼，党怀英代中书侍郎诵读祝文，章宗说：“读祝文念到我的名字时，声音低了些，虽然是出于对君主的尊敬，但是这是在祭祀，按照礼法是不应该的，应当平声诵读。”承安二年，党怀英请求退休，朝廷改任他为泰宁军节度使。第二年，又征召他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增加修《辽史》的编修官三名，皇帝下令，这三名官员分别担任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任他职的，可带所修书赴任。过了很久，党怀英才退休。大安三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赠谥号为“文献”。党怀英退休后，章宗命直学士陈大任继续修成《辽史》。

（魏连科 译）

【原文】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应举不得意，遂脱略世务，放浪山水间。簞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

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台中郝侯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赵汾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

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霖奏曰：“郝侯能属文，宦业亦佳。”上曰：“近日制诏唯党怀英最善。”移刺履进曰：“进士擢第后止习吏事，更不复读书，近日始知为学矣。”上曰：“今时进士甚灭裂，《唐书》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谓宰臣曰：“郝侯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

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明年，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七年，有事于南郊，摄中书侍郎读祝册，上曰：“读册至朕名，志微下，虽曰尊君，然在郊庙，礼非所宜，当平读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明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

王庭筠传

——《金史》卷一二六

【说明】王庭筠（1155—1202），字子端，辽东（今辽宁省）人。大定十六年进士，历官恩州军事判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他是金代首屈一指的书法家。他的书作，很讲究布局，字的大小位置，错落有致。赵秉文曾向他学习书法，也成为金代书法名家。王庭筠、赵沨、赵秉文三人齐名，王庭筠实出二人之上。传世书迹有《法华台帖》、《道林帖》、《游黄华诗》、《蜀先主庙碑》等。他曾和张汝方详品全内府所藏法书名画，编为五百五十卷。著有《聚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王庭筠字子端，是辽东人。他生下来不到一周岁，看书时就认得十七个字。他七岁时学作诗，十一岁时能整首写诗。稍稍长大以后，涿郡人王修只见他一面，就认为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大定六年考中进士，被任为恩州军事判官，他刚刚从政，就赢得好名声。恩州人邹四图谋造反，事情被发觉，逮捕了一千多人，但邹四却躲藏起来未被捕获。朝廷派大理司直王仲轸审理此案，王庭筠用计捕获了邹四，他分

辨出被牵连的人，判犯有预谋罪的只不过有十二个人罢了。再调任他为馆陶县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金章宗传旨于学士院，说道：“王庭筠所作的试文，句子太长，我不喜欢这样的句子，也担心四方学子仿效他。”章宗又对平章张汝霖说：“王庭筠的文采很好，但行文还不够老练，这个人才能高，改进也不难。”这年四月，征召王庭筠试馆阁职务，被选中。御史台上奏，说王庭筠在馆陶任职期间曾犯贪污罪，不应安排他在馆阁中任职，于是作罢。王庭筠定居在彰德，在隆虑县购置田地，入黄华山寺读书，因此自号为黄山人。这年十二月，章宗谈及翰林学士时，感叹人才缺乏，参知政事完颜守贞说：“王庭筠就是合适的人选。”明昌三年，朝廷征召他为应奉翰林文字，让他和秘书郎张汝方评品内府所收藏的书法、名画等级，把入选的书法、名画分为五百五十卷。

明昌五年八月，章宗对宰相说：“应奉翰林文字王庭筠，我打算把起草诏诰的任务委任给他，这样的人才是很难得的。近来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很不精美。听说文人们很妒忌王庭筠，不看他的文章如何，只抓住他的品行进行诋毁。大致说来，读书人好多嘴多舌，或相互结党。过去东汉时的儒生与宦官分别结成党派，这本不足怪。又如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他们都是读书人，而互相排斥诋毁，这也真无聊！”于是提拔王庭筠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因受赵秉文上书一事的牵累，被削夺一级，杖打六十，解除职务，这事载在《赵秉文传》中。承安二年，贬降为郑州防御判官。四年，又起用为应奉翰林文字。

泰和元年，再任翰林修撰，侍从章宗去秋猎，奉命作诗三十余首，受到章宗的嘉奖。第二年逝世，终年四十七岁。章宗一向知道他贫穷，命有关部门赠钱八十万，供丧葬费用，又搜集他一生所作的诗文，收藏于秘阁。又把亲笔诗作赏给他的家属，诗的小序中说：“王遵古，是我的老朋友，他的儿子王庭筠，因有文才被选入宫中任职，前后十年，现在已经去世，玉堂、东观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王庭筠外表清秀伟岸，善于谈笑，表面上看，有一种高贵气质，别人起初不敢接近他，和他见面以后，脸上洋溢着温和的气色，热情诚恳，对对方百般体贴，唯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别人有一点可取之处，他就满口称赞，过后虽然他人有一百个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也从不计较。和他交往的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等人，经他推荐的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等人，都成为一时的名人，因此世人称许他有知人之明。

王庭筠的文章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晚年的诗作格律严整，七言长诗尤其工于险韵。他著有《聚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他的书法学米芾，与赵沆、赵秉文都是书法名家，王庭筠尤其擅长画山水墨竹。（魏连科 译）

【原文】

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稍长，涿郡王修一见，期以国士。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即有声。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窜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轸治其狱，庭筠以计获邹四，分别诬误，坐

预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谕旨学生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张汝霖曰：“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四月，召庭筠试馆职，中选。御史台言庭筠在馆陶尝犯赃罪，不当以馆阁处之，遂罢。乃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因以自号。是年十二月，上因语及学士，叹其乏材，参政守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

五年八月，上顾谓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闻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若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迁庭筠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赵秉文上书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职，语在《秉文传》。二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四年，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馀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贫，诏有司贖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又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

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

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御、李公度，其引荐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

为文能通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聚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沔、赵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麻九畴传

——《金史》卷一二六

【说明】麻九畴（1183—1232），字知几，易州（今河北省属县）人。金正大初年特赐进士及第，历任太常寺太祝、权博士，应奉翰林文字。麻九畴自幼聪明，三岁识字，七岁能作草书，当时有神童之称。后博学经史，长于《易经》，知术数，善占卜算命。他诗文俱工，是当时著名文人。长于书法，“幼颖悟，善草书”，赵秉文“诗颇许麻知几、元裕之，字画颇许麻知几、冯叔献”（见刘祁《归潜志》）。可见其书法在当时颇有名。

麻九畴字知几，是易州人。他三岁时即识字，七岁时能作草书，能写数尺见方的大字，当时人视为神童。金章宗召见他，问道：“你进入宫殿，是不是感到害怕呢？”麻九畴回答说：“君臣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儿子难道会惧怕父亲吗？”章宗十分惊奇。二十岁左右进入太学，很有文名。

宋朝南渡后，他寓居鄆师、上蔡之间，后来去遂平西山读书，开始致力于古学。他博通《五经》，尤其精于《易经》、《春秋》。宣宗兴定末年，参加开封府的乡试，词赋得了第二

名，经义得了第一名。又参加南京会试，仍是词赋第二，经义第一。于是名声大振。即使是妇女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在殿试时，因有误笔而落第，士人们很为他惋惜。于是隐居不出，不再想参加科举考试。正大初年，他的弟子王说、王采苓都考中进士，哀宗以为他们小小年纪考中进士，感到很惊奇，便询问他们的学业，才知他们曾拜麻九畴为师。平章政事侯挚、翰林学士赵秉文联名推荐麻九畴，哀宗特赐他为卢亚那一科的进士。因他生病，没有任官，告假回家。后任命他为太常寺太祝，代行太常博士，不久升任为应奉翰林文字。

麻九畴生性放逸不羁，散漫随便，和别人交往，有一句话不投机，便掉头而去，不再见面。他自料终究和世人合不来，过了不久，就称病去职。他居住在鄆城，天兴元年，元兵攻入河南，他带领全家逃往确山县，被元兵捕获，把他赶往广平，生病而死，终年五十岁。

麻九畴起初因研究经学，曾学习《易经》，后来爱读邵尧夫的《皇极书》，于是便研究术数，又喜爱占卜算卦。晚年喜爱医学，和名医张子和交往，把他的医术都学到手，并且帮张子和润色他的著作。麻九畴的文章文思精密，持论稳健，诗尤其作得好。后来因避免他人的妒忌和诽谤，决心不再作诗文。明昌年间以来，有神童之称的有五人，太原人常添寿，四岁能作诗，刘滋、刘微、张汉臣，后来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只有麻九畴能有所建树，象元老大臣赵秉文这样的人物，对麻九畴也以“征君”相称，不直呼其名。（魏连科 译）

【原文】

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

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章宗召见，问：“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学，有文名。

南渡后，寓居鄆、蔡间，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儿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乃知尝师九畴。平章政事候摯、翰林学士赵秉文连章荐之，特赐卢亚榜进士第。以病，未拜官告归。再授太常寺太祝，权博士，俄迁应奉翰林文字。

九畴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迺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居鄆城，天兴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确山，为兵士所得，驱动广平，病死，年五十。

九畴初因经义学《易经》，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复之术。晚更喜医，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为文精密奇健，诗尤工致。后以避谤忌，持戒不作。明昌以来，称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寿四岁能作诗，刘滋、刘微、张汉臣后皆无称，独知几能自树立，耆旧如赵秉文，以征君目之而不名。

巛巛列传

——《元史》卷一四三

【说明】巛巛（1295—1345），字子山，号恕叟，康里（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因他是色目人，在元代，比汉人和南人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他的父祖又是元朝的开国功臣，这对于巛巛的入仕，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巛巛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又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宦途得意，自承直郎直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大都在皇帝身边任职，颇受宠幸。巛巛本人，又多才艺，未沾染贵胄公子恃势傲物的习气，喜欢读书人，加上自己的优越条件，自然成为读书人的宗主。

巛巛是元代著名书法家，以行书、草书见长，他的行草书，出规入矩，圆润流畅，如行云流水，线条优美，令人赏心悦目。传世书迹有《渔父辞》、《颜鲁公论书帖》等。

巛巛字子山，姓康里氏。他的父亲不忽木，本书另有传记。他的祖父叫燕真，在元世祖手下任职，跟随世祖南征北战，建立战功。巛巛自幼在国立学校读书，他博览群书，通晓各书的精义，关于修身养性学说，他从许衡那里学来或得

自父兄的家传。他长大成人以后，袭封了宿卫之职。他神情凝重高迈，品行高洁，人们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是贵家子弟。他议论政事，英气勃发，手捻胡须，侃侃论辨，即使是诤谏名臣也超不过他。

起初任官为承直郎、集贤殿待制，升为兵部郎中，转任秘书监丞。他曾奉命去泉州稽察舟舶，对于珍珠、犀角之类的物品，看作草木一样，不肯正眼看一下。后改任为金太常礼仪院事，升任监察御史，又开河东廉访副使。还未赴任，又改为秘书太监，升任侍仪使。不久又提升为中书右司郎中，又升集贤殿直学士，转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升任礼部尚书，监察群玉内司。

巉巉能以身作则率领部下。元朝的制度，音乐舞蹈等机构属礼部管辖，遇上礼部公共宴集，各种歌舞艺人来演奏助兴。巉巉面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他的下属各官，也都正襟危坐，不敢有轻浮举动。升任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仍旧兼任。不久，又兼任经筵官，再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还没有上任，仍留在京城。又升任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然兼任经筵官。升为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又升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任命他为浙西廉访使，又留在京城，仍任大学士、知经筵事。不久，又任他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起初，元文宗励精图治，想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巉巉曾选取圣贤的格言在皇帝身边讲解，收效很大。元顺帝即位之后，除掉专权的奸臣，想重新整顿社会的风气。巉巉担任给皇帝讲解经书的经筵官，经常劝皇帝致力于经学，皇帝经常

亲自去巉巉那里听取讲述，并且想以师礼相待，巉巉认为万万不行。凡是《四书》、《六经》中所记载的治国方略，他为皇帝条分缕析地进行讲解，一定要使皇帝内心省悟、完全理解了经书的内容后，才肯罢手。象柳宗元的《梓人传》、张商英的《七臣论》，他尤其喜欢讲说。他曾在皇帝面前极力陈述张商英所说的七位臣子的事迹，左右在场的人，都为之吃惊，继而表现出嫉妒的神色，但这些人一向了解巉巉为人正派，就不再怪罪他了。皇帝在闲暇之日想流览一下古代的名画，巉巉就拿出郭史恕画的《比干图》请皇帝看，并说商王不爱听忠臣的劝戒，因此才亡国。有一天皇帝看宋徽宗的画，并连连说好。巉巉乘机说道，宋徽宗多才多艺，只有一件事他不会，皇帝问他是哪一件事，巉巉回答说：“他只是不会当君主罢了。自身受到侮辱，国家灭亡，都是因他不会当君主的结果。君主重要的是要学会当君主，其他的事情都不必去追求。”如遇上自然灾变，必面带忧愁的脸色，便乘机对皇帝说：“上天仁慈，爱护君主，所以才用灾变进行警告。好比慈爱的父亲对待他的儿子，出于爱护他，才对他进行教育劝戒。儿子如能敬重孝顺父亲，那么父亲的满腔愤怒，必然烟消云散。君主如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上天必然会转怒为喜。”皇帝觉得他的态度诚恳，虚心听取。特别赏给他宴会服装九套以及玉带、钱币等，以表彰他的忠直。

巉巉曾对人说：“天下的政事，宰相应该向皇帝陈述，宰相如没有机会陈述，则由谏官向皇帝陈述，如谏官不敢陈述，则由经筵官向皇帝陈述。我身为经筵讲官，能够在皇帝面前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当时行政的得

失利害，应该提出纠正的，他从来不保持沉默。有的大臣提出，想把前朝设置的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等机构撤销，巛巛上书说：“平民如果有了价值千金的产业，还设立家学，聘请老师，哪有富有四海的堂堂天朝，连一所学校也容不下的道理呢！”皇帝听了以后，深深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当天就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机构设置如旧，任命巛巛进行管理。他又请求设置检讨等官十六个名额，以备经筵进讲，皇帝都同意了。当时科举取士已经中止，巛巛从容地对皇帝说：“古代选取人才治理国家，必通过科举的道路，怎么能废除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恢复了科举制度。有一天他向皇帝讲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趁机陈述国家应及时撰修宋、辽、金三朝史书，时间长了，恐怕史料散失。后来设局纂修三朝史书，实际上是巛巛提议的。他又请求在国立学校里推行乡饮酒礼，让百姓懂得礼让谦逊，又请求给唐朝的刘、宋朝的邵雍封赠荣誉官衔，以表彰他们的道学和忠直品行。皇帝接受了他的请求，专门传下圣旨。

巛巛声望很高，又官居高位，但他仍如饥似渴地喜欢读书人，因此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一致以他为领袖，聚集在他的门下。有位凭借权势的蒙古大官说道：“读书人有什么好？你这样爱重他们！”巛巛说道：“世祖认为读书人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他让裕宗向赞善王恂学习。现在内府藏书中收藏裕宗临书样张，当时裕宗亲笔在学生的名字中，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习书谨呈’字样，对读书人是这样敬重。世祖曾在夜间召我的祖先来到他的床边，让我祖先讲说《四书》以及古今治乱的史实，到半夜还不睡。世祖高兴地说：‘我之

所以让你向许衡求教，是想让你把那些有益于国家的言论告诉我，你应更加敬重谨慎，不辜负我的期望。’现在你说不喜欢读书人，难道你不考虑神圣的祖宗的用意所在吗？再者，读书人所讲的道理，如果采纳实行，君主就会推行仁政，臣子就会尽忠，做父亲的就会慈爱子女，子女就会孝敬父母，这样人际关系和谐，国家也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它，人际关系不能维持，国家就会陷于混乱。如果你想把你的家庭关系搞乱，我管不着，但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话弄乱我们的国家。有的读书人看来弱不禁风，说话也好像有东西倒不出来，但他们的肚子里的学问却有过人的地方，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说得那位蒙古高官面有愧色。

后来他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又任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召还入京。当时中书平章一职空缺，皇帝的亲近大臣想推荐人，用言语试探皇帝的意向。皇帝说：“平章一职，已经有了人选，现正在赴任的路上。”近臣就知道皇帝选中的目标是巖巖，不再推荐别人。巖巖到京城七天，患热病去世，时在至正五年五月初八，年五十一岁。因为他家境贫寒，几乎没有衣物入殓。皇帝听说这种情况，深深地悲悼，赏给他家白银五锭。他家所欠公家的埋葬费用，大臣们请求用罚布款代为偿还。巖巖善长行书、草书，行家认为他的书法颇得晋人的笔意，他的片纸只字，人们竞相珍藏，不下金银宝物。朝廷给他加谥号为“文忠”。（魏连科 译）

【原文】

巖巖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传。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巖巖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

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

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奉命往覆泉舶，芥视珠犀，不少留目。改同金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廉访副使。未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寻擢中书左司郎中，迁集贤直学士，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

巉巉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木部，遇公宴，众伎毕陈。巉巉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迁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如故。寻兼经筵官，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巉巉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巉巉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欲宠以师礼，巉巉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紬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畅旨意而后已。若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尤善诵说。尝于经筵力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左右错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贤，不复肆愠。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巉巉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因言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巉巉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

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变民灾，必忧见于色，乘间则进言于帝曰：“天心仁，爱人君，故以变示儆。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必释。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诚，虚己以听。特赐只孙燕服九裘及玉带楮弊，以旌其言。

巖巖尝谓人曰：“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未尝缄默。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巖巖进曰：“民有千金之户，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令巖巖董治。又请置检讨等职十六员以备进讲。帝皆俞允。时科举既辍，巖巖从容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帝采其论，寻复旧制。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宋、金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巖巖发其端。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使民知逊悌，及请褒赠唐刘 、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

巖巖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翁然宗之，萃于其门。达官有怙势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爱之。”巖巖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尝暮召我先人坐寝榻下，陈说《四书》及古书治乱，至丙夜不寐。世祖言曰：‘朕所以令卿从许仲平学，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

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贮储有过人者，何可易视也。”达官色惭。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觐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巖巖，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贫，几无以为敛。帝闻为震悼，赐赙银五锭。其所负官中营运钱，台臣奏以罚布为之代偿。巖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

赵孟頫传

——《元史》卷一七二

【说明】赵孟頫（公元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赵宋宗室。他在南宋作过小官，宋亡后在家闲居。入元，世祖忽必烈派人去江南搜访遗贤，经程钜夫荐举，历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直至翰林学士承旨，因此后世称之为“赵承旨”，死后封为魏国公，因此又称之为“赵魏公”。赵孟頫是南人，南人在元代地位最为卑下，而且他又是宗室，虽然官阶较高，只不过是文学侍从，在政治上难有做为。

赵孟頫是元代著名艺术家，他在书法、绘画以及篆刻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其以书法见长。他精于楷书行书，远学王羲之、王献之，近学唐代的李邕，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世称“赵体”，与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楷书端庄清秀，行书圆润流畅，遒劲中多有媚趣。因其以宋代宗室而仕元，后世对其节行颇有訾议，因而对他的书法成就亦颇多微词，这是不恰当的，应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他存世书迹很多，如《洛神赋》、《道德经》、《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四体千字文》、《急就章》、《襄阳歌》

等。他的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或李成，人物，鞍马师李公麟或唐人。他主张变革南宋画院格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创了元代画风。存世画迹有《重江叠嶂》、《东洞庭》、《鹊华秋色》、《秋郊饮马》等。诗文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人称“管夫人”，亦工书法绘画，她的书法作品酷肖赵孟頫，几可乱真。他的儿子赵雍，亦擅书画，尤以绘画见长。

赵孟頫字子昂，他是宋太祖儿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他的五世祖是秀安僖王赵子偁，四世祖是崇宪靖王赵伯圭。宋高宗没有儿子，立赵子偁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宋孝宗，赵伯圭是孝宗的哥哥，皇帝赐给伯圭的宅第在湖州，因而赵孟頫就成为湖州人。他的曾祖父赵师垂、祖父赵希永、父亲赵与，都在宋朝当过大官。到了元朝，因赵孟为贵官，累次追赠赵师垂为集贤侍读学士，赵希永为太常礼仪院使，二人都被追封为吴兴郡公，赵与 被追赠为集贤大学士，追封为魏国公。

赵孟頫自幼就很聪明，看过的书就能背诵，写文章拿起笔来就能成篇。他十四岁时，因父亲的恩荫，得以补官，经吏部考试合格，调任真州司户参军。宋朝灭亡后，在家闲住，更加致力于学问。

至元二十三年，行台御史程钜夫奉皇帝之命去江南搜访隐居的人才，找到赵孟頫，带他去晋见皇帝。赵孟頫才气横溢，神采焕发，象神仙中的人一样，元世祖看到他很高兴，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位。有人说赵孟頫是宋朝皇族的子弟，不

应该把他放在皇帝身边，世祖不听。当时刚刚设立尚书省，世祖命赵孟頫起草诏书，颁布天下。世祖看了他起草的诏书，很满意，说道：“把我想说的话都写出来了。”世祖命群臣在刑部议定法律条款，很多人主张赃款达到中统钞二百贯者处死，赵孟頫说道：“起初制造纸币时，是以白银的价值为标准的，纸币是虚的，白银是实的，虚实价值相等，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纸币和白银的价值，轻重相差至数十倍之多，因此才改中统钞为至元钞，若再过二十年后，至元钞又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如果让百姓按赃钞的面值抵罪，恐怕是太重了。古代因米和绢是民生所必须的物品，称之为‘二实’，白银、铜钱和米绢等值，称之为‘二虚’。这四者的价值虽然因时有升有降，但终究不会相差太远，用绢来核算受赃的数额，最为合适。再说，纸币从宋代开始使用，只在边地郡县流通，金朝沿用，那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想用这种办法来判人的死罪，似乎是不足取的。”有人认为赵孟頫年纪轻，又刚从南方来，他敢于非难国法不便于民，心里忿忿不平，责备赵孟頫说：“现在朝廷发行至元纸币，因而犯法的人以至元钞计赃论罪，你认为不合适，难道你想破坏至元钞的发行吗？”赵孟頫回答说：“法律关系到人的身家性命，判决倚轻倚重，就会出现死不当罪的情况。我奉皇帝之命参加讨论，不敢不说。现在中统钞贬值，因而改为至元钞，若认为至元钞永远不会贬值，哪有这样的道理！您不考虑事理之必然，却想以势压人，这样行吗？”那人面有愧色。世祖本来想重用赵孟頫，但参加讨论的人却提出非难。

二十四年六月，任他为兵部郎中，兵部统管天下的驿站。

当时供应来往使臣的饮食花销，比以前多出几十倍，驿站官吏无法供应，便用强制手段向民间索取，百姓不胜其扰，于是赵孟頫向中书省申请，增加各驿的饮食用钞。至元纸钞的发行遇到困难，皇帝派尚书刘宣和赵孟頫乘驿马到江南，责问行省丞相怠慢政令的罪过，但凡是左右司官员以及各路官员，可以自行拷打。赵孟頫接受命令前去，到他回京时，没有拷打过一个人，丞相桑哥为此对赵孟頫大加谴责。

当时有一个叫王虎臣的人，他上书检举平江路总管赵全有不法行为，朝廷即派王虎臣去调查，叶李上书，认为不应派王虎臣，皇帝不听，赵孟頫进言说：“赵全的问题当然应该调查审问，但王虎臣以前曾任该地长官，他强行买下别人的很多田地，又纵恿他的门客获取不法利益，赵全多次和他争论，王虎臣怀恨在心。若王虎臣前去，必然陷害赵全，即使赵全的不法行为得以证实，人也不能没有疑问。”皇帝恍然大悟，于是派遣其他人前去。桑哥在晨钟初鸣时即坐在尚书省大堂上，六曹官员迟到后，则加以鞭打。有一次赵孟頫偶然迟到，断事官立刻拉孟頫去受刑，赵孟进入大堂申诉，右丞叶李说：“古时对士大夫不用刑，这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廉耻观念，教育他们重视节义，再说侮辱士大夫，等于是侮辱朝廷。”桑哥马上多方安慰赵孟頫，让他回去。从此以后，所鞭打的只是曹史以下的吏员。有一天，赵孟頫行经东御墙外，因道路险狭，他的坐骑跌入河里。桑哥听说以后，报告给皇帝，于是把御墙西移了二丈多。皇帝听说赵孟頫一向清贫，便赏给他钞币五十锭。

二十七年，升任集贤殿学士。这一年发生地震，北京尤

其严重，地面下陷，黑沙水喷涌而出，百姓死伤数十万，皇帝深为忧虑。当时皇帝在龙虎台，派阿剌浑撒里快马回京，合集贤、翰林两院的官员，询问发生灾害的原因。与会的人出于对桑哥畏惧，只不过泛泛地引证经典以及五行灾异等言论，笼统地提出应修人事、应天复来回答，没人敢于联系现实政治。在此之前，桑哥派忻都和王济等人统计天下的钱粮，已经征收了数百万，未征收的还有几千万，严重地损害了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自杀事件不断发生，逃往荒山野林的人，朝廷发兵追捕，谁也不敢阻止这件事。赵孟頫和阿剌浑撒里的关系本来很好，劝他奏明皇帝，赦免天下百姓，全部免除所征的钱粮，这样或许能消除天灾。阿剌浑撒里上奏，和赵孟頫所说的一致，皇帝听从了。诏书的草稿已经拟出，桑哥却大为恼火，认为这不是皇帝的本意。赵孟頫说：“凡是钱粮还没征收的民户，家里人非死即逃，空无一人，向谁去征收？如不趁这时免除，日后提意见的人如果把亏欠数千万钱粮归罪于尚书省，这对于丞相您不是个沉重的包袱吗？”桑哥恍然大悟，百姓因此才得以喘息。

皇帝曾问及叶李和留梦炎相比谁优谁劣，赵孟頫回答说：“留梦炎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为人忠厚重信义，而且非常自信，长于谋略而能决断，有大臣的器度；叶李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他的知识能力，我都具备。”皇帝说：“那么你认为留梦炎比叶李好吗？留梦炎是宋朝的状元，官至丞相，当贾似道欺骗君主贻误国事时，留梦炎则曲意逢迎讨好；叶李是个平民百姓，却能冒死进宫向皇帝上书，这样看来叶李要比留梦炎强。你因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不敢直斥他的错误，可

以写诗进行讥讽。”赵孟頫所写的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的句子，受到皇帝的赞赏。

赵孟頫出殿之后对奉御彻里说：“皇帝评论贾似道贻误国事时，责备留梦炎默不作声，现在桑哥的罪过比贾似道还严重，而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出来说话，日后怎么能推卸责任！但我只是个被疏远的臣子，我说话皇帝必然不听从，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之中，读书知理、慷慨有大节而又得到皇帝信任的，没人超过您。不顾个人身家性命，替百姓除去残国害民的贼臣，这是仁人君子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大人您一定要勉力去做！”然后彻里来到皇帝面前，历数桑哥的种种罪恶，皇帝大发雷霆，命卫士打彻里的耳光，彻里被打得口鼻流血，瘫在地上。过了一会儿，皇帝又把他叫到跟前询问，彻里的回答和原先一样。当时大臣们也有继彻里之后揭发桑哥罪恶的，于是皇帝下令将桑哥论罪处死，撤消尚书省这一机构，许多大臣因罪被罢免。

皇帝想让赵孟頫参与中书省的政务，赵孟頫坚决推辞，皇帝下令，赵孟頫出入宫门不要阻拦。他每次进见，总是不厌其详地和皇帝谈论治国之道，他的意见对处理国家政事很有帮助。皇帝问他：“你是宋太祖的后代，还是宋太宗的后代呢？”赵孟頫回答：“我是太祖的十一代孙。”皇帝说：“太祖的所作所为，你了解吗？”赵孟頫回答不了解，皇帝说：“太祖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可取之处，我都了解。”赵孟頫心想，自己如在皇帝身边太久，一定会遭到猜忌，便坚决请求外任。二十九年，他被外任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当时总管缺员，他独自主持总管府政事，政务也比较清简。有个叫元掀儿的人，

在盐场服劳役，因不堪忍受盐场的艰苦生活，乘机逃走。他的父亲找到他人一具尸体，竟然诬告一起服役的人杀害了元掀儿，被诬告的人屈打成招。赵孟頫怀疑这是一起冤案，压下来没有判决，过了一个月，元掀儿回来了，当地人都称颂赵孟頫断案如神。廉访司金事韦哈剌哈孙为人一向苛毒暴虐，只因赵孟頫不肯顺从他的意志，便借机陷害，正逢朝廷撰修《世祖实录》，召赵孟頫回京城，才得以解脱。过了很久，迁知汾州，没有赴任，皇帝传旨要他书写金字《藏经》，写完以后，升任为集贤院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又迁任泰州尹，没有赴任。

至大三年，赵孟頫被召进京，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和其他学士撰写南郊祭天的祝文，以及拟进宫殿的名称，因与其他人意见不同，便请假回家。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赵孟頫的名字，仁宗即位以后，升任他为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任翰林侍讲学士，迁任集贤侍讲学士、资政大夫。延祐三年，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皇帝对他很爱重，称他的字号，而不直呼其名。皇帝曾和身边的大臣评论文学侍臣，认为赵孟頫可以和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轼相比。又曾称赞赵孟頫品行端正、博学多闻，书法和绘画超过时辈，并旁通佛、道二教的学说，别人都不可企及。有不喜欢他的人在皇帝面前说长道短，皇帝只装听不见。又有人上书说，国史所记载的内容，不应让赵孟頫这样的人了解和参与其事，皇帝说：“赵子昂这个人，是世祖皇帝选拔的，我特别尊重优待他，把他安排在馆阁中任职，主管著述，修史流传后代，这些人喋喋不休，干什么呢！”接着赏给赵孟頫

钞五百锭，对身边的大臣说：“中书省常说国家经费不足，必定不肯给他，就从普庆寺另藏的钱钞支付给他。”赵孟頫曾几个月不到宫中，皇帝问身边的人，都说他年岁大了又怕寒冷，皇帝下令，让内府赐给他貂鼠皮衣。

当初，赵孟頫因程钜夫的推荐，初入仕途，被任为兵部郎中，后来程钜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请求退休，赵孟頫代替他的职务，先去程钜夫家拜望，然后才进入翰林院，当时人认为此举是士大夫中间的一段佳话。延祐六年，请假回南方。皇帝派使者赏给他衣料，催他回京，因生病，未能成行。至治元年，英宗派使者去他家，让他书写《孝经》。二年，皇帝赐给他上等美酒和二套衣服。这年六月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追封他为魏国公，赠谥号为“文敏。”

赵孟頫的著作，有《尚书注》，还有《琴原》、《乐原》，这两篇著作道出了乐律的奥妙；他的诗文清新含义深远，表现出一种超世的风致，读了以后，使人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他的篆书、籀书、八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没有一种书体不是古今之冠，因而以书法名闻天下。天竺国有一位僧人，远涉数万里来求赵孟頫的书法作品，带回去以后，天竺国视为宝物。他画的山水、木石、花竹、人物、骏马，特别精妙。以前曾任史官的杨载认为，赵孟頫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书画名声所掩盖，了解他在书画方面成就的人，不了解他在文章上的成就，了解他在文章方面成就的人，不了解他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人们认为杨载的说法是很中肯的。

他的儿子赵雍、赵奕，都因长于书画而知名。

（魏连科 译）

【原文】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 ，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 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巨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与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系，议

有轻重，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时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叶李执奏不宜遣虎臣，帝不听，孟頫进曰：“赵全固当问，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全数与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将陷全，事纵得实，人亦不能无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东御墙外，道险，孟頫马跌堕于河。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

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时驻蹕龙虎台，遣阿剌浑撒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以修人事、

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进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获苏。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兆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帝叹赏焉。

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帝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捐一旦之命，为百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大臣多以罪去。

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金廉访司事哈刺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问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嗷嗷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巨夫荐，起家为郎，及巨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緻。前史官杨载称孟读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世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邓文原传

——《元史》卷一七二

【说明】邓文原（公元1259—1329年），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人。至元年间入仕，历任杭州路儒学正、崇德州教授、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江浙儒学提举、国子司业，后出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在任期间，屡屡昭雪冤案，辨明疑案。后官至集贤直学士，国子祭酒。邓文原还是元代的书法家和书画鉴赏家。他的书作，明显受赵孟頫的影响。明刻《停云馆帖》等丛帖中收有他的书法作品，许多书画名迹都有他颇见工力的题跋。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他的父亲邓漳，移家浙江钱塘。邓文原十五岁时，就能通晓《春秋》大义。在宋朝时，以客居的身份参加浙西转运司考试，名列四川举子第一名。至元二十七年，浙江行中书省任他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任崇德州教授。五年，提拔他为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任翰林修撰，请假回到江南。至大元年，又任翰林修撰，参加《成宗实录》的修撰。三年，外任为江浙儒学提举。

皇庆元年，朝廷征召他为国子监司业。他到任之后，首先建议修改学校的办学方针，当权的人因循守旧，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因意见不合，邓文原称病去职。科举制实行以后，邓文原任江浙行省的考试官，他担心考生墨守陈规，他用大字书写朱熹的《贡举私议》一文，贴在试院门口。延祐四年，升任翰林院待制。五年，外任为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佾事，平江地方的僧人中有对平江府判官理熙存个人恩怨的人，贿赂僧徒，诬告理熙贪赃，理熙被屈打成招。邓文原巡视到平江，审问出真相，鞭打僧徒，释放了理熙。吴兴地方有百姓夜里回家，被巡逻兵抓获，捆绑在乡亭上。被抓的百姓逃走，有人追上他，刺伤了他的肋部，那人扑倒在地。第二天早上，家属找到他，抬回家去，那人快死的时候，他的哥哥问他刺伤你的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人说：“他戴着白帽，穿着青色的衣服，身材比较高大。”他的哥哥告到官府，主管官员问那天担任初更巡逻任务的是谁，有人说是张福儿，于是逮捕了张福儿，迫使他承认杀了人。张福儿被扣押了三年，邓文原审阅案卷，说道：“张福儿身高不到六尺，不能说是身材高大；死者刀伤在右肋部位，但是张福儿是左撇子，一向用左手，伤口应在左部，为什么死者的刀伤在右肋呢？”经过审讯，果然抓获真正的杀人凶手，释放了张福儿。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关方面抓获了盗贼，审理结案，送郡审核；而案发当夜，有人放火烧了戴家的房子，但找不到戴汝惟的下落。邓文原审批道：“其中必有文章。”后来才审讯出戴汝惟的妻子和戴的弟弟谋杀的事实，在水边树下，找到戴汝惟的尸体和带血渍的斧子与尸体在一起。人们称邓文原断案如神。

延祐六年，邓文原移官江东道。徽州、宁国、广德三郡，每年征收茶税钞三千锭，后来增至十八万锭，即使把山上所产的茶都用来交税，也不到茶税的一半，其余的税款则巧立名目向民间搜刮，年年如此。当时转运司的官员任用乡间的流氓无赖，动不动就诬告百姓犯了法，而转运司又有专权处治的权力，凡是五品以下的官员，它都可以用刑处治，州县衙门不敢过问。邓文原请求朝廷罢去转运司的专治权力，交郡县衙门行使，朝廷不加理睬。徽州百姓谢兰有一个汪姓的家奴死去，谢兰的侄儿谢四贿赂汪家的本族人诬告谢兰杀死了家奴，谢兰被逼迫招认。邓文原复审此案，弄清了事实真相，释放了谢兰，判谢回有罪。当时久旱不雨，此案真相大白，天才下雨。

至治二年，朝廷征召邓文原为集贤直学士，因发生地震，皇帝令邓文原拟议消除灾变的措施。邓文原请求判决长期扣押没有审理清楚的囚犯，在河北地区设置仓库，储存多余的粟米以救济灾民；他又重申以前的主张，请求撤销榷茶转运司，朝廷仍不加理睬。第二年，邓文原兼任国子监祭酒，江浙行省官员赵简请求开设为皇帝讲解经史的经筵。泰定元年，邓文原兼经筵官，因病请求退休回乡。泰定二年，召任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因病辞去。泰定四年，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因病没有赴任。天历元年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邓文原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人却很厚道，家里很穷，操行却十分清廉。他初次客居京师时，有一个读书人病重，病人从行囊中拿出黄金，拜托邓文原交给他的亲人。那个读书人死了以后，与邓文原同住一室的书生把黄金偷去，邓文原

另外购买黄金，偿还给死者的家属，这件事他始终没有向别人说过。他著有文集若干卷，替皇帝起草的诏令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他的儿子邓衍，因邓文原的功劳，被任为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没有上任就死去了。至顺五年，皇帝下令，追赠邓文原为江苏浙行省参知政事，赠谥号为“文肃”。

【原文】

（魏连科 译）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父漳，徙钱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时，以流寓试浙西转运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谒告还江南。至大元年，复为修撰，预修《成宗实录》。三年，授江浙儒学提举。

皇庆元年，召为国子司业。至官，首建白更学校之政，当路因循，重于改作，论不合，移病去。科举制行，文原校文江浙，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延祐四年，升翰林待制。五年，出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贿其徒，告熙赃，熙诬服。文原行部，按问得实，杖僧而释熙。吴兴民夜归，巡逻者执之，系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胁，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归，比死，其兄问：“杀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长身者也。”其兄诉于官，有司向直初更者曰张福儿，执之，使服焉。械系三年，文原录之曰：“福儿身不满六尺，未见其长也；刃伤右肋，而福儿素用左手，伤宜在左，何右伤也！”鞫之，果得真杀人者，而释福儿。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司得盗，狱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庐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

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叶氏与其弟谋杀汝惟状，而于水涯树下得尸，

六年，移江东道。徽、宁国、广德三郡，岁入茶课钞三千锭，后增至十八万锭，竭山谷产，不能充其半，余皆凿空取之民间，岁以为常。时转运司官听用乡里晔狡，动以犯法诬民，而转运司得专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决，州县莫敢如何。文原请罢其专司，俾郡县领之，不报。徽民谢兰家僮汪姓者死，兰侄回贿汪族人诬兰杀之，兰诬服。文原录之，得其情，释兰而坐回。时久旱不雨，决狱乃雨。

至治二年，召为集贤直学士，地震，诏议弭灾之道，文原请决滞囚，置仓廩河北，储羨粟以赈饥；复申前议，请罢榷茶转运司，又不报。明年，兼国子祭酒，江浙省臣赵简请开经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经筵官，以疾乞致仕归。二年，召拜翰林侍讲学士，以疾辞。四年，拜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以疾不赴。天历元年卒，年七十一。

文原内严而外恕，家贫而行廉。初客京师，有一书生病笃，取囊中金，嘱文原以归其亲；既死，而同舍生窃金去，文原买金偿死者家，终身不以语人。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荫授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未任，卒。至顺五年，制赠文原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谥文肃。

揭傒斯传

——《元史》卷一八一

【说明】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县）人。年轻时即有文名，后因程巨夫、卢摯荐举，历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国子助教、授经郎等职，后至翰林待制、集贤学士、侍讲学士。揭傒斯长于文词，当时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又任《辽史》、《金史》、《宋史》的总裁官。揭傒斯的文章叙事严整，诗也清新可喜，传世有《揭傒斯全集》。同时他还是元代著名书法家，擅长楷书、行书、草书。

揭傒斯字曼硕，是龙兴路富州人。他的父亲揭来成，是宋朝时的乡贡进士。揭傒斯幼年时家里很贫穷，读书非常刻苦，白日黑夜，从不懈怠，父子互相为师友，因此他博通百家学说，很早就有文名。大德年间，曾到湖南、湖北一带游学，湖南经略安抚使赵淇素称有知人之明，他见到揭傒斯，惊喜地说：“这人将来会成为文章名流。”程巨夫、卢摯先后任湖南廉访使，都对他很器重。程巨夫把堂妹嫁给他。

延祐初年，程巨夫、卢摯向朝廷荐举揭傒斯，特任他为

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平章政事李孟为国史监修官，他谈了揭傒斯撰写的《功臣列传》，感叹地说：“这样的文章才能称为史家笔法，象其他人，只不过是誊录官方文书的抄手罢了。”升任他为应奉翰林文字，仍兼任编修，后迁任国子助教，又留任应奉翰林文字。他回南方去探望母亲，很快又被召回京。揭傒斯前后三次任职翰林，对朝廷的事务、台阁的制度，没有不熟悉的。集贤学士王约说：“和揭傒斯谈论治国之道，使人深受启发，如果让他办理政事，任何事都能办得好。”

天历初年，开设奎章阁，首先提拔揭傒斯为授经郎，让他教勋勋大臣以及皇亲国戚的子孙读书。文宗经常驾临阁中，询问各种问题，揭傒斯的回答皇帝很满意，常叫他的字号，而不直呼其名。每当中书省上奏起用儒臣时，文宗必然问：“那人的才能比揭曼硕怎样？”有时拿出揭傒斯进呈的《太平政要策》给阁臣看，并说：“这是我的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呈的。”他是这样受皇帝的亲重。

富州地方本不出产黄金，官府受奸民花言巧语的诱惑，为此召募了三百淘金户，而让奸民率领，散往外地，采金献给本地官府，每年征收四两，后来逐年加码，增至四十九两。奸民死去以后，三百淘金户留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贫穷无法生活，主管官员责令为官家服劳役的百姓代为交纳，很多民户因此而破产。中书省采用揭傒斯的建议，于是免去这项征调，百姓因此而得以休养生息，富州人至今对揭傒斯感恩戴德。

揭傒斯参与《经世大典》的修撰，文宗取来他撰写的《宪典》，读过以后，对身边的大臣说：“这难道不是《唐律》

一样的高水平法典吗！”特任命他为艺文监丞，参与校勘书籍的事务，文宗常称赞他纯朴忠实，想提拔他，因文宗逝世作罢。元统初年，皇帝在便殿召见他，长时间和他谈话，多方安慰，下令赏给他诸王才能享用的衣料表里各一件，并且亲自鉴别以后才交给揭傒斯。迁任他为翰林待制，又升任集贤学士，官阶为中顺大夫。在此之前，儒学官到吏部考核的人，必须移交给集贤院，考核他们的学业，集贤院再下交给国子监，国子监下交给国子博士，因手续烦琐耽误时间，动不动需要几个月。揭傒斯奏请朝廷，改变这种作法，把此事直接交集贤院官员办理，这样人人都感到很方便。

揭傒斯奉皇帝之命，去祭祀北岳、济水、南镇，顺路西去回家探望。当时秦王伯颜当权，屡次催促他回京，揭傒斯称病坚辞。不久，皇帝亲自提拔他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于是当天就启程回京，他还未到京城，又改任他为翰林直学士。及开始经筵讲书，又升他为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因官品升高相应官阶晋升为中奉大夫。按照当时的新条例，破格提升不得超越二等，只有揭傒斯进升了四等，迁了九级，受到特殊的礼遇。经筵不设专职官员，称为领经筵、知经筵，多由内阁大臣兼任，因此凡涉及经史中的深文奥义的阐释，必定由揭傒斯审定后才向皇帝进讲。他对经史的阐释，字里行间往往寓规谏之意，以有助于政事为出发点。皇帝很赞赏他的忠心诚恳，多次赏赐给他金织纹缎。

至正三年，他已七十岁，退休离京回原籍，皇帝派使者从郭县之南把他追回。不久，又奉皇帝之命撰写《明宗神御殿碑》，文章写成，赏给他纸币一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皇

后也赏给白金五十两。他请求离京回乡，朝廷不批准，皇帝派丞相脱脱和执政大臣当面劝他不要离开。揭傒斯说：“如果我揭傒斯的建议有一点可取的话，诸位大人采纳了我的建议而天下百姓受益，即使我死在这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如果不是这样，我留下来有什么益处呢！”丞相趁机问他：“现在的政事应以什么为当务之急呢？”揭傒斯回答说：“以储备人才为当务之急，在他的地位和声望还不高时加以培养，在他对各种政务熟悉洞达之后再加以任用，这样就不会有埋没人才、荒废政事的忧虑了。”有一天，大臣们聚集朝堂议论政事，揭傒斯高声说道：“应该使新旧铜钱同时流通，来补救现行钞法的弊端。”执政大臣认为不可行，揭傒斯更加坚持自己的主张，丞相虽然口头上称赞他刚正不阿，但实际上并没有把他的建议付诸实行。

皇帝下令纂修辽、金、宋三朝史书，揭傒斯参与其事并被任命为总裁官。丞相问他：“修史的工作，什么最重要？”揭傒斯说：“用人最重要，有学问又很会写文章但不熟悉史事的人，不可参与；有学问很会写文章而且又熟悉史事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可参与。用人的标准，应以心术最为重要。”并且对他手下的官员说：“要求得修史的方法，必须弄清楚修史的出发点，古人著史书，虽然是小小的善行，必加记载，虽然是小小的恶行，也必加记载。不然的话，怎么能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呢！”因此他毅然担起增删修改的责任，凡是政事的得失，人物的贤明与否，是是非非，一律以公论为准；对于某些人和事，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定通过反复辩论，直到得出最恰当结论为止。至正四年，《辽史》修成，皇帝下旨

对他进行嘉奖，并督促他及早修成金、宋二史。于是揭傒斯夜晚留宿在史馆内，日夜不停，不敢稍事休息，因此受凉生病，病了七天就去世了。当时皇帝派使者从上京来，奉命在史馆宴请修史官员，因揭傒斯去世，宴会改期。使者向皇帝回奏揭傒斯逝世，皇帝为之叹惜悲悼，赏赐纸币一万缗，派驿船护送他的灵柩回江南。至正六年，皇帝下令，追赠他为护军，追封为豫章郡公，赠谥号为“文安”。他之所以得到勋位爵号而没有得到官阶封赠，是因主管官员疏失造成的。

揭傒斯少年时很贫穷，侍奉双亲，即使是粗茶淡饭也使老人高高兴兴。到他有了薪俸收入时，吃穿比以前稍好一些，就悲恻地说：“我的父母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啊！”因此他一生清廉节俭，至老不变。他重于兄弟手足之情，兄弟相处，始终没有产生任何隔阂。他在朝廷，虽然是无实权的散官，却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对他人的长处大力表彰，唯恐人不知道，但听到官吏贪污糟害百姓，对这样的人，他决不想法替他掩盖。他写的文章，叙事严密，语言简练，持论稳妥；他的诗尤其清新婉转，格律严整；他还擅长楷书、行书、草书。朝廷的重要文书，以及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大臣逝世后，应得到朝廷所赐碑铭的，必请揭傒斯撰写。远方外城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能得到他的文章，都认为是荣耀。

（魏连科 译）

【原文】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间，稍出游湘、汉。湖南帅赵琪，雅

号知人，见之惊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巨夫、卢摯，先后为湖南宪长，咸器重之，巨夫因妻以从妹。

延祐初，巨夫、摯列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牒尔。”升应奉翰林文字，仍兼编修，迁国子助教，复留为应奉。南归省母，旋复召还。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台阁之仪，靡不闲习。集贤学士王约谓：“与傒斯谈治通，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子孙。文宗时幸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材何如揭曼硕？”间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其见亲重如此。

富州地不产金，官府惑于奸民之言，为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总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献，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其人既死，而三百户所存无十一，又贫不聊生。有司遂责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输，民多以是破产。中书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赖以苏，富州人至今德之。

与修《经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宪典》读之，顾谓近臣曰：“此岂非《唐律》乎！”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且屡称其纪实，欲进用之，会文宗崩而止。元统初，诏对便殿，慰谕良久，命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躬身辩识以授之，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阶中顺大夫。先是，儒学官赴吏部铨者，必移集贤，考校其所业，集贤下国子监，监子博士，吏文淹稽，动逾累月。傒斯请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属官，人

甚便之。

奉旨祠北岳、济读、南镇，便道西还。时秦王伯颜当国，屡促其还，傒斯引疾固辞。既而天子亲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以对品进阶中奉大夫。时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独傒斯进四等，转九阶，盖异数也。经筵无专官，曰领曰知，多宰执大臣，故微辞奥义，必属傒斯订定而后进，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务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恳，数出金织文段以赐。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诏遣使追及于潞南。寻复奉上尊谕旨，还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赐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许，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面谕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问：“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储材为先，养之于位望未隆之时，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则无失材废事之患矣。”一日，集议朝堂，傒斯抗言：“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执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相虽称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

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

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时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锡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闻，帝为嗟悼，赐楮币万缗，仍给驿舟，护送其丧归江南。六年，制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曰文安。有勋爵而无官阶者，有司之失也。

傒斯少处穷约，事亲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欢心，既有禄入，衣食稍逾于前，辄愀然曰：“吾亲未尝享是也。”故平生清俭，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终始无间言。立朝虽居散地，而急于荐士，扬人之善惟恐不及，而闻吏之贪墨病民者，则尤不曲为之掩复也。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

阿尼哥、刘元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阿尼哥，尼波罗国（即今尼泊尔）人。中统元年（1260）曾率其国中匠人赴吐蕃（今西藏）监造黄金佛塔，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合斯巴的赏识，并度他为僧，带他去见忽必烈，忽必烈也很赏识他。后来还俗，官至光禄大夫、大司徒，死在中国。阿尼哥自幼聪明好学，读佛经，习雕塑工艺，成为一名雕塑家。在他监造西藏的黄金佛塔时，年仅十七岁。他长于金属像的铸造，当时元朝两京寺庙的塑像，多出其手，又善于制作织锦像，都达到高度成就。

刘元，字秉元，宝坻县（今属天津市）人。他起初为道士，后向阿尼哥学艺。他长于泥塑、金属铸像和漆帛塑像，尤其是漆帛塑像，堪称一绝。元朝西京的寺庙佛像，大都出自刘元之手。他的作品，栩栩如生、神态生动，备受时人赞誉。因此，他很受元世祖和元仁宗的赏识，曾两度赐宫女为妻。官至昭文馆大学士。

阿尼哥，是尼波罗国人，他国家的人称他为八鲁布。阿尼哥自少聪明敏捷，悟性很好，与一般的小孩不一样，稍稍

长大以后，即诵读佛经，读了一年，就能掌握佛经的内容。和他一起学习的人中，有从事绘画雕塑的人正在读《尺寸经》，阿尼哥听了以后，就能背诵。长大以后，擅长绘画雕塑和铸造金属像。

中统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合斯巴在吐蕃建造黄金塔，尼波罗国要选择一百个工匠去建造，只找到了十个人，并且也没有找到护送匠人的人选。阿尼哥当时只有十七岁，他请求率领众工匠去吐蕃，众人认为他年岁太小，劝他不要去，他回答说：“我年幼心不幼。”于是派他前去。帝师八合斯巴一看到他，就认为他是一个奇才，让他当工程监造。第二年，黄金塔建成，他请求回国，帝师鼓励他进京朝见元世祖忽必烈，于是他剃去头发受戒成为帝师的徒弟，跟随帝师进京。世祖面对他注视了好大会儿，问道：“你来到我们的大国，难道不害怕吗？”他回答说：“圣明的君主，对待四邻小国就象父亲养育儿子一样，现在儿子来到父亲面前，有什么可怕的？”世祖又问：“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我的家乡在西域，奉皇帝的命令，去吐蕃建造佛塔，二年就完工了。我看到那里正在发生战乱，老百姓活不下去，希望陛下您下令安定百姓，因此我不远万里，来为百姓请命。”世祖又问：“你有什么技能？”他回答说：“我以心为师，掌握了绘画、雕塑和铸造金属像的技艺。”世祖令左右的人拿来明堂针灸铜像给他看，并说：“这是宣抚使王楫出使宋朝时带回来的，时间久了，有些缺坏，没有人能把它修复完整，你能把它修复一新吗？”阿尼哥回答说：“我虽然没有铸造过这样的铜像，我来试试吧。”至元二年，新像铸成，铜像人体上各个关节、隔膜、脉

络都完备无缺，铸造未家也赞叹他的高超技巧，没人不自叹不如而心悦诚服。凡是两京寺观的铜象，大都出自他的手中。他曾造了一架七宝鍱铁法轮，皇帝外出巡行，用它作先导。宗庙里列祖列宗的造像，都是锦缎织成，绘画远不如它生动传神。

至元十年，任命他为人匠总管，授给他银质印章和虎符。至元十五年，皇帝传旨让他还俗，任他为光禄大夫、大司传，主管将作院的事务，皇帝对他宠幸之深、赏赐之多，没人比得上。他逝世以后，赠衔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谅国公、上柱国，谥号为“敏慧”。

他有六个儿子，其中阿僧哥官至大司徒，阿述腊官至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又有一个叫刘元的人，曾向阿尼哥学习铸造佛像的技术，被人称为绝艺。刘元字秉元，蓟州宝坻县人。他起初作道士，拜青州把道录为师，学会了多种技艺。至元年间，两京著名寺庙里的佛像，不论是泥塑的或是金属铸造的，或是转换而成的，凡是出自列元之手，都神色栩栩如生，符合人们心目中佛祖的神态，得到天下人的称赞。其中上都的三皇像尤其古色古香，行家认为，刘元的塑艺把三位圣人的神态表现得细微入微。因此，皇帝两次把宫女赏给他为妻，让他统领各种工匠，皇帝出外，必令他随从。

仁宗曾命令刘元，没有圣旨准许，不许替别人造其他的神像。后来大都的南城建造东岳庙，刘元为该庙创作仁圣帝塑像，塑像气宇轩昂，有帝王的气度，旁边侍候他的臣子像，表现出深思熟虑的神情。起初刘元想塑侍臣像，长时间没有

动手，他在翻阅内府藏画时，看到唐朝魏征的画像，眼睛为之一亮说道：“有办法了，若不似魏征这样神情，就与宰相的身份不相称。”马上去庙里动手制作，当天就完成了，看到塑像的官员和读书人，都赞叹不已。他所创作的西番佛像，大都秘不示人，人们很少能见到。

刘元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长寿而死。所谓“搏换”这种工艺，即在泥塑像上遍缠绢帛，每用漆涂，然后把泥塑像挖去，漆过的绢帛，就形成栩栩如生的塑像。

（任文坚译）

【原文】

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幼敏悟非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

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的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久之，问曰：“汝来大国，得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士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向來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檄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

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鍱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

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灵，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转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由是两赐宫女为妻，命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

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册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征像，瞿然曰：“得之奚，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

元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转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云。

祝允明、唐寅传

——《明史》卷二八六

【说明】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枝指生，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他于弘治五年中举后，连考进士不中，后官为福建兴宁知县、应天府通判。祝允明为人，玩世不恭，狂放不羁，不为礼教所束缚，因此官场不得意，郁郁而终。他是明代中期著名书法家，与文征明、唐寅，徐祯卿称为“吴中四子”。他的小楷学钟繇、王羲之，古拙猷劲，有汉魏笔意；狂草学怀素、黄庭坚，用笔险劲，自具风神。传世书迹多种，如《前后赤壁赋》、《书刘基诗》等，著有《怀星堂集》、《祝氏集略》等。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名，因此人称他为“唐解元”。因会试牵连进科场舞弊案中，被剥夺考试资格回家。宁王宸濠礼聘至王府，唐寅觉察到宸濠蓄意反叛，佯狂得免祸。唐寅是明中期著名书画家，与沈周、文征明、仇英称为明四大家。唐寅于画，擅长山水，兼工人物花鸟，笔

力挺拔秀润，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书法亦佳，字风圆润秀丽。工诗文，诗学刘禹锡、白居易。著有《六如居士全集》。《明史》唐寅本传，对其书画艺术无一字述及，是为缺憾。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县人。他的祖父祝显，正统四年中进士。中进士后，太监传下圣旨，要考试善于做文章的，选拔四个人，祝显即属于四个中的一个，进入皇宫的掖门，祝显知道是要他们教小太监读书，于是他不参加考试就退了出来。后来由给事中历任山西参政，为官很有名声。

祝允明在弘治五年考中举人，很久考不中进士，被任为广东省兴宁知县。在他任知县时，捕杀盗贼首领三十多人，县内盗贼销声匿迹。后来仅仅升他为应天府通判，他告病假回乡。嘉靖五年逝世。

祝允明生下来是个六指，因此自号为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时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九岁能写诗。稍大以后，博览群书，写文章不拘一格，文风奇特，往往在宴席上当场作文章，奋笔疾书，文思如泉水喷涌一样。尤其擅长书法，名声传遍海内。好饮酒嫖妓，也好下棋，又善于度新曲，向他求诗文、书法的人，多得踏破门槛，很多人是贿赂了妓女才得到。他讨厌那些循规守礼的人，对家庭的生计，从不过问，有了收入，就邀请宾客狂喝滥饮，把钱花光为止，或者把钱分给宾客拿去，自己一钱不留。晚年更陷于困境，每次出门，后面总是紧追着一大群讨债的人，祝允明却以此为乐。他著有诗文集六十卷，其他杂著一百多卷。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他生来聪明伶俐，他和同街道的张灵整天狂喝滥饮，不从事任何生计。祝允明对他进行规劝，于是他关门闭户，成年不出门。弘治十一年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考中举人，录取他的老师梁储，对他的文章非常欣赏，梁储回京后，把他的文章给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也很欣赏。不久，程敏政会试主考官，江阴县富户徐经贿赂程家奴仆，偷出了考题。此事被揭露出来，检察官弹劾程敏政，并牵连上唐寅，被投入监狱，贬降他为办事吏员。唐寅以此为耻，拒不赴任，回家以后，更加放浪不羁。江西的宁王宸濠送来厚礼请他到王府任职，唐寅觉察到宸濠蓄意谋反，便装疯卖傻，纵情饮酒，甚至当众脱下裤子，露出隐私。宸濠不能忍受，才把他放回来。他回家以后，在桃花坞建筑房屋，和宾客整日在其中饮酒作乐，五十四岁时去世。

唐寅的诗文，初期的作品，才华横溢，到了晚年，颓废自放，认为后世了解我并不在才华，人们深替他可惜。吴郡一带，自从祝允明等人因放浪不羁为当时人所病垢，加之他们的文风又轻佻艳丽，追随他们的人为之倾倒，人们的传说又添油加醋，于是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已越出礼教的规范。

（魏连科 译）

【原文】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祖显，正统四年进士。内侍传旨试能文者四人，显与焉，入掖门，知欲令教小内监也，不试而出。由给事中历山西参政，并有声。

允明以弘治五年举于乡，久之不第，授广东兴宁知县。捕戮盗魁三十余，邑以无警。稍迁应天通判，谢病归。嘉靖五

年卒。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所著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馀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浹岁。举弘治十一年分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憎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沈度传

——《明史》卷二八六

【说明】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以擅长书法被明成祖选入翰林，官至翰林学士。沈度善篆、隶、行、楷、八分等书体，以楷书最为有名。他的楷书规矩圆润，平整端庄。他的书法，由于帝王的喜好，对明清影响较大，形成所谓“馆阁体”。这种书体，规整有余，而缺乏个性，艺术价值不高。明成祖朱棣偏爱沈度的书法，朝廷的高文典册，御旨封诰，多出自沈度之手。传世书迹有《与镛翁书帖》、《四箴帖》等。

其弟沈粲，亦善书，字风与其兄相近。行书流畅俏丽。其书迹有《自书御赐五咏》等。

沈度，字民则。他的弟弟沈粲，字民望。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兄弟二人都擅长书法，沈度的字以婉转俏丽见长，沈粲的字以遒劲放逸取胜。沈度博览经书史籍，他写的文章绝没有浮华轻靡的弊病。洪武年间，地方官因他长于文学而荐举他，他谢绝了。因官司牵连，被流放到云南，在云南的岷王送来丰盛的礼物聘他到王府任职，他经常对岷王进行劝戒，

不久就辞职而去。都督瞿能和他一起去京城。明成祖刚即位做皇帝，就下旨选拔擅长书法的人入翰林院，供给衣食俸禄，沈度与吴县人滕用亨、长乐县人陈登都被选中。当时在朝的大官解缙、胡广、梁潜、王璉等人都善长书法，沈度却最受成祖赏识，因而名声很高，在各朝官之上。他每天都在便殿侍奉皇帝，凡是皇家的册封典册，用于朝廷的封诰，收藏在内府的文件，颁发各附属国的国书，都请他书写。于是由翰林典籍官提拔为翰林检讨，历任修撰，升任侍讲学士。他的弟弟沈粲自翰林待诏升任中书舍人，提拔为侍读，进官为大理少卿。兄弟二人都得到织金衣的赏赐，皇帝下令，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平版上，涂上金粉，追赠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一样的官衔，特准乘驿马回乡，祭告他们的父母。

昆山县有个叫夏 的人，字孟暘，和他的弟弟夏 以擅长书法绘画闻名，兄弟二人都官至中书舍人，当时人称他们为“大小中书”，沈度和沈粲，当时人称他们为“大小学士。”

沈度的性格敦厚朴实，谦逊礼让，甘居人下，收授之间，非常严格。有位府学训导托沈度的朋友向沈度求字，并请写上赠某某字样。沈度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不是过去曾诬告上司官员的那个人吗？”马上加以拒绝。他的那位朋友仍坚持要他写，最终不肯落上那人的名款。他在朝廷备皇帝顾问，总是用忠正的言论回答问题。沈粲对哥哥非常尊敬，自己得到赏赐，都交给他哥哥。

【原文】

（魏连科 译）

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

摩。洪武中，举文学，弗就。坐累谪云南，岷王具礼币聘之，数进谏，未几辞去。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廩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琯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须属国，必命之书。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絜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擢侍读，进阶大理少卿。兄弟并赐织金衣，镂姓名于象简，泥之以金。赠父母如其官，驰传归，告于墓。

昆山夏 者，字孟旸，与其弟 以善书画闻，同官中书舍人，时号大小中书，而度、絜号大小学士。

度性敦实，谦以下人，严取与。有训导介其友求书，请识姓字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奸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固请，终不肯书姓名。其在内廷备顾问，必以正对。絜笃于事兄，己有赐，辄归其兄。

王绂、夏景传

——《明史》卷二八六

【说明】王绂（1362—1416），一作王芾，字孟端，号友石、九龙山人，无锡人。洪武年间因事被谪成山西朔州。永乐年间，因其长于书法，曾在文渊阁任职，官至中书舍人。王绂是明初著名画家，擅长山水，山水学王蒙，竹石学仇璘，尤其善画墨竹，人称明代第一。著作《友石山房集》。

夏景（1388—1470）年，初姓朱，后复姓夏，字仲昭，号自在居士，昆山人。中进士后，官至太常寺卿。他也善画墨竹，师承王绂。他的画，用笔洒脱，墨色苍润，自成一家，名播远近，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誉。

王绂，字孟端，是无锡县人。他博学多才，善于作诗，字写得很漂亮，又擅长绘画，山水竹石，称一时高手。洪武年间，因罪被发配朔州戍守边境。永乐初年，有人荐举，因擅长书法在文渊阁任职。过了很久，升任中书舍人。

王绂未做官以前，和吴县人韩奕交往，后隐居九龙山，于是自号为九龙山人。在书法方面，以古人为追求目标。在绘画方面，不肯轻易下笔，在游览山水的兴头上，酒酣耳热之

际，拿起画笔，在长廊的粉壁上尽情挥洒。但如果有人拿着金钱求他一笔一画，他会拂袖而起，拒不答应，或者拒人于门外，即使是豪富权贵，他也不屑一顾。有人劝他不要这样，王绂说：“大丈夫应该重视操守，在这些小问题上如果像你劝说的那样，遇上重要事该如何处理呢！”他在京城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听见有人在月下吹箫，于是乘兴画了一幅《石竹图》，第二天早上，找到那个吹箫人，把那幅画送给他，那人却是个商人。商人送给他红地毯，请他再画一幅相配成双。王绂把赠送的那幅画要来，当面撕碎，把礼物退还给商人。有一天他退朝回寓所的路上，黔国公沐晟在后面喊他的字号，王绂不答应。王绂的同事对他说：“这是黔国公。”王绂说：“我并不是没有听到，他一定是向我要画的。”沐晟追上他以后，果然是请他作画，王绂只点了点头就算了。过了好几年，沐晟又写信来催，王绂才开始给他作画。画完以后，王绂说：“我的画如果直接送给黔国公，那显得我是巴结他，不行。黔国公的宾客平微仲，是我的朋友，因朋友的关系，我把画送给他，等黔国公向平微仲要好了。”他就是这样清高耿直，不随流俗。

昆山人夏景，也以擅长画竹石著称，名声稍低于王绂。他画一枝竹子，价值白银一锭，但是人们大多通过送礼来得到他的画。夏景字仲昭，永乐十三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进修，为庶吉士，官至太常寺卿。夏昶和上元人张益同科中进士，都以文章著名，又都善于画竹子。后来夏景看到张益作的《石渠阁赋》，自认为赶不上他，于是不再作赋。张益看到夏景所画的竹石，也不再画竹。张益死于土木之变。

平仲微，名显，是钱塘县人。他曾任滕县县令，因事发配到云南。他的诗风豪放，颇以此自负，云南的诗人以平、居、陈、郭四家著称，平显是四家之一。（魏连科 译）

【原文】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

绂未仕时，与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遂自号九龙山人。于书法，动以古人自期。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声，乘兴写《石竹图》，明旦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云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含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其高介绝俗如此。

昆山夏景者，亦善画竹石，亚于绂。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景，字促昭，永乐十三年进士后改庶吉士，历官太常寺卿。景与上元张益，同中进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后，景见益《石渠阁赋》，自谓不如，遂不复作赋。益见昶所画竹石，亦遂不复画竹。益死土木之难。

仲微，名显，钱塘人。尝知滕县事，谪戍云南。其为诗颇豪故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显其一也。

文征明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更字征仲，别号衡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文征明一生未中科举，正德末年，因李充嗣荐举，被任为翰林院待诏。因不附张璁、杨一清等执政大臣，弃官回乡。文征明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他少年时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他长于书法，行草、小楷尤精。存世书迹较多，著名的有书苏东坡的《赤壁赋》、《与希古书帖》、《与野亭书帖》等。又擅长绘画，以山水见长，亦工花卉、兰竹、人物。他的画师法宋元，多描写江南水乡风光和文人生活。他的书画，名重当代，门人亦多，形成吴门画派，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因其书画名重，求者众多，其中亦有门人冒名之作，文征明亦听之任之。

《明史》文征明传后附蔡羽、黄省曾、袁褰、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何良俊、徐献忠、董宜阳、张之象等人的传记，这些人或长于诗文，或长于书画，遂一并译出。

文征明，长洲人，起初名叫文璧，字征明，以字行世，因改字征仲，别号衡山。他的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叔父文森，曾任右佥都御史。文林逝世后，当地官民凑集千金资助丧事。文征明当时十六岁，全都谢绝了。官民整修原来的却金亭，用来纪念文林和前任知府何文渊，并刻碑记述他们的事迹。

文征明小时候并不聪明，稍稍长大以后，却聪慧异常，灵气焕发。他向吴宽学习文章，向李应祯学习书法，向沈周学习绘画。这三人都他父亲的朋友。他又和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和书画艺术，名声日益显著。他的为人，很随和但也很耿直。巡抚俞谏想送给他一些钱，指着他破衣烂衫说：“怎么破成这样？”文征明假装不明白他的用意，说道：“被雨打坏的。”俞谏竟不敢提送给他钱的事。宁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名声，派人送来书信和礼物聘请他，文征明称病不去。

正德末年，巡抚李充嗣向朝廷推荐他，正好当时文征明以岁贡生的身份去吏部考官，任他为翰林院待诏。世宗即位，他曾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任经筵讲官，过年过节所得到的赏赐，与同在翰林的大臣相等。但当时崇尚科举出身，文征明因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心里很不自在，连年请求离任回乡。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曾在当时的秀才中发现了张璁。张璁得势以后，暗示文征明投靠他，文征明推辞，不去接近张璁。杨一清被征召为内阁执政大臣，文征明最后才去拜见他。杨一清对文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是朋友吗？”文征明严肃地说：“我的父亲去世已三十多

年，如果他生前有一字提到您，我是不敢忘记的，我实在不知道相公您和我的父亲是朋友。”杨一清表情尴尬。不久他和张璁商量，要提升文征明的官位，文征明却加紧请求回乡，才获准退休。四面八方请求他的诗文书画的人，在路上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大官豪富要得到他片纸只字，十分不易，他尤其不肯给王府和宦官作书画，他说：“这是国法所禁止的。”周王、徽王等诸王赠送他的宝物古玩，他当即原封退回。外国的使臣路过吴门，面对他的住地行政敬礼，因不能和他见面而深感遗憾。他的墨宝几乎遍布天下，他的门客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作书画，文征明也不加禁止。嘉靖三十八年去世，当时他已九十岁了。

他的长子文彭，字寿承，曾任国子博士，次子文嘉，字休承，曾任和州学正。二人都能写诗，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能继承他们父亲的学业。

吴中地区，自从吴宽、王鏊以文章为翰林院领袖人物，一时的名家如沈周、祝允明等人与吴宽等人并驾齐驱，文风盛极一时。文征明和蔡羽、黄省曾、袁帙、皇甫冲兄弟稍稍后起。但文征明领袖文坛数十年，和他交游的有王宠、陆师道、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等人，也都以文章书法著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员任用为南京翰林院孔目。他自号林屋山人，著有《林屋》、《南馆》二集。在诗文方面自恃甚高，文章效法先秦、两汉，有人说他的诗风与李贺相似，蔡羽说：“我作诗要求高出魏晋之上，现在仅仅像李贺吗？”他就是这样不肯屈就。

黄省曾，字勉之。乡试考中举人。他曾追随王守仁、湛若水，又向李梦阳学诗。著有《五岳山人集》。他的儿子黄姬水，字淳父，有文名，曾向祝允明学习书法。

袁帙，字永之，他七岁时即能作诗。嘉靖五年中进士，以庶吉士在翰林院进修。张璁讨厌他，把他赶出翰林院，任为刑部主事，后历升至广西提学僉事。两广自韩雍任总督之后，地方长官按察使、指挥使等去总督府拜见，一律在院中下跪，只有袁帙只拱拱手就算了。过了不久，称病离任回乡。他的儿子袁尊尼，字鲁望，官至山东提学副使，也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年时曾从学于蔡羽，在林屋这个地方居住了三年，不久又去石湖读书。他由秀才保送到国子监深造，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了。王宠的行书、楷书颇得晋人笔意，读书很博，无所不看。

陆师道，字子传。中进士后被任为工部主事，又改为礼部主事，以奉养母亲为由请假回乡。回家后，在文征明门下学习，称为弟子。在家居住了十四年，才再度起用他，官至尚宝少卿。他擅长诗文，又长于小楷、篆书以及绘画。人称文征明诗文书画为四绝，成就不在赵孟頫之下，陈师道能继承文征明的四绝，而且作风也与文征明相似。平时不随便和人交往，官吏很少能见到他。他的女儿叫卿子，嫁给赵宦光，夫妇二人在当时很有名气。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世。他的祖父陈琚，曾任副都御史。陈淳受学于文征明，以文章、品行著名。擅长书法绘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中进士后，以庶吉士进翰林院进修，官

至吏部员外郎。因得罪了吏部尚书汪铤，降为真定府通判，离任回乡。他和陈师道都有清官声望。

彭年，字孔嘉，为人忠实厚道。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周天球的书法，钱谷的绘画，在文征明之后成为吴中地区的佼佼者。

后来，华亭的何良俊也以贡生入国子监深造。当权者知道他有名声，援蔡羽的先例，特任为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字元朗。少年时就专心学问，二十年不下书楼，和他的弟弟何良傅都有杰出的才能。何良傅考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但何良俊却屡考不中，和上海人张之象、同乡人徐献忠、董宜阳是朋友，都有名声。后来何良俊到南京任官，赵贞吉、王维楨相继主持翰林院事务，和何良俊关系很融洽。何良俊在南京住了很久，他感慨地说：“我有一座清森楼在海滨，其中藏书四万卷、名画百幅，古代的碑帖、钟鼎彝器有几十种，放着这地方不住，何必在南京忙忙碌碌供人驱使呢？”于是称病离职回家。因海边遭受倭寇扰害，又回南京住了几年，在苏州购买宅第。七十岁时才回到故里。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年间考中举人，官至奉化知县。著作有数百卷。七十七岁时去世，王世贞个人给他赠谥号为“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他的祖父张萱，官至湖广参议。他的父亲鸣谦，官至顺天通判。张之象以秀才的身份入国子监读书，后任浙江按察司知事，因官位低下，自称为“吏隐”。离职回乡以后，更加专心从事著述。晚年住在秀林山，很少进

城。终年八十一岁。

【原文】

(魏连科 译)

文征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征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征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征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辈相切劘，名曰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征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征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征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征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耶？”征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馀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征明官。征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麇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

年卒，年九十矣。

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征明及蔡羽、黄省曾、袁帙、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征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号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馆》二集。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或谓其诗似李贺，羽曰：“吾诗求出魏、晋上，今乃为季贺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袁帙，字永之，七岁能诗。举嘉靖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累迁广西提学僉士。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帙独长揖。无何，谢病归。子尊尼，字鲁望，亦官山东提学副使，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征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征明四绝，不

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琚，副都御史。淳受业征明，以文行著，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天球以书，谷以画，皆继征明表表吴中者也。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芝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徐献忠，守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著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董其昌传

——《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历官轮翰林院偏修、湖广副使、湖广学政、太常卿、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是晚明著名书画家。他的书法，初学米芾，后又学唐人，上溯魏晋，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他的书法作品，秀丽超逸，布局疏宕有致，对明末清初的书坛影响很大。书迹存世很多，刻帖有《小玉烟堂帖》、《汲古堂帖》、《书种堂帖》、《来仲楼法帖》、《世春堂帖》等。著名的作品有《邵康节无名公使并程朱赞》、《孝经》、《书古人侍》、《传赞》等。他的绘画，擅长山水，学董源、巨然、黄公望、仇赞等，不重写实，画风清润明秀。在绘画上标榜士气，把古代山水画家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贬抑北派，这是一种偏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在于董其昌书画名重，求书画者很多，他常常请人代笔，因而存世的伪作甚多。

在当时同以书法著名的人有：华亭人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临邑人邢侗及其妹慈静、顺天人米万钟、晋江人张瑞图

等人，附于《董其昌传》后，今一并译出。

董其昌，字玄宰，是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教习庶吉士，死于任所，董其昌请假，奔走数千里路，把田一俊的灵柩护送回乡安葬。回来以后，被任为编修官。皇帝的长子就学读书，董其昌充任讲官，他在讲书中借史事随时对他进行启发诱导，皇长子不时报以会心的一瞥。由于董其昌未按执政大臣的意志行事，被外任为湖广副使，董其昌称病回乡。后来起用，官得原职，提督湖广学政。因他不徇私情开后门，受到有权势人的怨恨，他们唆使数百个生儒闹事，捣毁了他的衙门。董其昌当即上奏朝廷，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下令有关部门对闹事的生儒审查处治，董其昌终于辞职回乡。朝廷起用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他都不去上任。

光宗即位后，问道：“原来的讲官董其昌先生现在哪里？”于是朝廷征召他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提升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当时修撰《神宗实录》，派他去南方搜集神宗朝时大臣的奏章和遣闻佚事，董其昌文事搜集，记录有三百本之多。他又选择没有批复的奏章中有关太子、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的论述，分门别类，录成四十卷。他仿效史书论赞的体例，每篇之后都附以自己的论断。书编成后，上表进呈，皇帝下旨，加以褒奖，命交给史馆备用。第二年秋天，提升他为礼部右侍郎，协助詹事府事务，不久特为礼部左侍郎。天启五年正月，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当时朝政被宦官把持，对东林党惨酷迫害。董

其昌遇事则远远躲开，过了一年即请假回乡。崇祯四年，起用为原官，并掌詹事府事。在任三年，多次上奏请求退休，皇帝下旨给他加太子太保衔准予退休。又过了二年就去世了，终年八十三年，追赠太子太傅。福王在位时，赠谥号为“文敏”。

董其昌天资过人，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当初，华亭地方的人物，从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使莫如忠及其儿子莫是龙，都以擅长书法著称。董其昌后起，超越各家。他起初学习米芾，后自成一体，名闻外国。他的绘画，在集宋、元各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自创新意，形成潇洒生动的画风，这并非人力可以达到的。四面八方的金石刻词，如果能得到他的撰文和书丹，被认为是“二绝”。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求书画，他的一小幅画或一封短信，流传到社会上，人们竞相购买珍藏。他又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家得到他有关的片言只字，都十分重视。他生性随和，平易近人，精通佛理，谈吐高雅，整日无一句世俗语。人们把他比作米芾、赵孟頫。同时以书法著名的人，有临邑的邢侗、顺天的米万钟、晋江的张瑞图，当时人称之为邢、张、米、董，又称之为南董、北米。但其他三人，成就远不及董其昌。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为人洁身自好。夏言死后，经营他的丧事。擅长草书，诗文，也规整得体。莫是龙，字云卿，后以字通行，又改字廷韩。他十岁时就能写文章，长大以后也擅长书法。皇甫汈、王世贞等人对他交口称赞。临终仍是贡生。

邢侗，字子愿。万历二年中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卿。他

有巨万家产，在古犁丘上修筑来禽馆。他不惜出卖家产招待宾客，因此家道衰落。他的妹妹慈静，善于摹仿他的书体。

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遭魏忠贤的党羽仇文焕的弹劾，于是被免官。崇祯初年，起用为太仆少卿，死于官任。

张瑞图这个人，官至大学士，是名列逆案的宦官党羽。

【原文】

（魏连科 译）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者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还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文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年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所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傅。福

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强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浙江布政使。洁修自好。夏言死，经纪其丧。善草书，诗文有体要。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更字廷韩。十岁能文，长善书。皇甫汈，王世贞辈亟称之。以贡生终。

邢侗，字子愿。万历二上进士，终陕西行太仆卿。家资巨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减产奉客，遂致中落。妹慈静，善仿兄书。

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江西近察使。天启五年，魏忠贤党仇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祯初，起太仆少卿，卒官。

张瑞图者，官至大学士，逆案中人也。

徐渭传

——《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生，晚年号青藤道士，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一生科场不利，秀才出身，多次乡试不第，故一生没做过官。中年做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僚，颇得赏识。胡宗宪下狱，徐渭惧祸而发狂，杀死妻子，被判死刑，乡人张元忭营救，得以免死。后游历北边诸边塞，郁郁而终。

徐渭是明代中期的博学多才的艺术家。工书法，以行草见长，运笔超逸圆浑，纵逸飞动，源于苏轼、米芾，而形成自己的书风。善绘画，以花鸟著称，用笔放纵，水墨酣畅，重写意神似，不规于笔画之间，对后世大写意画有较大影响。同时他还是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著有《南词叙录》和《四声猿》杂剧。诗文亦称一时之妙，诗有李贺之奇，文有苏轼之辩，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等。

徐渭，字文长，是山阴县人。十多岁时即摹放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一文，长大以后，拜同乡季本为师。在做秀才时，即很有名气。总督胡宗宪聘请他为幕僚，他和歙

县人余寅，鄞县人沈明臣共同掌管文书。胡宗宪得到一头白鹿，将要献给朝廷，让徐渭起草进献表文，胡宗宪将他作的表文和其他幕僚所作的表文一起寄给和胡宗宪关系很好的一位学士，请他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篇进呈。这位学士选中了徐渭的表文进上，明世宗看了以后很满意，于是更加宠信胡宗宪，胡宗宪因此也更加敬重徐渭。胡宗宪曾在烂柯山宴请部下的将领，酒席进入高潮，乐队奏起乐曲，沈明臣当场作了《铙歌》十首，其中有两句说：“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胡宗宪听罢，站起来走到沈明臣身侧，将着他的胡子说：“沈先生真有你的，诗句这样雄壮痛快！”当场命令将此《铙歌》刻碑上石，胡宗宪对沈明臣和徐渭一样爱重。总督官高位显，威风凛凛，气氛严肃，将吏在胡宗宪面前，不敢抬头正眼相看，徐渭却以平民的装束，和胡宗宪彼此彬彬有礼，纵情畅谈。总督府如有紧急事情要徐渭办理，即使在深夜里也会大开府门，等待徐渭。有时因徐渭喝醉酒，不能前来，胡宗宪还去看望他。余寅、沈明臣二人也自视甚高，以耿直受到礼遇。

徐渭懂得军事，好出奇计，胡宗宪捕获海盗徐海，诱捕王直，徐渭都参与谋画。徐渭依仗胡宗宪的势力，专横无礼。后来胡宗宪因事被捕入狱，徐渭担心大祸临头，因害怕而发狂，用大锥刺自己的耳部，刺进好几寸深，又用锤子砸碎阴囊，但都没有致命。不久又把续娶的妻子杀死，被判为死罪，监禁等待处决，他的同乡张元忭极力营救，徐渭才没被处死。后来徐渭游历金陵，又北至宣府、辽州，考察边塞的形势，在考察边塞时，结交了李成梁的几个儿子。又进京，住在张元

忤家。张元忬引导他遵循礼法，徐渭听不进去，过了很久，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张元忬逝世，徐渭身穿孝服去吊唁，手扶尸棺，大声痛哭，没向丧家说出自己的姓名走开了。

徐渭的天赋很高，诗文的成就超出同时代的文人。他又擅长草书，兼工绘画，善画花草竹石。他曾自我评价说：“我的书法是第一，诗词第二，文章第三，绘画第四。”他生于嘉靖年间，当时王世贞、李攀龙倡导成立“七子社”，诗人谢榛因是平头百姓被排斥。徐渭气愤他们以官势压百姓，发誓不加入他们一派。过了二十年，公安人袁宏道游历浙江，得到徐渭著作的残篇，拿给国子监祭酒陶望龄看，二人非常欣赏，于是把他的文章刊刻传世。

（魏连科 译）

【原文】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和《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苍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将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令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什，宗宪禽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籍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刺耳，

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阨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冤压韦布，誓不入二入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沈周传

——《明史》卷二九八

【说明】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江苏吴县人。一生隐居不仕。他是明中叶著名画家，与唐寅、文征明、仇英被称为明代四大家。他的画艺得自家传，后又学董源、巨然、吴镇，自成一家。他擅长画山水，早年多画小幅，晚年始拓为大幅。他用笔豪放，沉厚，于豪放之中又有细腻之笔。明人王稚登《丹青志》列其画为神品，称明代第一。沈周又长于诗文书法，他文拟《左传》，诗学白居易、苏轼、陆游，字学黄庭坚。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

沈周，字启南，是长洲人。他的祖父沈澄，永乐年间地方官以人材科目推荐他，他不应荐。他住的地方叫做西庄，整日设宴招待朋友，人们比他为顾仲英。沈周的伯父沈贞吉、父亲沈恒吉，都隐居不肯出来做官。他们建造了有竹居，兄弟二人在里面读书，他们诗写得很好，又擅长绘画，连他们的奴仆也粗通文墨。同乡有个叫陈孟贤的人，是陈五经（字继之）的儿子。沈周小时候跟他学习，指示做学问的门径。沈

周十一岁时，去南京游历，作了一首百韵诗，呈送巡抚侍郎崔恭。崔恭当面让他做《凤凰台赋》，沈周提起笔来，不加思索，马上就写成了，使崔恭大为惊异。他长大以后，什么样的书他都读过。他的文章摹仿《左传》，诗摹仿白居易、苏轼、陆游、书法摹仿黄庭坚，他的诗文书法，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他最长于绘画，评论界认为他是明代第一家。

郡太守想以贤良的科目推荐沈周，他用《易》卦占卜，占得《遁》卦的九五，于是决心隐居不仕。他居住的地方有潺潺流水，茂林修竹，亭台馆阁，美不胜收，图书字画，钟鼎彝器，充满左右，四面八方的著名学者经常和他来往，文采风流，天下闻名。他对双亲特别孝敬，父亲逝世后，有人劝他出来做官，他回答说：“你不知道我母亲把我看作命根子吗？我怎么能离开她老人家。”他平时很讨厌进城，于是在城外找了一处临时住所，有事就去一趟。他到了晚年，唯恐隐居得不深，担心外人了解他的踪迹，先后任江南巡抚的王恕、彭礼等人都对他优礼有加，想留他做幕僚，他以母亲年老谢绝了。

有位郡太守征召画工绘饰墙壁，沈周同乡中嫉恨他的人，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于是沈周被抓去服役。有人劝沈周，让他去走走权贵的门路，可以免去服役，沈周说：“我前去服役，这是我的义务，如果去走权贵的门路，不是自找侮辱吗！”终于服完役后才回家。不久，那位郡太守进京朝见皇帝，吏部官员问他：“沈先生身体好吗？”那位郡太守不知怎样回答，就漫不经心地说：“他身体很好。”他又见到内阁学士李东阳，李问他：“沈先生有书信让你带来吗？”郡太守愕然不知所措，又

胡答胡应地说：“有书信，但还没送到。”他退出以后，慌慌张张去拜访侍郎吴宽，问道：“沈先生是什么人？”吴宽详细地向他说了沈周的情况。郡太守问左右的人，才知道就是绘饰墙壁的那个画工。郡守回到任所，去沈周家拜访，当面一再道歉，并要在沈家吃饭，沈周招待他以后，郡守才离去。沈周因侍奉母亲，一生不出远门。他母亲九十九岁时逝世，当时沈周也八十岁了。又过了三年，正德四年逝世。

（魏连科 译）

【原文】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牧宾，人拟之顾仲瑛。伯父贞吉，父恒吉，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藏获亦解文墨。邑人陈孟贤者，陈五经继之子也。周少从之游，得其指授。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及长，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评谓为明世第一。

郡守欲荐周贤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奉亲至孝，父歿，或劝之仕，对曰：“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奈何离膝下。”居恒厌入城市，于郭外置行窝，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后巡抚王恕、彭礼咸礼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辞。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倡费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

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覲，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牒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素饭，饭之而去。周以母故，终身不远游。母年九十九而终，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刘墉传

——《清史稿》卷三〇二

【说明】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擅长书法，尤以小楷见长。他的书法学颜真卿、苏轼，上溯钟繇，墨色厚重，貌丰骨劲。人称之为“深墨宰相”。因他久侍内廷，又官居高位，因此他的书法对清代影响颇大。与同时人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

刘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中进士，从翰林编修升任为翰林侍讲。乾隆二十年，他的父亲刘统勋犯了失职罪，连刘墉也罢了官，逮捕入狱。后来皇帝宽谅了刘统勋，赏刘墉为翰林院编修、提督安徽学政。他上书朝廷，请求州县官员束约当地贡生监生的不法行为，并责成州县考察他们的优劣。又提督江苏学政，上书陈述府县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他们怕刁民，怕贡生监生，也怕办事的吏员衙役，软弱无所作为。皇帝嘉奖他懂得政事，命令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大力清除这种不良风气。朝廷任命刘墉为山西太原府知府，又升任冀宁道道台。因他任知府时对下属的

贪污行为失察，发配到西北军中效力。过了一年放回京城，命他在修书处办事。不久，因他的父亲刘统勋有功，加恩于刘墉，皇帝下令仍用他为知府，于是任他为江苏江宁知府。在任有为官清正廉洁的名声。又升他为陕西按察使。因父亲去世，在家守丧，丧期满后，任他为内阁学士，在南书房主事办案。迁任户部、吏部二部侍郎。又外任为湖南巡抚，迁任左都御史，仍然在南书房办事。皇帝命他和尚书和坤一起去山东审理巡抚国泰贪污一案，审理得实，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充任上书房总师傅。又代理直隶总督，任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因他是诸皇子的师傅，但久不入书房尽师傅之责，被降为侍郎衔的官员。不久，任他为内阁学士，三次升迁为吏部尚书。嘉庆二年，任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命他和尚书庆桂一起去山东审察条件，并调查黄河决口的情况，他上书请求拓宽疏浚下游的河道。嘉庆四年，加太子少保衔。他上书陈述漕运事务，反映有关部门僉派漕运夫役不严肃从事，以致发生中途盗米情况，因而有凿破船只沉入水中的事情，有的把船舵和桅杆也卖了，虽然有船而不能使用，他请求命令各省派漕运夫役应从富实人家挑选。他的建议都得到批准执行。嘉庆九年去世，终年八十五岁，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衔，并入祀贤良祠，赠谥号为“文清”。刘墉擅长书法，在当时很著名。

（魏连科 译）

【原文】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

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仍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复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浚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金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橈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金了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于时。

戴熙、汤贻汾传

——《清史稿》卷三九九

【说明】戴熙（公元1801—1860年），字醇士，号鹿床、井东居士等，钱塘（今杭州市）人。道光十二年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兵部右侍郎，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太平军破杭州，赴水死，戴熙擅长书法绘画，山水学王翬，为世人所重。著有《粤雅集》、《习苦斋画絮》等。

汤贻汾（公元1778—1858年），字若仪，号雨生、琴隐道人、粥翁，江苏武进县人。因父亲和祖父都以死效忠清王朝，而世袭云骑尉，官至浙江乐清协副将。侨居南京，太平军破南京，投水死。汤贻汾擅长绘画，山水、墨梅、花卉、细致秀逸。也工书法。与戴熙并称为“汤戴”。著有《琴隐园集》、《画鉴析览》等。

戴熙，字醇士，是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任为翰林院编修。大考中名列二等，提升为赞善，又升为中允。道光十八年，入南书房办事。任提督广东学政，任期满后，请假回乡侍奉父母。道光二十五年，在家守孝期满，没有补官。复任提督广东学政，历升至内阁

学士。道光二十八年，任兵部侍郎，仍在南书房办事。

在此之前，广东官民为阻止英军进入广州城，双方相持了数年。至道光二十九年，英国人慑于民愤，在和谈中暂时放弃进城的要求。道光皇帝非常高兴，认为议和官员立了大功，封总督徐广缙为子爵，巡抚叶名琛封为男爵。当时正值戴熙入朝应对，谈起这件事。戴熙反映，他对广东的民风一向熟悉，总督、巡抚反映的情况，恐怕是夸大其词，是不可信赖的，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皇帝又命他书写扇面。戴熙在书写中用了不规范的帖体字，皇帝下旨进行斥责。过了一阵，命人书写南书房的匾额，太监传旨指名让戴熙的同僚张锡庚书写，并告戒不要让写错字的戴熙书写。不久，就不让他在南书房办事了。戴熙明白自己失宠了，于是称有病请求另任，皇帝更加恼怒，降为三品京官令他退休。

咸丰初年，皇帝下令选拔人才，尚书孙瑞珍推荐戴熙，征召他来京听候委任，因生病未能成行。粤匪占据江宁，浙江全省戒严。戴熙会同地方官员富户倡导捐款捐物，操练地方武装。咸丰八年，粤匪从江西骚扰浙东，戴熙协助巡抚晏端书筹划军粮，向相邻地方请求援助。援兵开到，贼兵没有得逞，渐渐退去。因操练地方武装有功，给他加二品顶戴。杭州起初有民兵八百人，又挑选了几百勇士，局势缓和下来以后，军饷缺乏，民兵人数裁减了一半，咸丰十年，粤匪从安徽广德攻入浙江，一连攻下数县，进犯湖州、武康。戴熙把他所属的地方武装交按察使段光清指挥，他会同满兵防守独松、千秋等关隘。贼兵来攻，则收兵进城坚守。戴熙认为，独守孤城是用兵的大忌，应分兵驻扎在城外，互为犄角，他又

建议乘贼兵刚到，应给以迎头痛击，他的建议都没有付诸实行。戴熙和他的弟弟戴涛防守城西北角。开炮击毙身着黄衣的贼首一人，贼兵很快退藏在山后。众人认为贼兵逃走，戴熙料定这是敌人诡计，派人侦察，果然贼兵转向西南方向。贼兵不分昼夜围攻，因长时间下雨，士卒疲惫不堪。贼兵从宋代的镇湖门旧址挖洞，用火药炸城，于是城被攻破，戴熙跳水自尽。他的弟弟戴煦，弟媳金氏，以及外甥王朝荣一起殉难。他的事迹奏报给朝廷，追赠他尚书衔，建专门祠堂祭祀，赠给他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赠谥号为“文节”。他的弟弟戴煦，精于算学，别有传记。

戴熙的爱好高雅不欲，尤其善于绘画。在他被任命为广东提学使时，到金殿辞行，道光皇帝对他说：“古人从事绘画，必须行万里路。你此行能遍经各地山川，画技会大有长进。”他是这样受皇帝重视。后来因直言敢谏被罢官。他殉难后，更受到世人的敬重。同时人汤貽汾绘画负有盛名，和戴熙不相上下。汤貽汾也在江宁殉难，又一起以忠义著名，世人称之为“戴汤”。

汤貽汾，字雨生，是江苏武进县人。他的祖父汤大奎，官至福建凤山知县，因守城遇难，他的父亲汤苟业也同时而死，事见《忠义传》。汤貽汾少年时即才华横溢。家境贫寒，因祖父殉国，他承袭世职，被任为守备，历升至浙江乐清协副将。他任职以善于治军缉捕盗贼著名。为人崇尚气节，擅长赋诗作画，他的政绩和文章被当时人所推重。晚年辞职侨居江宁。到粤匪强盛时，他看到国事危急，对人说：“我已经七十七岁了，祖祖辈辈的忠孝传家。倘有不幸，只有为国舍身，去地

下见先人。”江宁城筹备防御工事，大官经常向他询问有关事宜，汤貽汾也知无不言，协助筹划。城破之后，他从容地写下绝命诗，跳水自尽。事情奏给朝廷，咸丰皇帝因他家三代为国殉难，下旨从优抚恤，加赠一级云骑尉，赠谥号为“贞愍”。

【原文】

（魏连科 译）

戴熙，字醇士，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赞善，迁中允。十八年，入直南书房。督广东学政，任满，请终养。二十五年，服阕，未补官，复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仍直南书房。

先是，广东因士民阻英人入城，相持者数年。至二十九年，英人惧于民怒，暂罢议。宣宗嘉悦，以为奇功，锡封总督徐广缙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会熙召对，论及之。熙言广东民风素所谙悉，督抚所奏，恐涉铺张，非可终恃，上不悖。寻命书扇，有帖体字，传旨申饬。越日，命南书房书匾额，内监传谕指派同直张锡庚，戒勿交写误字之戴熙。未几，罢其入直。熙知眷衰，称病请开缺，上益怒，降三品京堂休致。

咸丰初，诏举人才，尚书孙瑞珍以熙荐，召来京候简用，因病未至。粤匪踞江宁，浙江戒严。熙偕官绅劝谕捐输，举行团练。八年，粤匪由江西扰浙东，熙助巡抚晏端书筹调兵食，乞援邻境。援师至，贼未得逞，渐退。以治团练劳，加二品顶戴。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又选锋数百，事缓，以资绌，减少半。十年，粤匪由安徽广德入浙，连陷数县，犯湖

州、武康。熙以所部练勇付按察使段光清，会旗兵防独松、千秋等关。贼至，敛兵入城守。熙谓用兵无独守孤城之理，宜分营城外相犄角，又议乘贼初至迎击，皆未行。熙与弟焘助守西北隅，炮毙黄衣贼一人，贼遽退匿山后。众谓贼且遁，熙料其诈，侦之，果转赴西南。昼夜环攻，久雨，兵疲。贼于宋镇湖门故址穴地轰城，遂陷，熙赴水死之。弟煦、媳金、及甥王朝荣，同殉，事闻，赠尚书衔，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弟煦，精算学，自有传。

熙雅尚绝俗，尤善画。当视学广东，陛辞，宣宗谕曰：“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其见重如此。后以直言黜。及殉节，遂益为世重。同时汤貽汾画负盛名，与熙相匹。亦殉江宁之难，同以忠义显，世称戴、汤云。

貽汾，字雨生，江苏武进人。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守城殉节，父荀业同死，见《忠义传》。貽汾少有隼才。家贫，以难荫袭世职，授守备，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历官治军捕盗有声。尚气节，工诗画，政绩文章为时重。晚辞官侨居江宁。及粤匪炽，貽汾见时事日亟，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江宁筹防，大吏每有咨询，尽言赞画。城陷，从容赋绝命词，赴水死。事闻，文宗以其三世死事，特诏优恤，加一云骑尉，谥贞愍。

翁方纲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说明】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今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他是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书法家。他精于古物的鉴赏，经他考证题跋的碑帖很多，见解颇精。他的书法学欧阳询、虞世南，书风古朴厚重，文人气颇浓，又能篆隶。他与同时书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至于学问的渊博，其他三人则不能望其项背。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瘞鹤铭考》、《苏东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石州传话》等。

翁方纲，号覃溪，是大兴县人。乾隆壬申年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散馆后被任为编修。升任国子监司业，累升至内阁学士。他曾先后主持江西、湖北、顺天的乡试，提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参加朝廷举行的千叟宴。嘉庆四年，降为鸿胪寺卿。嘉庆十二年，再次任乡试主考官，赐他为三品衔官员。嘉庆十九年，再次为会试考试官，赐他二品官衔，当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又过了四年便去世了。

翁方纲潜心研究经学，他认为考据这门学问，应以思想内容为中心，《论语》上说“多闻”、“阙疑”、“慎言”，只有作到了这三个方面才能发挥考据的作用。当时钱载斥责戴震的考据之学支离破碎，肢解了古代圣王的思想学说，翁方纲说：“考据名物制度，怎么说是支离破碎？经考据训诂，然后才能理解思想内容；但戴震认为，古代圣人的思想学说，一定从名物制度中求得，那也不尽然。”

翁方纲遍读群经，著有《书经附记》、《礼经附记》、《论语附记》、《孟子附记》，并撰著《经义考补正》。尤其精通金石之学，所写的《两汉金石记》，分析入微，参考《说文解字》和经书注解，考证非常精确。他作诗，能把经书的注疏、史书的考证，金石文字的考释整理，融会贯通熔铸在诗句中。行家认为，他能以学术为题材来作诗。其他著有《复初斋全集》、《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魏连科 译）

【原文】

翁方纲，号覃溪，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预千叟宴。四年，左迁鸿胪寺卿。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

包世臣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包世臣(公元 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小倦邈阁外史,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中举人,官至江西新喻知县。他关心晚清时政,对农政、漕运、监政、货币、鸦片等方面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擅长行、草、隶书,酷爱魏碑,大力倡导北朝书派,对明清以来圆润肥浓的馆阁书体,提出有力的挑战,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安关四神》,其中《艺舟双楫》下篇专门讨论书法理论,得到书苑的推重。

包世臣,字慎伯,是安徽泾县人。少年时即擅长词章之学,并有治世的才略,很喜欢谈论军事。嘉庆十三年中举人,因三次没有考中进士,被选为知县备员,发往江西。初任新喻县代理知县,就被弹劾离职。后来又随明亮征伐四川、两湖,他筹划的奇谋不被采纳,便回到故乡,居住在金陵。包世臣为人精明强悍,又富有口才,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来往于公卿大臣之间。东南各地的高级官员每遇上军事、灾荒、河患、漕运、盐政这类政务大事,都屈尊向他求教,包世臣也就侃侃而谈,说出自己

的见解。

当初，海盗蔡章抢掠上海，镇道官员把包世臣接来，考察沿海岛屿。他看到黄浦江停泊着许多商船，有上千艘，于是他建议，利用海运，可以消减漕运的弊端。他在游历袁浦时，正值黄河论争，于是他著作《策河四略》一书。当时的盐产，两淮为最大的产盐地，因而两淮地区，走私商贩充斥其间，官员们议论，都主张应该进行缉捕。包世臣的意见是，要大量裁减盐官，只留盐运司来主管钱粮的收征，盐场大使监督煮盐的灶户，不划分范围，仿效现行的铁冶、硝石的管理成例，允许商贩在本地领取官方发的执照，去盐场交税买盐。各州县有记录，盐运司有支盐存根，这样盐场官员就不能侵吞盐斤；由于转运迅速，盐价必然大幅度下降；因私盐交纳官税，赋税收入必然成倍增加。用这些钱作为公务津贴，并且可以增加翰林院、詹事府和各科道官员的薪水，这是一项便民利国的措施。

他论及西北水利时说：“现在国家每年从南方漕运四百万石粮食至西北，这是中等年景二百万亩好田的产量。如果有四百万亩地，每年的收入与佃户对半分，就可以与全年的漕运量相等。可以先减运十分之一，把十分之一的谷子卖出，加上运费，用这些钱在西北经营官方屯田，每年递减十分之一，用十年的时间，可以完全停止漕运，赋税收入可以宽裕。用剩下的钱增加军饷，这样官员可以做到清廉，士兵也可以得到操练。不然的话，把东南的粮食漕运供应西北，加上超额的征收和损耗，会一天比一天严重，竭尽民力，招致积怨，东南地区的祸患，必定由此而发。”

包世臣能在国家大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论书法的文

字尤其精辟，他的行书、草书、隶书作品，被世人所珍贵。他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另编为《安吴四种》。（魏连科 译）

【原文】

包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一权新喻，被劾去。复随明亮征川、楚，发奇谋不见用，遂归，卜居金陵。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谘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初，海盗蔡牵犯上海，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游袁浦，值河事亟，箸《策河四略》。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私梟充斥，议者争言缉私。世臣拟多裁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督灶户，不分畛域，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官印照，赴场缴课买盐。州县具详，运司存核，则场官不能干没正课；而转输迅速，则盐价必锐减；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以之津贴办公，并增翰、詹、科、道廉俸，为计甚便。

其论西北水利曰：“今国家南漕四百万石，中岁腴田二百万亩所产也。有田四百万亩，岁入与佃半之，遂当全漕，先减运十之一，崇其谷及运资置官屯，递减至十年，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馀量加赋饷，而官可廉，兵可练。不然，漕东南以贍西北，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

世臣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

何绍基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蝥叟，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他毕生从事经史及《说文》的考证，旁及金石律算。又能诗，论诗推重苏轼、黄庭坚，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同时他还是晚清的著名书法家，学唐人颜真卿，上溯魏碑，形成遒劲峻拔的书风。何绍基的书法作品，现存世公私收藏很多。著有《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钞》等。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他是尚书何凌汉的儿子。道光十六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任为翰林院编修。何绍基继承家学，少年时就有名声。阮元、程恩泽都很器重赏识他。历次主持福建、贵州、广东等省乡试，每次主考都发现不少人才。咸丰二年，提拔他为四川学政。进京朝见皇帝，皇帝询问的他的家世和学业，同时也问及当时的政事。何绍基对皇帝的召见，感恩戴德，一心想建言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便不时地向朝廷陈述地方上各种情况，最终因他对当

时的政务提出建议被降职而回乡。后来历任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的院长，他教授生徒，鼓励他们学习切实有用的学问。同治十三年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何绍基博通经史，精于律算之学，他曾据《大戴记》考证《礼经》，对《礼经》中所记载的礼仪制度，能够融会贯通，解释十分精确。他又撰著《水经注刊误》。对于《说文解字》的考证，工力尤深。他的诗风与黄庭坚类似。嗜好金石文学，精于书法，他起初学颜真卿，又遍临汉、魏各种碑帖上百遍。他运肘握笔，用心思想，笔下追寻，于是自成一家之体，世人对他的书法作品都很珍视。他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他的弟弟何绍京，字子愚，也擅长书法，用笔和他的哥哥很相似。

他的孙子何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任中书舍人，历升至道员。擅长书法绘画，书法摹仿他的祖父。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清亡后逝世，终年八十余岁。

与何维朴同时以书法著名于上海的，还有李瑞清，字梅庵，是临川人。光绪二十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任为道员，分管江苏，代理江宁提学使，兼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暴发，江宁新军也哗变，配合浙军攻打江宁城，城中官吏都偷偷逃走，只有李瑞清独自留下，不肯逃走，仍然每天带领学徒们上课，和平时一样。布政使樊增祥弃职逃走，朝廷令李瑞清接替樊的职务。他紧急购买三十万斛米供应官军，并帮助官兵守城，开设平糶局，救济难民。江宁城被攻破，李瑞清衣冠整齐端坐在大堂上，誓死不屈。民军不忍心杀害他，放他逃走。于是他把府库加封，把

钥匙和收支簿交给当地士绅，库内还积存白银数十万两。从此他改装为道士，隐居在上海，隐瞒姓名，自称为清道人，以卖书画为生。李瑞清作诗，崇尚汉、魏，汉、魏之下，学习陶渊明、谢灵运。他的书法，真草隶篆各体具备，尤其长于篆书、隶书。他认为篆书一定不要把李斯、李阳冰放在眼里，而应上学夏商周三代，才能算好。丁巳年张勋复辟，任他为学部侍郎。三年之后去世，赠谥号为“文洁”。

【原文】

（魏连科 译）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咸丰二年，简四川学政。召对，询家世学业，兼及时务。绍基感激，思立言报知遇，时直陈地方情形，终以条陈时务降归。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勸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又五。

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于《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于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所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弟绍京，字子愚。亦工书，笔法颇似其兄。

孙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为中书，累至道员。工书画，字摹其祖。久寓沪，国变后，卒，年八十余。

与维朴同时以书名海上者李瑞清，字梅庵，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江苏，摄江宁提学使，

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乱起，江宁新军亦变，合浙军攻城。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设平糶局，赈难民。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乃封藩库，以钥与籍嘱之士绅，积金尚数十万也。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

张裕钊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武昌人。咸丰元年中举，任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并从曾学古文。后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等书院。他是晚清桐城派，并深谙经学训诂，著有《左氏服贾注考证》、《今文尚书考证》、《濂亭文钞》等。同时他也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他学书从魏晋六朝入手，上溯汉隶，勤于临池，形成独特的书体，书名远扬。在他主直隶莲池书院讲席时，日本友人慕名前来向他学习书法。存世著名书迹有《南宫县学碑》等。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年时代，私塾先生教他科举的学业，他不高兴学。他家里只有一部曾巩的《南丰集》，经常偷偷阅读。咸丰八年考中举人，通过考试被任为内阁中书。曾国藩充当阅卷官，很欣赏他的文章，后来张裕钊来拜见，曾国藩对他说：“你莫非曾熟读曾巩的文章吗？”张裕钊听了，心里暗暗高兴。不久，曾国藩又向他讲解文章成败的原因以及唐、宋以来的传统，张裕钊的学业大有长进，认识到以前所作的文章，平庸近俗，于是，对于司马迁、班固、司

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书，没一天不诵读。他又精于书法，从魏晋人书法入手，上溯汉隶的笔意，练字非常勤奋，不曾一日停笔。曾国藩立了大功以后，他的门人弟子很多人做了大官。张裕钊跟随曾国藩数十年，只有他从事学问。曾国藩作文章，取法桐城派，再附以汉赋的风神，他尤其喜欢张裕钊的文章，他曾说：“我的弟子中可望有成就的，只有张、吴两个学生。”指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

张裕钊文字工夫很深厚，先后主持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个书院，造就了很多人才。他曾说：“作文章以思想内容为主，文词要求能表达思想，文气要能调动文词，比如行车，思想内容是掌握方向的驾车人，文词是所载之物，文气则是车行的动力。要想学好古人的文章，开始时在诵读之中掌握它的文气，掌握了文气，那么对它的思想内容和文词往往理解得更深，读书的方法不外乎是这些了。”人们认为这是深得文亭三昧的言论。他著有《濂章文集》。

张裕钊的学生中最出名的，有范当世、朱铭盘。范当世，字肯堂，是江苏通州的秀才。善于写诗，吴汝纶曾感叹他的诗气势纵横，不可阻挡。著有《范阳子诗文集》。朱铭盘，字曼君，是泰兴的举人。曾任知州，他的学问长于史学，同时也擅长诗和古文词。他著有《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以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原文】

（魏连科 译）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岂尝习子

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寤前此所为犹凡近，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诵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国藩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裕钊文字渊懿，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世以为知言。著《濂亭文集》。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于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傅山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傅山（公元1602—1683年），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号很多，如公之他、朱衣道人、啬庐等，阳曲（今山西太原市属县）人。明末，因营救袁继咸，名声动天下。明亡后，坚不出仕，朱衣道冠，居土窑。康熙十年举博学鸿词，强征至京，傅山以死相拒，放还。诗文书画都很有名，他的书法奔放不羁，流畅自然，尤以草书见长，他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他的书风正是如此。又擅长医学，长于妇科。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

傅山，字青主，是山西阳曲县人。他六岁时只吃黄精草，不吃粮食，强迫他吃，他才吃饭。他读书过目就能背诵。明朝末年，天下将有大战乱，那些名为士大夫的人，大都迂腐不堪，傅山为此很气愤，于是他含辛茹苦坚持气节，绝不屈节媚时。提学使袁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告，张孙振是宦官魏忠贤的党羽。傅山约同学曹良直等人去通政使衙门，三次上书替袁继咸申诉，巡抚吴生也认为袁继咸无罪，于是得以昭雪。傅山从此名闻天下。甲申年明朝灭亡后，他改为道士装，

身穿大红道袍，住在土窑洞里，侍奉母亲。袁继咸在九江被俘，押往北京，他把在患难中作的诗寄给傅山，信中说：“我不敢有愧于我的朋友！”傅山看了来信失声痛哭，说道：“我也不敢辜负大人的期望！”

顺治十一年，傅山因河南案件的牵连被捕，他坚贞不屈，绝食九天，几乎饿死。他的弟子中有人想出绝妙的计策营救他，因而得以免祸。但傅山非常悔恨，以为不如早些死了为好，因而他整日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一天也不停止，盼望恢复明朝。等到天下大局已定，他才出门和人交往。

康熙十七年，朝廷举行博学鸿词考试，给事中李宗孔荐举他应试，他坚决推辞。有关部门用强制的手段，让夫役们把他捆在床上，抬着他进京。来到离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先来看望他，公卿大臣全都来到，傅山躺在床上，也不施迎送礼。魏象枢向皇帝上奏，说傅山年老有病，皇帝下令可免他考试，给他加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冯溥强迫他进宫谢恩，派人抬着他去，傅山看到大清门，止不住泪流满面，昏倒在地。魏象枢上前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第二天就要回乡，大学士冯溥以下的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傅山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可以摆脱干扰，没有牵累了！”接着他又说：“如果后世人称许许衡、刘因那样称许我，我死不瞑目！”听到的人，都啧啧咋舌，大惊失色。傅山回到家，地方大官都到他家去看望。傅山无论冬夏，都穿一身布衣，自称为“民”。有人说：“你不是内阁中书舍人吗？”他不加理睬。他死后，用大红衣、黄冠来殡敛。

傅山擅长书法绘画，他说：“写字要宁拙勿巧，宁丑勿媚，

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人们认为这话不只是在论书法。他的诗文，起初学韩愈，文风倔强，自鸣得意，后来的文章则是信笔写来，民谣俗语，都从笔下流出，但他不希望以此名家。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他的儿子傅眉，比他先死，傅眉的诗作也附在《霜红龕集》之后。

傅眉，字寿髦。他每天出去打柴时，把书箱放在担子上，休息时就取出诵读。傅山常去各地卖药，他和傅眉共推一辆车，晚上住在旅店里，灯下教儿子读经书，傅眉也刻苦力学，能继承他父亲的学问和志向。他和人谈起中原文献，滔滔不绝。傅山喜欢喝苦酒，自称老蘗禅，傅眉则自称小蘗禅。

（魏连科 译）

【原文】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用坚苦持气节，不少。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天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愧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粮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

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愿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读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蘗禅，眉乃称小蘗禅。

王澍、王文治、梁巘、梁同书、 邓石如、吴熙载传

——《清史稿》卷五〇三

【说明】王澍（1668—1743），字若林，号虚舟，江苏金坛县人。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擅长书法，各体皆工，学唐人褚遂良、欧阳询。翁方纲以为，他的“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著有《淳化阁帖考正》。王澍传后附有蒋衡、徐用锡的传记。

王文治（1730—1892），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人。乾隆三十五年探花，官至翰林侍读。他的书法，以董其昌为宗，远学唐人李邕，宋人张即之。在当时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著有《梦楼诗集》、《赏雨轩题跋》等。

梁巘，字闻山，亳州（今安徽亳县）人。乾隆二十七年中举人，官至四川巴县知县。辞官后，主讲寿春书院。他以擅长唐人李邕书体而著名，对用笔方法及笔势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书法与梁同书齐名。梁巘为“北梁”，梁同书为“南梁”。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年又署石翁、新吾长，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会试落第，乾隆皇帝因

其是大学士梁诗正之子，特准予参加殿试，官至翰林侍讲。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后兼学苏轼、米芾，书风苍劲。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齐名。著有《频罗庵遗集》。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笈浙道人，怀宁（今安徽安庆市）人。擅书法，精篆刻。他的篆书在汉碑篆额及李阳冰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沉雄朴厚的风格。隶书功力很深，稍变汉隶笔意，形成楷隶之间的书体，对后世影响很大。邓石如自称：“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并非是自诩之言。他的篆刻得力于书法，苍劲庄重，流利清新，冲破当时一味摹仿秦汉印的风气，世称为“皖派”。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邓石如传后附有钱伯垌、吴育、杨沂孙等人的传记。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他的书法学习包世臣，创北朝书派，字体凝重古朴，这种书体对清代的馆阁体书法是有力的冲击。吴熙载又长于篆刻，学邓石如刀法，参以汉印，刀法流畅，遒劲凝练，发展了“皖派”篆刻艺术。著有《师慎轩印谱》、《吴让之印谱》等，吴熙载传后附有梅植之、杨亮的传记。

王澐，字若林，号虚舟，是江南金坛县人。学问渊博，文章写得很漂亮，尤其以书法著名。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职，历升至户科给事中。雍正初年。皇帝下令把六科隶属于都察院。王澐认为，六科的官阶负责对大臣起草的诏旨进行审察，或原封退还，或加以改正，官员虽低，但责任重大，如果隶属都察院，它的参驳职能就被废除了，一起

和同僚崔致远、康五端上疏力争。世宗大怒，当即把他召来责问，王澍耐心地解答，皇帝的怒气才平息了一些。于是改任他为吏部员外郎。过了两年，请假回乡，更加苦读，名扬海内。他遍临古代著名碑帖，真草隶篆都写得很好。他学习唐人欧阳询、褚遂良两家的书法，用力最深，常常通过题跋写出自己的心得。后来与内阁学士翁方纲的看法不一致，翁方纲认为王澍的篆书继承了古人笔法，行书就差一些，楷书则更差。王澍所著的题跋和《淳化阁帖考正》都流传于世。

自从明清之际以来，擅长书法的人，河北以王铎、傅山最为有名，继此之后，江南的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铤、张照等人，接着兴起，他们的事迹见于其他传记。总的来说，他们的书法渊源出于文征明、董其昌二家，王鸿绪、张照为董其昌的嫡派弟子，何焯和王澍的风格近于文征明。王澍论书法很著名，议论尤其详尽，为当时人所推崇。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年别号为拙老人。他和王澍是同乡。他闭门十二年，书写《十三经》。乾隆年间进呈朝廷，高宗下令把他书写的《十三经》在国子监刻石立碑，任蒋衡为国子监学正，但他不赴任。他早年喜爱出游，足迹走遍半个中国，去关中观摩碑林，得到晋唐人的著名的书迹，临摹了三百余种，称之为《拙存堂临古贴》。晚年和王澍相约比赛，每临摹一种书体，互相问难订正。他的儿子蒋骥、孙子蒋和，都能以书法继承家学。

蒋骥尤其擅长隶书，著有《汉隶讹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同时他也善于绘画。他曾说：“汉、魏字体不同，性质也不一样。书写汉隶时应悬臂用笔的中锋，用

力主要在于平稳。作画时用笔的提顿逆折，错落呼应，与作书法的道理是一样的。”都能阐明他先前的说法。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县人，寄籍大兴县。中举人后，于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向李光地问学，致力于乐律、音韵、历数、书法的研究。康熙五十四年，任会试阅卷官，他严厉拒绝说情，怨恨他为人反而唆使言官弹劾他把持会试事务，圣祖原谅了他，但最终仍由于闲言碎语被罢免，回到故乡。乾隆初年，起用他翰林院侍读，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不久就请假回乡，在家中逝世。徐用锡中举时，主考官是姜宸英，用锡和何焯当时同为李光地的门客，他的论书法文字，大都出入于姜、何二家学说。他精于鉴别古人的字画，讲用笔方法也多的心得。著有《字学札记》，收在《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是江苏丹徒县人。他天生就很聪明，十二岁时就能写诗，并且字写得很好。成人后到京城游历，跟随翰林院侍读。全魁出使琉球，因而他的诗文书法得以在海外传播。乾隆三十五年，考中探花，被任为翰林院编修。过了三年，在翰林院、詹事府的升职考试中，名列第一。提拔为侍读学士。外任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被降级，于是称病请求回乡。后来应该起用他任官，他对官场生活感到厌倦，于是就不再进官场。他往来于江、浙之间，曾在杭州、镇江等地书院任主讲。乾隆下江南，来到钱塘佛寺，看到王文治书写的碑文，非常喜爱。宫中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他，想让他出来任官，他也没有答应。

王文治喜好声色，出门总是带着一队歌舞乐队。研究音

律，达到很高深的境界，有客人来访，便令乐队演奏歌舞，整日整夜也不感到疲倦。海内求他书法的人，送来很多礼物，大都用于声色开销。但是，在客人走后，他默默地参禅打坐，整夜也不躺下休息。信奉佛家学说，他自称他的诗和书法，都体现了佛家学说。终年七十三岁。

他的著作，除《诗集》外，又有《快雨堂题跋》，从中也可以看到他论书的主张。他的书法成就和刘墉不相上下，人们称许说：“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他和姚鼐的交情最深，主张相投，二人当时的书法声誉，姚鼐不如王文治名声远播；后来包世臣极力推崇姚鼐的书法，把姚鼐的书法和刘墉的书法都列为上等，姚的名声反而居王文治之上。

梁巘，字闻山，是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考中举人，任官四川巴县知县。晚年辞职，任寿春书院主讲，以擅长李邕的书体闻名于世。起初他任咸安宫教习，来到北京，听说钦天监正何国宗曾因罪被关押在刑部，当时尚书张照也因罪在押，梁巘得到他们的书法作品，便去他们家请教。当时何国宗已经八十多岁，因病不能会客，派他的一个孙子来回传话。梁巘把他的见解说出来请何国宗指教，何国宗回答说：“你已经掌握了书法的真谛。”送给他亲自临摹的米芾、黄庭坚二种书贴。

后来梁巘对金坛人段玉裁说：“握笔的方法，用手指调动手臂，用手臂调动全身。握笔的姿式，以大姆指尖和食指尖相对，笔管竖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对形成环状，两指的根部以上形成水平，上面可以放一个酒杯。肘部平衡，腕部不贴书案，肘弯呈圆形，大、食二指和笔管放在胸前，调

动全身的力量，通过手臂，再集中在两指尖上。如果两指尖形不成环状，或形成环状而上面不平，就会握笔不紧，这样手臂的力量尚且发挥不出来，何况是全身的力量？笔握得紧，如果全身的力量能直接集中在指尖上，那还要手臂干什么？古人知道手指不能调动手臂，因此才用两指相接来固定笔管，直至笔管要被折断，手指痛不可忍，这样写出的字才有劲。只用拇指和食指握笔，称之为单勾；用拇指、食指、中指来握笔，称之为双勾。中指的作用，是用来辅助食指的力量，总的称之为‘拨灯法’。王献之七八岁时练字，王羲之从旁边抽他的笔，抽不动，王献之就是用这种方法执笔的。除去这种执笔法，其他都是歪门邪道。王羲之、王献之以后，至唐、宋、元、明各大家，人人相传就是这种执笔法，董其昌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司农王鸿绪，王鸿绪又传授给张照，我从张照那里得到的。本朝只有张照一人善于运用这种执笔法，其他人都不到家。王澎用笔，只领会这种方法的一半，蒋衡掌握了执笔方法而缺写字的乐趣。世人只说某某人的字没有大气，并不知大气用尽以后，才真是没有大气。这样执笔，则笔锋不偏，笔锋力透纸背，笔运行于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的，浓墨从笔画中间分开，中心象有一丝界限，这是笔锋的作用。这样执笔，必须用坚硬的纸来书写，软薄纸容易破裂。这样用笔，横、直、撇、捺，和现在人的写法完全不一样，笔锋的指向与笔画的走向相反，笔锋总是在每画的正中间，不稍稍偏离。古人所说的握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从这种执笔法中可以想见。”梁巘著述很少，他留下的论述仅这一样。他和同时的梁同书并称二梁，梁巘为“北梁”，梁同书为

“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年别号为山舟，是浙江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的儿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没有考中，乾隆皇帝特准他参加殿试，后来入翰林院任职，经过升职考试，被提拔为侍讲。梁同书对名利看得很轻，还不到老年，因病不再任职。晚年曾主持乡试，加衔以侍讲学士。九十三岁时去世。他爱好书法出于天性，十二岁时就能写大字。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学米芾，七十岁以后字风发生变化。书法著名于天下，求字者每天都送来数卷纸张，日本、琉球都珍重他的书法作品。

他曾与张燕昌讨论书法艺术，大致内容说：“古人所说的‘笔力直透纸背’，理解这句话应该象理解‘天马行空’那样。现在的人误认为把纸戳破，这和唐人惟俨和尚所说的‘看穿牛皮’一样，机械去理解，终究得不到正确的解释。所谓透纸，是形容笔力专注墨色充溢罢了，那些运笔和游丝一样的笔画，何尝不是透过纸背呢？用于腕的力量使极软的毛笔呈现出坚挺的力量，比如有人搀扶一个身体强壮的人，要他站直，不需要搀扶人用力；如搀扶一个衰弱的人，要想不让他倒下，自然搀扶的人把手腕的力气集中在两指的顶端。其实对于写字的人来说，只知道是手指的力量运笔，不知道腕力在起作用。藏锋的含意，并不是说笔锋象钝锥子那样，从来的书法家没有不出锋的，只不过在点画之间能把笔滞留住，不让它直接前行。笔毛要软，软笔能表现出笔锋的遒劲；笔锋要长，长锋运用起来灵便，笔要蘸饱，饱笔能表现出笔画的丰满，下笔要快，快能表现出书法家的意境。书法家称枯锋

为渴笔，画家也有枯锋，但渴、枯二字含义截然不同，渴只是形容笔画不圆润，枯则表现出一种死气。现在人喜欢用硬笔，所以才显得死。法帖是让人看的，不是让人临摹。现在的人只是象刻舟求剑那样，把古人的书法作品，一笔一画地临摹，象小孩临字一样，即便写得形似，哪有自己的特点？字要有神气，神气是从熟练中来。有神气就会有气势，字的大小、长短、上下、邪正，随笔势所至，自然流出，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却来不得一点故意安排，熟练以后自然领会其中的道理。写中锋的方法，关键是笔要提得起来，笔能提起，自然形成中锋，但也并不是一点也不兼用侧锋，总的是笔尖指挥运笔，虽然看起来不象中锋，实际上也是中锋。写得粗头乱脑，是不成其为字的，追求飘逸，反而粗野，追求古旧，反而笨拙，这里不可存有半点名利之心。”梁同书一向的书法主张，和梁巘主张的不同，具见上述。

邓石如，起初名叫邓琰，因避仁宗讳（颢琰），于是以字行世，改字为顽伯，是安徽怀宁人。因他家在皖公山下，又号为完白山人。他出生在偏僻的乡村，见闻很少，但他单单爱上石刻艺术，他摹仿汉人的篆文印章，摹刻得十分逼真。二十岁左右父亲去世，家里很穷，流浪到寿州，梁巘看到他的篆书气势雄浑，大为惊异，介绍他去见江宁的梅镠，梅镠是都御史梅穀成的儿子。梅家收藏多种古代金石善本，都拿出来，供邓石如观摩，并供给他衣食纸墨，让他专心学习。

邓石如爱好《石鼓文》，李斯的《峄山碑》、《泰山刻石》、汉代的《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苏建的《国山碑》，皇象的《天发神讖碑》，唐代李阳冰的《城隍庙碑》、《三愤记》

等。每一种各临摹一百本。他又苦于自己的篆书书体还不完备，于是抄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另外又搜集三代的钟鼎彝器，秦、汉的瓦当、碑额。练习了五年，篆书练成功。于是又学汉隶，临摹《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潘校官碑》、《孔羨碑》、《受禅碑》、《大乡碑》等，各临五十本。又练习了三年，隶书练成功。邓石如的篆书，学习李斯、李阳冰纵横开合的气势，从史籀笔法学来，稍稍掺进隶书的笔意，翕收笔的遒劲，字体略呈方形，与秦、汉的瓦当碑额篆体相近。他的隶书结构严整，综合了《峯山碑》、《国山碑》的笔法。他自称：“我的篆书赶不上李阳冰，隶书不在梁鹄之下。”

他在梅家客居了八年，学业成功，遍游名山大川，以书法和篆刻为生。他游历黄山，来到歙县，向古玩店出售篆书作品。编修张惠言对秦篆素有研究，当时他在修撰金榜家教书，偶然看到邓石如的篆书，对金榜说：“不想今天能看到李斯的真迹！”于是二人冒雨去破庙里拜访邓石如，金榜以待客礼仪把邓石如请进他家。又向尚书曹文植推荐邓石如，一起来到京城，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对邓石如的书法深表惊异，说道：“千百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作品！”当时京城研究篆隶的人，都推崇内阁学士翁方纲，翁方纲因邓石如不去拜见他，对邓石如大加诋毁。于是邓石如离开京城，去任两湖总督毕沅的幕僚。毕沅本来很好客，吴中名流很多人聚集在他的幕下，个个都是裘衣骏马，只有邓石如粗衣步行。住了三年，告辞而回，毕沅替他购买田宅，让他在家养老。临行之时，毕沅摆酒宴为他送行，说道：“完白山人是我衙署中

的一服清凉剂啊!”他四十六岁时才娶妻，常常在江、淮间来往，终年六十三岁。

他的儿子邓传密，起初名叫廷玺，字守之。邓传密从学于李兆洛，晚年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他能以篆书继承他父亲的学业。

在乾隆、嘉庆年间，嘉定的钱坫、阴湖的钱伯坳，都以擅长书法著名。钱坫以为他的篆书直接承继李阳冰，因而很自负，他曾游历焦山，看到山壁上有篆刻《心经》，感叹这篆书仅次于李阳冰。后来得知是邓石如所书，于是挑剔其中不合六书的地方进行诋毁。钱伯坳本来很佩服邓石如的行书、草书，感叹地说：“简直是杨凝式的再现!”后来和邓石如讨论笔法，二人意见不合，于是钱伯坳帮助钱坫大力底毁邓石如。钱坫的事迹见本书《儒林传》。

钱伯坳，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是尚书钱维城的侄子。少年丧父，刻苦读书，诗写得很好，嗜酒如命，交游很广，以国子监生逝世。他的书法学颜真卿、李邕，他曾说：“古人用兔毛做笔，因而笔画中间有一条线，现在用羊毛笔，精于用笔的才能成双钩。我热衷此道五十年，才掌握了十分之三、四。”评论界认为，自从刘墉死后，楷书、行书钱伯坳为第一。他的执笔方法是：小指不贴笔，其他三指包于笔管外，和拇指相抵，用侧锋下笔，以助长怒放的气势。运笔时手指和手腕都不动，只是肘部来回运动，他驳斥古今相传的“拨灯法”之说。邓石如写字时，悬腕双钩握笔，笔管随手指运转，两家用笔的方法大相径庭。

吴育，字山子，是江苏吴江县人。他向包世臣、李兆洛

问学，会写文章，擅长书法。他曾说：“下笔时应使笔毛平铺在纸上，这样笔画才能四面圆润，这是李阳冰写篆书的用笔方法，是书法家的用笔秘诀。”包世臣采纳了他的说法。吴育特别擅长篆书，用笔和邓石如相近。

杨沂孙，字泳春，是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中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父亲逝世后，在家守孝，于是不再出来任官，自号为濠叟。少年时跟李兆洛学习，研究周、秦诸子学说。热爱书法艺术，尤其用力学习篆书、籀书，著有《文字解说问讹》，打算补充段玉裁、王筠著述的不足。又考证上古至史籀李斯以来的篆书，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准，撰写了《在昔篇》，他对于篆书、隶书，推崇邓石如，而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曾说：“我写得篆书、籀书，和邓石如相抗衡，其中得意之笔，超过了邓石如；八分书、隶书则赶不上他。”光绪七年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号行世，后又改字让之，是江苏仪征人。他的祖辈居住在江宁，他的父亲吴明煌，起初在扬州，善于相面。吴熙载秀才出身，博学多能，他曾跟随包世臣学习书法。包世臣提倡北朝书法流派，探索北朝的书法渊源及其流变，形成一家之言。包世臣的笔法学说，兼取同时人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诸家的主张。包世臣所倡导的执笔方法是：食指高高钩起，母指置于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紧贴无名指外顶笔管向左方稍倾斜，上端向后，好象指向鼻尖。运笔时，使笔毛平铺纸上，每一笔收笔时将笔锋提起。字的结构，要黑白相应，使左右凸凹相称。包世臣认为自己的说法符合古人的用笔八法、九宫法。

吴熙载忠实遵守他教授的笔法。包世臣擅长楷、行、草书，爱好篆书、隶书，但没下什么工夫，吴熙载的篆书、隶书工夫很深。他操笔作画，也有文人气。咸丰年间去世。

和吴熙载同时接受包世臣笔法的人，有江都人梅植之，字蕴生；甘泉人杨亮，字季子；高凉人黄洵，字修存；余姚人毛长龄，字仰苏；旌德人姚配中，字仲虞；松江人杨承汪，字挹之。姚配中事迹详见本书《儒林传》。

梅植之，道光十九年中举人。通经书，以诗著名于世。包世臣特别欣赏他的书法，认为他的书法跌宕有姿，遒劲清丽，能把古碑帖中的血脉精神，熔铸于笔划中，在这方面吴熙载也不能超过他。梅植之又向吴思伯的女徒弟颜夫人学习弹琴，他弹奏的曲子独具神韵。并且能纠正吴思伯所传授琴谱中的错误，对于古代乐曲谱写的背景，他也颇熟悉。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叫嵇庵。姚配中和他有相同的爱好，曾著《琴学》二卷。梅植之五十岁就去世了。他对古琴古曲的研究，没有留下著作。

杨亮出自武将世家，他本袭封为世代相传的骑都尉。他专心学问，注重品行，江、淮间的读书人都称赞他。他的书法成就，稍次于吴熙载。

合肥人沈用熙出名最晚，至光绪末年才去世，年八十余。他一生谨守师法，是包世臣门下最老的徒弟。

包世臣把清代的书法家分为五品九等：“平和恬静，遒劲清研，出自天然，称为神品；揉和众家之长，不露痕迹，笔画稳安，称为妙品；能追寻名家的踪迹，追本溯源，用心用力，称为能品；能自出机杼，而不违背传统，称为逸品；墨

守一家的笔迹，颇有家法，称为佳品。收入神品的一人，邓石如的篆书和隶书。收入妙品上等的一人，邓石如的八分书和楷书；收入妙品下等的二人，刘墉的小字楷书，姚鼐的行草书。收入能品上等的七人，释邱山的楷书和行书，宋珏的八分榜书，傅山的草书，姜宸英的行书，邓石如的草书，刘墉的榜书，黄乙生的行榜书；收入能品下等的二十三人，王铎的草书，周亮工的草书，笪重光的行书，吴大来的草书，赵润的草榜书，张照的行书，刘绍庭的草榜书，吴襄的行书，瞿赐履的草书，王澐的行书，周于礼的行书，梁巘的楷书和行书，翁方纲的行书，于令澐的行书，巴慰祖的八分书，顾光旭的行书，张惠言的篆书，王文治的方寸楷收，刘墉的行书，汪庭桂的八分书，钱伯垌的行书和榜书，陈希祖的行书，黄乙生的小字楷书和小字行书。收入逸品上等的有十五人，顾炎武的楷书，萧云从的行书，释雪浪的行书，郑簠的八分书和行书，高其佩的行书，陈洪绶的行书，程邃的行书，纪映钟的行书，金农的八分书，张鹏翀的行书，袁枚的行书，朱筠的稿书，朱珪的楷书，邓石如的行书，宋镕的行书。收入逸品下等的有十六人，王时敏的行书和八分书，朱彝尊的八分书和行书，程京萼的行书，释道济的行书，赵青藜的楷书和行书，钱载的行书，程瑶田的小字楷书，巴慰祖的行书，汪中的行书，毕涵的行书，陈淮的行书，姚鼐的小字楷书，程世淳的行书，李天一的行书，伊秉绶的行书，张桂岩的行书。收入佳品上等的有二十二人，沈荃的楷书，王鸿绪的行书，先著的行书，查士标的行书，汪士镕的楷书，何焯的小字楷书，陈奕禧的行书，陈鹏年的行书，徐良的行书，蒋衡的楷书，于

振的行书，赵知希的草书，孔继涑的行书，嵇璜的楷书，钱澧的行书，桂馥的八分书，翁方纲的小字楷书，张燕昌的小字楷书，康基田的行书，钱坫的篆书，谷际岐的行书，洪梧的小字楷书；收入佳品下等的有十人，郑来的行书，林佶的小字楷书，方观承的行书，董邦达的行书，华岩的行书，秦大士的行书，高方的小字楷书，金榜的楷书，吴俊的行书，陈崇本的小字楷书。”收入九品的共九十七人，重见的六人，实际只有九十一人。又增加能品上等一人，张琦的楷书、行书和八分书；能品下等三人，于书佃的行书，段玉立的小字楷书和草书，吴德旋的行书。增加佳品上等六人，吴育的篆书和行书，方履篌的八分书，梅植之的行书，朱昂之的行书，李兆洛的行书，徐准宜的楷书。

后来包世臣的学说盛行，咸丰、同治以来，以书法著名的，有何绍基、张裕钊、翁同和三家最为有名，这三人的事迹，具见于本传。何绍基学习颜真卿的笔法，晚年又揉进汉隶的笔意；张裕钊的笔法出于包世臣；翁同和的书法，气象宏伟，且多变化，不受名家的束缚，成为有清一代书坛上的后劲。

（魏连科 译）

【原文】

王澐，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绩学工文，尤以书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澐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摹古名拓殆遍，四体并工，于唐贤

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后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异，谓其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文又次之。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于世。

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继则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镠、张照等，接踵而起，多见他传。大抵渊源出于明文征明、董其昌两家，鸿绪、照为董氏嫡派，焯及澍则于文氏为近。澍论书尤详，一时所宗。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号拙老人。与澍同里。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乾隆中，进上，高宗命刻石国学，授衡国子监学正，终不出。衡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三百余种，曰《拙存堂临古帖》。晚与澍相期斗胜，每临一书，相从质证。子骥，孙和，并以书世其家。

骥尤精分隶，著《汉隶讹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名一卷，兼工画。其言曰：“汉、魏字体不同，性情各异。书须悬臂中锋，而用力以和平为主。作画之提顿逆折，参差映带，其理一尔。”皆阐明其先说。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登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从李光地游，究心乐律、音韵、历数、书法。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绝请托，衔之者嗾言官劾其把持闹事，圣祖原之，终以浮议罢归。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读，年已八十。寻告归，卒于家。用锡乡举出姜宸英之门，与何焯同为光地客，论书多与二家相出入。精于鉴别古人，言笔法亦多心得。著《字学札记》二卷，载《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出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镌级，乞病归。后当复官，厌吏事，遂不出。往来吴、越间、主讲杭州、镇江书院。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内廷有以告，招之出者，亦不应。

喜声伎，行辄以歌伶一部自随，辨论音律，穷极幽渺。客至张乐，穷朝暮不倦。海内求书者，多有馈遗，率费于声伎。然客散，默然禅定，夜坐，胁未尝至席。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卒，年七十三。

所著《诗集》外有《快雨堂题跋》，略见论书之旨。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当时书名，鼐不及文治之远播；后包世臣极推鼐书，与刘墉并列上品，名转出文治上。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余，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凑于

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于身？紧则身之力全凑于指尖，而何有于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楔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灯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祇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软薄纸当之易破。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者，于此可悟入。” 献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献曰“北梁”，同书曰“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诗正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未第，高宗特赐与殿试，入翰林，大考，擢侍讲。淡于荣利，未老，因疾不出。晚年重宴鹿鸣，加侍讲字士衔。卒，年九十三。好书出天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乃变化。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琉球皆重之。

尝与张燕昌论书，略曰：“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当与

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如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用腕力使极软之笔自见，譬如人持一强者，使之直，则无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则全腕之力，自然集于两指端。其实书者只知指运，而不知有腕力也。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笔要软，软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书家燥锋曰渴笔，画家亦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今人喜用硬笔故枯。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有势，大小、长短、高下、猗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乱头粗服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此处不可有半点名心在。”同书平生书旨，与梁嘏之异同，具见于此。

邓石如，初名避仁宗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鲜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梁嘏见其篆书，惊为笔势浑鸷，而未尽得古法。介谒江宁梅鏐都御史穀成子也。家多弃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

好《石鼓文》，李斯《峯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讖

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愤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旁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羨》、《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辟阖，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峯山》、《国山》之法而为之。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

客梅氏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编修张惠言故深究秦篆，时馆修撰金榜家，偶见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于荒寺，榜备礼客之于家。荐于尚书曹文植，偕至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皆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客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沅为置田宅，俾终老。濒行，觞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石如年四十六始娶，常往来江、淮间，卒，年六十三。

子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从李兆洛学，晚客曾国藩幕。能以篆书世其家。

当乾、嘉之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皆以书名。坫自负其篆直接阳冰，尝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叹为阳冰之亚。既而知为石如所作，抚其不合六书者以为诋。伯坰

故服石如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复与论笔法不合，遂助诋诌之尤力。坩见《儒林传》。

伯坩，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尚书维城从子。少孤，力学，工诗嗜酒，广交游，以国子监生终。书学颜平原、李北海，尝曰：“古人用兔毫，故书有中线，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双钩，吾耽此五十年，才十得三四。”论者谓自刘墉殁，正、行书以伯坩为第一。其执笔，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助怒张之势。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斥古今相承拨灯之说。石如作书，则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两家法大殊。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与包世臣、李兆洛游，能文，工书。谓：“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阳冰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世臣取其说。育篆书尤工，法与石如差近。

杨沂孙，字泳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说文解字说订讹》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隶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先世居江宁，父明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之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

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得，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稿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复纵笔作画，亦有士气。咸丰中，卒。

与熙载同受包氏法者，江都梅植之蕴生，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作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汪挹之。配中详《儒林传》。

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煅炼旧拓，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又得琴法于吴思伯之女弟子颜夫人，独具神解。纠正思伯传谱，于古操制曲之故，辄能知之。自署所居曰嵇庵。配中与有同嗜，著《琴学》二卷，植之五十而卒，琴法未有传书。

亮，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间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载。

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

世臣叙次清一代书人为五品，分九等：“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榜书，傅山草书，

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笪重光行书，吴大来草书，赵润草榜书，张照行书，刘绍庭草榜书，吴襄行书，翟赐履草书，王澐行书，周于礼行书，梁巘真及行书，翁方纲行书，于令澐行书，巴慰祖分书，顾光旭行书，张惠言篆书，王文治方寸真书，刘墉行书，汪庭桂分书，钱伯垌行及榜书，陈希祖行书，黄乙生小真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正书，萧云从行书，释雪浪行书，郑簠分及行书，高其佩行书，陈洪绶行书，程邃行书，纪映钟行书，金农分书，张鹏翀行书，袁枚行书，朱筠稿书，朱珪真书，邓石如行书，宋镛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朱彝尊分及行书，程京萼行书，释道济行书，赵青藜真及行书，钱载行书，程瑶田小真书，巴慰祖行书，汪中行书，毕涵行书，陈淮行书，姚鼐小真书，程世淳行书，李天行书，伊秉绶行书，张桂岩行书。佳品上二十二入，沈荃真书，王鸿绪行书，先著行书，查士标行书，汪士铉真书，何焯小真书，陈奕禧行书，陈鹏年行书，徐良行书，蒋衡真书，于振行书，赵知希草书，孔继涑行书，嵇璜真书，钱沅行书，桂馥分书，翁方纲小真书，张燕昌小真书，康基田行书，钱坫篆书，谷际岐行书，洪梧小真书；佳品下十人，郑来行书，林佶小真书，方观承行书，董邦达行书，华岩行书，秦大士行书，高方小真小书，金榜真书，吴俊行书，张崇本小真书。”九品共九十七人，重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复增能品上一人，陈琦真、行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真及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及行书，方履篣分书，梅植之行书，朱昂

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真书。

其后包氏之学盛行，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和三家最著，并见他传。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和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

王时敏、陈洪绶、释道济、王翬、 恽格、龚贤、高其佩、张鹏翀、 唐岱、华岩、王学浩传

——《清史稿》卷五〇四

【说明】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太仓（今江苏属县）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隐居不仕，专心画学，擅长山水画，少时学董其昌，后又学宋、元，以黄公望为宗，笔墨苍润疏秀，丘壑少变化，临摹之迹较多。他广收门徒，培养后进，为清初南宗领袖人物。他与王鉴、王翬、王原祁合称“四王”。著有《西田集》、《西庐画跋》等。王时敏传后附有王鉴、王撰、王原祁、王宸等人的传记。

陈洪绶（1598—1692），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今浙江诸暨市）人。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一生未做官，以卖画为生。在明末曾入宫廷作画，明亡后也曾出家为僧，因自号悔迟，亦作老迟。他擅长人物、仕女，取法宋人李公麟。晚年画风有所变化，造型夸张，能突破前人窠臼；也工花鸟，下笔细腻，

色彩清丽。在当时，他与崔子忠齐名，称为“南陈北崔”。绘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九歌》、《西厢记》等。能诗文，著有《宝纶堂集》。陈洪绶传后附有崔子忠、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等人的传记。

释道济（1642—约 1718），字石涛，自号清湘老人，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等，朱姓，是明代清江王的后裔，明亡前尚在幼年，明亡后出家为僧。他是清初著名画家，擅长山水，也工兰竹、花鸟、人物等。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变化，因而他强调独创，构图善于变化，笔墨纵放，意境新奇。他的绘画作品和画论，对扬州画派和近代中国的绘画，影响很大，王原祁也认为：“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三。”同时他也擅长书法诗赋，兼擅园林叠石。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以及后人所辑《大涤子题画诗跋》等。按：“道济”应为“原济”。传后附有髡残、朱耷、弘仁、上睿、明中、达受等人的事迹。

王翬（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鸟目散人、清晖主人等，常熟（今江苏常熟市）人。他一生未仕。康熙年间，召他供奉内廷，主持绘制《南巡图》，画成以后，康熙欲任他为官，辞归乡里。他少年时曾向王鉴、王时敏等人学画，后又出入于宋元名迹，熔各家之长于一炉，形成清丽深秀的画风，有时也过于圆熟。晚年画风更趋于老成，有苍茫之致。从学弟子很多，形成“虞山画派”。他的画论也有见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后人把他和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四王”，加上吴历、恽寿平，称为“清六家”。王翬传后附有吴历、杨晋、黄鼎、方士庶的

传记。

恽格（1633—1690），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云溪外史、白云外史、东园客、草衣生等，武进（今江苏属县）人。他一生不应科举，家境贫寒，以卖画为生。他的画初学元人王蒙，后兼用徐熙、黄鉴的笔法，形成清丽明润的画风，自成一派，后人称之为“常州画派”。擅长山水、花鸟的写生，意趣盎然，栩栩如生。他和王时敏、王翬、王鉴、吴历、王原祁被称为“清六家”，兼工书法，诗文，他的诗书画，被称为“南田三绝”。著有《瓯香馆集》。他的曾孙女恽冰，字洁如，号清于，以擅长花卉著名。恽格传后附有马元驭、王武、沈铨的传记。

龚贤（1618—1689），一名岂贤，字半千，号野遗、柴丈人，昆山（今江苏属县）人。一生未仕。他擅长山水，学习董源、吴镇，而能独出心裁。重视写生，用墨层层渍染，浓郁苍润。后人称他和樊圻、高岑、邹喆、吴弘、叶欣、胡造、谢荪为“金陵八家”。著有《香草堂集》、《画诀》、《柴丈人画稿》等。龚贤传后附有赵左、项圣谟、查士标等人的事迹。

高其佩（1660—1734），字韦之，号且园，铁岭（今属辽宁）人，汉军旗。官至户部侍郎。擅长山水、人物、走兽、花鸟，画风苍浑沉厚，与明人吴伟的画风相近。他尤其以指头作画著名，手指画出的线条，人很难认出是手指所画，且具有奇异的效果。他的侄孙高秉著《指头画说》记其画法。高其佩传后附有李世倬、朱伦瀚、傅雯、瑛宝等人的事迹。

张鹏翀（1688—1745），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嘉定（今江苏属县）人。雍正五年中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他长

期为清帝的文学侍从，尤其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他的画，无所师承，但却合于古法，多为宫廷题材应制之作，如《春林澹霜图》等。在清代以绘画侍奉皇帝的人，著名的还有蒋廷锡、钱维城、邹一桂等人，附见于张鹏翮传记之后。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官至参领。他曾从王原祁学画，后来一直任宫廷画师，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擅长山水，学宋人笔法，康熙称之为“画状元”。著有《绘事发微》。清代画院派画家，著名的还有焦秉贞、郎世宁、张宗苍、余省、金廷标、丁观鹏、缪炳泰等人，附见唐岱传之后。

华岩（1682—1756），字秋岳，号新罗山人、东园生、布衣生、离垢居士等，福建上杭县人，徒工出身，后寓居杭州，以卖画为生，擅长人物、山水、花鸟、草虫、走兽等。他的画，远学马和之，近学陈洪绶、恽寿平，形象生动，构图别致，画风清秀明丽，独树一帜。又工诗画，人称其诗书画“三绝”。著有《离垢集》。华岩传后附有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钱杜、方薰等人的传记。

王学浩（1754—1832），字椒畦，江苏昆山县人。乾隆五十一年中举人。他幼年时向本县人李豫德学画，后又远学倪瓚、黄公望。他的画善于用墨，人称其用量“能入绢素之骨”。他是道光末年画界的元老。著有《南山论画》。王学浩传后附有黄均的传记。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是江南太仓县人，他是明代大学士王锡爵的孙子。因祖父有功而封官，官至太常寺少卿。王时敏出身于高门贵族，很早就有文名。明朝灭亡后，在家

闲住，不出来做官，他培养提携后辈，高名盛德，受到当时人的尊重。明末的绘画界，董其昌有承前启后的功绩，王时敏少年时曾从他学习，得到董其昌的真传。王锡爵晚年得孙，对他十分钟爱，安排他住在别墅里，广收名家的字画，所以他能探索到绘画技法的奥妙。对于黄公望的画法，领会得最深，到晚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爱才如渴，在他家里，四面八方擅长绘画的人来往不绝，凡是得到他的指点，在当时没有不出名的，成为一代绘画界的领袖。康熙十九年去世，终年八十九岁。

王鉴，字圆照，他是明朝尚书王世贞的曾孙。他和王时敏是同族，是时王敏的子侄辈，但年纪和王时敏差不多。崇祯年间，任官廉州知府，他正在壮年，便辞职回乡。在 园的故址上，建筑房屋居住，门前冷落，与世隔绝。他和王时敏互相切磋绘画艺术，师法董源、巨然，形成沉雄古迈的画风，虽然画面青绿色浓重，但充满书卷气。后辈画家对他很尊重，与王时敏齐名。康熙十六年去世，终年八十岁。

王时敏的儿子王撰，字异公。他的画作，严守家法，继承他父亲的画法，细致入微。

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他幼年时画了一幅山水画，贴在墙上，王时敏看到，惊讶地说：“我什么时候画的这幅画？”问清了以后，大为惊喜，说道：“这孩子的成就将来会在我之上！”王原祁于康熙九年考中进士，被任为任县知县。后调到北京，任官给事中，不久改任为中允，入直南书房。累次提升至户部侍郎，也在不同的官位上都享有声誉。当时天下太平，康熙皇帝又重视文，在处理国家之余，

以书画艺术陶冶性情，经常把王原祁召进便殿，他在康熙皇帝面前从容不迫地回答提出的问题。或者当场作画，康熙帝伏在桌子上观看，不觉过了很长时间。皇帝让他鉴定内府收藏的历代著名画作，他又充任编撰《书画谱》的总裁官、《万寿盛典》的总裁官，康熙对他格外礼敬。康熙五十四年在官位上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王原祁的画技是王时敏亲自传授的，他对于黄公望的浅红上色法的运用有自己的独创，晚年好用吴镇的墨色技法。王时敏曾说：“元末四大家，当以黄公望为首，能得到他的神韵的，只有董其昌；做到形似的，我不必谦让；甚是形神兼备的，我的孙子可以说达到这种境界了吗！”王翬的绘画名动一时，王原祁画风的高远实超过了王翬。他每次作画，必用宣德年间造的纸，重毫笔，顶烟墨，他说：“这三样缺任何一种，就不能表达出古色古香、浑厚高远的情趣。”有人问王翬的画怎么样，他说：“太熟了。”又问查士标的画怎么样，他说：“太生了。”大概他以不生不熟自居。他中年以后，在宫中侍奉皇帝，其他求画者所得到的，大都是别人的代笔，他自己署上名款。每到年末，他送给门下宾客画，每人一幅，作为买皮袄的资金，因而那些好收藏的人，常事先备好银两，等待买他的画。

王原祁的曾孙王宸，字子凝，号蓬心。乾隆二十五年中举人，官至湖南永州知府。王原祁的孙子们，大都能以绘画继承家学，只有王宸画得最好。他作画，用秃笔浓墨，表现出一种荒古的情趣。他喜爱永州的山水，自号为潇湘子，有心在这里养老。他罢官以后，穷得回不了家，当时毕沅任两

湖总督，于是王宸去武昌投靠毕沅。他经常拿诗画换酒喝，两湖的人尤其珍重他的绘画。他著有《绘林伐材》十卷，王昶称赞此书为“画史总龟”。

陈洪绶，字章侯，是浙江诸暨县人。在他青年时有一次去他岳父家，他登上桌子在墙上画了一幅关公肖像，身長八九尺，他的岳父看到，大为惊异，于是把这间屋子锁起来，专门供奉关公，陈洪绶所画的人物，连衣服的褶纹都特别清皙有力，他的笔力和气局，在明人仇英、唐寅之上。他曾到杭州，临摹杭州府学收藏的李公麟《七十二贤像》石刻，又临摹周昉的《美人图》，临摹了数本，仍不肯罢手，人们认为他的临本胜过原作，陈洪绶说：“我之所以赶不上他们，原因就在这里。我的画很容易看出好来，说明我的工夫还不到家。”他曾是秀才，崇祯年间，去北京游学，朝廷征召他为中书舍人，让他临摹历代帝王画像。他尽情观摩了内府收藏的绘画作品，艺术水平大大提高。不久就辞职回乡。明朝灭亡后，出家当了和尚，原来号为老莲，这时改法号为悔迟。他们纵情豪饮，放浪不羁，提起明末的战乱，常失声痛哭。辞职以后数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陈字，号小莲，也以绘画著名。

陈洪绶在北京时，绘画和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

崔子忠，一名崔丹，字道母，别号青蚓，是山东莱阳人，客籍在顺天府，在他作秀才时，就很有才华。他作画追求晋人、唐人的意趣，不屑于走宋人、元人的路子。他尤其擅长画人物仕女，董其昌很欣赏他的作品，认为近代还没有这样高水平的画作。如果人们拿金钱去求他的画，他绝不答应，可

是家里却常常断炊。史可法送给他一匹马，他卖了马，拿钱找朋友痛饮，不过一天就把马价花光。他作的诗文，古奥渊博，佶屈聱牙。遭遇战乱，他躲藏在地窖中，穷饿而死。后来画人物仕女最著名的，有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

禹之鼎，字尚吉，号慎斋，是江苏江都县人。他少年时从师于蓝瑛，后来又学习宋、元诸家，他尤其擅长人物，他画的《王会图》，流传于世。他画人物肖像，大都采取白描技术法，不沿袭李公麟的旧路，而采用吴道子的兰叶技法，人物的颧部，用浅红色点染，更显得古雅。康熙年间，任鸿胪寺序班。他喜爱太湖山水，本想定居在那里，后来回到家乡。那些朝廷大臣、贵族名流，很多人请他画像，流传于世上。

余集，字秋室，是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他擅长仕女画，当时人称之为“余美人”，在殿试时，本来应中状元，却因有“余美人”的雅号，遭到贬抑。后来充任《四库全书》的纂修官，被荐为翰林院编修，历升至侍读。他的画作，风格清朗，没有画匠气，被世人所珍重，和仇英、唐寅诸人的遗作并驾齐驱。

改琦，勃伯温，号七芗，他的祖辈是西域人，他是寿春总兵改光宗的孙子，因而在江南落户，定居在华亭县，改琦聪明机敏，多才多艺，擅长诗词。嘉庆、道光以后的人物画，改琦成就最高。他的画，吸收李公麟、赵孟頫、唐寅以及近世的陈洪绶各家的长处，小幅花草兰竹，清新不俗，有恽格的遗风。

费丹旭，字子苕，号晓楼，是浙江乌程人。他擅长人物肖像，如镜中的影像，唯妙唯肖。他画的仕女，娟秀有神气，

景物的布置，潇洒雅致，近世的画家没有超过他的。

释道济，字石涛，是明代楚王的后裔，自号为清湘老人。作画时落款有时称大涤子，有时称苦瓜和尚，有时称瞎尊者，没有一定的称呼。明亡后出家为僧。他的画，笔墨纵横，淋漓酣畅，能摆脱前人的束缚，却与古人的画法吻合。晚年游历江、淮之间，人们争相尊重。他著有《论画》一卷，内容奥妙无穷。他的画和髡残齐名，人们称为“二石”。

髡残，字石溪，是湖南武陵人。少年丧父，自己剪掉头发投奔龙三三香火院。此后他遍游名山大川，后到江宁，住牛首山，成为住持方丈。他画的山水，能表现崎岖的山势，幽深的山谷，引人入胜。释道济以笔墨纵横、奔放不羁取胜，髡残则以沉着痛快、谨严细密见长。二人各有独到之处。

朱耷，字雪个，是江西人，他也是明朝宗室后裔。崇祯甲申年以后，自号为八大山人，曾出家当过和尚。他的书画题款，“八大”二字常常连写在一起，“山人”二字也是如此，因而字形象“哭”、“笑”二字，大概也是有用意的。他的画简洁苍劲，生动而富有情致，他的山水画精品，尤其妙绝，但比较少见。他的为人，慷慨悲歌，世人视他为癫狂。

弘仁，字渐江，是安徽休宁县人，姓江，字亦奇。明朝秀才出身，也是在甲申年以后出家当和尚的。他擅长作古文，他的画学习倪瓒，新安画派的画家推他为宗主。弘仁所画的层崖叠嶂、峭壁沟壑，雄伟沉厚，绝不是世人以稀竹枯树企图表达高人之致所能比拟的，他逝世之后，坟墓上栽种几百株梅花，因而称他为“梅花古衲”。

从道济以下诸人，都是明朝的遗民，隐身于僧侣之中，以

绘画著名于世。后来擅长绘画的僧人，有上睿、明中、达受等人最有名。

上睿，字目存，吴县人。他曾向王翬学画。得到王翬的指点。

明中，字大恒，是浙江桐乡人。他晚年主持杭州南屏山慈静寺。乾隆下江南，赏赐他紫衣。他的山水画颇得元人笔法。

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他本是大家子弟。热爱书画艺术，书法有徐渭、陈道复的放纵风格。他善于鉴别古器物，又精于临摹槌拓，或对摹本拓本加工，亦颇有古雅情趣。阮元称之为“金石僧”。

王翬，字石谷，号耕烟，是江苏常熟县人。太仓人王鉴游玩虞山，看到他的画作，大为惊异，把他找来，当时他不过二十来岁。王鉴把他带回去，拜见王时敏，王时敏让他在西田学习，并拿出家藏的唐代以后的著名画作，让他在坐卧之中加以观摩，并且又带他到大江南北游历，得以观看各地收藏家的珍本秘籍。这样经过二十年，学业成功。康熙年间朝廷征召他，以平头百姓的身份在宫廷为皇帝服务。朝廷要画一幅《南巡图》，当时集中了海内的高手名家，但都迟迟不敢下笔，王翬通过口讲手授，在咫尺之间的画面上，能表现出千里之外的南巡情景，他给诸位画家分工，而由他负责总其成。画成以后，康熙皇帝连声说好，想封他为官，他坚辞不受，于是赏给他很多钱物，送他回乡。在他离开京城时，王公大臣备酒为他送行，并赋诗相赠。王翬生性孝顺父母，忠于友情，王时敏、王鉴死后，他每年都去墓前拜祭。康熙五

十六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王翬论画说道：“用元人笔墨技法，借鉴宋人的布局，点缀以唐人的风韵，这才能集山水画的大成。”称赞他的人说：“古今的笔墨技法互相矛盾，格格不入，王翬的笔下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汨汨而出。画史上有南宗、北宗之分，至王翬合而归一。”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也是常熟人。曾向王时敏学画，而能独辟蹊径，他的画，气势厚重沉郁，绝不象他人面目。晚年离家信奉天主教，曾两度游历欧洲。他作画常用西洋技法，画面上云雾飘渺，直上霄汉，和他以前的画风大不相同。康熙五十七年去世，终年八十七岁。当时有人说他出游欧洲没有回来，后来在上海南城发现他的墓碑，碑上题名称为“天学修士”。王翬起初和他关系很好，后来绝交了。王原祁论画，褒扬吴历而贬抑王翬，他说：“近时绘画高手，只有吴渔山一人罢了。”世人把王明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以及恽格，称为六大家。同县人又有杨晋、黄鼎。

杨晋，字子鹤。他是王翬的弟子，他的山水画清秀可喜，尤其擅长画牛，王翬作画时，凡是人物和骆驼马牛羊等，都让杨晋来画。他曾跟随王翬参加《南巡图》的创作，并临摹内府所藏的名画，进呈给皇帝。

黄鼎，字尊古。他曾学画于王原祁，但自学王翬的画法，能得到他的笔意。他摹仿古人能达到乱真的程度，尤其擅长元人王蒙的画法。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自号为独往客。论画者认为，王翬读遍天下的古今名画，下笔能体现出他的画学渊源；黄鼎游遍天下的山水，下笔则栩栩如生。他曾在宋

萃家客居，梁、宋之间保存他的墨迹特多。

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是安徽歙县人，在扬州安家。他是黄鼎的弟子，很早人们就认为他青出蓝而胜于蓝。他刚到四十岁就去世了，人们很为他可惜。王翬所创的画派为当时所推崇，世人比之为王士禛的诗派，当时弟子很多，继承他的技法的则更多。这里只附载其中著名的人。

恽格，字寿平，后来以字行世，改字为正叔，号南田，是江苏武进县人。他的父亲恽日初，事迹见本书《隐逸传》。恽格十三岁时，跟随父亲到福建，当时王祈在建宁起兵，恽日初投靠他。总督陈锦率兵攻下建宁，恽格被官兵所擒，陈锦的妻子收养他为儿子。跟随陈锦游玩杭州灵隐寺，恽日初通过查访，见到恽格，恽格欺骗陈锦，说是要出家为僧，才回到家乡。恽格因父亲忠于明朝，他本人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擅长作诗著名，用卖画的收入来供养父亲。他的绘画才能，出于天赋，山水画学元人王蒙。他和王翬相交之后，说道：“您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不能亦步亦趋地学您成为第二。”于是他兼用徐熙、黄筌的笔法作花鸟画，他的技法把自然界的天然情趣，集中在笔下，人们比之为天仙化人。画作完以后，他亲自咏诗题写，诗、书、画，人们称之为“南田三绝”。他虽然专门画花鸟等生物，有时也作山水画，画风超逸，颇有元人冷淡深远的情趣。王时敏听到他的名声，招他前去，他没有按时去见，等他来到时，王时敏已经一病不起，只是在病床前握了握手罢了。他家里很穷，遇上风雨天气，只好闭门挨饿，人们拿金钱前来求画，若不是热心绘画艺术的人，他从不出手。康熙二十九年去世，终年五十四岁。他的儿子无

力办丧事，王翬出钱安葬了他。

恽格的叔父恽向，字道生。在明朝末年即以绘画著名，他的山水画继承了董源的笔法，恽格少年时即跟他学画。后来恽格画名大著，他的侄辈人大都擅长绘画。其中著名的有恽源浚，字哲长，官至天津县丞。他能继承徐熙的笔法，下笔生动，本族的曾孙恽钟荫的女儿恽冰，尤其著名。

恽格的弟子最有名的是马元驭，字扶曦，是常熟县人。家境贫寒，喜好读书。少年时即擅长绘画，曾得到王翬的称赞。后来跟恽格学画，能继承恽格的超逸笔法，被称为入室弟子。马元驭的孙女马荃，能继承其家学，名声和恽冰不相上下。马元驭曾把画技传授给本县人蒋廷锡，后来蒋廷锡任大学士，写信召他进京，马元驭谢绝不去。

恽格人品很高，他的写生画为一代之首，学他的人很多，但却学不到他的天然韵味。只有乾隆年间的华岩能继承他的画风，后来改琦也能得其笔意。

王武，字勤中，吴县人。他画的花草，俏丽多姿，王时敏也称之为妙品，受到学者的推重，到恽格崛起，成就超过了他。

沈铨，字南苹，浙江德清人。擅长花鸟画，尤其精于染色，因而他的画艳丽过人。雍正年间，日本国王聘请他去教绘画，教了三年才回国，因而日本国尤其珍重他的作品，他和恽格，各自成派。

龚贤，字半千，江苏昆山人，寄住在江宁，筑室于清凉山下，修筑起半亩园，隐居于此，自得其乐。他生性孤僻，诗文不轻易作。他的画继承董源的笔法，但能另辟蹊径，独创

幽深画风，他自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龚贤与他同时的人樊圻、高岑、邹喆、吴弘、叶欣、胡造、谢荪号称“金陵八家”。樊圻，字会公；胡造，字石公，他和谢荪都是江宁人；高岑，字蔚生，杭州人；邹喆，字方鲁，吴县人；吴弘，字远度，金溪人；叶欣，字荣木，华亭人。各家都以高超的画技著名于时，总的来看，龚贤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清朝初年，画坛兴盛，大江以南的作者为数尤其多，分成各种流派，其中以娄东的王时敏为大家。至于金陵、云间、嘉禾、新安等地，名人也层出不穷。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他的画学习宋旭，成为云间画派的代表，吴县、松江等地的人很推崇他。

项圣谟，字孔彰，是嘉兴人，项元汴的孙子。他的画，起初学习文征明，后来进而学习古人，董其昌称赞他的画和宋人血脉贯通，又有元人的风韵。他的儿子项奎，字东进，能继承家学。

同县人李琪枝，字云连，是李日华的孙子。他的山水画具有高雅清淡的情趣，传世的作品，以梅竹为多。项、李都是望族，受到家庭的熏陶，二姓的子弟大都以绘画著名。

张庚，字浦山，也是嘉兴人。他曾向陈书学习绘画，精通绘画理论，著有《画征录》和《续录》，二书收录的画家，自明末至乾、嘉年间共有四百多人。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是安徽歙县人。明代秀才出身，后来放弃科举，专门研究书画艺术。他家里很有钱，收藏了很多钟鼎彝器等古器物，以及宋、元的著名书画。他的

画初学倪瓚，后又综合吴镇、董其昌的笔法，他的作品被人称为逸品。晚年的画风，以清淡幽静为主。他为人疏懒，很少接见宾客，大概是借此以逃避世俗。他和同县人孙逸，休宁人汪之瑞、释弘仁、号称“新安四家”。他长年居住在扬州，康熙三十七年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孙逸，字无逸。他从歙县流浪，寓居芜湖，曾作《歙山二十四图》。

汪之瑞，字无瑞，豪放自得，绘画善用渴笔浓墨，酒酣耳热，恣意挥洒，势如暴风骤雨。

当时又有当涂县萧云从，字尺木。他的绘画和孙逸齐名，山水画自成一家，也擅长画人物。他曾在宋石矶太白楼下的四壁上画《五岳图》，又曾作《太平山水》和《离骚图》，喜爱书画的人把他的作品刊刻流传。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是奉天辽阳人。籍属汉军。他的父亲死于耿精忠之乱，高其佩因父亲有功而封官，官至户部侍郎。他的画风奇特，人物山水，苍劲沉厚，衣纹象草书篆书的线批，一只袖子往往有数处折叠。他尤其擅长指头画，他曾画汉人黄初平叱石画成羊图，画面上有的石头已变羊站起，有的将要变成羊还未站起，有的变成一半还没有离开石头，妙趣横生。他画的龙、虎，活灵活现。世人非常珍视他的指头画，他晚年为了便于尽情挥洒，便不再用毛笔。至于他用笔作画的佳作，几乎没人知道了。雍正十二年去世。他的外甥李世倬、朱伦瀚都曾跟他学画。

李世倬，字汉章，他是总督李如龙的儿子。官至右通政。少年时曾到江南，向王翬学画，得到他的指点。后来在山西

作官，看到吴道子的《水陆道场图》，领悟出画人物的技法。他的花鸟写生画，具有高其佩指画的情趣，但他是用毛笔，各成一家。

朱伦瀚，字涵斋，是明代宗室后裔，籍属汉军旗。官至都统，担任清宫的警卫。他的指画跟高其佩学来，他的画布局奇特，而不违背传统，颜色浅淡，韵味厚浓。也喜欢画巨型断壁，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指头生有锥状肉瘤，当他画人物时，用肉锥画胡须眉毛，尤其熠熠有神，这是出于天赋条件。后来能继承高其佩画法的人，有傅雯、瑛宝。

傅雯，字凯亭。他是奉天的一个普通百姓，在王府中作门客，京城保留了不少他的遗墨。

瑛宝，字梦禅，满洲人，他是大学士永贵的儿子。因身体有病，辞去恩荫的官职，以写诗绘画自得其乐。他的指头画，以画风高雅见长，他对此也很自负。

张鹏翀，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是江苏嘉定县人。雍正五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职，官至詹事府詹事。他天赋过人，写诗作画，拿起笔就能成篇完幅，诗画表现出潇洒自得的情趣，与他的人品相似。乾隆皇帝爱他有才，越级提拔他。他所呈给皇帝的诗文，在歌颂之中，富有规劝的内容。他的绘画，没有师承，但天真自然，古色古香。即便是奉命之作，看来闲散，好象不大用心，却能表现出一种神韵。他画了一幅《春林澹霭图》，题上诗作，进献给皇帝，皇帝也题诗奉和，张鹏翀当即在宫门前用原韵咏诗表达谢意。他曾随皇帝游西苑太液池，在渡水的片刻，写了八首诗，皇帝屡屡让他在渡

船上作画，并赏给他皇帝亲笔画的《枇杷折枝图》和《松竹双清图》，又赏给他御笔亲书的“双清阁”匾额，而且他经常接受笔砚、文绮之类的赏赐，不计其数。乾隆十年，请假回乡，在路上去世。皇帝怀念他，久久不忘，经常对群臣说：“张鹏翮死了真可惜！”

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当时国家处于全盛时期，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诸臣，每每以书画艺术得到皇帝的青睐。大学士蒋廷锡和他的儿子蒋溥，董邦达和他的儿子董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以及张鹏翮等人，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蒋廷锡用纵放的笔法画花鸟等生物，用笔或出人意表，或循规蹈矩；或工整细致，或率尔操觚；或浓墨重涂，或淡色而出，在一幅图中，迭相运用，无不超然绝俗。他的画技源于恽格，但不受它的束缚。董邦达的山水技法源于董源、巨然、黄公望，用墨得力于董其昌，自王原祁以后，他被推崇为大家手笔。他长年在宫廷绘画，他献给皇帝的作品，大幅画有一丈多宽的，小册页只有寸把长，大小画幅，不下数百幅。蒋溥、董诰各承其家学。钱维城的山水画苍健中有秀逸，花卉染色，特具神采。邹一桂以一册《百花卷》受到皇帝的赞赏，世人认为自恽格以后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以上各家的画作，都收入《石渠宝笈》中，皇帝亲笔题跋，加以褒美，成为一时盛事。

嘉庆年间，尚书黄钺由主事改任翰林，入宫侍奉皇帝，他的画得到嘉庆皇帝的称赞。道光、咸丰以后，侍郎戴熙、大学士张之万，都曾在皇帝身边任职，都以绘画出名。但因国家处于多事之秋，与极盛时期君臣之间热心绘事种种美谈佳

话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年间，因父亲有功，荫官参领。他曾跟王原祁学画，画的布局与王原祁相似。他曾在宫廷侍奉皇帝，康熙皇帝品评当时的画家，认为他是第一把手，称他为“画状元”。他后来又侍奉雍正、乾隆。乾隆为太子时，就喜爱他的画，并多次题诗称赞，后来他更加受到皇帝的宠爱。唐岱专门画山水，他崇尚宋人的画法。少年时的绘画，即在朝廷公卿之中闻名。因他在宫廷时间久，画技也大有长进，可他的画流传在外面的反而日见其少。著有《绘事发微》，流行于世。

按照清朝的规定，画师服侍皇帝，不给官职，在启祥宫南边设置如意馆，凡是画工，文书以及雕刻艺人，碑帖装潢艺人，都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地位，起初和工匠差不多，后来渐渐用读书人，又由大臣出面推荐，或者献画得到皇帝的欢心而召进来，这些人的身份和文学侍从大臣待遇规格不同。其中也有经皇帝恩赐某某官出身的，那都是出于特殊的恩赏。乾隆皇帝在处理国事之余，也常去如意馆中看看，每每加以指点，当时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其中的绘画精品，也和文学侍从的作品一起收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中。嘉庆年间，编修胡敬著《国朝院画录》，共著录八十多人，其中最著名能传于后世的有十几人。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年间，官至钦天监五官正。他擅长画人物和楼台寺观，又精通测量术，他能采用西洋画法，精确地测量画面的尺寸，测量物体的向光背光，分出光线的明暗，从远处看，他画的人物、牲畜、花木、楼台馆阁，都

有立体感。康熙皇帝很欣赏，令他画出《耕织图》四十六幅，雕板印刷，赏给各位大臣百官。自从焦秉贞创造这种绘画技法，画院的人大都沿袭运用。

他的徒弟冷枚，胶州人，是焦秉贞最得意的弟子。他曾参与绘制《万寿盛典图》。

陈枚，是江苏娄县人。官至内务府郎中。他的画起初学习宋人，以唐寅的画法为基础，后来又参考西洋画法。他在寸纸尺幅之间，能绘出千山万壑，而且人物具备。

郎世宁，是西洋人。康熙年间进宫侍奉皇帝，乾隆皇帝对他尤其欣赏。但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往往让他作写生画，他画的景物，无不栩栩如生。他的染色技艺，奇丽无比，焦秉贞等人难望其项背。

艾启蒙，也是西洋人。他的画技仅次于郎世宁。

张宗苍，字默存，江苏吴县人。他曾向黄鼎学画。起初他任官河工主簿，乾隆十六年皇帝到江南巡视，他献上自己的画册，受到皇帝特别的赏识，把他召入宫中。过了几年，任他为户部主事，因年老请求回乡。张宗苍的山水画，气势深厚，多用皴擦法来表现画韵，一改画院的那种圆熟的画风，因而特别受到皇帝的厚待。他的画收进《石渠宝笈》的有一百一十六幅，而且大都得到皇帝的亲笔题跋。

他的弟子徐扬、方琮最能继承他的画法，也受到皇帝的赏识，赐徐扬为举人，任为内阁中书。

余省，字曾三，江苏常熟人。他长于写生，能表现花草之外的自然情趣。同时的人杨大章，他的画染色颇为考究，可与邹一桂相媲美，花鸟画以余省和杨大章二人最见功力。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皇帝到江南巡视，他进呈用白描法画的罗汉，得到皇帝的首肯，召进宫侍奉皇帝。金廷标的画不以工整细致取胜，而以线图的变化传神。乾隆皇帝评论他画的《琵琶行图》说：“唐寅的旧作，另一条船上画面上有弹琵琶的歌会，金廷标只画白居易一人侧耳静听，别出心裁。古人的画以表现意境为主，这一点画院的人是作不到的。”当时正逢爱乌罕向朝廷进献了四匹骏马，郎世宁为此作了一幅画，皇帝又令金廷标另作一幅，他摹仿李公麟的画法，画面上增添牵马人，颇有古趣，出于郎世宁之上。金廷标死后，皇帝令把贴在墙壁上金廷标的画作，全部取下来重新装裱，收入《石渠宝笈》一书中。

丁观鹏，他擅长画人物，效法明人丁云鹏，以宋人的画法为准，不崇尚奇怪诡谲的画风。他最擅长画仙佛神像，很多画收录在《石渠宝笈》中。

当时又有一个叫严弘滋的人，皇帝巡视江南，他二次献画，他所画的三官神像，神采飞扬，被称为绝世之作，皇帝多次让画院的画工临摹。

姚文瀚，也以画人物仙佛著名，仅次于丁观鹏。

缪炳泰，字象宾，江苏江阴人，起初他以国子监生的身份被召为皇帝画像。皇帝南巡，应皇帝的台试，恩赐他举人出身，被任为内阁中书，后官至兵部郎中。乾隆五十年以后的肖像，都出于他的笔下。皇帝又命他画紫光阁功臣像，每个人的肖像都画得十分逼真，他是画肖像功力最深的画家。

画院在康熙、乾隆两朝最为兴盛、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等人成就最高，宗苍的作品，尤其具有

文人气，道光以后画院没有再出什么有名的画家。到光绪年间，孝钦皇后喜爱艺术，才稍稍恢复了如意馆往日的规模，但其中的画工才能一般，没有值得记述的。

华岩，字秋岳，号新罗山人，是福建临汀人。他爱杭州西湖优美的风景，便在杭州安家。他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俱见功力，他能摆脱当时的画界习气，努力追寻古人的笔法，虽然有时显得过于超脱，但他因求超脱而粗略之处，越发令人难以企及。他善于作诗，著有《离垢集》，诗风古朴清峻。他的书法也能摆脱时俗，世人称他诗、书、画“三绝”，可以上承恽格。他在扬州寓居的时间很久，晚年才回到杭州，去世时年近八十岁。

乾隆、嘉庆年间，浙西的画风很盛，而扬州是画家云集的地方，一时的名流，竞相争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黄易、钱杜、方薰等人。

高凤翰，字西园，是山东胶州人。雍正初年，因被荐举而任官，代理安徽绩溪知县，被人弹劾而罢官。他长时间客居在江、淮之间，因患偏瘫症，于是改用左手写字作画，书画反而具有纵放奇异的情趣。他曾登上焦山，观摩《瘞鹤铭》，找到宋人陆游的题名石刻，亲自扫除石刻上的苔藓，点燃蜡烛，手摸石刻，用秃笔淡墨临摹图像，他的临摹，世人传为杰作。他生性豪放不羁，收藏有千方砚台，亲手在上面镌刻铭文，著成《砚史》一书。他又收藏有司马相如的玉质印章，视为稀世之宝。卢见曾任两淮运使，想参观一下他的收藏，他跪下乞求不让卢观看，他的癖好竟是这样。

郑燮，字板桥，是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中进士，官至

山东淮县知县，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他辞去官职，以卖画为生，他画的兰竹，用草书中的竖笔长撇法画兰叶，他的书法，用八分书和隶书杂揉，自己称为“六分半书”。他的诗词，风格也不同于一般，其中往往有诚恳的语句。慷慨悲歌，为人处世效法明代徐渭。

郑燮同县人李鱣，字复堂，举人出身，官至山东泰县知县。他的花鸟画学林良，富有天然情趣。

陈撰，字楞山，浙江鄞县人，也侨居在扬州。地方官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不去就试。他的画和李鱣齐名，他画的梅花尤其清俊超拔。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是浙江仁和人。他是个普通百姓，地方官荐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好学嗜古，收藏金石书籍千余卷。中年时，足迹已遍半个中国，客居在扬州，没再回故乡。他写的分隶，稍微改变了一下汉隶的写法，又学习《国禅山碑》和《天发讖碑》的用笔方法。他剪去笔锋，用秃笔写大字。五十岁时，才开始绘画。最初画竹子，学习石室老人，自署名为稽留山民。继而又画梅，学习白玉蟾，自署名为昔耶居士。又画马，自以为能继承曹不兴和韩幹的画法。又画佛像，自署名为心出家庵粥饭僧。他画的花木，奇枝异叶，都按自己的心意画出。人问他画的是什么树，他说：“这是佛经中贝多树、龙窠树之类的树木。”生性不修边幅，世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的诗，风格锐猛刚硬。他没有儿子，晚年把诗作抄出，交给他的女儿。他死之后，罗聘搜集他的杂著编成文集。

罗聘，字两峰，是江都人。学问渊博，长于作诗，从学

于金农，称为高足弟子，他的画，每幅都很工整细致。爱佛学，他曾梦见走进名叫花之寺的佛庙，自以为他的前世是僧人，因而自号为花之寺僧。他的画很多是模写佛像，又曾画《鬼趣图》，画了不只一本。后去北京游历，纵情于作诗绘画，晚年更贫困。曾燠任两淮盐运使，资助他回乡，没有过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方婉仪，也长于诗画，好佛学，自号白莲居士。

奚冈，字铁生，号蒙泉，原是歙县人，客居钱塘，于是在钱塘落户。他生性奇伟，但很不得志，于是寄情于吟诗作画。他的山水画学习王时敏，而且自具清韵；竹石花木，清峻超拔，颇有元人笔意。四十岁以后，更加名噪一时。曾出游日本，海外商人船只，出重金收购他的作品。朝廷以孝廉方正的名义征召他，他谢绝不去。

奚冈和同县人黄易齐名。黄易的父亲黄树谷，也擅长书画，黄易的事迹详见《文苑传》。他酷爱金石之学，常常用访碑纪游为题材作画，作品多受到世人的珍视。他的画，意境简淡，颇受山东地区人的推崇。

钱杜，字叔美，号松壶，是浙江仁和人。以高才屈居下级官吏，曾任云南经历，足迹出于万里之外。他精研画学，摹仿赵伯驹，赵孟頫、王蒙，都能达到神似的程度。偶而也画云山古刹，却也妍丽典雅，超绝时俗。他画的梅花，稀疏清冷，源于宋人赵孟坚。又以长于写诗而著名。著有《松壶画赞》、《画忆》，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断。

他的堂兄钱东，字袖海，画风格近于恽格，画名仅次于钱杜。

方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他的父亲方霖，本来长于绘画，方薰从幼时跟随父亲游历吴、越之间，看到很多名画，接触老学硕儒，于是博采众长。他论画说：“写生画以表意胜过形似。”又说：“不论难易，必须典雅才好。”著有《山静居论画》，以普通百姓去世。

王学浩，字椒畦，江苏昆山县人。乾隆五十一年中举人。他少年时跟同县人李豫德学画，李豫德是王原祁的外孙，得到南派的真传。王学浩的画学，上溯元人倪瓚、黄公望，用笔苍劲有力。他论画说：“绘画的六种技法，一个‘写’字可以概括。所谓‘写’，意在笔先，笔下直追所见所闻，虽然显得粗头乱脑，但意趣自足；有的极工整俏丽之能事，却也古色古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人画。如果不是这样，和世俗画工有什么两样？”他又说：“绘画以简洁为贵，即使是王时敏、王原祁犹失之繁琐，如黄公望，真不容易达到他那种境界。黄公望的画法，应从他的草率苍凉之中获得，尤其应该领会他那不怎么用力之处的奥妙。”当时人认为，王学浩用墨，能入骨三分，比他人更深一色。晚年好用破笔，摆脱原来的画法，画风为之一变。著有《南山论画》。终年七十九岁。王学浩寿命长，在道光末年，绘画界推他为元老。他曾在吴中刘氏的碧寒山庄设研馆授徒，从学的弟子很多。当时吴、越地区从事绘画的人虽然很多，但能继承前辈的成就成名成家的，却寥寥无几。

黄均，字谷原，浙江元和人。他墨守王时敏的画法，却能极尽其能事。他游学京师，法式善、秦瀛替他宣扬，提高知名度，得到一官半职，补为湖北潜江县主簿，他没有赴任。

在武昌胭脂山麓修筑了一处小园子，在那里居住了二十年，以吏员的身份作了隐士。晚年的画更具功力，在吴中画家中，称为后劲。

清代的画家，著名人物大都在乾隆以前，从道光以后，卓然成家的，只有汤貽汾、载熙二人。在本书中另有传记，昭文县人蒋宝龄著有《墨林今话》，上接张庚的《画征录》，他的儿子蒋 生又著《续编》，下至咸丰初年，所著录的画家比张庚几乎多出一倍。后来光绪年间，无锡人秦祖詠著《桐阴论画》，评品有清一代的画家，分为三编，评论的标准较严，大体上著录完备。这里只是记述其中最优秀的画家，蒋宝龄，秦祖詠的画也都有一定的水平。（魏连科 译）

【原文】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锡爵晚而抱孙，弥钟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于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爱才若渴，四方工画者踵接于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于时，为一代画苑领袖。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九。

鉴，子圆照，明尚书世贞曾孙。与时敏同族，为子侄行，而年相若。崇祯中，官廉州知府，甫强仕，谢职归。就 园故址，营构居之，萧然世外，与时敏砥砺画学，以董源、巨然为宗，沉雄古逸，虽青绿重色，书味盎然。后学尊之，与时敏匹。康熙十六年，卒，年八十。

时敏子撰，字异公。画守家法，得其具体。

孙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幼作山水，张斋壁，时敏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问知，乃大奇曰：“此子业且出我右！”康熙九年成进士，授任几县知县。行取给事中，寻改中允，直南书房。累擢户部侍郎，历官有声，时海内清晏，圣祖右文，同余怡情翰墨，常召入便殿，从客奏对。或于御前染翰，上凭几观之，不觉移晷。命鉴定内府名迹，充《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恩礼特异。五十四年，卒于官，年七十四。

原祁画为时敏亲授，于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复好用吴镇墨法，时敏尝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神形俱得，吾孙其庶几乎？”王翬名倾一时，原祁高旷之致突过之。每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或问王翬，曰：“太熟，”复问查士标，曰“太生”。盖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后，供奉内廷，乞画者多出代笔，而自署名。每岁晏，与门下宾客画，人一幅，为制裘之需，好事者絨金以待。

原祁曾孙宸，字子凝，号蓬心。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官湖南永州知府。原祁诸孙，多以画世其家，惟宸最工，枯毫重墨，气味荒古。爱永州山水，自号潇湘子，有终焉之志，罢官后，贫不能归，毕沅为总督，遂往依之武昌。以诗画易酒，湖湘间尤重其画。著《绘林伐材》十卷，王昶称为“画史总龟”云。

陈洪绶，字章侯，浙江诸暨人。幼适妇翁家，登案画关

壮缪像于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尝至杭州，摹府学石刻李公麟《七十二贤像》，又摹周昉《美人图》，数四不已，人谓其胜原本，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尝为诸生，崇祯间，游京师，召为舍人，摹历代帝王像，纵观御府图画，艺益进。寻辞归。鼎革后，混迹浮屠间，初号老莲，至是自号悔迟。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后数年卒。子字，号小莲，画亦有名。

洪绶在京师，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云。

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其后画人物士女最著者，曰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

之鼎，字尚吉，号慎斋，江苏江都人。幼师蓝瑛，后出入宋、元诸家，尤擅人物，绘《王会图》传世。其写真多白描，不袭李公麟之旧，而用吴道子兰叶法，两颧微用脂赭染之，弥复古雅。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爱洞庭山水，欲居之，遂归。朝贵名流，多属绘图像，世每传之。

集，字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工画士女，时称曰“余美人”，廷试，当得大魁，因此抑之。寻充《四库全书》纂修，荐授翰林院编修。累擢侍读。所作风神静朗，无画史气，为世所重，比诸仇、唐遗迹。

琦，字伯蕴，号七芗，先世为西域人，寿春镇总兵光宗孙，因家江南，居华亭。琦通敏多能，工诗词。嘉道、后画人物，琦号最工。出入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及近代陈洪绶诸家。花草兰竹小品，迥出尘表，有恠格遗意。

丹旭，字子苕，号晓楼，浙江乌程人。工写真，如镜取影，无不曲肖。所作士女，娟秀有神，景物布置皆潇洒，近世无出其右者。

释道济，字石涛，明楚藩裔，自号清湘老人。题画自署或曰大涤子，或曰苦瓜和尚，或曰瞎尊者，无定称。国变后为僧，画笔纵恣，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晚游江、淮，人争重之。著《论画》一卷，词议玄妙。与髡残齐名，号“二石”。

髡残，字石溪，湖南武陵人。幼孤，自剪发投龙三三家庵。遍游名山，后至江宁，往牛首，为堂头和尚。画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道济排傲纵横，以奔放胜；髡残沉着痛快，以谨严胜：皆独绝。

朱耷，字雪个，江西人，亦明宗室，崇祯甲申后，号八大山人，尝为僧。其书画题款“八大”二字每联缀，“山人”二字亦然，类“哭”、类“笑”，意盖有在。画简略苍劲，生动尽致，山水精密者尤妙绝，不概见。慷慨啸歌，世以狂目之。

弘仁，字渐江，安徽休宁人，姓江，字亦奇。明诸生，亦甲申后为僧。工诗古文，画师倪瓚，新安画家皆宗之。然弘仁所作层崖陡壑，伟俊沉厚，非若世之以疏竹枯株摹拟高士者比。歿后，墓上种梅数百本，因称梅花古衲云。

自道济以下，皆明之遗民，隐于僧，而以画著，其后画僧，上睿、明中、达受最有名。

上睿，字目存，吴人。尝从王翬游，得其指授。

明中，字大恒，浙江桐乡人。晚主杭州南屏净慈。高宗南巡，赐紫衣。山水得元人法。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故名家子。耽翰墨，书得徐渭、陈道复纵逸之致。善别古器，精摹拓，或点缀折枝于其间，多古趣，阮元呼曰“金石僧”。王翬，字石谷，号耕烟，江南常熟人。太仓王鉴游虞山，见其画，大惊异，索见，时年甫冠。载归，谒王时敏，馆之西田。尽出唐以后名迹，俾坐卧其中，时敏复挈之游江南北，尽得观收藏家秘本。如是垂二十年，学遂成。康熙中诏征。以布衣供奉内廷。绘《南巡图》，集海内能手，逡巡莫敢下笔，翬口讲指授，咫尺千里，令众分绘而总其成。图成，圣祖称善，欲授官，固辞，厚赐归。公卿祖饯，赋诗赠行。翬天性孝友，笃于风义，时敏、鉴既歿，岁时犹省其墓。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八十六。翬论画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称之者曰：“古今笔墨之龃龉不相入者，翬罗而置之笔端，融洽以出。画有南北宗，至翬而合。”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独运，气韵厚重沉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于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翬初与友善，后绝交。王原祁论画，右历而左翬，曰：“迩时

画手，惟吴渔山而已。”世以时敏、鉴、翬、原祁、历及恽格，并称为六大家。同县又有杨晋、黄鼎。

晋，字子鹤。翬弟子，山水清秀，尤以画牛名。翬作图，凡有人物与轿驼马牛羊，皆命晋写之。从翬绘《南巡图》，因摹内府名迹进御。

鼎，字尊古。学于王原祁，而私淑翬，得其意。临摹古人辄逼真，尤擅元王蒙法。遍游名山，号独往客。论者谓翬看尽古今名画，下笔具有渊源；鼎看尽九州山水，下笔具有生气。常客宋荦家，梁、宋间其迹独多。

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安徽歙县人，家于扬州。鼎弟子，早有出蓝之目。年甫逾四十，卒，论者惜之。翬画派为一代所宗，世比之王士禛之诗，当时门弟子甚盛，传衍其法者益众，附著其尤者。

恽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江南武进人。父日初，格年十三，从父至闽。对王祈起兵建宁，日初依之。总督陈锦兵克建宁，格被掠，锦妻抚以为子。从游杭州灵隐寺，日初侦遇之，给使出家为僧，乃得归。格以父忠于明，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画出天性，山水学元王蒙。既与王翬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黄筌法作花鸟，天机物趣，毕集豪端，比之天仙化人。画成，辄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自专意写生，间作山水，皆超逸，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致。王时敏闻其名，招之，不时至。至，则时敏已病，榻前一握手而已。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子不能具丧，王翬葬之。

从父向，字道生。自明季以画著，山水得董源法，格少即师之。及格负重名，群从子弟多工画，其著者源浚，字哲长，官天津县丞。能传徐熙法，笔有生气。

其弟子尤著者：马元驭，字扶曦，常熟人。家贫，好读书。幼即工画，王翬称之。后学于格，得其逸笔，颇称入室。孙女荃，传其学，名与恽冰相匹。元驭尝以画法授同县蒋廷锡，后廷锡官禁近，以书招之，谢不往。

格人品绝高，写生为一代之冠，私淑者众，然不能得其机趣神韵。惟乾隆中华岩号为继迹。后改琦亦差得其意云。

王武，字勤中，吴县人。画花草，流丽多风，王时敏亦称为妙品，学者宗之。及格出，遂掩其上。

沈铨，字南苹，浙江德清人。工写花鸟，专精设色，妍丽绝人。雍正中，日本国王聘往授画，三年乃归，故其国尤重铨画，于格为别派。

龚贤，字半千，江南昆山人。寓江宁，结庐清凉山下，葺半亩园，隐居自得。性孤僻，诗文不苟作。画得董源法，埽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时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弘、叶欣、胡造、谢荪号“金陵八家”。圻，字会公；造，字石公，与荪，皆江宁人；岑，字蔚生，杭州人；喆，字方鲁，吴人；弘，字远度，金溪人；欣，字荣木，华亭人。诸家皆擅雅笔，负时誉，要以贤为称首。

清初画学蔚盛，大江以南，作者尤多，各成派别，以娄东王时敏为大宗。若金陵、云间、嘉禾，新安，皆闻人迭起。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画出于宋旭，为云间派之首，吴、

松间多宗之。

项圣谟，字孔彰，嘉兴人，元汴之孙。初学文征明，后益进于古，董其昌称其与宋人血战，又得元人气韵。子奎，字东井，世其学。

同县李琪枝，子云连，日华之孙。山水淡逸，传世者梅竹为多。项、李皆名族，濡染有绪，群从多以画名。

张庚，字浦山，亦嘉兴人。学于书，浑通画理，著《画征录》及《续录》，自明末至乾、嘉中，所载四百余人。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安徽歙县人。明诸生，后弃举子业，专精书画，家饶于赀，多藏鼎彝古器，及宋、元名迹。初学倪瓒，后参以吴镇、董其昌法，称逸品。晚益以幽淡为宗，疏懒罕接宾客，盖托以逃世。与同县孙逸，休宁汪之瑞、释弘仁，号“新安四家”，久寓扬州，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逸，字无逸。流寓芜湖，曾绘《歙山二十四图》。

之瑞，字无瑞，豪迈自喜，渴笔焦墨，酒酣挥洒为风雨。

时当涂萧云从，字尺木。与逸齐名，山水不专宗法，兼长人物。于采石太白楼下四壁画《五岳图》，又画《太平山水》及《离骚图》，好事者并镌刻以传。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奉天辽阳人，隶籍汉军。父殉耿藩之难，其佩以荫官至户部侍郎。画有奇致，人物山水，并苍浑沉厚，衣纹如草篆，一袖数折，尤善指画，尝画黄初平叱石成羊，或已成羊而起立，或将成而未起，或半成而未离为石，风趣横生。画龙虎，皆极其态。世既重其指墨，晚年以便于挥洒，遂不复用笔，其笔画之佳，几无人知之。雍

正十二年，卒。甥李世倬、朱伦瀚皆学于其佩。

世倬，字汉章，总督如龙子。官至右通政。少至江南，从王翬游，得其传。后官山西，观吴道子《水陆道场图》，悟人物之法。花鸟写生，得其佩指墨之趣，易以笔运，各名一家。

伦瀚，字涵斋，明裔也，隶籍汉军。官至都统，直内廷。指画师其佩，兵壑奇而正，色淡味厚，喜作巨障，元气淋漓。指上生有肉锥，故作人物，须眉尤有神，出于天授。其后传其佩法者，有傅雯，瑛宝。

雯，字凯亭。奉天布衣，为诸王邸客，京师多其遗迹。

瑛宝，字梦禅，满洲人，大学士永贵子。以疾辞荫不仕，诗画自娱。指墨以简贵胜，深自矜许。

张鹏翀，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江苏嘉定人。雍正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詹事。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潇洒自适，类其为人。高宗爱其才，不次拔擢。进奉诗文，多寓规于颂，画无师承，自然入古。虽应制之作，萧散若不经意，愈见神韵。绘《春林淡霭图》，题诗进上，上赐和，鹏翀即于宫门叠韵陈谢。尝从驾西苑液池，一渡之顷，得诗八首。屡敕御舟作画，赐御笔《枇杷折枝》及《松竹双清图》，又赐“双清阁”书额，迭拜笔砚、文绮之赐无算。乾隆十年，乞假归，卒于途次。上眷之，久不忘，对群臣辄曰：“张鹏翀可惜！”

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与鹏翀为尤著。

廷锡以逸笔写生，奇正、工率、浓淡，一幅间恒间出，无

不超脱。源出于恽格，而不为所囿。邦达山水源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于董其昌，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久直内廷，进御之作，大幅寻丈，小册寸许，不下数百。溥、诒各承其家法。维城山水苍秀，花卉付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赏，世谓恽格后罕匹者。诸人所绘并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传为盛事。

嘉庆中，尚书黄钺由主事改官翰林，入直，画为仁宗所赏。道、咸以后，侍郎戴熙、大学士张之万，并官禁近，以画名。然国家浸以多故，视承平故事稍异焉。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荫官参领。从王原祁学画，丘壑似原祁。供奉内廷，圣祖品题当时以为第一手，称“画状元”。历事世宗、高宗。高宗在潜邸，即喜其画，数有题咏，后益被宠遇。唐岱专工山水，以宋人为宗。少时名动公卿。直内廷久，笔法益进，人间传播者转稀。著《绘事发微》行世。

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于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高宗万几之暇，尝幸馆中，每亲指授，时以为荣。其画之精美者，一体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凡载八十余人，其尤卓著可传者十余人。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中，官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楼观，通测算，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寸，量度阴阳向背，分别明暗，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圣祖

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自秉贞创法，画院多相沿袭。

其弟子冷枚，胶州人，为最肖。与绘《万寿盛典图》。

陈枚，江苏娄县人。官内务府郎中，初法宋人，折衷唐寅，后亦参西洋法。寸纸尺缣，图群山万壑，人物胥备。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丹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艾启蒙，亦西洋人。其艺亚于郎世宁。

张宗苍，字默存，江苏吴县人。学画于黄鼎。初官河工主簿。乾隆十六年南巡，献册，受特知，召入直。数年，授户部主事，以老乞归。宗苍山水，气体深厚，多以皴擦取韵，一洗画院甜熟之习，被恩遇特厚。所画著录《石渠》者，百十有六，多荷御题。

弟子徐扬、方琮最得其法，亦邀宸赏，赐扬举人，授内阁中书。

余省，字曾三，江苏常熟人，善写生，能得花外之趣。同时杨大章，亦赋色修洁，可与邹一桂颉，颇花鸟以二人为最工。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南巡进白描罗汉，称旨，召入祇候。廷标画不尚工致，以机趣传神。高宗题所作《琵琶行图》曰：“唐寅旧图，有琵琶伎在别船，廷标祇绘白居易一人侧耳而听，别有会心。古人画意为先，非画院中人所及。”会爱乌罕进四骏，郎世宁绘之，复命廷标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勒人，古趣出彼上。及廷标卒，上命旧粘殿壁者悉付

装池，收入《石渠宝笈》。

丁观鹏，工人物，效明丁云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画仙佛神像最擅长，著录独多。

时有严弘滋者，南巡两次献画，所作三官神像，秀发飞扬，称为绝作，屡命画院诸人摹之。

姚文瀚，亦以人物仙佛名，亚于观鹏。

缪炳泰，字象宾，江苏江阴人。初以国子监生召绘御容。南巡，应召试，赐举人，授中书，官至兵部郎中。乾隆五十年以后御容，皆出所绘。又命绘紫光阁功臣像，人人逼肖，写真之最工者。

画院盛于康、乾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宗苍所作，尤有士气，道光以后无闻焉。至光绪中，孝钦皇后喜艺事，稍复如意馆旧规，画史皆凡材，无可纪者。

华岩，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临汀人。慕杭州西湖之胜，家焉。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工，脱去时蹊，力追古法。有时过求超脱，然其率略处，愈不可及。工诗，有《离垢集》，古质清峭。书法脱俗，世称“三绝”，可继恽格。侨居扬州最久，晚归杭州，卒年近八十。

乾、嘉之间，浙西画学称盛，而扬州游士所聚，一时名流竞逐。其尤著者，为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黄易、钱杜、方薰等。

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雍正初，以荐得官，署安徽绩溪知县，被劾罢。久寓江、淮间，病偏痹，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尝登焦山观《瘞鹤铭》，寻宋陆游题名，

亲埽积藓，燃烛扃图，以败笔清墨为图，传为杰作。性豪迈不羁，藏砚千，手自镌铭，著《砚史》。又藏司马相如玉印，秘为至宝。卢见曾为两淮运使，欲观之，长跪谢不可。其癖类此。

燮，字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辞官鬻画，作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隶法，自号“六分半书”。诗词皆别调，而有挚语。慷慨啸傲，慕明徐渭之为人。

燮同县李鱣，字复堂。举人。官山东滕县知县，花鸟学林良，多得天趣。

陈撰，字楞山，浙江鄞县人，亦居扬州。举鸿博，不就试，与鱣齐名，写梅尤隽逸。

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布衣，荐鸿博，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中岁，游迹半海内，寄居扬州，遂不归。分隶小变汉法，又师《禅国山》及《天发讖》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年五十，始从事于画。初写竹，师石室老人，号稽留山民。继画梅，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又画马，自谓得曹、韩法。复画佛，号心出家庵粥饭僧。其点缀花木，奇柯异叶，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窠之类。”性逋峭，世以迂怪目之。诗亦铗削苦硬。无子，晚手录以付其女。歿后，罗聘搜辑杂文编为集。

聘，字两峰，江都人。淹雅工诗，从农游，称高足弟子，画无不工。耽禅悦，梦入招提曰花之寺，仿佛前身，自号花之寺僧。多摹佛像，又画《鬼趣图》，不一本。游京师，跌宕诗酒，老而益贫。曾沂为两淮运使，资之归，未几卒。妻方

婉仪，亦工诗画，好禅，号白莲居士。

冈，字铁生，号蒙泉，旧为歙县人，居钱塘，遂隶籍。负奇，不得志，寄于诗画。山水取法娄东，自成逸韵；竹石花木，超隽得元人意；四十后名益噪，曾游日本，海外估舶，悬金购其画。征孝廉方正，辞不就。

冈与同县黄易齐名。易父树谷，亦工书画，易详《文苑传》，笃嗜金石，每以访碑纪游作图，为世所重。画境简淡，山左多宗之。

杜，字叔美，号松壶，仁和人。屈于下僚，曾官云南经历，足迹逾万里，深研画学，摹赵伯驹、孟頫、王蒙皆神似。间为金碧云山，妍雅绝俗。画梅疏冷出赵孟坚。兼擅诗名。著《松壶画赘》、《画忆》，多名论。

从兄东，字袖海，画近恽格，名亚于杜。

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父霖，故善画，薰幼从父游吴、越间，多见名迹，接耆宿，遂兼众长。论画曰：“写生以意胜形似。”又曰：“不拘难易，须雅驯。”著《山静居论画》，以布衣终。

王学浩，字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幼学画于同县李豫德，豫德为王原祁外孙，得南宗之传。学浩溯源倪、黄，笔力苍劲。论画曰：“六法，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否则与俗工何异？又曰：“画以简为上，虽烟客、麓台，犹未免繁碎，如大痴，真未易到。大痴法固在荒率苍古中求之，尤须得其不甚著力处。”时论学浩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笔，脱尽窠

白，画格一变。著《南山论画》。卒，年七十九。学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画苑推为尊宿。馆吴中寒碧山庄刘氏，坛坫甚盛。其时吴、越作者虽众，足继前哲名一家者，盖寥寥焉。

黄均，字谷原，元和人。守娄东之法，尽其能事。游京师，法式善，秦瀛为之延誉，得官，补湖北潜江主簿，未之任。于武昌胭脂山麓筑小园，居之二十年，以吏为隐。画晚而益工，于吴中称后劲。

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貽汾、戴熙二人，并自有传。

昭文蒋宝龄著《墨林今话》，继张庚《画征录》之后，子生为《续编》，至咸丰初，视庚录数几倍之。其后光绪中，无锡秦祖咏著《桐阴论画》，论次一代作者，分三编，评鹭较严，称略备焉。今特著其尤工者。宝龄、祖咏画亦并有法。